2025 年第 2 期（總第 66 期）

澳門語言學刊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Revista de Linguística de Macau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　主辦
澳門語言學會　協辦

澳門語言學刊

半年刊 2025 年第 2 期（總第 66 期）2025 年 11 月出版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Revista de Linguística de Macau

Semiyearly No. 2 2025 (Gen. No. 66)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25

責任編輯 席若菲

書籍設計 道 轍

書籍排版 陳先英

出　　版 三聯出版（澳門）有限公司

Sociedade de Publicações Sam Lun (Macau), Limitada

Joint Publishing (Macau) Co., Ltd.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32 號 G 地下

No. 32-G, Avenida do Conselheiro Ferreira de Almeida, Macau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16 樓

印　　刷 香港

香港

版　　次 2025 年 11 月澳門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85mm×260mm）152 面

國際刊號 ISSN 0874-629X

編輯委員會

目錄

CONTENTS

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功能：顯化、別義與示域

樊中元

提　要：文章指出漢語時序關聯成分具有顯化、別義和示域的語義功能。顯化功能是指時序關聯成分顯示和明確語篇語義功能，主要體現在明確時間關係、標明語義節點和連綴事件語義；別義功能是指時序關聯成分在語篇中表達事件語義差異的功能，主要體現在時距差異、情態差異、功能差異和視點差異等；示域功能是指以時序關聯成分作為形式標記而將語篇中的系列事件分別整合成不同的語義單元，從而形成不同的事件語義域，主要體現在標識單層語義域和複合層次語義域。

關鍵詞：時序關聯成分；語義功能；顯化；別義；示域

一、引言

在語篇的構建過程中，運用表語法功能的關聯成分實現語篇組成成分之間的語義連貫是人類語言的共性特徵。在各語言中，關聯成分在語篇中能有效地體現和構建語篇間的邏輯 – 語義關係，並能幫助聽話者完成對語篇的理解（程曉棠、崔榮佳，2004：18—21）。在敘事語篇中，由於時間語義是推進語篇構建的主要因素，因而表達時間順序關係的時序關聯成分就成為敘事語篇中體現時間特徵、實現語篇推理、形成語義連貫的主要語言成分。目前，漢語中有關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研究主要有：呂叔湘（1982：373—376）說明了具有時間連續關係的事件之間在表達相承、先後緊接、習慣性承接等語義關係時所運用的不同關聯成分；廖秋忠（1992：63—68）將篇章中的時間連接成分分為序列時間連接成分和先後時間連接成分，同時又對其進行了下位分類，構建了一個基本的漢語時序關聯成分分類體系；邢福義（2001）、李晉霞（2015）著重分析了“接著”“然後”和“於是”等在句法形式和語義功能上的特徵，並從動作的承接與先後、步驟和節奏等語義和語用角度對兩者進行了辨析；郭中（2019：89—97）將連貫複句的關聯標記模式分為居端依賴式、居中粘接式和前後配套式，並對其語用狀況進行了認知機制解釋等。

已有的研究主要討論了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分類、句法功能、語義特徵以及語用功能等，但總體上看，這些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還沒有形成時序關聯成分的句法、語義和語用等方面的系統研究。同時，在關注時序關聯成分邏輯語義功能研究時，對其在語篇構建及其認知機

制上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基於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顯化、別義和示域等語義功能進行系統的探討。本文的時序關聯成分主要包括起時序關聯作用的連詞、副詞及部分時間名詞等。

二、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顯化功能

當依照時間順序發生的系列事件在運用語言線性表徵時，事件之間的排列順序與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構成平行關係，因此，敘事語篇中表達事件的先後時間關係經常不需要使用時序關聯成分，人們通過語言線性語序關係就能理解事件發生的先後關係，如呂叔湘（1982：373）認為“不分賓主的幾件事情先後相繼，常常可以不用任何關係詞來連繫。”但由於不同事件在時序上體現的時間位序、時段、時距等時間特徵的不同，以及事件之間的參與者、動作、方式、因果等要素之間的不同聯繫，使敘事語篇形成較為複雜的語義結構。因此為了使人們更為清晰和準確地理解語篇的複雜語義結構及其關係，說話者往往會使用時序關聯成分來顯示和明確語篇語義，也就是使時序關聯成分承擔語義顯化功能。具體地說，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顯化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 明確時間關係

如果對時序關聯成分進行語義分類，則最基本的類別就是時間關係語義類別。如廖秋忠（1992）把時間關係連接成分分為序列時間連接成分和先後時間連接成分。序列時間連接成分又分為表起始時間（如“最先、首先、起初、最早”等）、中間時間（如“接著、跟著、然後、就”等）和結尾時間（如“最後、最終、於是”等）三種連接成分，先後時間連接成分又分為以前（如“先、原先、從前”等）、以後（如“後來、接著、接下來、此後”等）和共時（如“同時、一方面”等）三類連接成分。張誼生（1996）也把時間副詞分為表先時順序、後時順序、起始順序和終止順序四類。表示不同時間關係的關聯成分運用到語篇中，能夠標明不同事件的時間位序、顯化事件之間的時間關係、構建事件之間的時間框架。例如：

（1）其實他的材料究竟有限，或者因為時運不濟，終沒抖起來。最後他想了一個吃飯的法子，皆因永興寺是各家報館的發報所，他便在寺裏賃了一間房，沒事給各家報館投一點稿子，畫一點插畫。（穆辰公《北京》）

（2）起先，因為距離得相當遠，那個人好像還不曾察覺，後來追隨得近了，他才知道後面有人。（葉紫《行軍掉隊記》）

（3）電話放下不久，我辦公室的電話就響個不停，最先是王家物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滕錦華打來的，然後是寶泰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方生打來的，接著是朋友計程車公司總經理占賦打來的，最後是大西部農莊的莊主程自祖打來的，他們的電話內容全部是一樣的……（鄧一光《揚起揚落》）

例（1）中，運用“最後”連接前後事件，標示前後事件處於不同的時間先後位置，或者說前後事件構成兩個時間段關係。例（2）中，“起先”“後來”“才”的運用，顯示了系列事件之間的時間先後關係，並把系列事件明確劃分為三個時間段，構成一個時間框架關係。例（3）

中，運用了“最先”“然後”“接著”“最後”四個時序關聯成分，顯示了各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關係，也構建了一個事件發生的“最先……然後……接著……最後……”的相對封閉的時間序列框架。

2.2 標明語義節點

敘事語篇中，事件是構成語篇的基本意義單元，而不同事件之間依照時間順序排列推進語篇建構、實現語義的整體連貫。但在通過時間順序構成的的敘事語篇中，各事件之間除了存在時間上的順承關係之外，在事件的運動路徑、空間方向、因果關係等語義上也構建起不同語義聯繫，並且這些語義關係在語篇中不斷產生語義轉換，如運動路徑的改變、空間方位的變換、事件類別的不同等。鄒海清、王悅（2020：98）認為如果序列事件之間的某個位置出現了明顯的語義轉換，那麼這個位置就會形成一個語義節點；或者說語義節點就是序列事件所構建的語義網絡中，語義發生明顯改變的分叉點。在語義分叉點的表徵中，時序關聯成分是提示語義轉換的一個主要句法手段。通過時序關聯成分的運用，能顯示語義節點關係、明示語義關係結構。“在符號表徵的過程中，言者時常需要使用一些符號手段，明示意義單元之間的語義邏輯關係，保證意義結構的清晰表徵。”（殷禎岑，2024：113）。邢福義（2001：32）也認為關聯詞語的顯示作用就是兩個分句之間本來隱含某種關係，人們運用表明這種關係的詞語顯示了這種關係。例如：

（4）哥哥抓起兩個鬮中的一個，停了一會兒後方才打開來看，看後就交給了父親，而後下炕，一聲不響抓起門邊的鋤頭，下地幹活。（王海 《新結婚時代》）

（5）江菊霞住在二樓，出了電梯，走廚房那個後門，向右手進去，便是一間華麗的客廳。（周而復《上海的早晨》）

（6）他拿那個撥，撥不下來，然後就拿鑿子。（萬美春《殭屍保鏢》）

例（4）中，“而後”連接的前後事件屬於不同的事類，“而後”之前屬於“哥哥抓鬮”事件，之後屬於“哥哥出外幹活”事件。例中的“而後”既顯示了時序關係，也標示了事件的語義節點。例（5）的“便”一方面顯示系列事件順序關係，另一方面也標示了事件運動路徑關係。“便”之前的是事件的運動路徑，之後是運動終點。例（6）中，“然後”在表示前後事件的時序關係時，也對前後的因果語義節點關係起到了標示作用。

2.3 連綴事件語義

由系列具有時間連續性關係的事件構成的語篇中，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語義關係受時距間隔、空間轉換、場景變化、主體變更等因素的影響而對語篇理解形成不同的認知狀態。反映日常動作行為、程序性行為或者處於相同的語義認知域的系列事件有較高的認知可及性，容易在概念與關係上整合為有序的時間意義框架，從而有利於聽讀者對語篇語義的連貫理解。而當系列事件之間的人物、時間、空間、因果等因素上處於不連續關係時，聽讀者對語篇的語義認知容易處於離散異質狀態，或者說難以形成語篇語義的整合和連貫，這不利於聽讀者對語篇語義的理解。Zwaan 等（1995: 292-297）在談到語篇的知識整合時認為，語篇理解者在理解語篇時，會實現對人物、時間、空間、因果關係和意向性五個維度上的信息監測，以保持信息的連貫，如果任何一個信息維度發生變化，都會造成理解者在更新心理表徵時處理成本的增加，特

別是當時間與人物處於不連續性時，信息處理的成本會更大。因此為了更好地構建語篇的語義連貫性，減少理解者的心理處理成本，當系列事件之間在時間、空間、人物、因果等因素上產生非連續的離散狀態時，語篇構建者就可能運用語篇連接手段將它們綴連成為一個整體的意義框架，構成有序共存、語義連貫的語篇，便於聽話者基於經驗和知識進行語義連貫的語篇解讀。而在敘事性語篇中，由於時序關聯成分具有時間順序義，因而當其關聯系列事件時，能將非連續性的、離散的事件語義整合起來，使其連綴有序，賦予時序意義框架，成為連綴語篇語義關係的連接手段。比較：

（7）老張自己冷靜了幾秒鐘，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的讀了一遍，然後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老舍《老張的哲學》）

→？老張自己冷靜了幾秒鐘，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的讀了一遍，（ ）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

（8）他動了動腦袋，睜開眼望了望我，臉上的表情很冷漠，接著又歪過腦袋繼續睡他的覺了。（卞慶奎《中國北漂藝人生存實錄》）

→？他動了動腦袋，睜開眼望了望我，臉上的表情很冷漠，（ ）又歪過腦袋繼續睡他的覺了。

（9）先是偷著當首飾，當衣裳，後來耍著不接氣，連房契帶地契，也背著媳婦兒哥，全給押出去了，沒有多少日子，也都報了揍字兒了。（自了生《張鐵漢》）

→？先是偷著當首飾，當衣裳，（ ）耍著不接氣，連房契帶地契，也背著媳婦兒哥，全給押出去了，沒有多少日子，也都報了揍字兒了。

以上例子中，由關聯成分“然後”“接著”“後來”連接的前後事件在語義上不具連續性，刪除這些關聯成分則不能推進語義的連貫，構成完整的語篇。而運用這些關聯成分，則能將這些事件因素處於非連續性狀態下的事件連綴起來，整合在一個時序框架之中，構成一個具有時序關聯的語篇。

三、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別義功能

時序關聯成分的別義功能是指時序關聯成分在語篇中表達事件語義差異的功能。在敘事語篇中，事件與事件之間以時間連續方式推進語篇的形成，但同時構成事件的參與者、對象、動作、時間、情態、方式、空間、方位、因果等語義因素又以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及相互制約的方式共存於語篇當中，實現語義連貫、形成統一的語篇整體。從形成敘事語篇的語義連貫看，人們一方面探討句法與語義的互動關係下事件要素如何完成語篇的語義連貫。如 Halliday & Hasan（1976）從銜接入手探索了語篇內部不同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Parsons（1990）論證了事件論元對句內成分的語義性質及句子之間語義關係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徐赳赳（2003）從人物、事件和事物等詞的回指現象探討話語篇章結構的特徵及句法語義和語用在篇章中的相互關係等。另一方面，人們也關注敘事語篇中事件要素之間的差異及其在句法中的體現。如 Longacre（1983）從語言形式角度將連貫關係概括為並列、時間、因果和對立四種類型，李宏德（2017）探討了漢語和英語中時間表達的異同及理據。而作為敘事語篇中對語義起連貫作用

的時序關聯成分，既能有效地明確和顯示語篇的語義聯繫，同時，不同的時序關聯成分也能對事件之間的語義關係起區分作用，從而使時序關聯成分具有語義示別功能，體現出語義的示別價值。根據我們的考察，不同的時序關聯成分的別義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 時距差異

當事件與事件以時間順序關係接續在一起時，會體現出時間距離關係的差別，有的事件之間相距時間較長，有的事件之間相距時間較短，這種時距語義差別在句法上有時會運用時序關聯成分進行表達。如李晉霞（2015：43）考察“然後”與“接著”表達時間連貫語義時，認為“接著”有短時間隔傾向，“然後”則既可用於短時間隔，又可用於長時間隔。例如：

（10）金秀正在外間枯坐，聞聲應了一句，匆匆從沙發上站起來，走過衣鏡時理了理頭髮，抹了抹眼睛，然後給妹妹開門。（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

（11）太陽系是由一塊星雲收縮形成的，先形成的是太陽，然後剩餘的星雲物質進一步收縮演化形成行星。（林崇德、王德勝《中國少年兒童百科全書》）

（12）一天，老宋正做早飯，聽見廟門響了一聲，接著就聽見那口鐘當當當當地響起來。（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

“然後”既可在例（10）中連接較短的事件時間距離，也可在例（11）中連接較長的事件時間距離。而“接著”只能用於例（12）或（10）較短的事件時間距離，不能用於像例（11）的較長事件的事件距離。

在我們考察的時序關聯成分中，具有表時距語義傾向的主要是表短時的“隨後、隨即、接著、緊接著、接下來、跟著、緊跟著、就、於是”等，表長時的“後來、這才、才、最後、最終、終於”等。

時距差別還表現在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影響，基於人們對事件之間時間關係的主觀認知，事件之間的時距關係賦予了主觀語義特徵。如“就”和“才”的時距語義關係往往與人們對事件之間的時距認知有關。例如：

（13）a：他同鐵匠磨了一刻多鐘才講好了工錢。（果戈里《死魂靈》）

b：他同鐵匠磨了一刻多鐘就講好了工錢。

例（13a）中的“才”表示“同鐵匠磨了一刻多鐘”與“講好了工錢”兩個事件之間的時距比較長，而（13b）中換成“就”則表示兩個事件之間的距離比較短。

3.2 情狀差異

情狀差別是指具有時序關係的事件之間的方式、狀態等關係。邢福義（2001：214）比較“然後”和“接著”時，認為“接著”在表示動作的承接時，突出了動作的緊接性，具有緊張感，而“然後”沒有這種意義。如例（14）中把“接著”換成“然後”就語義不通暢。

（14）每天天還沒亮，母親就第一個起身，接著聽見祖母起來的聲音，接著大家都離開床舖，餵豬的餵豬，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朱德《回憶我的母親》）

“接著”和“跟著”在時距上都表示短時義，但它們在表示事件的程序性和步驟性狀態時卻存在區別。“接著”能表示具有程序和步驟情態關係的特定事序義，而“跟著”不能表示事件的這種情態關係義。例如：

（15）兩手輕握，以雙手拇指中段互相搓熱，沿眼眶周圍順時針輕熨轉，接著換為逆時針熨轉。（聞卓《給老爸老媽的 100 個長壽秘訣》）

（16）最初是要求左腳踩在直線上，右腳不限；接著按相反條件行走；最後，左右腳交替踩在直線上走。（《讀者》1985 年第 5 期）

例（15）敘述的是按摩手法，例（16）講述的是試驗步驟，這兩例中的“接著”表達的不單純是自然順序，更突顯了特定事序，表達了事件發展的步驟性和程序性，這時不能用“跟著”替換。

“最後”和“最終”在時序關係上都表示處於系列事件的末端事件，但是兩者在表示事件的情態關係上存在區別。“最終”在表示事件發生的狀態時，往往能突出事件的異態性，即表示事件產生的最終結果是非常態下達成的。而“最後”不突顯事件的異態性。例如：

（17）從草垛的另一邊衝了出來，撞向另一個乾草垛，最終停了下來。（朱學恒《龍槍短篇故事》）

（18）從 1990 年至 1993 年年底，人民幣匯率經過無數次下調後，最終至 5.77%。（潘國陵《國際金融講義》）

例（17）中，“從草垛的另一邊衝了出來，撞向另一個乾草垛”和“停了下來”由“最終”連接，表達了後者是動作的結果。例（18）中表達了“最終”引出匯率下調結果的 5.77%，是無數次下調這個異態行為的結果。這些例子如果換成“最後”，則異態義基本消失，主要表達的是事件時序義和過程義。比較：

（17’）從草垛的另一邊衝了出來，撞向另一個乾草垛，最後停了下來。

（18’）從 1990 年至 1993 年年底，人民幣匯率經過無數次下調後，最後至 5.77%。

3.3 功能差異

由因至果、由動作到目的邏輯關係也具有時序特徵，因此從語言的類型學角度看，世界語言普遍存在既能表示時序語義也能表示因果等關係的句法成分。漢語的時序關聯成分中，“於是”“最終”“然後”“一……就……”“就”“才”等既能表達時序關係，也能表達事件的其他語義關係，呈現語義的多功能性，而“起初”“後來”“最後”等基本表達時序語義，具有語義的單一性。因而，漢語語篇中使用不同的時序關聯成分具有語義的區別作用。如“然後”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時序關聯成分，因其高頻使用而衍生出豐富的語義功能（王慧萍、潘秋平，2011）。例如：

（19）他失戀啊，然後就心情很差。

（20）人家覺得我個子小小的，然後還蠻高音。

（21）他喜歡美女，然後更喜歡有錢的美女。

（22）我要選貴妃，然後她要選骨感美女。

（23）我覺得個性要認真，然後有幽默感，然後孝順，然後上進。

上面例中的“然後”，例（19）表示因果關係，例（20）表示轉折關係，例（21）表示遞進關係，例（22）表示對比關係，例（23）表示並列關係。

“於是”在表示時序關係時，還常常有明顯的因果關係。例如：

（24）他知道自己打不過諸葛亮，於是他就關上城門。（姚明《我的世界我的夢》）

（25）一天照準了他的頭打下去，不知怎麼樣沒看準，打斷了尾巴尖兒了。於是毒蛇驚怕著，逃進地板底下去。（中田敬義《伊蘇普喻言》）

以上兩例中的“於是”都可以換成“所以”，語義基本不變。

“一……就……”既能表示時序語義，也能表示條件、因果等語義關係（黃曉紅，2014）。例如：

（26）覺慧一進門，就高興地大聲說。

（27）何順一見歪理講不通，就露出了本相。

（28）她一看見方宏偉的粉刺後就心跳。

以上例中的“一……就……”都具有時序義，但例（27）（28）還分別表達了因果義和條件義。

3.4 視點差異

人們對認知對象進行的觀察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指人們依照一定的路向對認知對象進行觀測、對象被視為各個連續階段的組合的次第掃描，次第掃描主要側重於可感知對象在各個階段的變化；二是對認知對象從宏觀上做整體性觀測的總括掃描，總括掃描的結果是認知對象的各方面信息被整合成一個整體或一個完形的，側重於觀測的整體效應（張國憲，2009；Langacker, 1987: 144-145）。次第掃描和總括掃描體現了人們對認知對象不同的視點觀察方式。這種觀察事物的視點差異在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表達中也能體現出來，並形成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差別。樊中元（2018：56—57）從視點角度說明了“後來”與“然後”的語義差別，認為“後來”是以靜態式的時間比照方式作為觀察視點的，各事件之間具有相對的獨立和模組性，“然後”強調的是事件之間掃視性的動態時間關係，時間順序義是其表現的顯赫語義，由“然後”連接的事件之間體現的是時間接續關係。在句法上的表現就是“後來”與其他成分可換位，而“然後”不能換位。例如：

（29）原來我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不知道。→*然後我才知道，原來我不知道。

（30）後來他說明了這件事的經過，開始沒有說明。→開始沒有說明，後來他說明了這件事的經過。→*然後他說明了這件事的經過，開始沒有說明。

從別義角度考察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功能，可以反映不同時序關聯成分的特徵差異，體現不同時序成分存在的功能價值，構建時序關聯成分的特徵差異體系，並能進一步揭示時序關聯成分在構建語篇中的機制和價值。因此，關注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示別功能是今後的一個主要問題。

四、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示域功能

敘事語篇的典型特徵是事件的時序性，因此時序義是敘事語篇的基本語義。如果我們用 P 表示某個事件單元，則敘事語篇按照時序義而構成的基本推進模式是：P1 → P2 → P3 →…… Pn。該模式也與敘事語篇的語言線性表達具有平行性。但在語篇構建過程中，由於表示事件發

展及其結果的因果關係、事件發生的空間情景、事件所反映的預期道德評價以及事件描述的真實性與虛構性等語義也共同參與到語篇的構建，因而，語篇就成為複雜的語義結構體（周紅，2017）。而在語篇的複雜語義結構關係中，由於各語義之間的關聯度不同以及人們對事件語義關係認知的差異，人們會依據事件的因果關係，時間、空間關係，主體接續關係，部分與整體關係，特徵、方式、意圖關係等語義維度而進行語義整合，如果某些事件在某個語義維度上更具關聯性，並比其他事件更具區別度，因而更容易在認知上整合為一個語義整體，構成一個語義域。因此，對以上敘事語篇的基本推進模式，我們可根據語義整合形成的語義域關係表示為：[P1 → P2] → [P3 → P4] →…… [Pn]。例如：

（31）他的妻子慢慢地轉過頭來（P1），盯著他（P2）。於是，他低下頭來（P3），好像在避開奔馳而過的馬（P4），然而這些馬把他的身心都帶走了（P5）。（左拉《娜娜》）

例（31）中，由於事件發生的主體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語義域。P1 和 P2 的事件主體是“他的妻子”，P3 和 P4 的事件主體是“他”，P5 的主體是“這些馬”。因為事件的主體不同，則這些事件之間構成了以事件主體為語義維度差別的語義域。可表示為：[P1 → P2] → [P3 → P4] → [P5]。

當語篇內各種事件之間形成不同的語義域時，為便於人們認知和理解語篇語義，往往需要運用一定的語言形式進行語義域的標識。而作為敘事語篇中表達基本時序語義的時序關聯成分就常常在語篇中履行語義域的標識功能。具體說，時序關聯成分的語義示域功能就是指以時序關聯成分作為形式標記，而將語篇中的系列事件分別整合成不同的語義單元，從而形成不同事件語義域。從時序關聯成分標識的語義域層次關係看，有單層語義域和複合層次語義域兩種。

4.1 標識單層語義域

標識單層語義域是指時序關聯成分所標識的語義域處於同一個層次的並行關係。例如：

（32）結晶產生了大量氣體［P1］，形成許多氣泡［P2］，在水桶裏劈哩啪啦地作響［P3］，接著就變成了五光十色的火焰［P4］。（《讀者》1986 年第 9 期）

（33）每個人自己設計菜譜、購買原料［P1］，直到做好一道道菜餚［P2］，然後讓“民選員工代表”給每一道菜打分［P3］，最後得分最高的大廚勝出［P4］。（李開復《世界因你而不同：李開復自傳》）

例（32）表達的是結晶形成火焰的系列行為過程，整個過程實際上被整合為兩個語義域：由結晶變成火焰前的系列行為構成的語義域和變成火焰的行為構成的語義域。而這兩個語義域就由關聯成分“接著”進行了標識，或者說“接著”是標示該語篇語義域的標誌成分。從層次關係看，[P1]、[P2] 和 [P3] 共同構成的語義域與 [P4] 表達的語義域屬於同一個語義層次，可表示為：[P1 → P2 → P3]（→）+ [P4]。例（33）是表達菜餚製作到評選的過程，整個過程則是由 [P1] 和 [P2] 表示做好菜餚的語義域、[P3] 給菜打分的動作語義域、[P4] 表示最終結果的語義域等三個語義域構成，並且這三個語義域分別由“然後”和“最後”進行標識。從層次關係看，[P1]、[P2]、[P3] 和 [P4] 處於語義的平行關係，可表示為 [P1 → P2]（→）+ [P3]（→）+ [P4]。

4.2 標識複合層次語義域

林忠、吳潔瓊（2021）介紹副詞起篇章銜接作用時，認為句首表時間副詞不僅可以推動語篇發展，且具有切分語篇的作用，使得語篇具有層次感。時序關聯成分在標識事件語義域時，也常常通過關聯標記的套用形式標識語義域，使標識的語義域形成套合關係，並顯示出一定的層次關係，構成一個複合層次語義域。例如：

（34）剽牛時先由年節主持者將牛拴在木樁上［P1］，然後由年輕女子在牛背上披蓋麻布毯［P2］，給牛角掛珠鏈［P3］，擺好祭品［P4］，點燃松明和松樹毛（松葉）［P5］。最後由一名父母雙全的青年男子，用鋒利的竹矛將牛刺死［P6］，然後就地將牛肉切割［P7］，當即用大鍋煮食［P8］。（網絡語料）

（35）黃蓉微微一驚：“襄兒連大校場上的比武也不要看，定是和楊過暗中約上了。”［P1］於是先回自己房中［P2］，身邊暗藏金針暗器［P3］，腰間插了柄短劍［P4］，再拿了短棒［P5］，然後往後花園來［P6］。（金庸《神鵰俠侶》）

例（34）是敘述系列動作構成的剽牛過程，而整個過程通過“先”“然後”“最後”等關聯成分標識為三個並行關係的語義域，即［P1］（→）+［P2 → P3 → P4 → P5］（→）+［P6 → P7 → P8］。但其中由“最後”標示的［P6］［P7］［P8］中，“然後”和“當即”標示的語義域卻是屬於“最後”的下位語義域，具有語義域的層次關係，構成了一個複合層次的語義域。可表示為［P1］（→）+［P2 → P3 → P4 → P5］（→）+［P6 →［P7 → P8］］。例（35）是由“於是”標識為黃蓉前後兩種行為的語義域，即［P1］和［P2］［P3］［P4］［P5］［P6］構成兩個平行的語義域關係。但“於是”關聯的後項成分卻又由“先”“再”“然後”標識成三個語義域，即［P2］［P3］［P4］、［P5］和［P6］構成三個平行關係的語義域，它們處於“於是”的下位語義域。整個語篇由關聯成分標識為一個複合層次的語義域，可表示為：［P1］（→）+［［P2 → P3 → P4］（→）+［P5］（→）+［P6］］。

五、結語

時序關聯成分的基本語義是表達時間先後順序義，基於其基本的語義特徵，時序關聯成分成為敘事語篇中起語義關聯的主要句法成分。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時序關聯成分在標識時序義時，還承擔了更多的其他語義功能。本文以漢語的時序成分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在語篇中的主要語義功能，認為漢語時序關聯的語義功能主要體現在顯化、別義和示域三個方面。顯化功能主要體現在標誌時間關係、明示語義節點和連綴事件語義；別義功能主要體現在標誌時距差異、情態差異、功能差異和視點差異等；示域功能就是指以時序關聯成分作為形式標記而將語篇中的系列事件分別整合成不同的語義單元，從而形成不同的事件語義域，主要表現有標識單層語義域和複合語義域。但我們也認為，對漢語時序關聯成分語義功能的考察還需進一步做到：一是時序關聯成分在語義功能上的個體差異，即不同時序關聯成分基於其句法表現和語義特徵所形成的個性功能差異；二是系統考察時序關聯成分之間的語義差異，從而建立時序關聯

成分語義差異的參項系統；三是將漢語時序關聯成分與其他語言的時序關聯成分進行比較，進一步認識漢語時序關聯成分的類型學意義。

參考文獻

程曉棠、崔榮佳 2004《連接性詞語的功能新解》,《外語教學》第 2 期。

樊中元 2018《連貫句標記“然後”與“後來”的語義比較》,《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郭　中 2019《現代漢語複句關聯標記模式的類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曉紅 2014《“一 X 就 Y”句式的語義類型》,《理論月刊》第 10 期。

李宏德 2017《漢英時間表達異同及其理據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李晉霞 2015《相似複句關係詞語對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廖秋忠 1992《廖秋忠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林　忠、吳潔瓊 2021《英語句首漂移副詞在敘事文本中的篇章功能——以 Treasure Island 文本為例》,《六盤水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

呂叔湘 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慧萍、潘秋平 2011《從語義地圖談“然後”》，載吳福祥、張誼生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五），北京：商務印書館。

邢福義 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徐赳赳 2003《現代漢語篇章回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殷禎岑 2024《語篇意義整合的過程機制與手段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張國憲 2009《“在 + 處所”構式的動詞標量取值及其意義浮現》,《中國語文》第 4 期。

張誼生 1996《副詞的篇章連接功能》,《語言研究》第 1 期。

周　紅 2017《近二十年來國內敘事語篇研究述評》,《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 4 期。

鄒海清、王　悅 2020《語義節點和邏輯語義關係對序列事件小句中“然後”位置的影響》,《海外華文教育》第 2 期。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gacre, R. E. 1983. *The Grammar of Discourse*. New York: Plenum Press.

Parsons, T.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Zwaan, R. A, Langston, M. C & Graesser, A. C.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 models in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n event-indexing model. *Psychological Science* 6(5): 292-297.

樊中元　廣西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fyw0626@163.com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in Chinese: Manifes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cation of Scope

FAN Zhongy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in Chinese posses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Manifes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cation of Scope. The manifesting function refers to the role of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in presenting and clarifying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a discours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emporal relations, marking semantic nodes, and connecting the semantics of events. The differentiating function refers to the role of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in expressing differences in the semantics of events within a discours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differences of time intervals, modality, functions and viewpoints.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scopes refers to integrating a series of events in a discourse into different semantic units respectively by using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forming various event semantic scope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marking single-layer semantic scopes and multi-layer composite semantic ones.

Keywords: Temporal Correlative Components; semantic function; Manifestation; Differentiation; Indication of Scope

跨語言視角下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與編碼類型 *

葛平平

提　要：基於語系、語言類型和地理區域分佈的相對平衡性，本文選取 40 種語言作為樣本，對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情況及其編碼類型進行系統考察。根據施事的句法實現形式，將被動態劃分為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三類，其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施事隱含型＞施事出現型。在施事出現的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主要有非核心格編碼型、介詞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以及無標記編碼型，它們的優勢序列為：介詞編碼型＞非核心格編碼型＞無標記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在此基礎上，本文從語系影響、語言接觸與形態簡化三個維度分析該優勢序列的成因。

關鍵詞：被動態；施事隱現；編碼類型；語言類型學；成因

一、引言

被動態是世界語言中普遍存在的語法範疇，其形態—句法實現因語言類型的不同而表現出多樣性。鑑於其在語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被動態一直是語言學研究的重點課題，已有研究從多種角度探討了被動態的句法形式、語義功能與分佈特徵等問題。

在形式語言學框架下，施事論元在被動態中的隱現狀況被視為語法結構生成與句法映射的重要議題。以生成語法為代表的研究強調論元結構的轉換與 θ-role 的重新分配（如 Chomsky, 1981, 1995）。諸多研究指出，施事論元的隱含並非意味著語義上的缺失，而是由句法鏈條中的空代詞（PRO）或隱含論元（implicit arguments）所控制（如 Jaeggli, 1986; Baker 等，1989）。此外，Rizzi（1986）和 Collins（2005）等提出的“偷帶”（smuggling）或輕動詞（light verb）分析也對施事位置的可及性與可控制性進行了深入討論。在具體語言研究中，被動態中施事的句法表現也廣受關注，如漢語被動句被劃分為長被動和短被動，其依據就是施事是否出現。

在類型學研究框架下，Keenan（1985）將施事隱現作為判斷被動態基本性的重要標準，提出大多數語言的典型被動態中不含施事，並稱之為“基本被動態”（basic passive），而施事的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重點項目“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編號 24FYYA007）、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漢藏語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編號 2022SJYB0131）的階段性成果。感謝《澳門語言學刊》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顯性表達則屬於“非基本被動態”（non-basic passive），之所以認為施事短語通常不是被動態結構的核心組成部分，主要有三個理由：（1）許多語言的被動態不允許出現施事短語；（2）施事短語同樣也出現在非被動結構中；（3）即使施事短語出現，通常表現為一個獨立存在的旁格名詞短語（oblique NP）。Kazenin（2001）根據被動態的構成將其分為兩類：綜合型被動態和分析型被動態。Siewierska（2013）在對 373 種語言的廣泛調查中發現，被動態存在顯著的類型學差異，並據此劃分出“人稱被動態（personal passive）”與“非人稱被動態（impersonal passive）”兩類，其核心區分點即在於施事與受事的句法編碼能力。Zúñiga & Kittilä（2019）則把被動態分為原型被動態（prototypical passive）和非原型被動態（non-prototypical passive），其中含有施事論元的被動態被視為原型被動態，而無施事論元的結構則歸入非原型被動態。該界定方式主要遵循當前大多數關於語態的研究中對被動態結構特徵的概括（參見 Dixon & Aikhenvald, 2000; Kulikov, 2011）。該劃分與 Shibatani（1985）、Keenan（1985）、以及 Keenan & Dryer（2007）將無施事被動態視為原型、有施事被動態視為非原型的觀點截然相反。Ge & Comrie（2022）討論了變價與形態類型之間的相關性，其中最重要的減價操作之一便是被動態，其特點在於涉及施事論元的刪減或降格。

當前研究在被動態的基本類型建構、句法生成機制、跨語言變異特徵及語言個案描寫等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相關理論框架和實證材料不斷豐富，但還存在若干值得深入探討之處。第一，關於施事論元句法表現的系統性研究較為薄弱。傳統研究多關注受事論元的提升機制，然而對於施事的隱現類型、編碼方式、語用限制與類型分佈等維度的系統分析相對滯後，亟需從類型學與句法接口的角度展開更廣泛探索。第二，施事編碼類型的描述標準尚不統一。當前文獻中關於施事引介方式的術語與分類標準差異較大，缺乏清晰可比的界定依據，限制了跨語言研究的操作性與可重複性。第三，語言形態類型與施事編碼類型之間的關聯尚未得到系統驗證。目前類型學研究已關注到語法結構的地理與譜系分佈趨勢，而在語言形態類型與施事編碼策略之間的關聯與偏好傾向方面尚未提出普遍性解釋。

本研究聚焦於上述理論與議題，圍繞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展開探討：（1）在不同語言中，被動態中施事論元的隱現是否呈現出系統性差異？（2）當施事以顯性形式表達時，不同形態類型的語言（如孤立語、黏著語）採用何種編碼或引介方式？（3）施事的編碼方式是否呈現出系統性的類型學偏好趨勢？若是，如何對其進行解釋？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選取來自六個主要宏觀地理區域[①]、24 個語系[②]的 40 種語言作為樣本，涵蓋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s）、黏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s）、融合語（fusional

① 六個主要宏觀地理區域：亞歐大陸、巴布尼西亞（Papunesia）、北美、南美、澳大利亞、非洲。巴布尼西亞，Glottolog 上一個特色的地理概念，指台灣島、馬來群島、新幾內亞島和達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三大太平洋群島這片區域，為南島語系和巴布亞諸語的分佈範圍。

② 24 個不同語系：大西洋 – 剛果語系（3）、亞非語系（1）、米爾迪語系（1）、南亞語系（1）、壯侗語系（1）、苗瑤語系（2）、漢藏語系（6）、日語系（1）、通古斯語系（1）、突厥語系（1）、烏拉爾語系（1）、南高加索語系（1）、東北高加索語系（1）、阿布哈茲 – 阿迪格語系（1）、阿伊努語系（1）、印歐語系（9）、猶他 – 阿茲特克語系（1）、愛斯基摩 – 阿留申語系（1）、阿爾吉克語系（1）、瑪雅語系（1）、薩利希語系（1）、博拉語系（1）、雅姆語系（1）、塞皮克語系（1）。

languages）和複綜語（polysynthetic languages）各 10 種[③]。樣本語言在語系[④]分佈、地理區域覆蓋與形態類型[⑤]選擇三個維度上盡量保持相對平衡。研究語料主要來源於參考語法書、專題論文集及相關語言學研究成果。

二、原型被動態

不同類型語言中的被動態雖在句法形式上表現出多樣性，整體上仍高度契合“原型被動態”（prototypical passive）的結構特徵。Dixon & Aikhenvald（2000: 7）與 Zúñiga & Kittilä（2019: 83）均從類型學角度探討了原型被動態的核心屬性。兩者在細節上有所分歧，但都為我們提供了原型被動態的經典模式。通過跨語言考察，原型被動態通常具備以下四項特徵：

a. 被動態適用於及物小句，派生出句法價低於主動態一價的結構（例如：主動態中為二價動詞，在被動態中變為一價）；

b. 被動態的主語對應於主動態的賓語 P；

c. 被動態中的外圍論元（通常為非核心格或介詞標記）對應於主動態中的主語 A，且該論元通常可省略。

d. 被動態在謂詞結構上具有形式標記，如動詞詞綴或迂迴動詞結構。

基於上述特徵，在語法角色的轉換關係中，被動態主語（S_2）源自主動態賓語（P_2），而主動態主語（A_1）則被降格為附加語或省略，其語法對應關係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動態和被動態之間的語法關係

語態	語法關係	A_1	P_2
主動態	A_1 V P_2	SBJ	OBJ
被動態	S_2 V_{PASS} (ADJ_1)/ S_2 PASS V (ADJ_1)	ADJ/ 省略	SBJ

以日語為例，被動態通過在動詞後附加被動後綴 *-rare* 構成，例（1）展示了日語主動態與被動態之間的語法對應關係。

日語（Kishimoto 等，2015：776）

（1）a. Sensei-ga　　gakusei-o　　home-ta.
　　老師 -NOM　　學生 -ACC　　表揚 -PST
　　‘老師表揚了學生。’

---

③ 孤立語（10）：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白語、諾蘇彝語、漢語、豐語（Fongbe）、約魯巴語；黏著語（10）：日語、埃文語（Even）、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格魯吉亞語、貝希塔語（Bezhta）、普米語、斯瓦希里語、雅基語（Yaqui）、嫩語（Nen）；融合語（10）：拉丁語、意大利語、德語、英語、現代希臘語、俄語、冰島語、立陶宛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印地 – 烏爾都語；複綜語（10）：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奧傑布瓦語（Ojibwe）、尤卡坦瑪雅語（Yucatec Maya）、阿伊努語、欽唐語（Chintang）、卡巴爾達語（Kabardian）、阿拉姆布拉克語（Alamblak）、賈明瓊語（Jaminjung）、薩萊蒙薩利希語（Sliammon Salish）、博拉語（Bora）。

④ 樣本語言的族系和地理區域劃分的相關信息來源於 Glottolog（https://glottolog.org/glottolog/language, Hammarström 等，2025）。

⑤ 語言的形態分類主要基於 Comrie（2018），Haspelmath & Sims（2010），葉蜚聲、徐通鏘（2010）等。

b. Gakusei-ga (sensei-ni) hom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DAT） 表揚 -PASS-PST
‘學生被（老師）表揚了。’

三、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類型

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現象並非句法結構中的偶發事件，而是語言信息組織策略與句法結構調整互動的結果。Foley（2007）按基本功能將被動態劃分為兩類：前景化被動態和後景化被動態。前者通過被動化突出非施事論元，將其設為話語焦點，取代施事原有的顯著位置。後者則體現了被動態的核心特徵，即降低施事論元的顯著性，將其從核心語法位置移除。施事在句法結構中的降格程度因語言而異，可能以旁格形式出現，也可能被完全壓制。因此，在句法上，被動態涉及底層施事與受事句法位置的重新分配。被動化過程中，施事的句法實現通常有三種情形：（1）施事必須顯性表達，但被降格為非核心成分；（2）施事被壓制，無法在句法中表達；（3）施事表達具有可選性，既可顯性表達，也可省略。據此，可將被動態劃分為三類：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

3.1 施事出現型

在少數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必須顯性表達，稱之為“施事出現型被動態”，其中施事通常以旁格名詞短語的形式出現，如諾蘇彝語。Gerner（2013: 435）指出，諾蘇彝語的被動句屬於施事型被動態，句中施事位於介詞 *gep* 之前，即使其可由語境推斷，也不得省略，如例（2）所示。

諾蘇彝語（Gerner, 2013: 436）

（2）ka bba ax yy **cy** **gep** ngo ndox ox.
獎 大 3SG COV 觸及 PUT DP
‘一個大獎被他贏得了。’

在某些語言的特殊類型被動態中，施事短語的顯性表達往往也具有強制性，如日語的間接被動態（indirect passive）和立陶宛語的示證 / 推理被動態（evidential/inferential passive），其中施事短語必須出現，分別用與格 *-ni* 和屬格 *-es* 編碼，如例（3）、（4）所示。

日語（Kishimoto 等，2015：776）

（3）Ken-ga ame-ni hur-are-ta.
凱恩 -NOM 雨 -DAT 落下 -PASS-PST
‘凱恩被雨淋了。’

立陶宛語（Geniušienė, 2006: 31）

（4）a. Vag-is nu-si-kirt-o vis-us kopūst-us.
小偷 -NOM PERF-RM- 砍 -3.PST 所有 -ACC 捲心菜 -ACC.PL.M
‘小偷把所有的捲心菜都砍了。’

b. Vagi-es　　nu-si-kirs-t-a　　vis-i　　kopūst-ai.
小偷 -GEN　PERF-RM- 砍 -P.PASS-NT　所有 -NOM　捲心菜 -NOM.PL.M
‘［顯然，］所有的捲心菜都被小偷砍了。’

3.2 施事隱含型

在施事降格的被動態中，若施事在句中被完全壓制，則構成降格程度最強的一類，稱之為“施事隱含型被動態”。這一類型見於豐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立陶宛語及奧傑布瓦語等語言中。豐語由於缺少類似英語 by 的介詞，施事無法在句中顯性表達，如例（5b）所示。然而，施事的隱性存在仍可通過插入施事導向的修飾語加以驗證，如例（5c）所示。在現代標準阿拉伯語的屈折型被動態中，動作的施事通常不以顯性形式表達；在派生型被動態中，施事名詞短語從不顯性出現，而語義上是隱含的，如例（6）所示。

豐語（Lefebvre & Brousseau, 2011: 258, 274）

（5）a. Kɔ̀kú　sɔ́/zé　àvɔ́　ɔ́　sɔ́-wólɔ́n.
可布　拿　纏腰布　DEF　拿 . 皺
‘可布弄皺了纏腰布。’

b. Àvɔ̀　ɔ́　nyí　wìwólɔ́n.
纏腰布　DEF　繫詞　皺 .PPTCP
‘纏腰布被弄皺了。’

c. Zɛ̀n　ɔ́　nyí　gbìgbà　kpóɖó　jló　kpó.
花瓶　DEF　繫詞　打碎　PREP（用）　意圖　POSP（用）
‘花瓶被故意打碎了。’

現代標準阿拉伯語（Kász, 2015: 349）

（6）a. saraqa　l-liṣṣ-u　n-nuqūḍ-a　min　al-mar’at-i.
偷 .PRF.3SG.M　ART- 小偷 .M-NOM　ART- 錢 .F-ACC　從　ART- 女人 .F-GEN
‘小偷把錢從那個女人那裏偷走了。’

b. insaraqat　an-nuqūḍ-u　min　al-mar’at-i
偷 .VII.PASS.PRF.3SG.F　ART- 錢 .F-NOM　從　ART- 女人 .F-GEN
‘錢被從那個女人那裏偷走了。’

施事隱含型被動態除了可實現受事論元的話題化，還可用於將焦點轉移至整個事件狀態。例如，立陶宛語表達特殊語境的狀態被動態（statal passive）、潛在被動態（potential passive）和意外被動態（admirative passive）時（參見 Geniušienė，2006），其中施事均無法顯性表達，如例（7）所示的靜態被動態。

立陶宛語（Geniušienė, 2006: 31）

（7）a. Petr-as　atvėr-ė　lang-ą.
皮特 .NOM　打開 -3.PAST　窗户 -ACC
‘皮特打開了窗户。’

b. Lang-as (yra) (vis dar) atver-t-as (*Pet-ro).
窗户 -NOM 繫詞 .3.PRS 仍然 打開 -P.PASS.NOM （* 皮特 -GEN）
‘窗户（仍然）是（* 被 Peter）打開的。’

3.3 施事可選型

在多數語言的被動態中，施事的表達具有可選性，既能顯性出現，也能隱含，稱之為“施事可選型被動態”。該類型出現在大多數語言中，包括 28 種樣本語言，如漢語、越南語、英語、德語、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日語（直接被動態）、斯瓦希里語、阿伊努語、卡巴爾達語等（具體見第 5 節表 2）。例如，上文日語例句（1b）中的施事 *sensei*‘老師’既可保留，也可省略。例（8）、（9）則分別呈現了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和斯瓦希里語被動態中施事的句法可選性。

立陶宛語（Geniušienė, 2006: 30）

（8）Lang-as (yra) atveria-m-as (Petr-**o**).
窗戶 -NOM 繫詞 .3.PRS 打開 -PR.PASS-NOM （皮特 -GEN）
‘窗戶被（皮特）打開了。’

斯瓦希里語（Vitale, 1981: 116）

（9）Halima a-li-um-w-a (na nyoka).
哈利瑪 她 -PST- 咬 -PASS （介詞 蛇）
‘哈利瑪被（蛇）咬了。’

在許多允許施事顯性表達的語言中，當施事不明確、不具體或語義上不重要時，被動態中往往會將其省略，如例（10）、（11）所示。

苗語（Sposato, 2021: 468）

（10）Beul zhus hnant monl lah.
3SG 遭受 叫 走 PRF
‘他被叫走了。（有人叫他走）’

匈牙利語（Dezső, 1988: 293）

（11）A klub fel van épít-ve.
定冠詞 俱樂部 上 繫詞 建造 -ADS
‘俱樂部已經被建好了。’

四、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

在施事顯性表達的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與引介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a. 非核心格詞綴或附著詞編碼施事，如日語的與格 *-ni*/ 離格 *-kara*、卡巴爾達語的工具格 *-k’ʸa* 等；b. 介詞引入施事，包括前置介詞（如拉丁語 *a*、現代希臘語 *apó*）和後置介詞（如土耳其語 *tarafından*、匈牙利語 *által*）；c.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施事，如冰島語、印地 – 烏爾都語等；d. 無標記引入施事，如緬甸語、老撾語等。

4.1 非核心格編碼型

在 40 種樣本語言中，有 10 種語言採用非核心格對被動態中的施事進行編碼，如俄語、日語、薩萊蒙語等。這些語言所使用的非核心格類型多樣，包括工具格、與格、屬格、離格、處所格、向格、離格 - 情態格（ablative-modalis），以及較為寬泛的旁格（oblique）。其中多數語言僅使用一種非核心格對施事進行編碼，少數語言（日語、土耳其語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則採用兩種不同的非核心格編碼施事。

4.1.1 工具格

被動態中使用工具格對施事進行編碼的情況出現在俄語和卡巴爾達語中，分別如例（12）、（13）所示。

俄語（Guhl, 2010）

（12）Dom　　stroit-sja　　**rabočimi**.
　　房子　　建造 .PRS-sja　　工人們 .INSTR
　　‘房子正在被工人們建造。’

卡巴爾達語（Colarusso, 1992: 136）

（13）gʷaʒə-r　　ƛə-m-**k’ʸa**　　ø-ʔʷəxˆə-žə-aɣ-ś.
　　小麥 -ABS　　人 -OBL-INSTR　　3- 移動 - 最後 -PST-AFF
　　‘小麥被那個人收割了。’

4.1.2 與格

被動態中使用與格編碼施事的語言包括日語（見例（1b））和埃文語。例（14）為埃文語示例。

埃文語（Malchukov & Nedjalkov, 2015: 592）

（14）Etiken　　nugde-**du**　　ma-v-ra-n.
　　老人　　熊 -DAT　　殺 -AD-NFUT-3SG
　　‘老人被熊殺死了。’

4.1.3 屬格

被動態中以屬格編碼施事的情況見於緬甸語和立陶宛語。緬甸語中存在一種將主要動詞名詞化，並以被動助動詞[⑥]*khan-yá-dɛ*（字面義為“必須接受、獲得”）作為完整句法動詞的被動結構。在該結構中，底層施事可通過表示領屬關係的從屬形式出現（Jenny & Hnin Tun, 2016: 292），如例（15）所示。立陶宛語用屬格編碼施事的情況如例（16）所示。

緬甸語（Jenny & Hnin Tun, 2016: 292）

（15）θu-dó　　**ʔəmé**　　ʔə-pyɔ̀　　k^{h}an-yá-dɛ.
　　3-ASS.PL　　媽媽 .DEP　　NML- 講　　接受 - 獲得 -NFUT
　　‘他們被媽媽訓斥了。’

⑥ 被動助動詞（passive auxiliary）指從屬於主要詞彙動詞的動詞，協助表達被動語態，如英語中的 ‘be’。

立陶宛語（Geniušienė, 2006: 37）

（16）Vaik-as buvo iš-gąsdin-t-as tėv-**o**.
孩子 -NOM.SG.M 繫詞 .PST PERF- 嚇 -P.PASS-NOM.SG.M 父親 -GEN
‘孩子被父親嚇到了。’

4.1.4 離格

被動態中施事使用離格編碼的語言包括緬甸語（人稱離格 *shi-ká*）、日語和土耳其語。日語和土耳其語分別如例（17）、（18）所示。

日語（Kishimoto 等，2015：776）

（17）Gakusei-ga sensei-**kara** syoo-o ata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ABL 獎 -ACC 給 -PASS-PST
‘學生被老師給了一個獎勵。’

土耳其語（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5）

（18）Keten ayışığ-ın-**dan** parçala-n-ır-miş.
亞麻布 月光 -NC-ABL 破壞 -PASS-AOR-EV.COP
‘顯然亞麻布會被月光弄碎掉（在月光下的結果）。’

4.1.5 處所格

土耳其語被動態中，除了用離格後綴 *-dan* 編碼施事外，也可以用處所格後綴 *-da* 來編碼施事，如例（19）所示。

土耳其語（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5）

（19）Keten ayışığ-ın-**da** parçala-n-ır-miş.
亞麻布 月光 -NC-LOC 破壞 -PASS-AOR-EV.COP
‘顯然亞麻布會被月光弄碎掉（在月光下的結果）。’

4.1.6 向格及離格 - 情態格

被動態中以向格編碼施事的現象見於博拉語（後綴 *-vú*）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後綴 *-mun*）。此外，在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中，施事還可以用離格 - 情態格（後綴 *-mek*）編碼，如例（20）所示。

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Miyaoka, 2015: 1197）

（20）Carayag-**mek**/-**mun** maligce-sci(u)-llru-uq nepa-u-nani.
熊 -ABM.SG/-ALL.SG 跟隨 -PPAS-PST-IND.3SG 聲音 -PRV-APP.3rSG
‘他被熊默默地跟隨。’

4.1.7 旁格

在薩萊蒙語中，施事可直接通過旁格附著詞 ʔə= 進行編碼，如例（21）所示。

薩萊蒙語（Watanabe, 2015: 1342）

（21）č’ag-a-θiy-əm =k’wa =səm ʔə= tom.
幫 -LV-CTR+1SG.OBJ-PASS =QUOT =FUT OBL= 湯姆
‘湯姆將幫助我。（字面意思：我將被湯姆幫助。）’

4.2 介詞編碼型

在某些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引入，包括前置介詞和後置介詞。

4.2.1 前置介詞型

在融合語中，施事通常由前置介詞引入，如英語、拉丁語、現代希臘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等。以德語和意大利語為例，德語中施事可由前置介詞 *durch* 或 *von* 引入，其中 *durch* 用於引入施事性較弱的工具性施事，如例（22）所示；而 *von* 通常用於引入施事性較強的有生施事，如例（23）所示。意大利語中，施事作為旁格論元，由前置介詞 *da* 引入，如例（24）所示。

德語（Müller, 2002: 124-125）

（22）Meine Entscheidung wurde **durch** die Schneeflocken beeinflußt.
我的 決定 繫詞 介詞 定冠詞 雪花 影響 .PPTCP
‘我的決定被雪花影響了。’

（23）Der Mord wird **von** der Polizei untersucht.
定冠詞 謀殺 繫詞 介詞 定冠詞 警察 調查 .PPTCP
‘這起謀殺案正在被警察調查。’

意大利語（Cennamo, 2015: 462）

（24）Il tetto fu
定冠詞 .M.SG 屋頂 .M.SG 繫詞 .PST.3SG
distrutto **da** un fulmine.
摧毀 .PPTCP.M.SG 介詞 不定冠詞 .M 閃電 .M.SG
‘屋頂被閃電摧毀了。’

在黏著語中，斯瓦希里語被動態中使用前置介詞引入施事，參見前文例（9）。

4.2.2 後置介詞型

在日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和格魯吉亞語等黏著語的被動態中，施事可由後置介詞引入。例如，土耳其語用後置介詞 *tarafından*，匈牙利語用後置介詞 *által*，分別如例（25）、（26）所示。

土耳其語（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7）

（25）Okulmeğer belediye başkanı **tarafından** kapat-ıl-mış.
學校 市政 市長 介詞 關閉 -PASS-EV/PF
‘這所學校似乎被市長關閉了。’

匈牙利語（Dezső, 1988: 294）

（26）A haz fel le-tt épít-ve a kömüves-e **által**.
定冠詞 房子 上 繫詞 -PST 建 -ADS 定冠詞 磚匠 -PL 介詞
‘房子已經被磚匠蓋好了。’

在日語被動態中，施事也可以用附著型後置介詞 *-niyotte*[⑦]（相當於英語中的 by）來引介，如例（27）所示。

---

⑦ 複雜形式 *-niyotte* 由格助詞 *-ni* 和動詞 *yotte* 組合而成，表示動作或事件發生的方式或原因（表示“通過”“按照”“由於”），Kishimoto 等（2015）將其界定為後置介詞（postposition），本文採用其觀點。

日語（Kishimoto 等，2015：776）

（27）Gakusei-ga　sensei-**niyotte**　syoo-o　ata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BY　獎 -ACC　給 -PASS-PST
‘學生被老師給了一個獎勵。’

在複綜語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引入的情況較為罕見，僅見於尤卡坦語和阿伊努語這兩種語言。兩者均採用後置介詞引介施事，阿伊努語用後置介詞 *or(o)wa* ‘從’，尤卡坦語用後置介詞 *tuméen*，如例（28）、（29）所示。

阿伊努語（Shibatani, 1990: 57）

（28）Aynu　Nuca　**orowa**　a-rayke.
阿伊努人　俄羅斯人　從　PASS- 殺
‘一個阿伊努人被一個俄國人殺了。’

尤卡坦語（Lehmann, 2015: 1448）

（29）h　méek’-ab　le　chaan　xibpal　**tuméen**　u　maamah-o’.
PFV　抱 -CMPL.PASS　DEM　小　男孩　介詞　POSS.3　媽媽 -D2
‘小男孩被他的媽媽抱著。’

4.3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

在少數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與非核心格共同編碼，這一現象見於冰島語和印地 – 烏爾都語。其中，介詞的類型既有前置型，也有後置型，具體表達形式取決於語言自身的語法結構與施事論元的語義特徵。這種雙重編碼方式體現了介詞與格標記在表達施事時的協同作用。

4.3.1 前置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

在冰島語被動態中，施事由前置介詞 *af* 引入，並同時用與格形式編碼，如例（30）所示。

冰島語（Zaenen 等，1985）

（30）Sigga　var　tekin　föst　**af**　**lögreglunni**.
西格 .NOM　繫詞　帶走 .PPTCP　快速的 .NOM　介詞　定冠詞 . 警察 .DAT
‘西格被警察逮捕了。’

4.3.2 後置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

在印地–烏爾都語被動態中，施事由後置介詞 *dvara* 引入，並編碼為旁格，如例（31）所示。

印地–烏爾都語（Kachru, 2006: 176）

（31）**chatrõ**　**dvara**　səmmelən　ka　ayojən　kiya
學生 .PL.OBL　介詞　會議 .M　的　組織 .M　做 .PERF.M.SG
ja　rəha　hɛ.
PASS　PROG.M.SG　3P.PRES.SG
‘會議正由學生們組織。’

4.4 無標記編碼型

某些語言的被動態中，施事既無格標記，也不由介詞引介，構成無標記編碼施事（zero-marked agent）。此類形式主要見於孤立語，如漢語、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和白語等。與典型的被動態不同，緬甸語被動態中的施事並不會被降格至外圍或旁格位置，而是作為主要動詞的無標記主語出現，而受事則作為被動助動詞 *-kʰan-yá-dɛ* 的主語出現。這形成了一種“雙主語結構”（double subject construction）。與其他雙主語結構類似，其中保留全部主語屬性的是表受事的主語，可以帶主格標記 *ká*，而原始施事則不可以帶主格標記（Jenny & Hnin Tun, 2016: 291-292），如例（32）所示。

緬甸語（Hnin Tun & Jenny, MS）

（32）θu　ká　kʰənaʔ.kʰənaʔ　ʔəmé　shu-kʰan-yá-dɛ.

3　SBJ　經常　媽媽　責罵 - 接受 - 獲得 -NFUT

‘他經常被媽媽責罵。’

關於漢語被動句中“被”字的語法地位，長期以來存在較大分歧，主要可歸納為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介詞說”。主張“被”為介詞的學者包括 Chao（1968）、呂叔湘（1980）和朱德熙（1982）等。該觀點認為“被”在句法上引入施事，與後接成分構成介詞短語。二是“動詞 / 助動詞說”。該觀點認為“被”為動詞 / 助動詞，與一個嵌套小句或動詞短語構成連動結構，以表達被動意義。代表性學者包括 Hashimoto（1969）、Feng（1990）、Huang（1999）、Tang（2001）等。三是“雙重地位說”，由 Shi（1997）、石定栩和胡建華（2005）提出，認為現代漢語中的“被”是動詞性“被”與介詞性“被”在同音刪略（haplology）過程中語音合一的結果。其中，動詞性的“被”是類似英語 *-en* 的被動化詞綴（passivization morpheme）。

王力（1980：425—426）在考察漢語“被”字句的歷史演變時，指出其結構經歷了一個從上古時期不允許施事（即關係語）出現到中古時期允許施事出現的變化過程。“被”字句大約萌芽於戰國末期，至漢代已得到普遍使用，當時“被”字句尚不容許施事成分出現，僅是在動詞前加“被”字以表達被動意義。

（33）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戰國策·齊策》）

（34）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戰國策·齊策》）

（35）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36）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論衡·累害篇》）

到了中古時期，“被”字句進一步發展，不僅使用更加普遍，更重要的是，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開始允許插入施事。

（37）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世說新語·言語》）

（38）亮子被蘇峻害。（《世說新語·方正》）

（39）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狠役。（《顏氏家訓·雜藝篇》）

（40）舉體如被刀刺。（《顏氏家訓·歸心篇》）

漢語“被”字句的歷時演變說明“被”字並不是專門用來引入施事的，“被”字句中允許施事出現是中古漢語句法演變的結果。在共時研究中，Huang（1999）從多個方面論證了“被”為動詞，而非介詞。首先，與典型的介詞短語不同，“被”與施事不能作為一個整體提前，

如（41）所示；其次，通過並列結構測試表明，施事名詞短語（Agent NP）與其後的動詞詞組（VP）構成一個小句成分，而不包括前面的“被”，如（42）所示；再次，由於漢語的反身代詞“自己”必須以前面的主語作為其先行詞，藉助“自己”的指稱關係測試，表明施事名詞短語並不是一個介詞賓語，而是一個嵌套小句的主語，如例（43）所示。

（41）a. 跟張三，我很處得來。

b.* 被李四，張三昨天打了。

（42）他被李四罵了兩聲，王五踢了三下。

（43）張三被李四$_i$關在自己$_i$的家裏。

從句法形式來看，漢語中的基本被動句與越南語、老撾語裏的對應結構相似。關於越南語和老撾語中用於表達被動意義的詞，其性質普遍被語言學者認為應歸入動詞或助動詞範疇。Enfield（2007: 439）在分析老撾語被動結構時指出，表達被動意義的 *thùùk*^{5}（意為“打擊、接觸”）是帶動詞短語或小句補語的謂詞（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其主語與從屬補語的賓語共指。Keenan & Dryer（2007: 338-344）通過跨語言考察指出，在迂迴型被動態中，有一類結構以體驗動詞（experiencer verbs，如“遭受”“接觸”，甚至“愉快地經歷”）充當被動助動詞。這種類型的被動結構在東南亞語言中廣泛存在，包括漢語在內。在這類結構中，施事短語沒有介詞引介，構成無標記顯性表達。例如：

越南語（Simpson & Ho, 2008）

（44）Nam **bị** thầy giáo phạt.

南 PASS 老師 懲罰

‘南被老師懲罰了。’

老撾語（Enfield, 2007: 439）

（45）phuø-thii1-sòòng3 paj3, kaø **thùùk5** paa3 kin3.

MC.HUM-ORD- 二 走 T.LNK 襲擊 魚 吃

‘第二個人去了，他也被魚吃了。’

從類型學角度來看，中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語言中，被動標記的來源及句法表現與漢語、越南語和老撾語也高度一致。Sposato（2021: 469-473）在對苗語被動結構的研究中採用 Enfield（2007）的分析框架，主張苗語中表達被動義的 *zhus*/*zhaus* 更宜被分析為一個帶補語的動詞，其基本義為“遭受、受到不利影響”，而非一個語法化的被動標記。鶴慶白語中表示被動的 *tso*^{35}“著”、*e*^{55}“挨”和勉語中表示被動的 *tsu*^{ʔ31}“得、遭受”也都具有類似的動詞詞源背景與用法。例如：

苗語（Sposato, 2021: 468）

（46）Miant bioud **zhaus** zheinb.fux faol.kuanx.

3PL 家 遭受 政府 罰款

‘他們家（因為生太多孩子）被政府罰款。’

鶴慶白語（趙金燦，2010：101）

（47）ŋo^{55} sʰɯ^{33} pʰa̱u^{44} **tso**^{35} xua̱^{44}ɕy^{33} lue̱^{44} sʰõ^{31} xʰa^{55}

1 SG.GEN 手 CFL 著 開水 燙傷 疼痛 PFV

‘我的手被開水燙傷了。’

勉語（劉玉蘭，2012：313）

（48）lui^{33}/^{53}xou^{24} **tsu**^{ʔ31} a^{33}dzja^{24} dzo^{24} dzeŋ^{31} ŋa^{ʔ31}.

衣服 PASS 妹妹 洗 完成 PFV

‘衣服被妹妹洗乾淨了。’

同時，與其他語言中施事通常由介詞引入的被動結構相比，如英語、德語、土耳其語、斯瓦希里語等，漢語這類被動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例如，在土耳其語中，被動義由動詞詞尾的被動後綴表達，施事則由後置介詞引入（參見上文例（25）），即表達被動義與引介施事的形式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成分承擔，兩者各自獨立、分工明確。這種結構模式在語言中廣泛存在，具有顯著的跨語言普遍性。若將漢語這類表示被動義的詞分析為介詞，則意味著該成分需同時承擔表達被動義與引介施事這兩項語法功能。然而，從現有的跨語言資料來看，尚未發現類似具備雙重語法負載的介詞成分，這使得將“被”分析為介詞的解釋缺乏類型學支持。因此，從歷時演變、共時結構以及類型學比較的角度來看，將“被”分析為動詞或助動詞更為妥當，其後的施事成分則為從屬補語小句中的主語，屬於無標記編碼形式。

五、被動態中施事隱現及編碼類型的數據及成因分析

根據對 40 種樣本語言語料的考察與統計，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分佈情況如表 2 所示。數據顯示，施事出現型被動態極為罕見，僅見於 3 種語言，佔樣本總數的 7.5%；施事隱含型被動態出現在 8 種語言中，佔比 20%；而多數語言（28 種）的被動態中，施事的顯性表達是可選的，佔比為 70%。因此，這三類被動態的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被動態＞施事隱含型被動態＞施事出現型被動態。由此可見，不帶施事的被動態在語言樣本中佔優勢地位（佔比為 82.5%），包括施事隱含型與施事可選隱含型（其中立陶宛語、埃文語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包含這兩種類型），且後者更為普遍。某些語言的被動態可通過多種結構形式表達，一般而言，其主要類型被動態中的施事隱含具有可選性，而特定類型被動態中的施事隱含具有強制性，如立陶宛語的動作被動態中，施事是可選的；而狀態 / 潛在 / 意外被動態中，施事是必須隱含的。該調查結果總體符合 Keenan & Dryer（2007）提出的一項跨語言蘊涵共性：若一種語言有帶施事短語的被動態，則該語言一定有不帶施事短語的被動態。本研究中僅有諾蘇彝語構成該

表 2　被動態隱現類型的語言分佈

被動態類型	語言	合計	
		數量	佔比
施事出現型	諾蘇彝語、日語（間接被動態）、立陶宛語（示證 / 推理被動態）	3	7.50%
施事隱含型	豐語、立陶宛語（狀態 / 潛在 / 意外被動態）、現代標準阿拉伯語、埃文語（中動被動態）、雅基語、奧傑布瓦語、欽唐語、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TAM 敏感型被動態）	8	20.00%
施事可選型	漢語、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白語、拉丁語、現代希臘語、英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冰島語、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印地–烏爾都語、日語（直接被動態）、埃文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斯瓦希里語、格魯吉亞語、阿伊努語、卡巴爾達語、薩萊蒙語 、尤卡坦瑪雅語、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博拉語	28	70.00%

蘊涵關係的例外。需要指出的是，該蘊涵關係的逆向推導並不成立。換言之，一種語言存在無施事的被動態，不能推斷其必然也存在帶施事的被動態。例如，豐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雅基語、奧傑布瓦語和欽唐語等語言只有無施事的被動態，而沒有帶施事的被動態。

在被動態中施事顯性表達的情況下，其編碼方式多樣化，如表 3 所示。從統計數據可見，施事的編碼類型呈現出一定的優勢序列：介詞編碼型（40.63%）＞非核心格編碼型（31.25%）＞無標記編碼型（21.88%）＞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6.25%），即施事由介詞編碼的被動態佔主要優勢地位，其次是非核心格編碼型，再次是無標記編碼型，而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則較為罕見。該優勢序列的成因可從語系影響、語言接觸與形態簡化三個維度加以探討。

首先，從語系角度來看，在使用介詞引入施事的語言中，融合語是重要組成部分。印歐語系的融合語由於源於共同的母語基礎，在語音、詞彙及語法結構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這些語言在被動態中普遍採用介詞編碼施事，且傾向使用前置介詞，如英語 by、德語 von 等，體現出強烈的語系同源性。

其次，形態簡化促使語義角色需依賴功能詞表達，介詞成為編碼語義角色的重要工具。許多語言（尤其是印歐語系語言）原本通過格尾標記施事，隨著格系統退化或消失，語義角色需藉助介詞顯性表達。介詞結構不僅具備語義透明性，其語義本身往往與施事角色密切相關（如來源、工具、致使等），能適配各種語義關係，具有高度的表達靈活性與結構穩定性。在語言類型學的維度上，隨著形態的簡化，融合語在施事編碼方面體現出一定的形態複雜性連續統，呈現出以下演化鏈條：非核心格編碼（如俄語、立陶宛語）→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如冰島語、印地–烏爾都語）→介詞編碼（如英語、德語），這一序列反映出隨著形態複雜度的降低，被動態中施事編碼方式的黏著性和語義精度逐漸減弱。同時，在原始受事升格的語法操作中，介詞還能有效實現原始施事的降格處理，因而成為語法演化中一種經濟而高效的表達手段。相較而言，孤立語由於形態高度簡化，其被動態中施事的表達也更為簡化，往往採用無標記形式；而黏著語與複綜語形態系統發達，雖然部分語言也使用介詞編碼施事，但更傾向用格後綴編碼施事。

再次，在多語言接觸區，如東南亞語言區域，語言雖分屬不同語系，例如緬甸語、漢語、白語屬漢藏語系，越南語屬南亞語系，老撾語屬壯侗語系，苗語、勉語屬苗瑤語系，而它們的被動態普遍採用表示“遭受”或“獲得”意義的動詞來表達，且施事多以無標記形式出現，表現出明顯的結構相似性。這一現象部分可歸因於語系內部的繼承性影響，更關鍵的動因在於語言接觸所引發的詞彙與句法特徵的擴散。在長期接觸過程中，不同系屬的語言間通過借用、複製等機制發生了結構上的同化，推動了被動表達方式的類型趨同化。這種非系屬性卻結構一致的現象，體現出語言聯盟（Sprachbund）中的區域共性，即被動態結構在東南亞語言區域內形成一種跨語系的普遍性特徵。因此，該區域被動態的表達不僅受語系因素制約，更深層地反映出接觸誘導的類型擴散與句法趨同，是東南亞區域語言聯盟特徵的重要體現。

表 3　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與標記

編碼類型		語言	編碼形式	合計	
				數量	佔比
非核心格編碼型		緬甸語	屬格形式或人稱離格 *shi-ká*	10	31.25%
		俄語	工具格		
		立陶宛語	屬格		
		日語	與格 *-ni*/ 離格 *-kara*		
		土耳其語	離格 *-dan*/ 處所格 *-da*/ 狀語後綴 *-CA*		
		埃文語	與格 *-du*		
		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	離格 - 情態格 *-mek*/ 向格 *-mun*		
		薩萊蒙語	旁格 *ʔə=*		
		卡巴爾達語	工具格 *-kʼʸa*		
		博拉語	向格 *-vú*		
介詞編碼型	前置介詞型	拉丁語	*a* ‘從’	7	21.88%
		現代希臘語	*apó*		
		英語	*by*		
		德語	*durch* (工具型施事) /*von* (有生施事)		
		意大利語	*da*/*da parte di*		
		斯瓦希里語	*na*		
		尤卡坦瑪雅語	*tumeén*		
	後置介詞型	諾蘇彝語	*gep*	6	18.75%
		日語	*-niyotte*		
		土耳其語	*tarafında*n		
		匈牙利語	*által*		
		格魯吉亞語	*mier*		
		阿伊努語	*or(o)wa* ‘從’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		冰島語	*af* + NP (DAT)	2	6.25%
		印地–烏爾都語	NP(OBL) + *se*/*dvara*		
無標記編碼型		緬甸語、漢語、越南語、老撾語、苗語、勉語、白語	——	7	21.88%
合計				32	100%

六、結論

通過對 40 種語言樣本的考察，本文從施事的隱現角度將被動態劃分為三類，分別為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三者的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施事隱含型＞施事出現型，其中包含施事可選型被動態的語言佔總樣本的 70%，顯示出該類型被動態在跨語言中的高度普遍性。

在施事顯性表達的被動態中，其編碼方式呈現多樣化，主要包括介詞編碼型、非核心格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以及無標記編碼型，它們的優勢序列為：介詞編碼型＞非核心格編碼型＞無標記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該優勢序列的形成受語言系屬、

形態簡化和語言接觸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總體而言，介詞編碼型在跨語言中佔據優勢地位，這不僅反映了形態簡化與語言演化過程中被動結構的發展趨勢，體現了語言對結構經濟性與表達清晰性的追求，同時也揭示了語言接觸與語系繼承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跨語言結構趨同現象。

附錄

縮寫

1	第一人稱（first person）
2	第二人稱（second person）
3	第三人稱（third person）
r	反身態（reflexive）
A	施事（agent）
ABL	離格（ablative）
ABM	離格 - 情態格（ablative-modalis）
ABS	通格（absolutive）
ACC	賓格（accusative）
AD	受損被動態（adversative passive）
ADJ	附加語（adjunct）
ADS	去動詞化副詞後綴（deverbal adverbial suffix）
AFF	肯定語氣（affirmative mood）
ALL	向格（allative）
AOR	不定過去時（aorist）
APP	同位語氣（appositional mood）
ART	冠詞（article）
ASS.PL	聯合複數（associative plural）
CFL	類別詞 / 量詞（classifier）
CMPL	完成體（completive）
COV	副動詞（coverb）
CTR	控制及物式（control transitive）
D2	遠指（distal-deictic）
DAT	與格（dative）
DEF	定指（definite）
DEM	指示詞（demonstrative）
DEP	從屬（dependent）
DET	限定詞（determiner）
DP	動態完成時（dynamic perfect）
ERG	作格（ergative）
EV.COP	證據性繫詞（evidential copula）

EV/PF	證據性 / 完成體（evidential/perfective）
FUT	將來時（future）
GEN	屬格（genitive）
HUM	人類（human）
IND	陳述語氣（indicative）
INSTR	工具格（instrument）
LOC	處所格（locative）
LV	處所式（locative version）
M	陽性（masculine）
NC	複合名詞（noun compound）
NFUT	非將來時（non-future）
NML	名詞的（nominal）
NOM	主格（nominative）
NON.PRES	非現在時（non-present）
NT	中性標記（neuter marker）
OBJ	賓語（object）
OBL	旁格（oblique）
ORD	序數詞（ordinal）
P	受事（patient）
P.PASS	過去被動分詞（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ASS	被動態（passive）
PFV	完成體（perfective）
PL	複數（plural）
POSP	後置介詞（postposition）
POSS	領屬 / 所有格（possessive）
PPTCP	過去分詞（past participle）
PR.PASS	現在被動分詞（present passive participle）
PREP	前置介詞（preposition）
PRF/PERF	完成時（perfect）
PROG	進行體（progressive）
PRS	現在時（present）
PRV	剝奪態 / 否定態（privative）
PST	過去時（past tense）
QUOT	引語（quotation）
RM	反身標記（reflexive marker）
SBJ	主語（subject）
SG	單數（singular）
T.LNK	話題連接詞（topic linker）

參考文獻

劉玉蘭 2012《泰國勉語參考語法》，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呂叔湘 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 : 商務印書館。

石定栩、胡建華 2005“被”的句法地位，《當代語言學》第 3 期。

王　力 1980《漢語史稿》，北京 : 中華書局。

葉蜚聲、徐通鏘 2010《語言學綱要》，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社。

趙金燦 2010《雲南鶴慶白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朱德熙 1982《語法講義》，北京 : 商務印書館。

Baker, Mark, Kyle Johnson & Ian Roberts. 1989. Passive arguments raised. *Linguistic Inquiry* 20(2): 219-251.

Cennamo, Michela. 2015. Valency patterns in Italian.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417-482.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Cinnaminson: Foris Publications.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olarusso, John. 1992. *A Grammar of the Kabardian Languag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Collins, Chris. 2005. A smuggling approach to the passive in English. *Syntax* 8(2): 81-120.

Comrie, Bernard (ed.). 2018. *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 (3rd e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Dezső, László. 1988. Passiveness in Hungarian: with reference to Russian passive. In Shibatani, M. (ed). *Passive and Voice*, 291-32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Dixon, Robert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2000.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field, Nick J. 2007. *A Grammar of Lao*.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Feng, Shengli. 1990.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tity of Pennsylvannia.

Foley, William A. 2007. A typology of information packaging in the clause.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nd ed.)*, 362-4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 Pingping & Bernard Comrie. 2022. Correlations of valency alternations and morphological typ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Lingua* 273: 1-20.

Geniušienė, Emma. 2006. Passives in Lithuanian (in comparison with Russian). In Abraham, W. & Leisiö, L. (eds.), *Passivization and typology: Form and function*, 29-6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Gerner, Matthias. 2013. *A Grammar of Nuosu*.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Göksel, Aslı & Celia Kerslake. 2005. *Turkish: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Guhl, Marcel. 2010. Towards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Russian *-sja*. *Russ Linguist* 34(3), 261-283.

Hammarström, Harald, Robert Forkel, Martin Haspelmath & Sebastian Bank. 2025. *Glottolog 5.2*.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552526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glottolog.org, Accessed on 2025-06-24.)

Hashimoto, Mantaro J. 1969.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Unicorn* 5: 59-71.

Haspelmath, Martin & Andrea Sims. 2010.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Hnin Tun, San San & Mathias Jenny. Differential Subject Marking in Burmese. M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comparativelinguistics.uzh.ch/staff/mathiasjenny/download/DSMinBurmese.pdf)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423-509.

Jaeggli, Osvaldo A. 1986. Passive. *Linguistic Inquiry* 17(4): 587-622.

Jenny, Mathias & San San Hnin Tun. 2016. *Burm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Kachru, Yamuna. 2006. *Hindi*.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Kász, Csilla. 2015. Valency properties of verbs in Modern Standard Arabic.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327-363.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Kazenin, Konstantin I. 2001. The passive voice. In Haspelmath M, Konig E, Oesterreicher W. & Raible W.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899-916.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Keenan, Edward L. 1985. Passive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43-2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enan, Edward L. & Matthew S. Dryer. 2007. Passive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nd edition)*, 325-3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shimoto, Hideki, Kageyama Taro & Sasaki Kan,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Japanes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765-805.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Kulikov, Leonid. 2011. Voice typology. In Song, J. J.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Claire & Anne-Marie Brousseau. 2011. *A Grammar of Fongb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Lehmann, Christian.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Yucatec Maya.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407-1461.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Malchukov, Andrej & Igor V. Nedjalkov.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Even (North Tungusic) in a comparative Tungusic perspectiv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571-628.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Miyaoka, Osahito.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Central Alaskan Yupik, an Eskimoan languag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165-1204.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Müller, Stefan. 2002. *Complex Predicates: Verbal Complexe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Particle Verbs in Germa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Rizzi, Luigi. 1986. On chain formation. In H. Borer (ed.), *The Syntax of Pronominal Clitics*, 65-9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hi, Dingxu.1997. Issues on Chinese passiv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5(1): 41-70.

Shibatani, Masayoshi. 1985. Passiv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A prototype analysis. *Language* 61(4): 821-848.

Shibatani, Masayoshi. 1990. *The Languages of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ewierska. Anna. 2013.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Dryer, M. S. & Haspelmath, M. (eds.), WALS Online (v2020.4) [Data set].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395059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07, Accessed on 2025-07-31.)

Simpson, Andrew & Hao Tam Ho. 2008. The comparative syntax of passive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n Chan, M. K. M. & Kang, H.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 825-841.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Sposato, Adam. 2021. *A grammar of Xong*.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Tang, Sze-Wing. 2001. A co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passives and its consequences. *Linguistics* 39(2): 257-295.

Vitale, Anthony J. 1981. *Swahili syntax*. Dordrecht/Cinnaminson: Foris Publications.

Watanabe, Honoré.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Sliammon Salish.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313-1358.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Zaenen, Annie, Joan Maling & Höskuldur Thráinsson. 1985. Cas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Icelandic passiv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4): 441-483.

Zúñiga, Fernando & Seppo Kittilä. 2019. *Grammatical V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葛平平　南京　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
巴黎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東亞語言研究所　geping0502@163.com

The Presence/Absence and Encoding Types of Agents in Passiv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GE Pingping

Abstract: Based on a relatively balanced selection in terms of language family affiliation, typological profile,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40 language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gent phrases and their encoding strategies in passive constru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yntactic realization of the agent, passiv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agentive passives, agentless passives, and optionally-agentive passives. These exhibit the following hierarchy of preference: optionally-agentive passives > agentless passives > agentive passives. In passives where the agent is overtly expressed, four main types of agent encoding are identified: oblique case marking, prepositional marking, a combination of preposition and oblique case marking, and zero marking. The distributional hierarchy of these encoding types is as follows: prepositional marking > oblique case marking > zero marking > "preposition + oblique case" marking. Building on this finding,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this hierarchy of prefere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genealogical influence, language contact, and morphological simplification.

Keywords: passives; presence/absence of agent; encoding types; linguistic typology; motivations

去事件化與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

羅　堃

提　要：常規情況下，“被”字句謂語多為複雜形式，但在標題中卻可以出現單音節動詞“被”字結構。從形式上看，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其中動詞應具有［+ 結果義］或［+ 稱說義］，且在“被”字與動詞之間不能插入任何施事成分。基於標題語言特區的特點，常規“被”字事件句通過刪除“了”、依附成分和特定語素等去事件化操作變為節奏強烈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在理論價值上，通過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可以充分觀察“被”的語法化過程。

關鍵詞：標題；語言特區；去事件化；單音節動詞；“被”

一、引言

“被”字句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一般認為，“被”字句的語法意義是受事者受到某一動作的作用和影響，因此“被”字句的謂語動詞不能是簡單光桿動詞（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1；張伯江，2001）。對此一些學者持有反對意見，他們發現真實語料中存在光桿動詞“被”字句（劉承峰，2003；彭淑莉，2009）。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這類句子數量極少，且需要複雜狀語、對舉句以及複句（從句）等句法條件的允准才能成活。例如：

（1）車在學院的停車場上被砸，他有責任，要扣他的工資。（BCC 語料庫）

（2）要到畫家家裏去，在那裏被捆綁、被塗、被畫、被使用。（王小波《黑鐵時代》）

（3）從而增大受光面積、降低受光面的功率密度，防止因受光面功率密度過大而被燒。（BCC 語料庫）

概言之，光桿動詞“被”字句在現代漢語中是一種出現頻率低，且使用受限的語法形式。相比於雙音節動詞，單音節動詞“被”字句更是十分罕見。然而，在標題中卻存在大量的單音節動詞“被”字結構，如：

（4）老狼坐地鐵被拍 頭髮花白戴耳機顯滄桑（中國網 2017-09-11）

（5）精神病人“殺”死父親被鎖 遭遺棄餓死家中（《新京報》2014-12-09）

（6）大左爆閆妮生活技能有限 戴戒指被猜好事將近（搜狐娛樂 2015-05-26）

*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原官話秦隴片方言時體範疇深度調查研究（22BYY048）”和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特色工作項目“特殊語言運用領域的語言創新與規範研究及語料庫建設（24JDTS14）”支持。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

（7）中國新測量船一性能超反潛艦被稱大洋黑洞（中國新聞網 2015-06-18）

上述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未得到複雜狀語、對舉句、複句（從句）等句法條件的允准，卻可以自由使用。可見，單音節動詞“被”字結構在常規事件句和標題中的句法表現並不相同。甚至在同一語篇中，正文與標題的表述也所區別，如：

（8）標題：江蘇翻譯“被打”籃協正在調查（《新京報》2016-12-13）

正文：江蘇隊方面稱，薛飛被安保人員毆打，且扣留了兩個多小時。

（9）標題：馬雅舒一家海邊野營 丈夫被讚“別人家的老公”（新華網 2017-06-02）

正文：馬雅舒老公一經亮相就被網友讚為“別人家的老公”，馬雅舒的育兒方式受爭議後，羅伯特本週放出大招逼老婆放手，攜家帶口在海邊露營野炊。

同樣是被動表達，新聞標題中是“被 +V 單”形式（“被打”“被讚”），而在新聞正文裏卻換成了雙音節動詞“被”字句（“被安保人員毆打”“被網友稱讚為‘別人家的老公’”）。關於這一特殊現象，目前學界研究不多，只有尹世超（2008）在討論標題被動表述時有所提及，他提出“被”類標題中的“被”大多是助詞，其後施事一般不出現，“被”字後結構簡單，常用光桿動詞。而對於該類標題的句法語義特點以及產生機制，尹文未展開討論。另外，孫建強（2008）、陳禹（2023）注意到新聞標題中特殊的“被指”（《四川一食品公司被指污水直排入河》中國新聞網 2024-11-29），探討了“被指”出現的條件與語用價值，但並未涉獵其他“被”字標題。

鑒於此，本文將對單音詞動詞“被”字標題進行深入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呈現怎樣的句法語義特徵？

（二）在去事件化背景下，單音節動詞“被”標題的產生動因與機制是什麼？

（三）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有何理論價值？

二、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的句法語義特徵

就形式而言，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可以根據動詞後是否有賓語分為兩種類型：

（一）S+ 被 +V 單

這一類型，無論是單段式標題還是兩段式標題，單音節動詞一般在小句末位置，其後無賓語成分，主語為受事論元或客體論元。例如：

（10）打工仔錢被偷 司機售票員遞上救急錢（《三秦都市報》2015-11-04）

（11）“寶馬高考生”作弊被抓 考場內飛踹女監考老師（光明網 2014-06-10）

（12）金水路與未來路人行道被圍 市民跨欄通過（《大河報》2017-04-14）

（13）中國首隻放歸野外大熊貓被拍（央視網 2017-04-15）

根據單音節動詞在常規情況下是否成詞還可以細分為兩類：第一類 V 單在非標題語境中不能成詞，如（12）、（13）例“圍、拍”等；第二類 V 單在非標題語境中可以成詞，如（10）、（11）“偷、抓”等。前一類標題如果要變成常規事件句，需要將單音節動詞擴充成複合動詞，而後一類則需要在標題中添加時體標記。

（二）S+ 被 +V 單 +O

這一類型根據動詞以及句法構造的差異也可以分為（a）、（b）兩種類型，下面分別討論。

（a）單音節動詞為“稱、讚”等稱呼義、評價義動詞，整個標題結構由雙賓句變化而來，賓語是原雙賓句中的直接賓語，以頭銜、稱號居多。例如：

（14）加多寶王老吉紅罐之爭開審 被稱中國包裝第一案（《新京報》2015-06-17）

（15）引經據典借筆傳情 研究生為母校作賦被讚“校園王勃”（中國教育在綫 2015-05-25）

（14）、（15）例“中國包裝第一案”“校園王勃”均為原雙賓句的直接賓語，而原雙賓句中的間接賓語“加多寶王老吉紅罐之爭”“研究生”則移動到了標題主語位置。

（b）單音節動詞為揭發、言說、詈罵義動詞，賓語是相應的揭發、言說、詈罵內容。從構造上看，這類標題由“動詞 + 賓語小句”結構改造而來，其中標題主語為原賓語小句的主語。例如：

（16）TFBOYS 新歌 MV 被曝抄襲 EXO 網友大打口水戰（國際在綫 2015-04-28）

（17）揭陸毅田海蓉狗血情史 鮑蕾被諷小三上位（新娛在綫 2015-05-12）

（18）楊紫被蔣欣調侃 頭戴小黃帽被說像安全帽（中國青年網 2017-05-27）

（16）例“TFBOYS 新歌 MV”原本在動詞“曝”所帶賓語小句中，即“曝 TFBOYS 新歌 MV 抄襲 EXO”，變為被動結構之後，賓語小句的主語移動到標題主語位置。（17）例“鮑蕾”、（18）例“頭戴小黃帽”也是同樣的情況。

需要明確，不管（a）類還是（b）類，標題中的賓語並不是動詞的賓語，而是“被 +V 單”結構的賓語。理由有二：第一，依據上述分析，（a）、（b）兩類標題單音節動詞與賓語之間存在一個潛在的空位。不同的是，造成空位的句法成分不一樣，（a）類標題中雙賓句間接賓語移位留下空位，（b）類標題中賓語小句的主語移位留下空位；第二，根據“被”字句的句法語義特點，除了特殊的保留賓語句，“被”字句的謂語動詞作格化（ergativization）之後，不能帶賓語成分（鄧思穎，2004）。所以無論從理論還是語感角度看，將賓語分析為“被 +V 單”的賓語更切合實際。

（一）、（二）兩種類型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除了形式上存在差異之外，在報道結構上也有所不同。（一）類標題為報道者疏離型，即新聞標題只是客觀地報道了相關事件，事件過程中沒有報道者的參與。與之相反，（二）類標題則暗含報道者的個人情感，具有一定主觀性，報道者也有可能是稱讚、諷刺、揭發等言語活動中的一分子，屬“報道 + 評論”標題模式。

需要特別指出，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還有兩個重要的句法語義表現：

一、“被”與動詞之間禁止插入任何施事成分。請對比：

（19）a. 也門首都軍火庫被襲 沙特聯軍 64 名士兵身亡（新華網 2015-09-06）

b. * 也門首都軍火庫被敵軍襲 沙特聯軍 64 名士兵身亡

（20）a. 5000 名大媽高考期間息舞 被讚深明大義（金陵熱綫 2017-06-05）

b. *5000 名大媽高考期間息舞 被群眾讚深明大義

（19）、（20）例“被襲”“被讚”可以成立，“被敵軍襲”“被群眾讚”反而不合法。宋文輝、羅政靜、于景超（2007）曾研究指出，單音節動詞“被”字句中施事成分不顯現是韻律因素影響的結果。觀察發現，在非標題語境中，施事成分不出現並不是一條鐵律，比如“張三被李四

騙了”完全合法。但在標題中，由於時體標記“了”的刪除，“被”與單音節動詞之間變得更加緊密，形成雙音節音步結構，擴展能力極度受限，故施事成分禁止出現。

二、不具備相關語義特徵的單音節動詞不能進入該類標題。具體情況為，類型（一）中動詞須有［+ 結果義］，類型（二）中動詞應有［+ 稱說義］。范曉（2006）分別從謂語動詞配價、情狀角度分析了“被”字句的語義特徵，他指出“多價性”“動結性”是“被”字句謂語動詞的典型特徵。也就是說，“被”字句中謂語動詞應該為二價動詞或三價動詞（及物動詞或雙及物動詞），不能是單價動詞。我們發現，同為二價動詞，只有［+ 結果義］動詞才能出現在該類標題中，“吃”“寫”“跑”“看”等［－結果義］動詞則不行。例如：

（21）a. 10 平米形象牆 1 小時被寫滿（《銀川晚報》2014-09-15）

b. *10 平米形象牆 1 小時被寫

（22）a. 陝西一鎮政府吃飯不給錢 7 年打 148 張白條 飯店老闆被吃窮（財經網 2015-11-12）

b. * 陝西一鎮政府吃飯不給錢 7 年打 148 張白條 飯店老闆被吃

上述兩例標題，單音節動詞後必須跟有結果補語。這是因為，這些單音節動詞無［+ 結果義］，僅表達一種動作，只有添加結果補語才能使語義完整，滿足“被”字句的句式義要求。[①] 另外，在第（二）類標題中，並非所有三價動詞都可進入，只有［+ 稱說義］動詞才有此能力。下列（23）、（24）兩例標題中，無［+ 稱說義］的單音節動詞“選、授”均不能構成“被”字標題。

（23）a. 金秀賢全智賢等 8 人被選為韓國“今年之星”（國際在綫 2015-11-09）

b. * 金秀賢全智賢等 8 人被選韓國“今年之星”

（24）a. 達州渠縣被授予“中國詩歌之鄉”（《四川日報》2015-10-28）

b. * 達州渠縣被授“中國詩歌之鄉”

三、漢語標題去事件化及其類型

關於標題的性質特徵，學界討論較多。尹世超（2001：5）認為標題是書面語體中區別於正文的一種特殊語言片段。Straumann (1935: 21) 將其定義為“塊式語”（block language）。Mårdh (1980: 12) 認為其語法層級低於常規句子。沈家煊（1995）用是否有界來區分事件句和非事件句，將標題劃歸為非事件句，因為其沒有實際的終止點。劉雲（2005：102—125）認為自然語句充當標題要經歷“篇名的篇章化”過程，同時提出隱含、省略、移位、標記都是篇名篇章化的手段。羅堃（2018）綜合前人研究，提出漢語標題的特點是“遠距單向，韻律親和”，即標題缺乏互動性，標題製作者與受眾之間的信息流動是單向的。同時，漢語標題節奏明快，齊整諧律。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在語法特徵方面，標題與常規事件句表現有所不同；其次，在價值功用上，標題與常規事件句也不一樣，不能用來

① 據張黎（2010）研究，[+ 結果義] 的動詞形式上不能參與“結果勾消句”，但［－結果義］的動作動詞可以進入“結果勾消句”。如“上午我寫了一封信，但是沒有寫完。”“* 上午張三偷了一部手機，但是沒有成功。”其中，“寫”為［－結果義］動詞，因此該句合法，而“偷”為［+ 結果義］，句子不合法。

交流，只起信息報道與概括正文內容的作用；最後，就標題製作來看，為了與常規句子拉開距離，標題製作者一方面傾向於選擇動作性相對較弱的謂詞，另一方面會對句子進行相應的句法改造，這些句法改造包括但並不限於隱含、省略、移位等。上述兩方面內容我們統稱為“標題去事件化”。

“事件”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事件也叫“事態”（eventuality），包括靜態的狀態（state）和動態的事件（event）（Maienborn, 2007: 207-130）。狹義的事件與狀態相對，有過程，佔據一定的時間段，具有時體特徵（Bach, 1986: 5-16; 崔希亮，2018）。而“去事件化”（de-eventualization）是指語義上一個表達事件的句法結構轉而表達非事件（陳振艷、施春宏，2021）。在句法層面，去事件化遵循去句化（de-sententialization）的相關操作手段。事件性強弱與小句獨立性存在一定關聯，強事件性對應自立小句，而弱事件性與依附小句相對應（方梅，2018：10）。從獨立事件句到依附小句是一個連續統，其中經歷了一系列句法降級操作，據方梅（2018：5）研究，這些句法降級操作有丟失言外之力，行為效力成分受限，情態、語氣成分受限或丟失，時態成分受限或丟失，主語變為隱性槽，動詞支配變成名詞支配等等。[②] 不難發現，這一連續統中獨立事件句陳述性強，指稱性弱，而低事件性的依附小句陳述性弱，指稱性強。

陳述性和指稱性的分野影響了標題的分類。尹世超（2001：106—107）把標題分為報道性標題和稱名性標題兩類。報道性標題提供一條消息，能夠回答“誰 / 什麼怎麼樣”的問題，稱名性標題不具備這個功能。例如，《京城首家當舖開業》《商業信函在中國》兩個標題，前者是報道性標題，而後者是稱名性標題。當然，報道性標題也不是事件句，對比“京城首家當舖開業了”“京城首家當舖開業”，前一句才是真正的事件句。

總體而言，這個分類方法客觀公允，但並沒有涵蓋漢語標題的各種類型，而且一些標題也不能簡單地歸入二者中的任何一類。因此，有必要對漢語標題進一步分類，事件性強弱程度可以作為新的分類依據。

表 1 基於事件性強弱程度的標題分類表

類型	標題舉例	去事件化表現	操作的句法層級	事件性強弱
Ⅰ	《聯合國“斷糧”誰之過》《為了忘卻的母愛》	互動性等特徵丟失、依附成分丟失	CP 層	強
Ⅱ	《東城區多所小學返校復課》	時體成分丟失	IP 層	較強
Ⅲ	《哈工大三教授入選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會士》	數量、結果、具象性成分丟失	VP 層	中
Ⅳ	《京都企業編餘人員透視》《楊宗緯救場張碧晨》《保險業在西藏》	動賓逆序（OV 式）、狀動轉動賓、弱動詞	VP 層	較弱
Ⅴ	《嶧山腳下斫琴師》《李自成》	結構緊縮（刪減“的”）、體詞性成分	VP 層	無

在這個分類系統中，Ⅰ型標題的事件性最強，Ⅴ型標題沒有事件性，二者分別處於連續統的兩級。Ⅰ型標題丟失了常規事件句中的語氣詞、言語行為語力、話語標記等互動性成分以及依附小句，例如標題《聯合國“斷糧”誰之過》中沒有語氣詞“呢”，雖然有疑問代詞“誰”，

② 前人研究中對“事件”這一術語的定義較多，但“事件化”和“去事件化”的定義相對較少。莫啟揚（2016：29—33）界定了兩個相關術語“時間化（temporalize）”“去時間化（atemporalize）”，也提出“去時間化”較難用實證方法來驗證，不同語言當中“去時間化”的手段不盡一致。參考前人研究，本文從語義和句法兩個層面討論漢語標題的“去事件化”，即語義上由事件轉為非事件，句法上操作手段包括但不限於互動、時體、數量、結果、“的”等成分丟失。

但整個標題無疑問語力。《為了忘卻的母愛》在常規情況下則需要另外一個依附小句支持才能成活。Ⅱ型標題缺失了“了”“著”“過”等時體成分，時間定位模糊化，標題《東城區多所小學返校復課》對應的常規事件句應為“東城區多所小學返校復課了”。Ⅲ型標題缺失的是數量、結果等成分，屬於空間定位模糊化，標題《哈工大三教授入選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會士》中量詞“位”丟失。Ⅳ型標題則是通過句式變換、弱動作動詞等方法削弱事件性，如《京都企業編餘人員透視》（對比“透視京都企業編餘人員”）《楊宗緯救場張碧晨》（對比“楊宗緯給張碧晨救場”）《保險業在西藏》（“在”為存在義動詞）。Ⅴ型標題是無動詞參與的體詞性成分。對應 Rizzi（1997）提出的“CP-IP-VP”三層級句子結構，五類標題的去事件化操作分屬不同的句法層級，Ⅰ型標題的去事件化操作在 CP 層，Ⅱ型標題在 IP 層，後三類標題則在 VP 層。當然，雖然後三類標題的去事件化操作均屬 VP 層級，但其事件性強弱程度並不一致，Ⅲ型標題缺失的是數量、結果成分，語序與常規事件句無異，且動詞的動作性很強，Ⅳ型標題發生了語序結構變化，同時動詞動作性變弱，Ⅴ型標題是一個體詞性成分，自然無事件性可言。從標題的語用功能來看，Ⅰ型標題事件報道性強，主要用作新聞標題，而Ⅴ型標題稱名性強，其功用是概括正文內容，所以多充當著作以及評論性、描述性文章的標題。

整體上，無論採用何種去事件化操作手段，最終引發的結果都是：標題逐步剝離了時間、空間特質，變為高度泛時空的話語形式（王永娜、馮勝利，2015）。而根據上述分類，本文討論的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可視情況分別歸入Ⅰ、Ⅱ、Ⅲ型標題。

與漢語標題類似，英語標題的生成過程其實也發生了去事件化，標題的事件性逐漸減弱，稱名性增強。李瑩（2018）對比漢英標題提出，英語標題更傾向於名詞性標題，換句話講，英語標題的稱名性更強。但跟漢語標題不同的是，英語標題去事件化的句法操作表現為冠詞、連詞、主語，甚至動詞的丟失，[③] 例如：

（25）Divorce New York Style（The Divorce of the New York Style，冠詞、介詞丟失）[④]

（26）Bush Pressures Arafat, Backs Israeli Self Defense（Bush Pressures Arafat and Backs Israeli Self Defense，連詞丟失）

（27）China Appoints First Governor in World Bank（China Appoints its First Governor in World Bank，物主代詞丟失）

（28）Seven Injured in NJ Chemical Blast（Seven are Injured in NJ Chemical Blast，繫動詞丟失）

四、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的生成機制與理論價值

徐杰、覃業位（2015）在形式語言學背景下提出“語言特區”（Special Linguistic Domain）

---

③ 匿名審稿專家提出，英文標題去事件化與冠詞、連詞、主語等成分的缺失有何必然聯繫？筆者認為，去事件化的本質是時空模糊化，不管是漢語標題還是英語標題，為了達到“時空模糊化”的要求，都會進行一系列刪除句法操作，而根據“奧卡姆剃刀”原則，刪除的成分一般是不影響讀者理解的信息量較小的句法單位。英語標題中，冠詞、連詞等成分信息量小，且丟失後能模糊時空，所以被刪除的可能性更大。去事件化與冠詞等成分的缺失並無必然聯繫，只是具有一定的選擇傾向性。

④ 英文例句轉引自顧維芳（2005）。

概念，即“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約束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語言特區與語言習得、語言接觸一樣，是語言創新變化的重要源泉。語言特區有詩歌、網絡、標題口號三大類型，諸多“非法”形式在語言特區中可以被“合法”解讀（劉彬、覃業位、唐儀，2022）。無獨有偶，在構式語法研究領域也存在類似的理論——篇章壓制（discourse coercion）。其核心要義是，特定的語篇類型會對語篇中的詞彙、句法項目產生壓制作用（Östman, 2005）。換言之，特定語篇類型能夠允准特異詞彙、句法現象出現。比如，在“mother drowned baby”（母親溺死嬰孩）中，“mother”和“baby”兩個名詞前均無冠詞，常規情況下是違背語法規則的表達，但是，冠詞缺失的“mother drowned baby”若作為新聞標題出現，就可以被接受（袁野，2011）。

在標題語言特區內，出於簡潔明瞭的形式要求和吸引眼球的語用動機，常規“被”字事件句經過去事件化操作，變為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其中去事件化操作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一）刪除時體標記“了”，讓常規“被”字事件句的時間定位模糊化，這一操作適用於可以獨立成詞的單音節動詞，如“騙、偷、殺、撞、打、刪、燒”等，這類動詞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動作性強，語義上蘊含較強的物理力，會對受事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刪除依附成分，常規“被”字事件句往往是一個依附小句，需要有對舉成分或複句（從句）語境才能成立，如：

（29）一段很受群眾歡迎的相聲表演，使他成了捱批判的第一人，被抓、被綁、被關押、被遊街。（BCC 語料庫）

（30）萬一誰被咬，而這狗又帶狂犬病毒……真讓人不敢想下去。（同上）

常規“被”字事件句只有依靠這些依附成分才能成活，“被抓”“被綁”“被咬”均不能自立。但在充當標題時，句中依附成分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刪除，“被”字事件句相應地由依附小句變為獨立小句。

（三）刪除複合動詞中的某個語素。這一操作適用於雙音節複合動詞，並遵循兩條刪除規則：第一，刪除的語素一般是非核心語素。具體而言，動補式複合詞刪去補充語素，動賓式複合詞刪去賓語語素，而並列式複合詞則兩個語素均有刪除的可能性。如：

（31）男子闖紅燈被攔（干）掏錢讓交警“幫個忙”（網易新聞 2017-05-24）

（32）網曝 90 後代課女老師舉債辦學 相關負責人被免（職）（人民網 2012-12-30）

（33）打賭為求合影 男子給老外敬酒被毆（打）（光明網 2015-04-28）

第二，刪除後所剩成分應與原雙音節動詞意義保持一致。例如，“懷疑”為動賓式複合動詞，按照第一條規則，應該刪除語素“疑”。但在真實語料中，並沒有“被懷”的例子，只有“被疑”，如“90 後 CEO 央視演講被疑用戶和融資數據造假（《中國青年報》2014-12-01）”。原因是，語素“懷”的意義與“懷疑”一詞相差甚遠，而語素“疑”卻和“懷疑”一詞意思基本一致。因此，只能刪除“懷”，不能刪除“疑”。[⑤] 對比來看，第一條規則是句法要求，第二條是語義要求，二者共同作用制約了常規雙音節動詞“被”字句的去事件化過程。

還要看到，上述三種去事件化操作並不是互斥關係。對於一個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來講，在去事件化過程中有可能同時進行兩種以上操作，但其目的都是為了降低事件性，以契合

⑤ 刪除操作發生後，留下一個粘著語素自由使用，類似的情況在詩歌語言特區也有出現，參看徐杰、姚雙雲、覃業位（2016）。

標題語言特區的相關特徵。

常規事件句通過去事件化操作，通過縮減一定的成分來形成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這種縮減行為最終的目的是吸引受眾眼球，引發讀者持續關注。在心理學上，McConkie（1979）提出的聚光燈理論就認為，類似於這種閱讀困難的地方，注意會像聚光燈一樣自動聚焦。當然，由去事件化操作形成的“被 +V 單”這種表達形式，並非毫無理據，在漢語“被”字句的發展史上，就有單音節光桿動詞“被”字句這樣一個階段，而這一階段恰恰是“被”字句發展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馮勝利（2013：338—339）的研究，漢語“被”字句句法結構的發展歷程如下：

（34）春秋［被 NP］——戰國［被 N/V］——戰國［被 V］［於 NP］——西漢［被 VV］——東漢［被 Adv V］——東漢［被 NP V］

馮文研究指出，從戰國到漢代這段時期，“被 +V 單”結構盛行，其間不能插入任何成分。而“被”與單音節光桿動詞之間能夠加入施事成分，則是漢末以後的事情。例如：

（35）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戰國策·齊策一》）

（36）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韓非子·五蠹》）

（37）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顏氏家訓·歸心》）

（38）一朝被馬踏，唇裂版齒無。（杜甫《戲贈友二首》）

戰國時期單音節動詞“被”字句的意義在於，“被”與單音節動詞所形成的雙音節音步韻律詞（prosodic word）為“被”後 NP 變為 VP 提供了條件（馮勝利，2013：339—340）。這一階段，“被”字後單音節成分可以有動詞和名詞兩解，如果沒有韻律上的雙音結構，“被”後成分便不能作動詞解讀。由此可見，通過刪減手段來更改韻律結構形成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並不是隨意而為，而是一種“復古”手段。

張誼生（2003：98）曾將“被”字的語法化過程總結為“從動詞到介詞，再從介詞到助詞，最後由助詞發展到構詞語素”。就現代漢語平面來看，“被”作為構詞語素的情況並不多[⑥]，只是具有準詞綴化傾向（王振來，2008）。不過，王文也提出，伴隨語言生活不斷發展變化，“被”構成的詞語定會越來越多。與之相對，“被”的詞綴化傾向在標題中卻有長足發展。通過去事件化所形成的雙音節音步結構“被 +V 單”，為“被”的進一步語法化提供了句法環境。正是標題語言特區，讓我們看到“被”字深度語法化的種種表現，這就是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存在的真正理論價值。

五、結論

常規“被”字事件句由於句式義的管控，其謂語一般為複雜形式，不能是光桿動詞。與之相反，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卻屢見不鮮。在形式上，該類標題可分為兩種類型，單音節動

⑥ 王振來（2008）認為，現代漢語層面“被”參與構詞有兩種形式類型，分別是“被 V”與“被 VN”，例如“被告、被俘”“被告人、被害人”，對比來看，“被 VN”格式的能產性更強，“被 V”格式的能產性稍弱，但兩種格式詞例數量均不多。由于成詞標準尚待商榷，且本文關注的是標題相關情況，對於“被 V”結構是否成詞這個問題，本文不作討論，統一稱之為“被 + V 單”結構。

詞要求具有［+ 結果義］或［+ 稱說義］，在“被”與動詞之間不能插入任何施事成分。從生成過程來看，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的出現是標題語言特區中常規“被”字事件句去事件化的結果，具體操作包括刪除“了”，刪除依附成分以及刪除特定語素。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看似違反常規語法規則，實則在“被”字句的發展歷史上能找到相應的理據。標題語言特區是觀察語言形式變異創新的窗口，而單音節動詞“被”字標題是觀察“被”字語法化鏈條的“動態切片”。

參考文獻

陳　禹 2023 新聞標題常用詞“被指”探析，《澳門語言學刊》第 1 期。

陳振艷、施春宏 2021 語篇銜接構式“這樣一來”功能浮現路徑與機制，《漢語學報》第 3 期。

崔希亮 2018 事件分析中的八種對立，《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

鄧思穎 2004 作格化和漢語被動句，《中國語文》第 4 期。

范　曉 2006 被字句謂語動詞的語義特徵，《長江學術》第 2 期。

方　梅 2018《浮現語法：基於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馮勝利 2013《漢語韻律句法學》（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顧維芳 2005 新聞英語標題的特點淺析，《東華大學學報》第 4 期。

李　瑩 2018 漢英新聞標題句法差異對比研究及其理論意義，《華中學術》第 2 期。

劉　彬、覃業位、唐　儀 2022“語言特區”研究理念的形成、發展與展望——兼談語言特區語料庫的建設，《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劉承峰 2003 能進入“把 / 被”字句的光桿動詞，《中國語文》第 5 期。

劉月華、潘文娛、故　韡 2001《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　雲 2005《漢語篇名的篇章化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　堃 2018 漢語標題特點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報》6 月 26 日第 3 版。

莫啟揚 2016《語言中的去時間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彭淑莉 2009 雙音節光桿動詞“被”字句成活條件再考察，《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孫建強 2008 說“被指”，《語文建設》第 11 期。

沈家煊 1995“有界”與“無界”，《中國語文》第 5 期。

宋文輝、羅政靜、于景超 2007 現代漢語被動句施事隱現的計量分析，《中國語文》第 2 期。

王永娜、馮勝利 2015 論“當”“在”的語體差異——兼談具時空、泛時空與超時空的語體屬性，《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

王振來 2008“被 V”和“被 VN”及其詞彙化分析，《漢語學習》第 5 期。

徐　杰、覃業位 2015“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當代修辭學》第 4 期。

徐　杰、姚雙雲、覃業位 2016 詩歌作品中黏著語素的自由用法，《語言暨語言學》第 5 期。

尹世超 2001《標題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尹世超 2008 漢語標題的被動表述，《語言科學》第 3 期。

袁　野 2011 論語篇構式語法及語篇構式壓制，《外國語》第 5 期。

張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對稱與不對稱，《中國語文》第 6 期。

張　黎 2010 漢語“動作——結果”的句法呈現及其認知類型學的解釋，《對外漢語研究》第 1 期。

張誼生 2003 助詞“被”的使用條件和表義功能——兼論“被”的虛化軌迹，載吳福祥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一）》，北京：商務印書館。

Bach, E. 1986. The algebra of event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1), 5-16.

Maienborn, C. 2007. On Davidsonian and Kimian states. In I. Comorovski and K. von Heusignger (eds.), *Existence: Semantics and Syntax,*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Mårdh, I. 1980. *Headlinese: On the Grammar of English Front Page Headlines*. Malmö: Gotab.

McConkie, G. W. 1979. On the Role and Control of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In Kolers P. A., M. E. Wrolstad and H. Bouma (eds.), *Processing of Visual Language*. Boston, MA: Springer US.

Östman, J.O. 2005.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 Prolegomenon. In J.O. Östman and M. Fried (eds.),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Straumann, H. 1935. *Newspaper Headlines: A Study in Linguistic Metho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羅堃　西北師範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730070 luokunstudent@sina.com

De-eventualization and the *Bei* (被) Title with the Monosyllabic Verb

LUO Kun

Abstract: Normally, the predicate of the *'bei'* (被) sentence is a complex form, but the *'bei'* (被) structure with the monosyllabic verb can appear in the titles. Formally, this kind of *'bei'* (被) tit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 which the verb should have the feature [+resultativity] or [+verbalness], and the agent cannot be inserted between the *'bei'* (被) and the verb.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tle of Special Language Domain, the conventional *'bei'* (被) sentence becomes a rhythmic *'bei'* (被) title with the monosyllabic verb by de-eventualization, such as deleting *'le'* (了), attachment components and specific morphem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valu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bei'* (被) can be fully observed through this kind of *'bei'* (被) title.

Keywords: title; Special Language Domain; de-eventualization; monosyllabic verb; *bei* (被)

現代漢語並列截省結構的句法分析 *

吳童杰

提　要：截省結構可以分為一般截省、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漢語並列截省和一般截省、多重截省在截省的構成、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語義解讀方面存在差異，應該視為獨立的結構。和英語並列截省適用“移動 + 刪略”分析不同，漢語並列截省適用偽截省分析，截省部分是兩個“*pro* 是 *wh*”分句並列，不存在語音刪略。英漢語並列截省構造方式的差異說明，並列截省在不同語言中可能通過不同機制生成，對一種語言截省現象的分析不能直接類推至另一種語言中。

關鍵詞：截省結構；並列截省；偽截省分析；空代詞；“是”

一、引言

截省（sluicing）是一種普遍現象，最早由 Ross（1969）提出，後引起廣泛關注（參看 Merchant, 2001; 倪廣妍、李心敬，2022）。從形式上看，截省包括兩個句子，前句是完整句，後句是包含疑問詞的省略句，其中“除疑問代詞之外的句子成分皆被刪略；但是在語義內容上，截省句相當於一個完整的特指疑問句”（張昀、徐杰，2019：1），如（1）。

（1）Somebody just left—guess **who**.　（Ross, 1969）

= Somebody just left—guess **who just left**.

截省可以包含兩個疑問詞，兩個疑問詞並置或被連詞連接，前者是多重截省（multiple sluicing），如（2），後者是並列截省（coordinated sluicing），如（3）。

（2）a. Someone was talking to someone, but I don’t know **who to who**.　（Lasnik, 2014）

b. Mary showed something to someone, but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o whom**.

（Park & Kang, 2007）

（3）a. Someone saw something, but I can’t remember exactly **who or what**.

b. I heard that John gave something to someone. Do you know **what and to whom**?

（均來自 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

* 張和友教授、《澳門語言學刊》的編輯和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有益的意見和建議，謹致謝忱。本文部分內容曾在第三屆京滬港澳高校中文學科研究生論壇（2025 年 9 月 20 日—21 日，復旦大學）彙報，受到與會老師同學的幫助。崔耘赫、付雨甜等在寫作過程中給予了一些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三類截省在漢語中都存在。漢語截省有時需要出現“是”，如（4）。

（4）a. 截省：李四買了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什麼。

b. 多重截省：某人昨天買了一樣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誰 *（是）什麼。

（Wang & Han, 2018）

c. 並列截省：班上有一個學生唱了一首歌，但是我忘了（是）哪一個學生以及（是）哪一首歌。 （Wang, 2025）

有三種常見的對漢語截省的分析。第一，移動 + 刪略說（movement and deletion）：截省來自疑問詞前置和剩餘成分刪略，疑問詞前置可能是焦點化（Wang & Wu, 2006）、話題化（傅玉，2014），或兼具兩種可能（Wang & Han, 2018; Wang, 2025），如（5）。

（5）a. 李四買了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XP *（是）［FocP 什麼 ［Foc’ ~~李四買了 t~~］］］

b. 有人唱了一首歌，但我不知道 ［XP（是）［TopP 哪個人 ［Top’ ~~t 唱了一首歌~~］］］

第二，偽截省說（pseudo-sluicing）：截省的疑問詞基礎生成在表層位置，述謂一個空代詞。如果疑問詞沒有述謂性，“是”必須出現，如（6）。該觀點主要來自 Wei（2004, 2011）、Adams（2004）、Adams & Tomioka（2012）等。

（6）a. 李四買了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pro* *（是）什麼］。

b. 有人唱了一首歌，但我不知道 ［*pro*（是）哪個人］。

第三，（偽）分裂說（(pseudo-)cleft）：截省是分裂句，“是”是分裂標記，如（7）。這個觀點主要來自 Kizu（1997）、Fukaya & Hoji（1999）、Fukaya（2003）等。[①]

（7）a. 李四買了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李四買了的~~］ *（是）什麼］。

b. 有人唱了一首歌，但我不知道 ［［~~唱了一首歌的~~］（是）哪個人］。

很多討論截省的文獻假定（部分）多重截省包含隱性連詞（Adams, 2004; Adams & Tomioka, 2012; Wang & Han, 2018 等），用同一方法分析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但 Citko & Gračanin-Yuksek（2020）和 Wang（2025）指出，並列截省和多重截省不同，應該分別分析。這裏說的並列截省，截省部分包括兩個並列的疑問詞，截省所在分句是截省句，不包含截省的分句是先行句，先行句中和疑問詞對應的成分是疑問詞的先行語。（8）的截省是“是哪個學生以及是哪一首歌”，“但我不知道是哪個學生以及是哪一首歌”是截省句，“班上有個學生唱了一首歌”是先行句，“有個學生”和“一首歌”分別是“哪個學生”和“哪一首歌”的先行語。

（8）班上有個學生唱了一首歌，但我不知道［［（是）哪個學生］以及［（是）哪一首歌］］。

本文考察漢語並列截省，希望回答兩個問題：

（9）a. 漢語並列截省在經驗上有什麼特點？

b. 漢語並列截省適用哪個 / 些分析方法？

本文結論如下：漢語並列截省在截省的構成、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語義解讀方面存在不同於一般截省和多重截省的性質，應該視為獨立的結構。漢語並列截省適用偽截省分析，截省部分是兩個“*pro* 是 *wh*”分句的並列。下文第二節討論有關漢語並列截省的事實，第三節討論漢語並列截省的分析方法，第四節總結。

① 除非語境要求，否則本文不區分分裂（cleft）和偽分裂（pseudo-cleft），兩者的差異不影響討論。

二、漢語並列截省的經驗事實

下面從截省的構成、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語義解讀三方面討論漢語並列截省的經驗事實，著重觀察並列截省不同於一般截省和多重截省的性質。

2.1 截省的構成

漢語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由連詞、疑問詞和“是”構成，下面分別考察。第一，連詞可以是表示合取的“和”“以及”，表示析取的“或”，不能是表示轉折的“但”，如（10）。

（10）班上有個學生唱了一首歌，但我不知道（是）**哪個學生{和/以及/或/*但}**（是）**哪一首歌**。

第二，疑問詞的先行語可以是先行句中的論元或非論元。根據先行語的類型對疑問詞分類：先行語是論元的疑問詞是簡單疑問詞“誰”“什麼”和對應的“什麼 +NP”型複雜疑問詞“什麼人”“什麼東西”等；先行語是非論元且非介詞短語的疑問詞是附接型疑問詞“為什麼”“何時”等，以及對應的複雜疑問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等；先行語是非論元且為介詞短語的疑問詞是介詞型疑問詞“跟誰”“在哪裏”等，如（11）。[②]

（11）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論元 + 論元）

b.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何時**。（論元 + 非論元）

c. 我聽說張三某天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跟誰以及是何時**。（介詞短語 + 非論元）

疑問詞並列的順序不固定，如（12）。

（12）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以及是誰**。

c. 我聽說張三某天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何時**。

d. 我聽說張三某天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何時以及是誰**。

並列截省對疑問詞有兩條限制。限制一：“怎麼（樣）”不出現在並列截省中，如（13）。

（13）a. *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怎麼樣**。

b. *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怎麼樣以及是什麼**。

“怎麼樣”不能用於各類截省。在截省句中提問方式需要用“怎麼”並重複動詞，或用複雜疑問詞（Adams & Tomioka, 2012），如（14）。

（14）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怎麼給的**。

b.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方式**。

限制二：相同疑問詞不能出現在並列截省中，如（15）。

（15）a. * 我聽說某人把這本書給另一個人了，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誰**。

b. * 張三用一個東西和李四換了另一個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以及是什麼**。

---

② 這裏說的論元也包括介詞的賓語，如（i）。

（i）a. 小明跟一個人去了上海，但是我們不知道（是）跟誰。

b. 小明跟一個人去了上海，但是我們不知道 *（是）誰。（Wang & Han, 2018）

“跟誰”的先行語是“跟一個人”，它是介詞型疑問詞。“誰”的先行語是“一個人”，它是簡單疑問詞。

第三，和其他截省相同，並列截省中的簡單疑問詞必須出現在“是”後（Wei, 2004, 2011），複雜疑問詞、附接型疑問詞或介詞型疑問詞無此限制，如（16）。

（16）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誰以及 *（是）什麼。

b. 我聽說張三給了一些人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幾個人以及（是）什麼東西。

c. 我聽說張三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跟誰以及（是）何時。

“是”在一個並列項中的隱現不受另一個並列項影響，如（17）。

（17）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誰以及（是）為什麼。

因此，截省的構成方面，並列截省和其他截省共性多，除並列結構的特性（存在連詞）和漢語截省結構的個性（“是”的隱現），並列截省無特殊表現。

2.2 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

並列截省和其他截省在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上有兩點相同。第一，論元先行語在先行句中不可省略，非論元（包括介詞短語）先行語可以不在先行句中出現，如（18）。

（18）a. 某人吃了 *（冰箱裏的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張三給了 *（某人）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c. 張三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跟誰以及是什麼時候**。

顯性先行語是無定的，如（19）。

（19）張三給了 { 某人 /* 李四 }{ 一些東西 /* 這些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第二，並列截省不對孤島敏感（Merchant, 2001; Adams & Tomioka, 2012; 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 Wang, 2025 等）。先行語處於孤島內的並列截省也合法，如（20）。

（20）a. 主語孤島：

所有從某個國家來的學生都通過了某場考試，但我不知道**是哪個國家以及是哪場考試**。

b. 複雜 NP 孤島：

王五對張三說的李四給了某人某樣東西的消息感到驚訝，但我忘了**是誰以及是什麼**。

c. 附接語孤島：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不高興，但我忘了**是誰以及是什麼東西**。

d. 左分支條件：

張三最近買了一輛汽車，但我不知道**是在哪裏以及是多大**。

並列截省在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方面有特殊表現。第一，不受同句條件（clause-mate condition）限制。並列截省中先行語可以出現在先行句的任何位置。如果先行句包括主句和內嵌句，兩個先行語不必同時出現在主句或內嵌句中，如（21）。

（21）a. 有人告訴張三［學校某處有一場演講］，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在哪裏**。

b. 有人說［他看見張三給了李四某些東西］，但我忘了**是誰以及是什麼東西**。

同句條件是多數語言構造多重截省需要滿足的條件（Merchant, 2001; Lasnik, 2014; 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 等），如（22），其中（22b）的“在哪裏”提問演講地點。

（22）a. 日語（Takahashi, 1994:(51)）：

*Dareka-ga [John-ga nanika-o katta to] itteita
某人 -NOM 約翰 -NOM 某些東西 -ACC 買 .PST COMP 說 .PST
ga, Mary-wa [**dare-ga** **nani-o** ka] oboeteinai.
但是 瑪麗 -TOP 誰 -NOM 什麼 -ACC Q 不記得
希望得到的意思：‘某人說約翰買了什麼，但是瑪麗不記得是誰是什麼。’

b. 漢語（Chiu, 2007: (5)）：

* 某人告訴張三［學校有一場演講］，但我不知道**是誰在哪裏**。

c. 斯洛文尼亞語（Marušič & Žaucer, 2013: (9)）：

*Nekdo misli, da je Janez nekaj pojedel,
某人 認為 COMP AUX 亞內茲 某些東西 吃 .PST
sprašujem se **kdo** **kaj**.
問 自己 誰 什麼
希望得到的意思：‘某人認為亞內茲吃了某些東西，我想知道是誰是什麼。’

d. 英語（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24b)）：

*Some linguist was upset [because Harry spoke to some philosopher], but Bill doesn't know **which linguist which philosopher**.

這說明並列截省在允准條件上和多重截省不同。

第二，不允准對比截省（contrast sluicing）。對比截省指截省中的疑問詞和先行語不對應，在語境中對比關聯。漢語一般截省允准對比截省（Wang & Han, 2018），如（23）。

（23）a. 五位男士參加了演出，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幾位女士**。

b. 張三養了三隻狗，但是我不知道**是幾隻貓**。（Wang & Han, 2018: (10)）

並列截省不允准對比截省，說明並列截省在允准條件上和一般截省不同，如（24）。

（24）a. * 五位男士參加了演出，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以及是幾位女士**。

b. * 張三養了三隻狗，但是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以及是幾隻貓**。

因此，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方面，並列截省和其他兩類截省有共性（無定論元先行語必須出現、沒有孤島敏感性），也有個性（不受同句條件限制、不允准對比截省）。

2.3 語義解讀

並列截省和其他截省在語義解讀方面有差異。第一，內並列項的有定解讀限制。解讀截省需要補全截省句，（25a）補全後有（25b、c）兩種可能。

（25）a. 張三給了某人一本書，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什麼時候**。

b. 張三給了某人一本書，但我不知道**是誰張三給了一本書**以及**什麼時候張三給了他一本書**。

c. # 張三給了某人一本書，但我不知道**是誰張三給了一本書**以及**什麼時候張三給了某人一本書**。

（25a）是以論元和非論元為先行語的疑問詞並列。（25b、c）的區別是“誰”在第二個問句中的有定性：（25b）的“他”有定，（25c）的“某人”無定。（25b）是合適解讀。

（26a）是以論元為先行語的疑問詞並列。補全後的句子中，（26b）的“他”有定，（26c）的“某人”無定，（26d）的“這樣東西”有定。只有（26b）是合適解讀。

（26）a. 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張三給了某樣東西**以及**是什麼張三給了他**。

c. # 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張三給了某樣東西**以及**是什麼張三給了某人**。

d. ? 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張三給了這樣東西**以及**是什麼張三給了他**。

（27a）是以非論元為先行語的疑問詞並列。補全後的句子中，（27b）的“這個時候”有定，（27c）的“某個時候”無定。（27b）是合適解讀。

（27）a. 張三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以及是為什麼**。

b. 張三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張三去了上海**以及**是為什麼張三這個時候去了上海**。

c. # 張三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張三去了上海**以及**是為什麼張三某個時候去了上海**。

上述事實說明並列截省中，內並列項的解讀受外並列項影響，補全解讀包含內並列項的句子時必須將外並列項對應的成分轉化為有定表達（如（25b、26b）中的“他”和（27b）中的“這個時候”）；但外並列項的解讀不受內並列項影響，補全解讀包含外並列項的句子時不需要將內並列項對應的成分轉化為有定表達（如（26b）中的“某樣東西”）。這是內並列項的有定解讀限制。一般截省的語義解讀沒有這個要求。

第二，只允許單對解讀（single-pair reading），排斥配對解讀（pair-list reading）。包含多個疑問詞的句子通常有兩種解讀，如（28），回答一對應單對解讀，得到一組回答，回答二對應配對解讀，得到多組回答（Dayal, 1996; Romero, 2000; Bošković, 2002 等）。

（28）a. Who bought what?

b. 回答一（單對解讀）：John bought a book.

c. 回答二（配對解讀）：John bought a book, Bill a CD, and Mary a DVD.

（Bai & Takahashi, 2024: (9)）

根據 Bai & Takahashi（2024）、Wang（2025）等，漢語多重截省允許單對解讀和配對解讀。帶來單對解讀的疑問詞以存在量化詞為先行語，帶來配對解讀的疑問詞以全稱量化詞為先行語，如（29）。

（29）a. 單對解讀：

- 有學生認為教室牆壁要塗上一種顏色，老師請班長告知**哪個學生哪種顏色**。
- 班長告訴老師是張三，紅色。

b. 配對解讀：

- 每個學生都認為教室牆壁要塗上一種顏色，老師請班長告知**哪個學生哪種顏色**。
- 班長告訴老師是張三紅色、李四白色、王五灰色……

（改編自 Wang, 2025: (12)）

並列截省只允許單對解讀，不允許配對解讀（Wang, 2025），如（30）。

（30）a. 單對解讀：

- 有學生認為教室牆壁要塗上一種顏色，老師請班長告知**哪個學生以及哪種顏色**。
- 班長告訴老師是張三，紅色。

b. 配對解讀：

- # 所有學生都認為教室牆壁要塗上一種顏色，老師請班長告知**哪個學生以及哪種顏色**。
- 班長告訴老師是張三紅色、李四白色、王五灰色……

類似現象在英語中也存在。並列截省不和全稱量化共現，而多重截省可以（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如（31）。

（31）a. Every student has published on some topic, but I couldn't tell you **which student on which topic**. （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 (29b)）

b. #Every student has published on some topic, but I forgot **which student and on which topic**. （ibid: (30b)）

對配對解讀的排斥是語義上區別並列截省和多重截省的特徵。

因此，語義解讀方面，並列截省表現出內並列項的有定解讀限制和對配對解讀的排斥，和其他截省不同。

2.4 階段性總結

從截省的構成、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語義解讀三方面比較一般截省、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的不同表現，可以得到表 1。

表 1　一般截省、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的經驗事實

	一般截省	多重截省	並列截省
包含顯性連詞	×	×	√
疑問詞的使用			
- 位置自由	×	×	√
- 不能用“怎麼（樣）”	√	√	√
- 相同疑問詞不能並列	×	√	√
“是”的隱現	√	√	√
先行語的隱現和無定性	√	√	√
沒有孤島敏感性	√	√	√
不受同句條件限制	√	×	√
不允准對比截省	×	√	√
內並列項的有定解讀限制	×	√	√
排斥配對解讀	√	×	√

一般截省、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既表現出截省的共性，又有特性，應該視為不同結構。認為多重截省和並列截省可以用相同方法分析不合理，因為這不能解釋兩者的差異。下面分析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機制，判斷它適用哪個 / 些分析方法。

三、漢語並列截省的分析方法

並列截省的可能分析很多，不同分析對截省的底層看法不同，可以根據圖 1 分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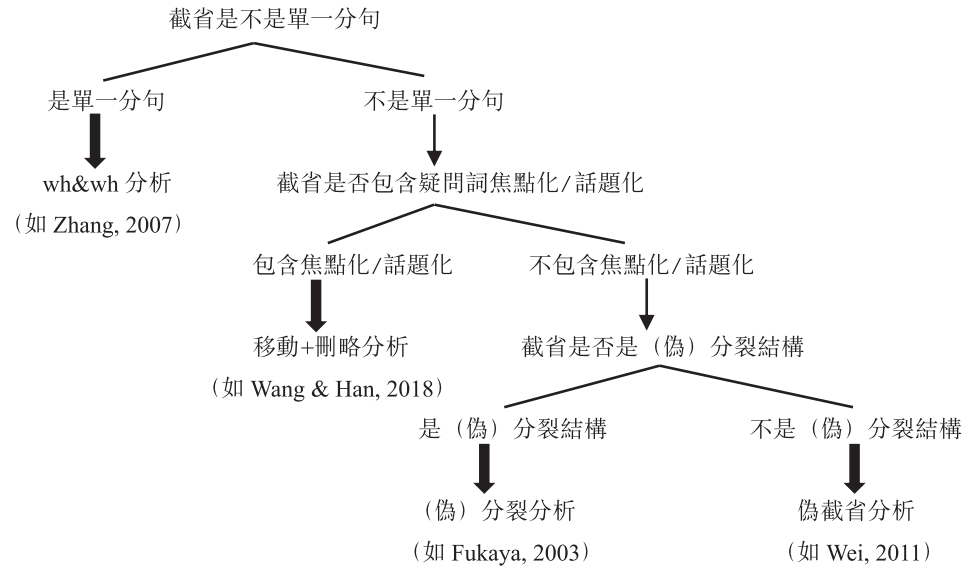

圖 1 並列截省可能分析的層次

本節旨在論證（32）中的觀點。

（32）a.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 wh&wh 分析，不是單一分句

b.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移動 + 刪略分析，不包含疑問詞焦點化 / 話題化

c.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偽）分裂分析，不是（偽）分裂結構

d. 並列截省適用偽截省分析

3.1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 wh&wh 分析，不是單一分句

第一種對並列截省的分析是 wh&wh 分析，其認為並列截省推導如下：疑問詞生成於同一分句，先移到左緣的 Spec FocP 位置，然後移出句子和顯性連詞結合，得到的並列結構重新併入左緣，最後刪略剩餘部分。（33a）的推導如（33b-f）。[③]

（33）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截省部分的底層：張三給了誰什麼

c. 疑問詞移到句子左緣：是誰 $_i$ 是什麼 $_j$ 張三給了 t_it_j

d. 疑問詞移出並和顯性連詞結合：是誰 $_i$ 以及是什麼 $_j$ t_it_j 張三給了 t_it_j

e. 並列結構併入句子左緣：是誰 $_i$ 以及是什麼 $_j$ t_it_j 張三給了 t_it_j

f. 刪略剩餘部分：是誰 $_i$ 以及是什麼 $_j$ ~~t_it_j 張三給了 t_it_j~~

wh&wh 分析廣泛用於解釋日爾曼語、斯拉夫語和漢語等的並列疑問詞結構（Conjoined Question Words Construction, CQWC），見 Zhang（2007）、Haida & Repp（2011）、Bošković（2024）等。但 wh&wh 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理由如下。第一，不能解釋疑問

③（33d）中的移動是側向移動（sideward movement），見 Nunes（2004）、Zhang（2007）等。

詞的自由順序。很多語言的 CQWC 有順序效應（ordering effect），如（34）。

（34）塞爾維亞 – 克羅地亞語（Bošković, 2024: (9)）：

a. **Ko i šta** kupuje?
誰 和 什麼 買 .PROG

b. ***Šta i ko** kupuje?
都表示：‘誰在買什麼？’

漢語並列截省的疑問詞位置自由，如（35），說明兩類結構不來自同一底層。同一分句內疑問詞的移動受相對最簡性（Relativized Minimality, Rizzi, 1990）限制，語序不可能自由，這意味著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來自單一分句。

（35）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以及是誰**。

第二，語義解讀不匹配。如果漢語並列截省的底層是單一分句，疑問詞應該量化同一限定域，兩者的語義解讀不會有區別。但漢語並列截省存在內並列項的有定解讀限制，說明疑問詞並列項語義不對稱。wh&wh 分析不能解釋這種不對稱。

第三，存在特設移動。漢語是 wh 在位（wh-in-situ）語言，疑問詞可以在原位加“是”得到焦點解讀，如（36）。

（36）a. **是誰**喜歡小李？

b. 你**是什麼時候**去過北京？

c. 你**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徐杰，2001：132）

漢語前置並用“是”標記的成分通常有對比性，如（37a、b）。有對比性的成分在句中只有一個，如（37c）。

（37）a. 是［**張三**］$_F$ 喜歡吃蘋果（，不是王五）。

b. 是［**蘋果**］$_F$ 張三喜歡吃（，不是香蕉）。

c. * 是［**張三**］$_F$ 是［**蘋果**］$_F$ 喜歡吃。

這樣（33c）在漢語中是特設的操作，而且存在反例（37c）。

因此，wh&wh 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是單一分句。

3.2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移動 + 刪略分析，不包含疑問詞焦點化 / 話題化

第二種對並列截省的分析是移動 + 刪略分析，其認為並列截省推導如下：疑問詞生成於兩個分句，各自在分句中移到 Spec FocP 或 Spec TopP 位置，其中移到 Spec FocP 的疑問詞必須前加“是”，然後刪略剩餘部分。（38a）的推導如（38b-d）。

（38）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人以及 *（是）什麼**。

b. 分句並列：張三給了哪一個人某樣東西以及張三給了他什麼

c. 疑問詞前置：[$_{TopP}$（是）哪一個人 $_i$ [$_{Top'}$ Top [張三給了 t_i 某樣東西]]] 以及 [$_{FocP}$ *（是）什麼 $_j$ [$_{Foc'}$ Foc [張三給了他 t_j]]]

d. 刪略剩餘部分：（是）哪一個人 $_i$ ~~張三給了 t_j 某樣東西~~ 以及 *（是）什麼 $_j$ ~~張三給了他 t_j~~

一些學者用移動 + 刪略分析解釋歐洲語言截省結構（Merchant, 2001; Citko & Gračanin-

Yuksek, 2020 等），也有人用此分析漢語截省（Wang & Wu, 2006; Wang & Han, 2018; Wang, 2025 等）。但移動 + 刪略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理由如下。第一，無法解釋相同疑問詞的共現限制。如果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來自兩個獨立分句，疑問詞應該不受干擾地在各自分句前置，這樣可以預測，即使疑問詞相同，也可以形成並列截省，如（39）。

（39）a.［誰喜歡李四］以及［張三喜歡誰］

b.［是誰$_i$［t_i 喜歡李四］］以及［是誰$_j$［張三喜歡 t_j］］

c.［是誰$_i$［~~t_i 喜歡李四~~］］以及［是誰$_j$［~~張三喜歡 t_j~~］］

但 2.1 節指出，相同疑問詞不能出現在並列截省中，如（40）。

（40）a. * 我聽說某人把這本書給另一個人了，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誰**。

b. * 張三用一個東西和李四換了另一個東西，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以及是什麼**。

移動 + 刪略分析不能解釋這一點。

第二，對孤島敏感性的分析。並列截省沒有孤島敏感性，即使疑問詞的先行語處於孤島內，結構也合法。以附接語孤島為例，如（41）。

（41）附接語孤島：張三因為李四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不高興，但我忘了**是誰以及是什麼東西**。

但單個疑問詞前置有孤島敏感性，如（42）。

（42）a.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誰某樣東西不高興。

b. * 是誰$_i$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 t_i 某樣東西不高興。

c.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某人什麼東西不高興。

d. * 是什麼東西$_i$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某人 t_i 不高興。

如果並列截省來自兩個獨立分句，疑問詞跨越孤島的移動就需要特設的解釋。

第三，無法解釋介詞論元的前置。漢語不允許介詞懸垂（proposition stranding），介詞賓語位置上的疑問詞前置時介詞需要並移，如（43）。

（43）a. 張三跟誰一起去北京了？

b. 跟誰張三一起去北京了？

c. * 是誰張三跟一起去北京了？

但以介詞賓語為先行語的疑問詞可以出現在並列截省中，如（44）。

（44）張三跟一個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時候**。

（改編自 Wang & Han, 2018: (9)）

移動 + 刪略分析不能解釋為什麼（44）合法，因為其生成涉及介詞懸垂。

因此，移動 + 刪略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來自疑問詞焦點化 / 話題化前置。

3.3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適用（偽）分裂分析，不是（偽）分裂結構

第三種對並列截省的分析是（偽）分裂分析，其認為並列截省推導如下：疑問詞生成於兩個分句，各自在分句中分裂並加“是”，最後刪略剩餘部分。（45a）的推導如（45b-d）。

（45）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分句並列：張三給了誰某樣東西以及張三給了他什麼

c. 分裂：[張三給了某樣東西的 [是誰]] 以及 [張三給了他的 [是什麼]]

d. 刪略剩餘部分：[~~張三給了某樣東西的~~ [是誰]] 以及 [~~張三給了某人的~~ [是什麼]]

一些學者指出日語截省結構適用（偽）分裂分析（Kizu, 1997; Fukaya & Hoji, 1999; Fukaya, 2003 等）。但（偽）分裂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理由如下。第一，“是”的隱現不一致。由於“是”是分裂標誌，所有分裂結構必須出現“是”，如（46）。

（46）a. 張三喜歡的 *（是）李四。

b. 張三給他的 *（是）一本書。

c. 給李四一本書的 *（是）張三。

漢語並列截省中，只有簡單疑問詞“誰”和“什麼”必須和“是”一起出現，如（47）。

（47）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誰以及** *（是）**什麼**。

b. 我聽說張三給了一些人一些東西，但我不知道 ?（是）**幾個人以及** ?（是）**什麼東西**。

c.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以及**（是）**什麼時候**。

d. 我聽說張三跟某人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是）**跟誰以及**（是）**何時**。

（偽）分裂分析不能解釋為什麼並列截省不強制要求“是”出現。

第二，對孤島敏感性的分析。漢語分裂句有孤島敏感性，如（48）。

（48）a.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王五一本書不高興。

b. *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一本書不高興的是王五。

c. * 張三因為李四給了王五不高興的是一本書。

並列截省沒有孤島敏感性，以附接語孤島為例，如（49）。

（49）附接語孤島：張三因為李四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不高興，但我忘了**是誰以及是什麼東西**。

（偽）分裂分析必須特設並列截省的生成包含不具有孤島敏感性的分裂操作。

第三，無法解釋相同疑問詞的共現限制。漢語主賓語都可以分裂，如（50）。

（50）a. 喜歡李四的是張三。

b. 張三喜歡的是李四。

將（50）中的指人名詞替換成疑問代詞“誰”，再將（50a、b）並列刪略，可以得到“是誰以及是誰”。但這和事實不符，相同疑問詞不能構成並列截省，如（51）。

（51）* 我聽說某人把這本書給另一個人了，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誰**。

因此，（偽）分裂分析不能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不來自疑問詞的分裂。

3.4 並列截省適用偽截省分析

第四種對並列截省的分析是偽截省分析，其認為並列截省推導如下：疑問詞生成於兩個分句，各自在分句中述謂空代詞 *pro*，形成“*pro* 是 *wh*”，“是”構建述謂關係，可以看作聯繫詞（Relator, den Dikken, 2006），結構中不存在刪略。（52a）的推導如（52b-c）。

（52）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是誰以及是什麼**。

b. 構建兩個分句：*pro*1 是誰　　*pro*2 是什麼

c. 兩個分句並列：［*pro*1 是誰］以及［*pro*2 是什麼］

（52）的疑問詞以論元為先行語，*pro* 是 E- 類代詞（Evens, 1977），*pro*1 相當於“張三給某樣東西的人”，*pro*2 相當於“張三給 *pro*1 的東西”，*pro* 可以替換為其指稱，如（53）。

（53）a.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pro*1 是誰**］**以及**［***pro*2 是什麼**］。

b. 我聽說張三給了某人某樣東西，但我不知道［**張三給了某樣東西的人是誰**］**以及**［**張三給了他的東西是什麼**］。

以非論元為先行語的疑問詞並列也類似，如（54），其中 *pro* 指稱事件，不是 E- 類代詞，是事件代詞（event *pro,* Parsons, 1990; Wei, 2011; Adams & Tomioka, 2012）。④

（54）a. 我聽說張三去了上海，但我不知道［***pro*1 是什麼時候**］**以及**［***pro*2 跟誰**］。

b. PAST(∃e)[去 (e) & Agent(e, 張三) & Theme(e, 上海) & Time(e, 某時) & Instrument(e, 某種工具) & Comitative(e, 某人) & Purpose(e, 某原因) & …], … [$pro_{(time,\ instrument,\ comitative,\ purpose,\ etc.)}$ … $wh_{(time,\ instrument,\ comitative,\ purpose,\ etc.)}$]

（改編自 Wei, 2011: (60)）

偽截省分析能解釋和並列截省相關的事實。截省的構成方面。第一，偽截省分析要求存在兩個分句，分句間有顯性連詞。第二，兩個分句可以互換位置，疑問詞位置自由。第三，“怎麼樣”不能述謂事件代詞（Adams & Tomioka, 2012），因為用“怎麼樣”提問無法得到事件的發生方式，如（55），因此“怎麼樣”不能出現在並列截省中。

（55）a. 那對恩愛的夫妻大吵了一架。

b. 真的嗎？（那是）什麼時候 / 在哪裏 / 為什麼 /# 怎麼樣？

（Adams & Tomioka, 2012: (33)）

第四，相同疑問詞不能並列，因為如果 *pro*1 和 *pro*2 被相同疑問詞述謂，彼此不能區分，

---

④ 審稿專家指出（54a）的“什麼時候”和“跟誰”是附接語，很難直接做謂語，否則無法解釋（i）。

（i） a. * 張三去了南京跟誰？

b. * 張三去南京什麼時候？

類似的還有（ii），這類句子的主語指稱一個事件。

（ii）* 我不知道她突然大笑為什麼。（劉麗萍，2015：183）

審稿人的觀察是正確的，但似乎的確存在表示疑問的附接語做謂語的用法，如（iii）。

（iii）a.（*談論拼車事宜*）他跟我，你跟誰？

b.（*談論監考事宜*）我下午兩點，你什麼時候？

c.（*談論遲到事宜*）她早上肚子不舒服，你為什麼？

這類結構的前後分句有對比關係，疑問詞預設被提問對象存在：（iiia）用於聽說雙方都要拼車的語境，（iiib）用於聽說雙方都要監考的語境，（iiic）用於兩個人早上都遲到的語境。（54a）允許“什麼時候”和“跟誰”做謂語，是因為說話人知道張三在某個時候跟某人去了上海。

另一方面，拯救（i）和（ii）的辦法是在謂語前加“是”，如（iv）。

（iv）a. 張三去南京是跟誰？

b. 張三去南京是什麼時候？

c. 我不知道她突然大笑是為什麼。

根據 Wei（2011），“是”用於構建述謂關係。儘管（iv）中的附接語有述謂性，但當主語相對複雜時，它們必須加“是”加強述謂性。類似現象在名詞謂語句中也存在，比較（va）和（vb）。

（v） a. 魯迅紹興人。

b. 那個寫了無數經典文章、棄醫從文、閃爍著時代光輝的魯迅 */?? （是）紹興人。

這樣，劉麗萍（2015：183）的“當主語為事件時，充當謂語的疑問詞短語前面同樣需要繫動詞‘是’強制性出現”並不反對偽截省分析，“是”的出現可能和複雜主語的性質有關。感謝審稿專家指出這一問題。

就無法確定指稱。（56）中，*pro*1 可以是告訴我書被借走的人，*pro*2 是借書的人；*pro*1 也可以是借書的人，*pro*2 是告訴我書被借走的人。沒有辦法區別兩種解讀。

（56）* 有人告訴我這本書被一個人借走了，但我不知道［***pro***1 **是誰**］**以及**［***pro***2 **是誰**］。

第五，“是”的隱現和疑問詞與是否有述謂性有關：沒有述謂性的簡單疑問詞“誰”和“什麼”必須和“是”一起出現；有述謂性的疑問詞不要求“是”強制出現（Wei, 2011），如果“是”出現，它可以看成焦點標記（Li & Wei, 2025）。[⑤]

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方面。第一，先行語的隱現與其類型有關。論元先行語關聯 E- 類代詞，必須出現；非論元（包括介詞短語）先行語關聯事件代詞，其隱現不影響事件約束。顯性論元先行語是無定的，因為 E- 類代詞不能選擇有定先行語。

第二，並列截省沒有孤島敏感性、不受同句條件限制，和其底層結構有關。“*pro* 是 *wh*”是基礎生成的，不涉及移動，沒有孤島敏感性。*Pro* 可以關聯先行句中的任何成分，因此並列截省不受同句條件限制。

第三，並列截省不允准對比截省，因為 E- 類代詞不以隱性成分為先行語。論元先行語必須出現且和疑問詞對應，否則 E- 類代詞無法被允准。

語義解讀方面。第一，內並列項受有定解讀限制，因為內並列項述謂的 *pro*2 的指稱包含 *pro*1，但 *pro*1 的指稱不包含 *pro*2。*Pro*1 尋找先行語時 *pro*2 沒有出現，後者不影響前者的指稱。*Pro*2 尋找先行語時 *pro*1 更新了語境，後者影響前者的指稱。類似效應在驢子句中也存在，（57a）的 it 指“農民擁有的驢”，（57b）的 it 指“脾氣暴躁的農民擁有的驢”。

（57）a. If a farmer owns a donkey, he will beat it.

b. If a farmer owns a donkey, the owner of which is quick-tempered, he will beat it.

（改編自 Geach, 1962: 143）

第二，並列截省排斥配對解讀，因為並列截省的底層是兩個包含單個疑問詞的問句，而非一個包含兩個疑問詞的複雜問句（Citko & Gračanin-Yuksek, 2020）。

---

⑤ 審稿專家提問表示述謂關係的“是”和焦點標記“是”是否有同一性，其給出的句子為（i）。

（i）a.“是”表示述謂關係：魯迅是浙江人。

b.“是”用作焦點標記：魯迅是 1910 年去的日本。

表示述謂關係的“是”和焦點標記“是”處於相同位置，語義上都表示主觀斷定（張和友，2012），可以認為是同一的。換言之，“是”兼有表示述謂關係和標記焦點的功能，是否強制出現取決於“是”後成分的述謂性。感謝審稿專家提出這個問題。

綜上所述，偽截省分析可以解釋漢語並列截省的生成。[⑥] 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包含兩個分句，每個分句中的疑問詞述謂一個空代詞 *pro*，形成“*pro* 是 *wh*”，“是”是聯繫詞。如果疑問詞的先行語是論元，*pro* 是 E- 類代詞；如果疑問詞的先行語是非論元，*pro* 是事件代詞。漢語並列截省在構造過程中不存在語音刪略。

四、結論

本文考察漢語並列截省，指出並列截省和其他截省在截省的構成、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語義解讀方面存在差異。截省的構成方面，並列截省包含顯性連詞，疑問詞可以互換位置，但不能彼此相同或用“怎麼樣”提問，簡單疑問詞“誰”“什麼”必須和“是”一起出現。截省部分與先行句的關聯方面，無定論元先行語必須顯性出現，並列截省沒有孤島敏感性、不受同句條件限制、不允准對比截省。語義解讀方面，並列截省排斥配對解讀，且內並列項存在有定解讀限制。這些差異說明並列截省是獨立結構，需要單獨分析。

本文比較四種分析並列截省的方法，指出並列截省的截省部分：（1）不適用 wh&wh 分析，不是單一分句；（2）不適用移動 + 刪略分析，不包含疑問詞焦點化 / 話題化；（3）不適用（偽）分裂分析，不是（偽）分裂結構；（4）適用偽截省分析。

對漢語並列截省的考察以及英漢語類似結構的比較發現：很多語言都有並列截省結構，但各種語言的並列截省不以相同手段構造，每種語言會選擇符合自身特點的操作構造並列截省。作為疑問詞移位語言，英語並列截省通過移動 + 刪略構造；作為疑問詞在位語言，漢語並列截省通過構建偽截省結構實現。

---

⑥ 劉麗萍（2015：6.3 節）指出偽截省分析存在無法解釋的事實。第一，漢語有對比截省，如（i）。第二，漢語存在偽截省和典型截省，如（ii）。第三，偽截省句的附接語先行語可以是隱性的，和英語典型截省句相似，如（iii）。第四，有些截省通過還原省略可以得到更自然的解讀，如（iv）。第五，主語指稱事件時，充當謂語的疑問詞前必須出現“是”，如（v）。

（i） 我知道他養了一隻貓，但我不知道**幾隻狗**。

（ii） a. 他 *（跟一個人）去上海了，但我不知道**是誰**。

b. 他（跟一個人）去上海了，但我不知道**跟誰**。

（iii） a. 英語偽截省句：*He fixed the car, but I don’t know **when/why/it was**.

b. 英語典型截省句：He fixed the car, but I don’t know **when/why**.

（iv） “若不是你父親教的，是誰教的？”王動道：“我也不知道［**是誰（教的）**/*?**pro 是誰**］。”

（v） 我不知道她突然大笑 *（**是**）**為什麼**。（均來自劉麗萍，2015：181—183）

並列截省不允許對比截省（2.2 節），事實一不影響本文分析。事實二、五已經得到解釋：“誰”是簡單疑問詞，先行語必須出現，“跟誰”是介詞型疑問詞，先行語可以不出現（2.2 節）；“是”的強制出現來自複雜主語對述謂的要求（註釋 ④）。事實三、四可能支持截省的其他分析，但沒有從正面反對偽截省分析。根據 2.4 節，並列截省和一般截省不同，不好簡單認為兩者有相同的生成機制。

根據劉麗萍（2015），漢語偽截省適用偽截省分析，典型截省適用邏輯式複製分析（LF-copy approach, Chung, Ladusaw, & McCloskey, 1995, 簡稱 CLM）。將 CLM 用於分析並列截省至少有兩個問題。第一，根據 CLM，截省句的底層是 CP，並列截省的底層包含 CP 並列，而漢語的“和”和“以及”不能並列 CP。第二，CLM 的關鍵技術 IP 迴圈（IP-Recycling）、萌生（Sprouting）和合併（Merger）只存在於截省，不存在於其他省略（Romero, 2000），有特設的可能。感謝審稿專家提到劉麗萍（2015）對相關問題的討論。

參考文獻

傅　玉 2014“小句左緣理論”框架下的英漢截省句對比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劉麗萍 2015《句法省略與漢語截省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倪廣妍、李心敬 2022 語音形式刪除的漢語研究綜述，《澳門語言學刊》第 2 期。

徐　杰 2001《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和友 2012《“是”字結構的句法語義研究——漢語語義性特點的一個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　昀、徐　杰 2019 截省句中謂詞性空位成分的特點與性質，《語言研究》第 4 期。

Adams, Perng Wang. 2004. The structure of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en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0: 1-16.

Adams, Perng Wang & Tomioka, Satoshi. 2012.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an instance of pseudo-sluicing. In Jason Merchant & Andrew Simpson (eds.), *Sluicing: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219-2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i, Xue & Takahashi, Daiko. 2024. Pair-list interpretation in multiple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Special Collection: CogNet*: 1-13.

Bošković, Željko. 2002. On multiple *wh*-fronting. *Linguistic Inquiry* 33(3): 351-383.

Bošković, Željko. 2024. Wh&wh coordinations.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32(FASL issue): 1-23.

Chiu, Liching Livy. 2007. A focus-movement account on Chinese multiple sluicing. *Nanzan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1(1): 23-31.

Chung, Sandra, Ladusaw, William A. & McCloskey, James. 1995. Sluicing and logical form.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3(3): 239-282.

Citko, Barbara & Gračanin-Yuksek, Martina. 2020. Conjunction saves multiple sluicing: How *(and) why?. *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 5(1): 92. 1-29.

Dayal, Veneeta. 1996. *Locality in Wh Quantification: Questions and Relative Clauses in Hindi*. Dordrecht: Kluwer.

Den Dikken, Marcel. 2006.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Evens, Gareth. 1977. Pronouns, quantifiers, and relative clauses.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3): 467-536.

Fukaya, Teruhiko. 2003. Island (in)sensitivity in Japanese sluicing and stripping and some implications. In Gina Garding & Mimu Tsujimur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WCCFL 22)*, 179-192.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Fukaya, Teruhiko & Hoji, Hajime. 1999. Stripping and sluicing in Japanese and some implications. In Sonya Bird, Andrew Carnie, Jason Haugen & Peter Norques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WCCFL18)*, 145-158.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Geach, Peter. 1962. *Reference and Generality: An Examination of Some Medieval and Modern Theori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ida, Andreas & Repp, Sophie. 2011. Monoclausal question word coordinations across languages. In Suzi Lima, Kevin Mullin & Brian Smith (eds.), *Proceedings of NELS 39*, 373-386.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GLSA.

Kizu, Mika. 1997. Sluicing in wh-in-situ languages. In Kora Singer, Randall Eggert & Gregory Anderson (eds.), *CLS 33: Papers from the Main Session*, 231-244. Chicago, IL: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Lasnik, Howard. 2014. Multiple sluicing in English?. *Syntax* 17(1): 1-20.

Li, Yen-Hui Audrey & Wei, Ting-Chi. 2025. Base-generated “ellipsis”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4(3): 547-591.

Marušič, Franc & Žaucer, Rok. 2013. A note on sluicing and island repair. In Steven Franks (ed.), *Formal Approaches to Slavic Linguistics: The Third Indiana Meeting 2012*, 176-189. Ann Arbor, MI: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Merchant, Jason. 2001. *The Syntax of Silence: Sluicing, Islands, and the Theory of Ellip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unes, Jairo. 2004. *Linearization of Chains and Sidew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ark, Myung-Kwan & Kang, Jung-Min. 2007. Multiple sluicing in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394-404. The Korean Society for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arsons, Terence.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Rizzi,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Romero, Maribel. 2000. Antecedentless sluiced wh-phrases and islands. In Kerstin Schwabe & Zhang Ning (eds.), *Ellipsis in Conjunction*, 195-220.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Ross, John Robert. 1969. Guess who?. In Robert I. Binnick, Alice Davison, Georgia M. Green & Jerry L. Morgan (eds.), *Papers from the 5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52-286.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Takahashi, Daiko. 1994. Sluicing in Japa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3): 265-300.

Wang, Chengdong & Han, Jingquan. 2018. The syntax of multiple-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28(4): 609-630.

Wang, Chyan-An Arthur. 2025. Multiple sluicing and coordinated sluicing in Mandarin: a cross-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ELSJ 18th International Spring Forum 2025. Tokyo: Seijo University.

Wang, Chyan-An Arthur & Wu, Hsiao-Hung. 2006. Sluicing and focus movement in wh-in-situ languages. In Aviad Eilam, Tatjana Scheffler & Joshua Tauber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375-387. Philadelphia: Penn Linguistics Club.

Wei, Ting-Chi. 2004. *Predication and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Wei, Ting-Chi. 2011. Island repair effects of the Left Branch Cond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3): 255-289.

Zhang, Ning Niina. 2007.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s of two paired dependency constructions. *Lingua* 117(12): 2134-2158.

吳童杰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tjericwu@163.com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Coordinated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WU Tongjie

Abstract: Sluicing construc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tandard sluicing, multiple sluicing, and coordinated sluicing. In Mandarin Chinese, coordinated sluicing differs from standard and multiple sluicing in terms of structural 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luiced element and its antecedent, and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thus warranting its classification as a distinct construction. Unlike English coordinated sluicing, which is amenable to a movement and deletion analysis, Mandarin coordinated sluicing is better treated under a pseudo-sluicing analysis, in which the sluiced elements consist of two conjoined clauses in the form "*pro shi wh*" without any phonological dele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of coordinated sluicing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suggest that this construction may be generated through distinct mechanisms across languages. Consequently, an analysis of sluicing phenomena in one language may not be directly extended to another.

Keywords: sluicing construction; coordinated sluicing; pseudo-sluicing analysis; empty pronoun; *shi*

上古漢語句際關係標示與關聯標句詞研究 *

田　源、趙璇玉

提　要：標句詞是標示句子類型的句法範疇，關聯標句詞指標示句際關係的一類標句詞。本文將標句詞理論應用於上古漢語研究中，通過對《戰國策》中標示句際關係的關聯標句詞的研究，瞭解上古漢語在複句句際關係標示等方面的特徵，以期進一步明確上古漢語在現代語言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價值。根據所標示的不同句際語義關係，《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可分為因果類、並列類和轉折類等三大類型，涉及十個小類；從句法特徵看，關聯標句詞位於前（後）一分句句首、前一分句句尾和主謂之間等句法位置，與“句子三個敏感位置理論”一致；從組配關係看，《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多為單用，也可見到一些前後分句關聯標句詞搭配使用和框式關聯標句詞的現象。

關鍵詞：上古漢語；《戰國策》；關聯標句詞；語義類型；句法特徵

標句詞（Complementizer），是生成語法學中的重要概念。最經典意義的“標句詞”指的是引導名詞性補足語小句的標記（如英語中引導主賓語從句的“that”）。隨著句法理論的發展，“標句詞”這一術語被借用來表示句子（CP）的中心語（縮寫為 C 或 COMP），其內涵與外延發生了巨大改變。在標句詞理論發展過程中，Rosenbaum（1967）、Bresnan（1970, 1972）、Frajzyngier（1995, 1996）和 Rizzi（1997）等西方學者的研究貢獻突出，起到了尤為關鍵的作用。標句詞理論也被廣泛運用到英語、歐洲多種語言和日語、韓語等世界多种語言的研究實踐中。漢語標句詞研究主要集中於言說動詞語法化發展而來的一類標句詞，如“說”（方梅，2006）、“道”（劉丹青，2004）、“講”（Simpson & Wu, 2002）、“話”（Chui, 1994; Yeung, 2003, 2006）等，另外還涉及句尾語氣、複句關係等內容。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田源（2011，2017）梳理了標句詞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對標句詞概念提出了明確界定，指出標句詞是標示句子類型的虛詞（“句子類型”與句子屬性、句類、句子情態語氣以及句間關係等全句功能範疇有關），位於句首、謂頭和句尾三個句子敏感位置。漢語標句詞系統包含標示句子屬性、標示句子情態語氣、標示句際關係等多個子系統。

本文嘗試將標句詞理論應用於上古漢語研究中，以上古漢語經典文獻《戰國策》為例，以

* 本文相關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上古漢語全句功能範疇與標句詞研究”（20YJC740057）和武漢大學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項目資助。衷心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建議，文中舛誤概由作者負責。田源是本文通訊作者。

點帶面，通過對《戰國策》中標示句際關係的關聯標句詞進行窮盡性統計分析，在對語義關係類型和句法特徵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瞭解上古漢語在複句句際關係標示等方面的特徵，以期進一步明確上古漢語在現代語言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一、關聯標句詞的界定

廣義句子功能除了包括“疑問”“否定”等狹義句子功能範疇外，還包括“條件”“因果”等句際關係範疇，“關係”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功能，標示複句內部分句間邏輯語義關係的句際關係範疇也是通過在三個句子敏感位置進行加標等句法操作來實現的，與狹義的句子功能具有平行一致的特徵（徐杰、李瑩，2010）。標句詞，即標示句子類型的虛詞，是標示包括句子屬性、句類、句子情態語氣和句際關係在內的全句功能語法範疇的標記詞，是句子功能實現的關鍵手段之一。不同類型的全句功能範疇分別投射出自己的功能範疇短語，都屬於標句詞短語層面（CP-layer）。任何一個句子都帶有一個標句詞 C（Complementizer），都是標句詞 C 投射出來的標句詞短語 CP（Complementizer Phrase）。

關聯標句詞即標示複句內分句間語義關係這一句際關係範疇的標句詞。關聯標句詞對複句而言意義重大，是特定複句類型的標記和複句語義關係的形式標誌。一方面連接複句內的不同分句，另一方面對分句間隱性的邏輯語義關係具有顯示、選示、轉化和強化作用（邢福義，2001：31）。

二、語義類型

我們對《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進行了窮盡性調查[①]，共得到包含關聯標句詞的用例 2239 條，關聯標句詞共計 15 個（同一詞形計 1 個），其中包含關聯標句詞“而”的用例最多，共 912 條，其次是“則”和“故”，分別為 398 條和 318 條。

有關漢語複句的分類，傳統上一般採用二分法，即首先分為聯合複句和偏正複句兩大類，然後進一步分別細分為並列複句、遞進複句、選擇複句等和因果複句、轉折複句、條件複句等小類。邢福義（2001：303）按照“從關係出發，用標誌控制的原則”，依據複句內分句間的邏輯語義關係，將漢語複句分為因果類、並列類和轉折類三個一級複句類，並進一步區分出多種二級複句類。本文採用邢福義（2001）的三分法，依據所標示的分句間邏輯語義關係，將《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分為因果類、並列類和轉折類等三個類別。

---

① 本文所依據的版本為《戰國策註釋》（何建章，2019）。《戰國策》當前通行版本中，標點較為瑣碎，很多關聯標句詞出現在單句句首，所標示的句際關係體現在句群而非一個句子內部，因此在統計分析《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時，我們採用語義理解與既有標點相結合的方式。複句與句群其實不存在嚴格的界限，標點符號因為人們對“句”的理解不同而不同，具有靈活性（邢福義，2016：380）。

表 1《戰國策》中關聯標句詞的語義類型及佔比

語義類型	用例數（條）	佔比（%）
因果類	1218	54.40
並列類	626	27.96
轉折類	395	17.64

2.1 因果類

因果類關聯標句詞標示分句之間的因果關係。《戰國策》中包含因果類關聯標句詞的用例共 1218 條，佔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54.40%，是數量最多的一類。通過對分句間因果關係的進一步細化，因果類關聯標句詞可進一步細分為因果式、推斷式、假設式、條件式與因果類等五類。

2.1.1 因果式

因果式關聯標句詞主要標示分句之間嚴格意義上的因果關係，最具典型性與代表性。《戰國策》中因果式關聯標句詞有 4 個：“而”“者”“故”和“是故”，包括詞條共計 555 條，佔因果類標句詞用例的 45.57%，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24.79%。

（1）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戰國策·東周策》）

（2）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戰國策·齊策一》）

（3）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戰國策·東周策》）

（4）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戰國策·楚策一》）

2.1.2 假設式

假設式關聯標句詞一般用於前一分句所表示的原因是一種假設情況，後一分句根據前述假設推斷出結果的複句中，可理解為根據假設推斷結果，表現一種假設的因果關係。《戰國策》中假設式關聯標句詞有 9 個：“而”“則”“者”“若”“如”“使”“且”“即”和“為”，包括詞條共計 476 條，佔因果類標句詞用例的 39.08%，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21.26%。

（5）韓聽，而霸事可成也。（《戰國策·秦策三》）

（6）秦與天下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戰國策·西周策》）

（7）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戰國策·齊策二》）

（8）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戰國策·秦策二》）

（9）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戰國策·中山策》）

（10）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戰國策·燕策一》）

（11）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戰國策·楚策三》）

（12）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戰國策·燕策二》）

（13）為弗能聽，勿使出竟。（《戰國策·魏策一》）

2.1.3 條件式

條件式關聯標句詞一般用於前一分句所表示的原因是一種條件，後一分句根據條件推斷出結果的複句中，可理解為根據某種條件推斷結果。《戰國策》中條件式關聯標句詞有 2 個：“而”和“則”，包括詞條共計 90 條，佔因果類關聯標句詞用例的 7.39%，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4.02%。

（14）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戰國策·秦策四》）

（15）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戰國策·東周策》）

2.1.4 推斷式

推斷式關聯標句詞一般用於依據事實而推斷出某種結果的情況，重視推斷的理據性，可理解為根據某種事實情況有理據性地推斷結果。《戰國策》中推斷式關聯標句詞只有 1 個：“則”。推斷式雖然強調理據，但也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是說話人的主觀推斷，服務於人或事，自我斷定的因果關係並非是客觀存在的因果關係（孫凱悅，2024）。《戰國策》中推斷式關聯標句詞包括詞條共計 65 條，佔因果類關聯標句詞用例的 5.34%，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2.90%。

（16）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之形危。（《戰國策·齊策六》）

（17）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戰國策·楚策一》）

2.1.5 目的式

目的式關聯標句詞用於前分句所表示的憑藉或做法，是為了實現後分句所表示的目的的情況，在隱含的語義關係中，前分句為原因，後分句為結果。《戰國策》中，目的式關聯標句詞只有 1 個：“者”，包括詞條共計 32 條，佔因果類關聯標句詞用例的 2.63%，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1.43%。

（18）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尉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戰國策·楚策一》）

（19）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戰國策·趙策四》）

表 2　因果類關聯標句詞的類別及佔比

因果類關聯標句詞類別	用例數（條）	佔比（%）
因果式	555	45.57
假設式	476	39.08
條件式	90	7.39
推斷式	65	5.34
目的式	32	2.63

2.2 並列類

並列類關聯標句詞標示分句之間的並列關係。《戰國策》中包含並列類關聯標句詞的用例共 626 條，佔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27.96%。通過對分句間並列關係的進一步細化，並列類關聯標句詞可進一步細分為並列式、連貫式與遞進式等三類。

2.2.1 並列式

並列式關聯標句詞用於標示分句之間的並列關係，但強調平列或對照等關係，是典型的並列，沒有順序上的先後或程度上的輕重之別。《戰國策》中並列式關聯標句詞有 2 個：“而”和“與其……不如……”，包括詞條共計 65 條，佔並列類標句詞用例的 10.38%，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2.90%。

（20）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成也。(《戰國策·西周策》)

（21）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戰國策·燕策二》)

2.2.2 連貫式

連貫式關聯標句詞用於強調時間上的縱線序列，比如兩個動作先後發生、兩種情況先後出現等，可以理解為具有時間先後的廣義並列關係。《戰國策》中連貫式關聯標句詞只有 1 個：“而”，包括用例共計 237 條，佔並列類標句詞用例的 37.86%，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10.59%。

（22）樂羊反，而語功。(《戰國策·秦策二》)

（23）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戰國策·秦策四》)

2.2.3 遞進式

遞進式關聯標句詞用於強調程度上的差異，前一分句與後一分句情況不同，可以順遞，也可以反遞，反遞往往通過加入否定詞實現，可理解為具有程度深淺的廣義並列關係。《戰國策》中遞進式關聯標句詞有 2 個：“而”和“且”，包含用例共計 324 條，佔並列類標句詞用例的 51.76%，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14.47%。

（24）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戰國策·秦策三》)

（25）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戰國策·魏策三》)

表 3　並列類關聯標句詞的類別及佔比

並列類關聯標句詞類別	用例數（條）	佔比（%）
並列式	65	10.38
連貫式	237	37.86
遞進式	324	51.76

2.3 轉折類

轉折類關聯標句詞標示分句之間廣義的轉折關係。《戰國策》中包含轉折類關聯標句詞的用例共 395 條，佔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17.64%。通過對分句間轉折關係的進一步細化，轉折類關聯標句詞可進一步細分為突轉式和讓步式等兩類。

2.3.1 突轉式

突轉式關聯標句詞用於前一分句中沒有明顯的轉折標誌，後一分句加入關聯詞語後語義突轉，完成突然性轉折的情況，前一分句也可以出現轉折標誌，二者搭配使用。《戰國策》中突轉式關聯標句詞有 4 個：“而”“則”“然”和“然而”，包括用例 257 條，佔轉折類關聯標句詞用例的 65.06%，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11.48%。

（26）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戰國策·齊策五》）

（27）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戰國策·齊策二》）

（28）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戰國策·趙策一》）

（29）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戰國策·魏策二》）

2.3.2 讓步式

讓步式關聯標句詞用於強調在前一分句中包含讓步標誌，先讓步後實現轉折，前一分句對後一分句的轉折起預示作用的情況。《戰國策》中讓步式關聯標句詞只有 1 個：“雖”，包含用例 138 條，佔轉折類關聯標句詞用例的 34.94%，佔《戰國策》關聯標句詞用例總量的 6.16%。

（30）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戰國策·秦策三》）

（31）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戰國策·趙策三》）

（32）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戰國策·西周策》）

表 4　轉折類關聯標句詞的類別及佔比

轉折類關聯標句詞類別	用例數（條）	佔比（%）
突轉式	257	65.06
讓步式	138	34.94

三、句法特徵

3.1 句法位置

“句子三個敏感位置”包括句首、謂頭和句尾，這三個句法位置之所以特殊和敏感，原因在於它們除了擔負線性句法結構中的基本角色之外，還要對屬於全句的語法範疇做出相應的語法反應（徐杰，2005）。與全句有關的功能範疇，其表現形式和句法手段只能在這三個句子敏感位置上進行。句際關係是典型的全句功能範疇，《戰國策》中標示句際關係的關聯標句詞所處的句法位置包括前一分句首、後一分句句首、前一分句句尾和主謂之間等四個，與句子三個敏感位置理論一致。

3.1.1 分句句首

分句句首是《戰國策》中關聯標句詞出現次數最多的句法位置，包括前一分句句首和後一分句句首，二者數量基本一致。位於前一分句句首的關聯標句詞包括：“如果”義的“而”“則”“且”“即”以及“若”“如”“使”“為”“雖”；位於後一分句句首的關聯標句詞包括：非“如果”義的“而”“則”“且”“即”以及“故”“是故”“然”“然而”。

A. 前一分句句首

“如果”義的“而”“則”“且”和“即”，出現在前一分句的句首，引導表原因的分句，這種“原因”常是對某種情況的假設。

（33）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戰國策·齊策一》）

（34）則不可，因而刺殺之。（《戰國策·燕策三》）

（35）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戰國策·魏策二》）

（36）即復之楚，願王殺之。（《戰國策·秦策一》）

表“如果”“假如”的“若”“如”“使”和“為”，引導標示原因的分句，標示對某種情況的假設。

（37）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戰國策·秦策五》）

（38）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戰國策·中山策》）

（39）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戰國策·秦策三》）

（40）為弗能聽，勿使出竟。（《戰國策·魏策一》）

“雖”表示讓步，僅出現在前一分句中，譯為“即使”或“雖然”，表實讓時譯為“雖然”，表虛讓時譯為“即使”。

（41）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戰國策·齊策一》）

（42）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戰國策·齊策一》）

B. 後一分句句首

非“如果”義的“而”“則”“且”和“即”，出現在後一分句句首，引導表結果的分句。“而”可譯為“那麼”表因果（如（43））、譯為“而且”表並列（如（44））、譯為“然而”表轉折（如（45））；“則”多數情況下譯為“那麼”表因果（如（46）），有時可譯為“但是”表轉折（如（47））；“即”往往譯為“那麼”表因果（如（48））；“且”可譯為“那麼”表因果（如（49））、譯為“而且”“況且”表遞進（如（50））。

（43）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戰國策·東周策》）

（44）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戰國策·秦策三》）

（45）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戰國策·秦策四》）

（46）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戰國策·東周策》）

（47）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戰國策·齊策五》）

（48）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戰國策·中山策》）

（49）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戰國策·西周策》）

（50）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戰國策·秦策三》）

“故”“是故”譯為“所以”“因此”，引導表結果的分句。

（51）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賢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戰國策·東周策》）

（52）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戰國策·楚策一》）

“然”“然而”譯為“但是”“然而”，在轉折類複句中引導後一分句。

（53）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戰國策·齊策三》）

（54）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戰國策·齊策五》）

3.1.2 分句句尾

《戰國策》中位於分句句尾的關聯標句詞只有“者”，標示因果關係時，出現在表原因的分句末尾。有時譯為“……的原因”表示已然的原因（如（55）），有時譯為“的話”表示未然的原因（如（56）），有時譯為“目的是”“是為了”表示目的（如（57））。

（55）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戰國策·齊策三》）

（56）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戰國策·齊策三》）

（57）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戰國策·趙策一》）

“者”屬於因果類關聯標句詞，其位置只出現於前一分句末尾，符合“聯繫項原則”的要求。Dik（1997）根據跨語言調查得出人類語言若干語序原則中，有一條很重要的聯繫項原則，即聯繫項的優先位置是位於所連接的兩個單位之間。劉丹青、陳玉潔（2008）指出“聯繫項原則”出現在絕大多數語言中，是人類語言象似性的具體表現之一，連詞像是介紹二者相識，介紹人往往出現在二者之間。

3.1.3 分句句中

《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若”和“雖”，除了可用於句首，也可以用在主謂之間，用來標示因果、轉折等句際關係。

（58）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戰國策·東周策》）

（59）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戰國策·秦策五》）

（60）秦雖辟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戰國策·趙策二》）

（61）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戰國策·魏策一》）

3.2 組配關係

《戰國策》中關聯標句詞可單用或彼此搭配使用以標示分句間的句際關係，總體來看，單獨使用的關聯標句詞用例共 1637 條，佔 73.11%；彼此搭配使用的用例共 602 條，佔 26.89%。

表 5　關聯標句詞組配類型及佔比

組配類型	數量（條）	佔比（%）
單獨使用	1637	73.11
搭配使用	602	26.89

3.2.1 單用 ②

《戰國策》中關聯標句詞多數情況下可單用標示句際關係，或居於前一分句，或居於後一分句。常見的居於前一分句單獨標示句際關係的有“雖”“者”“若”“使”“如”“為”和“即”。

（62）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戰國策·齊策一》）

（63）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戰國策·西周策》）

② 此處的“單用”指關聯標句詞的單用，句中依然可能會出現具有關聯意義的副詞等成分。

（64）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戰國策·秦策五》）

（65）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戰國策·齊策四》）

（66）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戰國策·中山策》）

（67）為弗能聽，勿使出竟。（《戰國策·魏策一》）

（68）即復之楚，願王殺之。（《戰國策·秦策一》）

常見的居於後一分句單獨標示句際關係的有“則”“且”“然”“是故”和“即”。

（69）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之形危。（《戰國策·齊策六》）

（70）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戰國策·秦策三》）

（71）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戰國策·齊策三》）

（72）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戰國策·趙策二》）

（73）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戰國策·中山策》）

3.2.2 搭配使用

除單用之外，前後分句中同時出現標示同一語義類型的關聯標句詞的現象在《戰國策》中可見到多例，其中搭配能力最強的是“而”，出現用例共 165 條；“則”次之，出現用例共 121 條。

（74）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戰國策·東周策》）

（75）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戰國策·秦策三》）

（76）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戰國策·燕策二》）

（77）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戰國策·趙策四》）

還見到一例“與其……，不如……”，“與其”與“不如”必須同時出現，分別位於前一分句句首和後一分句句首。

（78）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戰國策·燕策二》）

3.2.3 框式關聯標句詞

因果式與目的式因果類關聯標句詞中，除了“者”單用之外，還可見到“所以……者”和“之所以……者”的用例，“所以”或“之所以”多出現在前一分句主謂之間，“者”出現在前一分句句尾，形成框式結構，共同標示前後分句間的因果關係。

（79）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韓之南陽舉矣。（《戰國策·魏策一》）

（80）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戰國策·齊策三》）

四、結論

句際關係即複句內分句與分句之間的邏輯語義關係，可通過分句間的意合來實現，也可通過一些外在形式標記進行標示，從而對隱性邏輯語義關係進行“顯示、選示、轉化和強化作

用”（邢福義，2001：31）。關聯標句詞即標示分句間句際關係的一類標句詞，是句際關係這一全句功能範疇實現的關鍵。

本文以上古漢語經典文獻《戰國策》為例，對《戰國策》中的關聯標句詞進行了窮盡性統計分析，共收集到包含關聯標句詞的用例 2239 條，關聯標句詞 15 個（同一詞形計 1 個）。其所涉語義類型可分為因果類、並列類和轉折類等三種類型，包括 10 個小類；關聯標句詞所出現的句法位置包括句首（前一分句句首、後一分句句首）、謂頭（主謂之間）和句尾（前一分句）；組配關係方面，多數關聯標句詞可單用，也可見到前後分句關聯標句詞搭配使用和框式關聯標句詞的現象。《戰國策》中 15 個關聯標句詞所涉及的語義類型及句法位置分佈整體情況，詳見表 6。

表 6《戰國策》中關聯標句詞的語義類型與句法位置

		語義類型					句法位置			
		類型		數量（條）		佔比（%）	前分句句首	後分句句首	謂頭	句尾
1	而	因果類	因果式	136	912	40.73		√		
			假設式	80			√	√		
			條件式	12				√		
		並列類	並列式	64				√		
			連貫式	237				√		
			遞進式	196				√		
		轉折類	突轉式	187				√		
2	則	因果類	假設式	249	398	17.78	√	√		
			條件式	78				√		
			推斷式	65				√		
		轉折類	突轉式	6				√		
3	故	因果類	因果式	318	318	14.20		√		
4	雖	轉折類	讓步式	138	138	6.16	√		√	
5	且	因果類	假設式	5	133	5.94	√			
		並列類	遞進式	128				√		
6	者	因果類	因果式	77	124	5.54				√
			假設式	15						√
			目的式	32						√
7	若	因果類	假設式	88	88	3.93	√		√	
8	然而	轉折類	突轉式	39	39	1.74		√		
9	然	轉折類	突轉式	25	25	1.12		√		
10	是故	因果類	因果式	24	24	1.07		√		
11	即	因果類	假設式	21	21	0.94	√	√		
12	使	因果類	假設式	12	12	0.54	√			
13	如	因果類	假設式	5	5	0.22	√			
14	為	因果類	假設式	1	1	0.04	√			
15	與其……不如……	並列類	並列式	1	1	0.04	√	√		

句首、謂頭和句尾是對疑問、句際關係等全句功能範疇敏感的三個關鍵位置，不同語言為了實現全句功能范疇而採取句法操作的位置與其語序類型及中心語位置參數等多種因素有關，

但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句子三個敏感位置”在諸多語言全句功能范疇的實現問題上具有一定的類型學意義。以《戰國策》為代表的上古漢語，其句際關係的標示和關聯標句詞的使用與全句功能範疇、句子三個敏感位置理論和聯繫項原則等基本保持一致，與現代漢語在關聯標句詞的語義類型和句法位置等方面表現出了較多的一致性，有關古今漢語句際關係標示的歷時變化、關聯標句詞的歷時演變等問題擬另文詳述，此處不贅。

參考文獻

方　梅 2006 北京話裏“說”的語法化——從言說動詞到從句標記，《中國方言學報》第 1 期。

何建章 2019《戰國策註釋》，北京：中華書局。

劉丹青 2004 漢語裏的一個內容賓語標句詞——從“說道”的“道”說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語文》編輯部編《慶祝〈中國語文〉創刊 50 週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劉丹青、陳玉潔 2008 漢語指示詞語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察（上），《當代語言學》第 4 期。

孫凱悅 2024《〈左傳〉因果複句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田　源 2011《漢語標句詞及相關句法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田　源 2017《標句詞理論與漢語標句詞系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邢福義 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邢福義 2016《漢語語法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徐　杰 2005 句子的三個敏感位置與句子的疑問範疇——跨語言的類型比較，單周堯、陸鏡光主編《語言文字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徐　杰、李　瑩 2010 漢語“謂頭”位置的特殊性及相關句法理論問題，《漢語言文學研究》第 3 期。

Bresnan, Joan W. 1970. On complementizers: Toward a syntactic theory of complement types.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6: 297-321.

Bresnan, Joan W. 1972. Theory of complementation in English syntax.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Chui, Kawai. 1994.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saying verb *wa* in Cantonese.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12.

Dik, S. C.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Ⅰ: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2nd)*. Berlin/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Frajzyngier, Zygmunt. 1995. Functional Theory of Complementizers. In Joan Bybee & Suzanne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Frajzyngier, Zygmunt. 1996.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mplex Sentence: A Case Study in Chadi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Haegeman Liliane (Ed.), *Elements of Grammar: A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Dordrecht: Kluwer.

Rosenbaum, Peter. 1967. *The Grammar of English Predicat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impson, Andrew & Xiu-Zhi Zoe Wu (吳秀枝). 2002. IP-raising, tone sandhi and the creation of s-final particles: Evidence for cyclic spell-ou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1(1): 67-99.

Yeung, Ka-Wai. 2003. Universal vs. language-specific properties of grammaticalized complementizers: Two case studies in multi-functionality.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eung, Ka-Wai. 2006. On the status of the complementizer WAA6 in Canto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1-48.

田源　武漢 武漢大學文學院 / 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hntianyuan@foxmail.com

趙璇玉　瀋陽　瀋陽市瀋河區人民政府　747457291@qq.com

The Study on the Marking of Inter-sentential Relations and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s in Archaic Chinese

TIAN Yuan ZHAO Xuanyu

Abstract: Complementizer is syntactic categories that indicate sentence types (including sentence properties, modality, and inter-sentential relationships).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is a type of complementizer that indicates inter-sententi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theory of complementizer to the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using the classic text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s an example. By examining the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in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at indicates inter-sentential relationships, we aim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ld Chinese in marking complex sentences' inter-sentential relationships, thereby further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Old Chinese in modern linguistic research. Based on different inter-sentential semantic relationships, the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in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causal, coordinate, and contrastive category, including ten subtypes. From a syntactic perspective,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is lo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vious or subsequent clause, or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predicate of one clause before another,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of three sensitive positions in sentences. From a syntactic structure perspective, most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in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s used individually, but there are also instances where it is paired with other clauses before or after.

Keywords: Archaic Chinese; *Warring States Strategies* (《戰國策》); correlative complementizer; semantic types; syntactic features

“不說 X / X 不說，還 Y”的構式演化及其語義主觀化 *

趙　球、石　錕

提　要：構式“X 不說，還 Y”的直接來源是“不說 X，還 Y”，它經歷了“形成”和“擴展”兩個演變過程。宋元“不說 X”由單句擴展至複句“不說 X，Y”，“不說”話題轉換功能的實現涉及了跨越單句的臨界環境。明清語法標記“還”高頻介入，形成新構式“不說 X，還 Y”。X、Y 表現為量級序列上兩個不同的語義級別，主客觀程度差促使構式具備了深化拓展義生成的條件。晚清時期構式進入擴展階段，產生了典型的異變形式“X 不說，還 Y”，圖式性和能產性得到增強。作為演化動因的主觀化貫穿構式演化的各個階段，推動“X 和 Y 的關係意義”及“遞進關係”的層級主觀化，而構式化又以主觀化為基礎觸發並強化說話人的預期情感和主觀評述。

關鍵詞：“X 不說，還 Y”；遞進；量級；構式化；主觀化

一、前言

本文主要關注漢語一類表深化拓展義的遞進結構。請看例句[①]：

（1）只顧眼前，不計長遠，一味貪求經濟效益而忽略甚至破壞生態環境，必將受到大自然的懲罰，自己受害不說，還禍及子孫。（CCL）

（2）同期銀行貸款僅增加 11515 萬元，也就是說，新增的銀行貸款全部被基項資金“吃掉”不說，還“吃掉”銀行老貸款 32636 萬元。（CCL）

（3）有幾個農民對筆者說：“家裏買了不少種油茶的書，可光看書，枯燥不說，還不好懂；看場科技錄像，技術要點都掌握了，還不覺得累。”（CCL）

划線部分可以碼化為“X 不說，還 Y”。從傳統的結構主義看，它是一個從屬於上位聯合下位遞進的複句。從構式語法來看，這是一個高頻使用且具有規約語義（深化拓展義）的圖式性構式。其中“不說”和“還”為常量，變量 X、Y 分別代表量級序列上兩個不同的語義級別。

* 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類型學視角下的明清漢語語法研究”（項目編號：15ZB098）的資助。感謝彭睿、王光和、朱麗師等學者和《澳門語言學刊》編輯部及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趙球是本文通訊作者。

① 文章語料主要來源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CCL）和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BCC）等，且均已註明出處，個別例句為自擬。

構式義由客觀深化過渡到主觀強化。既有研究主要集中於共時層面對“不說”的詞性判定、語義功能及其相關句式群進行探討，如黃慧英，蕭國政（1996）、李敏（2005）、李宗江（2009，2019）、唐善生（2016，2019）及夏煥樂（2022）等，關於該構式的歷時來源及產生過程還有待進一步討論。按照 Traugott & Trousdale（2013）的說法，圖式性構式的形成是構式化的後果。“構式化”是創造“形式新 – 意義新”組配的過程。它在一定數量說話者的語言網絡中會形成新的類型節點，這些節點有新的句法或形態，並有新的語義。單獨的形式或語義變化不能構成構式化，稱為“構式演變”。構式化與構式演變概念相關但不相同。前者主要關注構式的產生、發展及其演化的規律。構式演變則是新形式或者新意義的出現，即“形式舊 – 意義新”或者“形式新 – 意義舊”，強調對既存構式的影響。根據 Noël（2007），圖式性構式的歷時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即“形成”和“繼續發展（擴展）”，分別對應構式化理論中的“構式化”和“構式演變”。本研究擬從歷時視角出發，系統考察圖式性構式“X 不說，還 Y”的形成和擴展過程。在此基礎上，揭示主觀化在這一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定位與具體表現，以明確複雜句子構式的構式化進程與主觀化互動。

二、構式“不說 X，還 Y”的形成階段

2.1 源構式“不說 X，Y”的產生

五代之前，“不說”都是由否定副詞“不”與言說動詞“說”連用形成的偏正短語，表示“不講出來”“不提及”。具體用法碼化為單句“X 不說”和“不說 X”。例如：

（4）洪自有識以逮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晉〕《抱樸子外篇·自敘》卷七十）

（5）不說風霜苦，三冬一草衣。（《全唐詩·溪居》卷六百九十一）

（6）廣陵故事無人知，古人不說今人疑。（《全唐詩·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卷七百）

“不說 X”的句型結構由最初的“不說 NP”演變為“不說 VP”，否定對象由名詞性成分拓展至謂詞性成分。 說明“不說”的否定轄域已經明顯提升，但“說”仍是句中唯一的動詞核心。

宋代“不說 X”出現後續分句，由單句向複句擴展。“不說”與“只說”搭配對應，形成“不說 NP1，只說 NP2”。例如：

（7）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南宋〕《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

“不說”後接名詞性成分，表達的仍包含一定的言說義。從邏輯關係上講，“不說 NP1，只說 NP2”聯結的是選擇複句。具體而言，是取捨句，即捨一取一，前分句是“捨”，後分句是“取”。

受宋元說書性質的敘事風格影響，元代“不說”的後接成分由 NP 擴展至 VP，接續詞也有所擴充。例如：

（8）俺又不曾徹青霄，高蓋起摘星樓。不說他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元〕《雜劇·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9）不說安妃娘娘龍冠六宮。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姓韓，名玉翹，妙選入宮，年方及笄。（〔元〕《元代畫本選集·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發展到明代，用例驟增，後分句句首出現更多新的功能詞，如“且說”“卻說”“先說”“單表”等，形成“不說 VP_1，且說 / 卻說 / ……VP_2”。例如：

（10）不說公子有難，且說亡八淫婦拐著玉姐，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野店安下。（〔明〕《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卷二十四）

（11）不說小娟在牢中受苦，卻說趙院判扶了兄柩來到錢塘，安厝已了，奉著遺言，要去尋那蘇家。（〔明〕《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

上兩例對新舊話題進行取捨，“不說”終止舊話題，“且說”“卻說”引出新話題。這類句式在章回體小說中被廣泛使用，表示結束上文敘述而轉入下文新內容。這一功能的實現涉及了跨越單句的臨界環境。“臨界環境具有誘發產生目標義的臨界性特徵，即語用推理條件”（彭睿，2020：173）。“不說”的臨界性特徵表現在：它仍然是一個動詞短語，但其語義上的理據性已經開始削弱，融合程度有所增強。因為“（我們）現在不談這個事情，先談談別的事情”已不僅僅是“不”和“說”意義上的簡單相加，並非單純描述具體的言說行為，而是進入了話題轉換的領域。簡言之，“不說”仍然具有一定的言說性質，其賓語可以是詞、短語或小句。然而在複句中，無論是用於轉換話題情節還是縮小話題範圍，後分句的“且說”“卻說”等成分都是以“不說”為基點進行的。這就引發一種可能的推理，即“不說”承擔了某種話題的轉換功能。兩種理解差異表明，“不說 VP，Y（且說 / 卻說 / ……VP_2）”句式恰好構成了一個臨界環境，允許“不說”新舊功能疊加。從宋代到明代，“不說”的臨界頻率一直呈增長趨勢。如果“不說”高頻出現在這種環境里，並與後項“且說”“卻說”等成分搭配使用，它就很可能會語法化為遞事的標記。

2.2 源構式“不說 X，Y”的發展

2.2.1“不說”的變化及其作用機制

一方面，“不說”的內部組構性在明代逐漸喪失，形式上也由固定短語演變成了一個詞彙性單位。例如：

（12）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爹聽，就要去罷？”（〔明〕《金瓶梅》第三十二回）

（13）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明〕《金瓶梅》第十五回）

上兩例“不說”可被視作為副詞，主要用來調節埋怨語氣，緩和聽者情緒。“不說”的言說義消失，刪除“說”句子仍然成立，但刪除“不說”便不成立，這說明不說”的語義重心已不再由“說”負載。②

另一方面，清代用例擴展，“不說”不再與施事直接聯繫，而是標示前後命題在某種程度範圍上的遞進關係，成為組織語篇的策略。例如：

② 需要說明的是，“不說”在語法化過程中出現了語氣副詞的用法，但這並非是“不說 X / X 不說，還 Y”構式演變鏈條的中間環節，因此不在本文研究範圍內。

（14）衲子曰：“不獨像人，而至修成仙真。”狐疑曰：“不說修成仙真，即修成個人形，都了當不得。”（〔清〕《繡雲閣·下》卷一百四十）

（15）而君召同普潤又是自幼的弟兄，設若卻他來意，不說他兩人不肯甘休，便是自己也難推卻。（〔清〕《施公案·四》卷四百零六）

例（14）中的“修成仙真”和“修成人形”具有類同性和遞進性。類同性表示兩個事件是同類的或相同的狀況。遞進性表示兩個事件在難易程度上存在由高向低的遞進關係，即以“修成仙真”為基點向程度相對更低的“修成人形”反逼遞進。“不說”高頻出現在連詞的典型位置上，即“不說 X，Y”句首，從而實現了句際關聯成分的用法。此外，在新的句法 境中（如“不說 X，即 / 便 Y 都 / 也”等），“不說”從“與主語直接關係”變化為“與整句直接關係”，句法地位也提升至整句高層謂語。总體看，“不說”相繼經歷了詞彙化和語法化兩個階段。根據彭睿（2007：32）的觀點，單個詞項的語法化歸因於詞項所在構式的語法化。因此，“不說”由偏正短語輸出為詞彙單位並發展出新的語法功能實質上是構式“不說 X，Y”語法化的附帶現象。這一過程主要涉及兩個機制：

一是源構式“不說 X，Y”的重新分析。但發生重新分析需具備一個前提條件：“不說”發生語法化，即“說”在意義上虛化。這就需要考慮“說”這類言說動詞的發展問題。“漢語史上諸如“謂、言、云”這類言說義動詞都由具體言說義演變成了抽象認知義”（董秀芳，2003：55）。言說動詞“說”較為典型，其言說義弱化，抽象度變高，這一直接後果是其動詞性發生弱化。“實詞虛化如果引起了句間關係的變化，就可能會引發句子結構的重新整合”（朱麗師，2021：116）。當“不說”後接謂詞性成分時，它就可能失去核心地位，從而引發三個關鍵性變化：1）句法複雜性變高。因為相較於名詞性成分，謂詞性成分具有更高的結構複雜度。這種高複雜度會引發論元衝突，促使“不說”突破及物框架進行句法重組。原型結構的單論元限制被打破，形成新的句法配置；2）語義轄域擴展。否定算子“不”的轄域在名詞性成分中僅作用於“說”，但在謂詞性結構中可跨越言說域擴展至命題層面。如例（13）“不說叫俺一聲兒”中，“不”的否定對象從具體言說行為擴展至隱含的“應該”情態範疇，形成“（你）應該叫俺卻未叫”的元語解讀；3）韻律重組與句法降級。“說”作為及物動詞時，攜帶核心重音，形成［不［說 X］］的重音模式。當 X 為謂詞性成分時，核心重音被迫落在 X 的謂詞上，而原核心動詞“說”變為輕讀成分。這種韻律再切分直接觸發句法降級，而“不說”也由句法核心降級為了功能標記。從停延模式來看，原始結構的自然停頓位於“不”與“說”之間，而在重構後的句法中，停頓後置於整個“不說”之後，證明其已獲得韻律完形。

總體看，原本限定於言說領域的否定含義可能會變得更加抽象。因為“不說”言說義弱化會導致其動作性變得模糊。它不再強調實際的言說行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抽象的意義，即“做某事”或“考慮做某事”，更趨向於描述一種狀態、情感或態度。語法項語法化後，新的語法功能會引發小句關係的重新分析與整合。因此，動詞性弱化的“不說”在進入複句結構後會迫於句法壓力實現邏輯連接的引導功能。例如：

（16）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贅個秀才，並不說真名真姓。（〔明〕《今古奇觀》卷二十四）

（17）到後來兩家不與前話相對，多有公婆父母小家子，不說娶得一個賢德女子，到家做個好媳婦，卻專在當初信媒妁講的，行下財禮，陪嫁妝奩。（〔明〕《東度記》卷六十四）

例（16）“不說”具有明確的動作性，其施事為句內主語“孟夫人”，此時語義指向受句法

主語制約。而在例（17）中，“不說”的施事已經由句子主語轉變為言者主語。“不說娶得……好媳婦”並非表示公婆父母言說該命題，而是言者否定該命題作為話題的適切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卻”觸發反預期框架，完成從行為否定到立場申明的功能變化。

二是特定語境促使“不說”吸收了框架意義。構式化受語境的驅動。構式所具有的語法意義在長期使用過程中，會誘發構式中的某個詞語或結構從語境中獲得新的語義或新功能特徵，並在脫離語境後內化為語義吸收項自身所具有的語法意義。換言之，語法化項由某種語義關係框架的臨時編碼項演變為這種關係的專門語法標記（彭睿，2008：282；2017：69）。“不說 X，且說 / 卻說 Y”是“不說”演變的臨界環境。X、Y 兩個話題實質上存在著一定的主次關係或優先次序，而“不說”仍然具有一定的言說義，但它可以理解為表示這種主次關係或優先次序的臨時編碼項。諸如此類的臨界環境實例頻繁出現，“不說”的主次銜接或話題取捨臨時編碼項的功能便會被固化。基於話題取捨，“不說 X，Y”繼續發展由取捨範疇擴展到遞進範疇。而例（14—15）中的“不說 X，即 / 便 Y 都 / 也”句式是“不說”進一步語法化的語法環境。“不說 X，Y”中的 X、Y 均為說話人的主觀評述，二者在同一語義範疇內所表現的主客觀程度差異促使整個構式帶上了深化義。由於言說性質不斷淡化的“不說”經常出現在表達“讓步 – 進一步推論（遞進）”這一命題意義的複句前一小句中，並與後一小句中的其他功能詞聯合使用，語境所顯現出來的遞進關係便會被“不說”吸收，從而在主次話題取捨功能的基礎上獲得了表深化的臨時語用義。經過語用推理產生語用義，然後這一語用義通過高頻推動逐漸內化為固定意義。因此，“不說”有了被理解為連詞的可能性。

2.2.2 新構式“不說 X，還 Y”的產生

在事理邏輯關係複雜化的背景下，新的標記不斷進入構式“不說 X，Y”，產生多個“不說”類次級遞進構式。各個新構式的產生涉及新形式和新意義的組配，它們處於相互關聯的網絡系統中，具有相關特徵。首先，在形式方面，“不說”類複雜構式可以細分為三類：

1）順向遞進：“不說 X，還 / 也 / 就是 Y”。這類構式呈現的是一種順序性的遞進關係，是最典型的遞進方式。例如：

（18）不說別的，就是尊大人在安徽帶兵，年代亦就不少。（〔清〕《官場現形記》卷五十二）

2）反轉遞進：“不說 X，反 / 倒 / 還倒 / 倒還 Y”，大體相當於“不但不 X，反而 Y”結構。這類句式是“表反轉性遞進關係的複句形式”（邢福義，2001：396）。分句間具有明顯的轉折關係，X 通過一個否定基點向遞事 Y 反轉推進。例如：

（19）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捶你不捶你！（〔清〕《紅樓夢》第七回）

3）排除或讓步反逼遞進：“不說 X｜除了 / 姑且 / 暫且＋拋開 / 撇開 X 不說，只 / 單 / 再 / 且 / 還 Y”。構式採取先排除後肯定的方式，構成加合式遞進。[③] 表讓步時，構式以深而淺，暫退一步形成讓步反逼遞進。其中 Y 的性狀或程度相對較低。例如：

（20）你主僕上下，每天大盤大碗，不說豬羊，只鴨子雞兒，也不知傷了多少性命。（〔清〕《綠野仙蹤》卷四十九）

③ 構式表面上排除命題 X，僅闡述命題 Y，實際上包含的是 X、Y 兩個命題的加合關係。

（21）這時除了不幫忙不說，還容易產生抵觸心理，說不定背後再給你幫點倒忙，看你不依靠我依靠別人這事能辦成！（劉震雲《一地雞毛》）

從整體上看，後項搭配“還”的構式（“不說 X，還 Y”）出現頻率最高，產生的時間節點大概在清代中期。Traugott（2007, 2008）強調構式是分層級的系統，包含宏觀構式、中觀構式、微觀構式和構例四個層級。這三類形式是同中有異的平行關係，它們均可被整合為構式“不說 X，還 Y”，或隸屬於構式“不說 X，還 Y”。因此，相對於順向遞進、反轉遞進和排除讓步遞進，“不說 X，還 Y”又是一個中觀構式，其圖式性更高，形式更加固定。

其次，構式義方面。根據李宗江（2022：44）的說法，“不說 X，還 Y”與“不但 X，而且 Y”句式大體相似，可以較為顯豁地表明前後分句間的遞進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可以完全等值替換。前者除表遞進關係之外，還會標注一種意外或反預期信息。可見，構式“不說 X，還 Y”主要是標示遞進關係，其次是基於命題 X、Y 之間的對立性、並存性和級層性來觸發、顯現並強化說話人的預期情感和主觀評述。這是基本構式義。構式觀強調形式和意義的匹配關係。儘管這三類遞進方式在句法形式上有所差異，但它們對應的語義在原型構式義上有交集，共同承繼了基於“不說 X，還 Y”遞進義的平行理據。更具體地說，它們分別採用不同的方式，即轉折、讓步、排除或加合等來標示遞進關係。

總體看，構式“不說 X，還 Y”在清代已經產生，它不僅形式趨於固定化，而且還產生了統一的語義詮釋方式。這一語義詮釋方式為所有構例共享。

三、構式“不說 X，還 Y”的擴展階段

3.1 變體“X 不說，還 Y”的產生

晚清時期“不說”打破了句法位置的限制，後移形成“X 不說”。例如：

（22）冬天不說，夏天院子裏頭一樣兒是天棚。（〔清〕張廷彥《北京風土編·北京事情·北京風俗問答》人事五十一）

（23）親家老爺死了不說，三姑爺的差使也吹了，這下子是麻煩哪。你們不用探喪了，接三再說罷。（〔清〕亦我《過新年·勢力鬼》）

這一時期，構式“不說 X，還 Y”也產生了第一種異變形式：“X 不說，還 Y”。例如：

（24）有一人請客，酒菜很不豐盛，上了一隻鴨，又瘦又小不說，還又生又硬。（〔清〕程世爵《笑林廣記·詼諧部》）

（25）您怎麼還要打人呢？爺您自己生氣不說，還把家人給誤賴了。（〔民國〕常傑淼《雍正劍俠圖》卷五十）

這種變體初見於晚清時期，至民國繼續沿用。發展到現代漢語，位於前一分句句末的“不說”已佔據主導地位。但這兩種構式的關鍵性意義沒有改變，它們共享抽象的語義解釋方式，其區別性特徵一致，同樣表示遞進深化拓展和主觀評述遞增。

“不說 X”向“X 不說”構式演變的關鍵在於句法成分的語法化與信息結構轉型。[④] 其演變機制需滿足兩個前提條件：1）否定動詞“不說”虛化；2）X、Y 成分的謂詞化升級。一方面，“不說”經歷了“行為否定標記＞語篇銜接標記＞對比焦點標記”的語法化過程，其管轄域從單一命題擴展至複合命題間的邏輯連接；另一方面，謂詞化使 X、Y 獲得獨立述謂性，誘發句法結構重新分析：X 通過話題化前移構成主位結構，“不說”後置實現焦點標記功能，最終形成“話題 – 述題”雙焦點框架，其中後項 Y 通過對比重音實現語用強化。

實際上，此類構式的轉換反映了兩種信息編碼策略的競爭與選擇：

一是回指驅動的舊信息包裝。當 X 具有語篇回指性時，構式遵循“已知信息→銜接標記→新信息”的線性序列原則。如例（25）中“自己生氣”作為回指性主位，復現話語雙方的共享已知信息；“把人家給誤賴了”則承載說話人核心交際意圖，既與前文構成語義延展，又通過意外性特徵標記信息焦點。

二是話題化驅動的對比焦點建構。當 X 無顯性先行語時，說話人通過強制話題化操作構建信息層級。例如：

（26）A：如果遲到會怎麼樣？

B：扣年終績效不說，還可能丟了工作。

例（26）通過將未知信息“扣年終績效”前景化，實現雙重語用功能：一方面，建立“基礎處罰→疊加後果”的級差模型，引導听者進行語義量級推理；另一方面，運用非自然語序標記主觀性評價，通過調整信息排列順序，強化言者對事件嚴重性的態度編碼。這種編碼策略本質上屬於信息結構的語用化重組，反映了交際雙方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介入和認知調節。

3.2 變體“X 不說，還 Y”中“不說”與“還”的互動

“語義上兩個小句之間的依存關係越密切，語法形式上兩個小句的聯繫就越緊密，語法化程度也就越高”（Hopper & Traugott, 2003: 168-177）。“X 不說，還 Y”經歷了句子內部由鬆散到緊密、由話語到句子的語法化過程，這一過程就是一種構式化。X 和 Y 在同一範疇內聯結越緊密，“不說”和“還”搭配就越固化。

一方面，“還”主要著眼於兩個事件的互補關係，在複句中用來連接前後分句，表示“情況仍然存在並進一步補充遞進”（吳長安，2009：71）。同時，“‘還’也具有‘元語’和‘主觀’的性質，說話人用它表明自己對一個已知命題的態度，即認為這個命題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同時增補一個信息量充足的命題”（沈家煊，2001：483）。構式“X 不說，還 Y”中的“還”所引領的命題情況就具有追加補充、信息增量和強化論述的效果。例如：

（27）他罵人不說，還打人。

“罵人”和“打人”共現“他不禮貌”這一評述，說話人基於客觀事實，主觀認為“罵人”不足以突出“他不禮貌”程度等級的情況，便採用“還”來引介出更有說服力的論據：“他還打人”。

另一方面，“還”約於明清之際發展出了“主觀反預期義”（武果，2009：324）。若將構

④ 我們認為，“不說”虛化和 X、Y 的謂詞化是基本條件。信息結構話題化操作也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受語言接觸、包裝策略的影響。限於篇幅，關於其深層動因我們另有專文討論。

式“X 不說，還 Y”納入否定視角，前分句出現否定成分“不 VP”，形成“不 VP_1 不說，還 VP_2”。基事表示“沒有怎麼樣”，遞事部分就表示“反到怎麼樣”，整句表現出一種不服氣或不滿的情感態度。例如：

（28）你們本來答應給四十個盧布，可才給了二十五個；不給錢不說，還叫我把貨拿走。賊，酒鬼！（萊蒙特《福地》）

（29）他上輩子是折翼的鴕鳥尼瑪，你不排隊不說，還以找人為由欺騙俺們幼小脆弱的心靈，拉你丫的！（BCC）

例（28）中說話人的不滿態度十分明確，其心路歷程為：“不給錢也就算了，竟然還叫我把貨拿走，這簡直是不可理喻。”這實質上與說話人的預期情況有關。預期多次被打破從而形成前後兩個反預期情況，說話人在選擇中臨時對前一個反預期情況讓步。此時整個構式就成了一個遞進與讓步關係相融的複句。

受“不說”引導的部分動詞性成分影響，與之平行呼應的“還”所引導的分句自然也是動詞性成分，即“X（VP_1）不說，還 Y（VP_2）”。而“還”包含的持續義間接制約著對“VP_2”的選擇，即選擇同 X 屬性一致且高於 X 的情況。由此，它在“不說”的影響下激發了 X 同質屬性的持續反覆，從而在原有情狀或事件的基礎上進行話語追加、信息補充或程度增量。其結果是，程度更深、信息量更足的“VP_2”被賦予邏輯重音，“還”在高頻使用的環境中也被賦予了“強化主觀評述”的語用義。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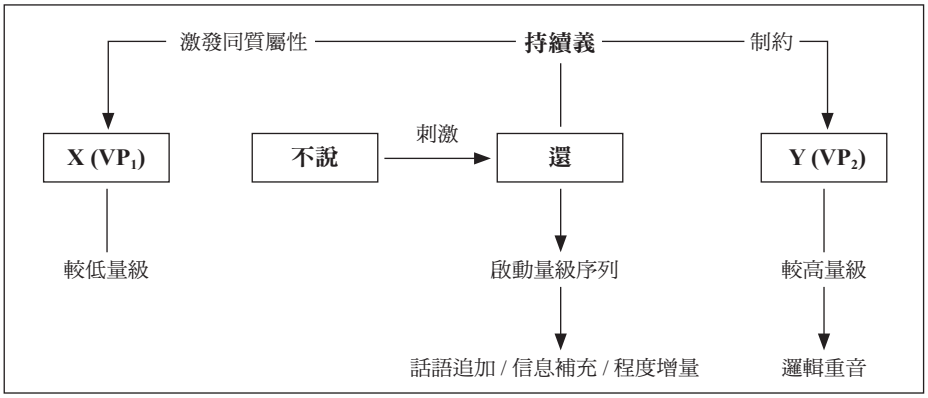

圖 1　構式“X 不說，還 Y”的語義推理過程

然而這一環節需具備一個前提條件：“還”所引領的情況之前有另一個低程度或低預期信息量，由“不說”引領。因此，“不說”和“還”配對首先是激活了前後命題的程度序列，其次是觸發說話人的預期情感，最終目的是強化說話人的深層主觀評述。

3.3 變體“X 不說，還 Y”圖式性的增強

任何構式在形成初期，形式和意義都比較鬆散。一個構式的演變趨勢是其圖式性越來越強，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構式的形式更統一，意義更分化，使用頻率更高”（石鋟、王秀雲，2021：630）。從晚清到民國、再到現當代，構式“X 不說，還 Y”的使用數量佔絕對優勢，“不說 X，還 Y”的使用數量相對較少，如表 1 所示：

表 1　構式“X 不說，還 Y”構式圖式性增強的具體表現（形式｜意義｜頻率）

圖式性	具體表現
構式形式	統一為“X 不說，還 Y”
構式意義	並列式遞進→（因果式遞進｜順承式遞進）
使用頻率	7.4%（“不說 X，還 Y”）→ 90.3%（“X 不說，還 Y”）[⑤]

前者語例頻率持續增高，時代越晚，語例越多。這說明構式的形式在不斷抽象化並趨向統一。其次，構式允准更多非動詞義範疇的成分進入，擴展至述補結構、連動結構等謂詞性成分，表明構式的能產性增強。能產性越強，允准的圖式就越容易固化，構式化特徵就更加明顯。第三，在保持遞進強化的核心功能下，深層邏輯呈現差異化發展。構式以並列式遞進為原型範疇（如例（24）），擴展出因果式和順承式兩種隱性遞進。例如：

（30）這倒好，讓車站派出所抓進去不說，還耽誤兩天發貨。跟國家較勁兒，有你什麼好！（阿登《書惑》）

（31）“我前世造了什麼孽啊？今生讓何小勇佔了便宜，佔了便宜不說，還懷了他的種；懷了他的種不說，還生了一樂；生下了一樂不說，一樂還闖了禍……”許玉蘭繼續哭訴：“一樂闖了禍不說……”（余華《許三觀賣血記》）

例（30）“讓派出所抓進去”和“耽誤兩天發貨”構成因果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事情的‘果’比事情的‘因’要更進一層”（秦曉迪，2018：24）。“耽誤兩天發貨”是說話人強調的重點信息。例（31）前後項構成時間序列：“佔便宜→懷孕→生子→闖禍”形成線性發展鏈條，其遞進關係體現為“事件影響的累積”，即每個 Y 既是 Y 的結果，又是新事件的誘因。

四、主觀化在構式“不說 X / 不說 X，還 Y”演化中的角色

圖式性構式具體成分範圍的擴展是構式整體擴展的附帶現象。“不說”由偏正短語結構輸出成為一個詞彙單位及其語法性增強都是“不說 X，還 Y”構式化的後果。同語法化一樣，主觀化在構式化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在主觀性維度上統攝構式的形成和繼續發展，促使構式由取捨範疇過渡到遞進範疇並進一步糅合或分化出多個下屬遞進範疇，由客觀描摹轉化為說話人主觀評述序列，融入預期信息的同時也顯現了構式的表情功能。反過來，構式化又以主觀化為基礎不斷強化構式的主觀性。具體來看，“不說 X，還 Y”的主觀化分為兩個梯度，首先是 X 和 Y 關係意義的主觀化，其次是構式“遞進關係”的主觀化。

4.1“X 和 Y 的關係意義”的主觀化

一方面，X 是說話人認為對方應該主動做卻未做的事情，相當於一種義務情態。“不說 X”可以理解為“不考慮做什麼”，而 Y 表示“做了什麼”。例如：

（32）戈：本來說好了，一人一期的版面，我現在弄兩期了。啊，饒著幫了你忙，不說哄

⑤ 黃慧英、蕭國政（1996）考察了“不說”在前一分句不同位置的使用數量。從收集到的書面用例看，“不說”位於前一分句句末的情況佔所收例句的 90.3%，位於句首的情況佔 7.4%。

著點兒，還弄得像我欠你什麼似的。（王朔《編輯部的故事·歌星雙雙》）

“不說哄著點兒”中的“哄著點兒”是句子中心，說明“不說”的句法形式已經由最初的“S+ 不 + 說 +VP（“不說”為偏正短語）”演變為“S+ 不說 +VP”。“S+ 不說 +VP”表達的是說話人因對方未主動做某事而出現的“不滿”或“不認同”的主觀情緒。“不”的語義指向為後接成分“VP”，“VP”已經不能直接分析為“說”的引語。[⑥]“‘不’具有‘反先設特徵’，表示對說話人的主觀判斷，這一主觀判斷是對先設的否定”（唐善生，2016：60—61）。通常而言，“否定句總會是‘預先假設’相應的肯定句所表達的命題內容”（沈家煊，2015：46）。否定句“不說 VP”實質上隱含了一個相應的肯定命題。“不說哄著點兒”實際上表示“不考慮哄著點兒”，其中“說”的言說義淡化而心理活動義強化。言者以“你應該哄著點兒我”為先設命題，再對“不說哄著點兒”進行否定。先設命題與主觀判斷不相統一，從而激活了“不說”暗含的反預期心理特徵。從預期角度來看，X 本是一個預期，即言者對某個事件結果的心理期待或從自身角度出發所認為的好事，而“不說 X / X 不說”就是一個反預期，Y 則是一個程度更深的反預期或意外情況。陳振宇、杜克華（2015）、陳振宇（2017）指出不論反預期還是預期，都有可能產生意外，且意外有強弱之分。因此 X 和 Y 又可被視作為意外等級鏈上的兩種情況（弱意外→強意外），即相較於 X 之發生，言者對 Y 的發生更感到意外。也正是由於說話人的預期或心理期待與所出現的意外情況相對立，構式才得以傳達出強烈的埋怨語氣。因為如果只是簡單的反預期情況出現，言者不一定出現強烈的責怪、埋怨心理或這類心理不足以達到現有意外程度。

另一方面，X 代表了一種中性情況，而 Y 則代表了具有更高程度或性質的其他情況。Y 的臨時介入迫使 X 的地位降低，性質轉變為不如意的情況。這種不如意情況或不認同情緒的出現都是主觀化。X、Y 的客觀性逐漸減少，而隱含的主觀性卻在不斷增加。

更進一步，主觀化的強弱會影響構式的語法化進程。一個是微觀構式隨著時間流逝可能變得更為圖式或者抽象，因為它們參與並成為抽象圖式的“更好”成員。隨著命題 X 的主觀性增強，構式“X 不說，還 Y”變得更為圖式，它參與並成為了抽象圖式的“更好”成員。簡言之，“X 不說，還 Y”發生了形式異變，產生“X，還 Y”。Traugott（1995）認為主觀化程度越高，句法中所顯現的語言形式就越簡化。這說明構式的語言符號數量與主觀化的強弱有關。顯然，“X，還 Y”的主觀化程度更高，“不說”已弱化至省略。聽話人無需過多識解，仍可抽繹出構式的深化拓展義。

4.2“遞進關係”的主觀化

主觀化可能伴隨著語義化。“特定語境中的語用意義可能會被重新分析為某一語言成分的編碼意義”（吳福祥，2019：5）。當“不說”被納入複句結構，進入臨界環境“不說……，則說 / 只說 / 且說……”時，在表達言說義的基礎上，句子已經蘊含了說話人的主觀特性，即有選擇性地“說什麼”和“不說什麼”。例如：

（33）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殺，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明〕

⑥ 此時的“說”可以被看作為一個臨時添加到“不”後的語用標記，主要用來取消“VP”的行域資格，舒緩句子口氣。具體參見李宗江（2019）。

《西遊記》第四十四回）

Hopper & Traugott（2003）將複雜構式的歷時演變過程歸納為如下斜坡：

並列句＞主次關係複合句＞主從關係複合句

這類整體性變化直接影響到了“不說 X，還 Y”的演化。隨著主觀性的增強以及語例頻率的增高，構式前後兩個命題的信息地位由原本的並列關係轉變為主次關係，整句表達的是典型的遞進。然而，遞進關係通過“不說”和“還”促使語義深化的驅動力是由於主觀化誘發。這一演變也可以視為“遞進”的抽象化。構式中兩個事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依賴於它們自身在某個性狀或程度上的客觀差異，而是越來越依賴於說話人的傾向，即說話人更加主觀地對言說內容進行否定和評述，以此來表明主觀立場。這種變化正是“遞進關係”主觀化的體現。例如：

（34）一度陷入絕境的河北省永年縣外貿局，從今年 5 月始，又絕處逢生，扭虧 30 萬元不說，還盈利 58 萬元。（CCL）

（35）這個商店質量差、價格高不說，服務態度還不好。（黃為之《經貿初級漢語口語·下冊》）

例（34）表示財力性質由負到正，數量持續增加，實現了經濟復甦。前後命題在數量範疇上呈客觀遞進。例（35）則有區別，前後命題的位置選取主要受說話人主觀意圖的影響，整句重點強調“服務態度不好”。“不說”引領的前一分句看似退讓一步，實際上是與後一分句的深化語義構成加合遞進，增強語力的同時也強化了說話人的主觀態度。

五、結論

圖式構式“X 不說，還 Y”的歷時演化包括“形成”與“擴展”兩個階段。它由“不說 X，還 Y”直接變體而來，最早可追溯至“不說 X，Y”結構。構式形成初期，“不說 X”於宋代由單句擴展至複句“不說 X，Y”。其中“不說”言說義弱化，逐步實現話題轉換功能。至清代中期，伴隨“還”的高頻介入，源構式經重新分析形成量級構式“不說 X，還 Y”，標記遞進關係並凸顯主觀評述。晚清時期，構式進一步異變為“X 不說，還 Y”，通過 X 的後置與信息結構重組，增強圖式性及能產性。演變動因上，主觀化與構式化呈雙向互動：前者統攝構式語義由客觀事理遞進轉向主觀情感強化；後者則通過形式 - 意義組配的固化，推動“X 和 Y 的關係意義”與“遞進關係”的層級主觀化。這一過程印證了語法化與主觀化在漢語複雜構式演化中的協同效應。

實質上，與“不說”相似的“別說”在漢語中也經歷了從言說動詞到語篇標記的語法化路徑。二者均源於否定性言說行為，後通過臨界環境的高頻使用（如複句前項），逐步剝離具體言說義，轉而承擔話題轉換或反預期標記功能（董秀芳，2007；李宗江，2014）。擴大來看，日語引語標記“って”源於言說動詞“と言う（という）”，其縮略形式“って”同樣在語法化過程中脫離原義，發展出引介話題、標記間接引語及凸顯焦點的功能。三者的演變均涉及“言說域＞認知域＞語篇域”的抽象化路徑，核心機制動因涵蓋語用推理、重新分析與語義的

主觀化，這既印證了言說動詞語法化的跨語言共性，也為構式演化理論提供了類型學支持。值得追問的是，漢語“不說”與日語“って”的演化存在部分平行性，但受語言類型差異影響，二者在擴展階段的功能分化又有何差異或傾向性？因此還需系統考察漢日語同類構式的歷時互動與共時變異，從而揭示複雜構式演變的普遍規律與個性特徵。總體看，現階段構式歷時演變研究的重點是要區分不同類型的構式及其演變，尤其是“弄清楚圖式構式演變的性質和歸屬”（胡亞，2022）。只有深入挖掘探討圖式性構式歷時演變的個性化特徵，才有可能建立起跨構式類型的統一構式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董秀芳 2003“X 說”的詞彙化，《語言科學》第 2 期。

董秀芳 2007 詞彙化與話語標記的形成，《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

陳振宇、杜克華 2015 意外範疇：關於感歎、疑問、否定之間的語用遷移的研究，《當代修辭學》第 5 期。

陳振宇 2017《漢語的指稱與命題——語法中的語義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　亞 2022 構式語法與語法化理論的交匯，《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黃慧英、蕭國政 1996 現代漢語里一個新的關聯詞語“不說”，《漢語學習》第 5 期。

李　敏 2005 遞進連詞“不說”及其語法化過程，《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第 2 期。

李宗江 2009 連詞“不說”的語義和語用功能，《漢語學報》第 3 期。

李宗江 2014 也說話語標記“別說”的來源——再談話語標記來源的研究，《世界漢語教學》第 2 期。

李宗江 2019 說“不”後的偽結構成分——從“不”後的“說”談起，《對外漢語研究》第 1 期。

李宗江 2022 漢語中的後置話語關聯成分，《當代修辭學》第 5 期。

彭　睿 2007 構式語法化的機制和後果——以“從而”、“以及”和“極其”的演變為例，《漢語學報》第 3 期。

彭　睿 2008“臨界環境 - 語法化項”關係芻議，《語言科學》第 3 期。

彭　睿 2017“語境吸收”芻議，載邵敬敏主編《語言學研究的多元視野——慶祝史有為教授八十華誕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彭　睿 2020《語法化理論的漢語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秦曉迪 2018“A 不說，還 B”格式及語篇分析，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沈家煊 2001 跟副詞“還”有關的兩個句式，《中國語文》第 6 期。

沈家煊 2015《不對稱與標記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石　鋭、王秀雲 2021“一 X 就 Y”的構式化與構式裂變，《語言科學》第 6 期。

唐善生 2016“不說”的副詞化，《漢語學習》第 2 期。

唐善生 2019 副詞“不說”與連詞“不說”，《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3 期。

吳福祥 2019 語義演變與主觀化，《民族語文》第 5 期。

吳長安 2009《“還”和“更”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武　果 2009 副詞“還”的主觀性用法，《世界漢語教學》第 3 期。

邢福義 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夏煥樂 2022 深化拓展性構式“X 不說，還 Y”功用與成因，《漢語學習》第 1 期。

朱麗師 2021 國內外小句整合研究述評，《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第 2 期。

Hopper, P. J. & Traugott, E. 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ël, D. 2007.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Functions of Language* 14(2): 177-202.

Traugott, E.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Stein &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 C. 2007.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onal mismatch and type sh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8(4): 523-557.

Traugott, E. C. 2008. Grammaticalization, constructions and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ugges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egree modifiers in English. In Regine Eckardt, Gerhard Jager & Tonjes Veenstra (eds.), *Variation, Selection, Develodment–Probing the Evolutionary Model of Language Change,* 219-25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raugott, E. C. & Trousdale G.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趙球　武漢　湖北大學文學院　zhaoqiu980110@163.com

石鋟　武漢　湖北大學文學院　sqshilin@126.com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Semantic Subjectivization of "*bushuo* X / X + *bushuo*, *hai* + Y"

ZHAO Qiu SHI Qi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X+*bushuo, hai*+Y" directly evolved from the earlier form "*bushuo*+X, *hai*+Y", undergoing two key stages of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phrase "*bushuo* X" expanded from single-clause to complex sentences like "*bushuo*+X, Y", with "*bushuo*" functioning as a topic-shifting marker in cross-sentential contexts. By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ammatical marker "*hai*" frequently appeared, forming the new construction "*bushuo*+X, *hai*+Y". Here, X and Y represent two distinct levels on a scale of semantic intensity, and their objective-subjective degree difference allows the construction to express deepened or extended meaning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further evolved into its typical variant form "X+*bushuo*, *hai*+Y", enhancing its schematic flexi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ubjectification drives this entire evolution, promoting the layered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 and Y"and the "progressive relation", while constructionalization based on subjectification triggers and intensifies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al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s.

Keywords: "X+*bushuo*, *hai*+Y"; progression; scale; constructionalization; subjectivization

基於預期的“不是 X 嗎”問句多重話語功能解讀*

曾　君、陸方喆、朱　斌

提　要：文章總結了“不是 X 嗎”問句的表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項話語功能，分析了不同功能的句法語義特點，並從預期的角度對四項話語功能的生成機制做了統一說明，即預期求證、預期修正、預期強化和預期激活分別對應“不是 X 嗎”的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大功能。“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說話人預期及預期強度的變化密切相關。

關鍵詞：預期；“不是 X 嗎”；話語功能

一、問題的提出

“不是 X 嗎”問句是多義句式，具有多重話語功能。試比較以下例句：

（1）“可是天快黑了，我會走錯路。”
“您不是本地人嗎？”
“不是。”　（BCC）

（2）科學從乾旱沙漠之中找到了水資源，這不是奇跡中的奇跡嗎？　（CCL）

（3）朱鎔基請工作人員調出一位享受最低保障的居民的資料。看到電腦上“272 元”的保障金數，朱鎔基問：“大連的最低保障線不是 221 元嗎，他怎麼是 272 元呢？”（CCL）

（4）鄭也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因你不能從足球上找，你得從人心上找，佛教史上不是有一個生動的段子嗎，倆小和尚看著那個旗子在那飄舞，就爭論是旗動還是風動，旁邊一個人搭腔了，也不是旗動，也不是風動，是心動。　（MLC）

上述劃線部分是本文研究的“不是 X 嗎”句式，在不同的語境中，該句式具有不同的功能。例（1）的“不是 X 嗎”是疑問句，言者對“您不是本地人”有疑問，從而向聽者尋求答案。例（2）和例（3）的“不是 X 嗎”在以往研究中一般被歸為反問句，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義，字面意思分別是“這是奇跡”“大連的最低保障線是 221 元”。雖然同屬反問句，但兩者又略有不同。比如是否有疑問上，例（2）一般沒有疑問，也不要求聽者回答解疑，符合反問句無疑而問的特點。但是例（3）可以表達疑問。齊滬揚、胡建鋒（2010）指出“不是 X 嗎”具

* 陸方喆是本文通訊作者，本研究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

有疑問用法，表達反預期信息，說話人希望瞭解為什麼或怎麼會出現這個反預期信息。另一方面，例（4）和例（2）、例（3）也有較大區別，既不是反詰也不是疑問，更多表現為一種話語組織功能，表示提醒。我們把以上例句代表的“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分別稱為詢問、反問、質疑和提醒。需要注意的是，“不是 X 嗎”有“不是 X 嘛”“不是 X 么”等多种變體形式。熊子瑜、林茂燦（2003）指出，“嗎”“嘛”“麼”只是文字上的區別 , 它們原本同屬於一個語氣詞“me”。基於此，上述變體形式同被視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嘛”與“麼”統一記作“嗎”。

已有研究也注意到“不是 X 嗎”的上述不同用法。但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反問句“不是 X 嗎”，特別是該句式的不同語用功能。鄭貴友（2014）總結了“提醒”“表疑”“斷言”“宣泄”“反駁”“勸解”“申辯”等七種表達功能。劉婭瓊、陶紅印（2011）認為“不、沒”類反問句表達說話人對聽話人的不同程度上的負面事理立場，包括表提醒、意外、反對和斥責。胡建鋒（2011）指出該句式通常實現後景功能，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實現前景功能。儘管學者們提出了“不是 X 嗎”的多種話語功能，但不同功能的概括似乎比較主觀，比如“反對”和“斥責”如何區分？“反駁”和“申辯”又有什麼不同？另外，對於疑問和反問句的“不是 X 嗎”的關係研究也不多，只是從語音層面說明，“不是”重讀時為疑問句，輕讀時為反問句（張發明，1989）。

問題在於，“不是 X 嗎”句式表示出的不同話語功能之間有怎樣的聯繫，是否有一個更好的視角解釋“不是 X 嗎”不同話語功能之間的遷移？我們認為，“不是 X 嗎”在交際中體現出的不同話語功能實質上是交際主體對預期的不同操作。所謂預期，是一種與人的認識、觀念相聯繫的抽象世界，通常與一定的社會常規、言談事件中說聽雙方的知識狀態以及特定的話語語境密切相關（Heine 等，1991：192—193）。陸方喆、朱斌（2022）進一步發展了預期的概念，指出預期是認識主體對主客觀世界的信念和願望，可以影響主體的決策和行為。所謂信念是指人們關於世界的心理狀態或態度，即人們關於某事或某物的思想。用通俗的話說，即“人們相信什麼”或“怎麼認為”。願望是指人們對事物的主觀心理傾向，通俗地講，即“人們想要什麼或想做什麼”（倪偉，2010：80）。預期的來源包括：知覺、記憶、上下文、百科知識以及推理。我們將具體分析“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背後體現的不同預期操作，並從預期確信度的強弱解釋其多重話語功能的遷移機制。文章例句主要來自 CCL、BCC、MLC 語料庫，以及一些自擬的例句。

二、預期求證與“不是 X 嗎”的詢問功能

表詢問的“不是 X 嗎”屬於否定是非問，說話人對該命題的真假有疑而問。“不是”相對重讀，後接體詞性或謂詞性成分。徐盛恒（1999）指出，肯定式是非問是無標記的，屬於全疑而問。否定式是非問是有標記的，傾向於作出否定的判斷，屬於半疑（猜測）而問。我們認為，當言者用“不是 X 嗎”表詢問時，發問人對疑問對象已經有了一定的心理預期，即猜測“不是 X”，但又不十分肯定，需要向聽話人求證（確認）自己的預期，並預期聽話人能證實或證偽比如：

（1）“他，病得嚴重嗎？”“不，不，他不是病人，雖然為人古怪，但很有魅力。等一下，

你不是他的朋友嗎？”她奇怪地問。“朋友。”我笑著打馬虎眼，“哈哈。” （CCL）

（2）雷文自己駕駛跑車，卡露蓮坐在他的身邊。“這條路，不是去新界嗎？”“唔，粉嶺。”（BCC）

（3）他開始四處遊蕩，有意無意尋找于憂的蹤影。但她似乎不住在這裏，因為他從來沒看過她。他忍不住問：“奶奶，于憂不是住在家裏嗎？”“嗯。”連老夫人低調地哼了聲。（BCC）

例（1）“不是”後接體詞性成分“他的朋友”，聽話人問“他病得嚴重嗎”，說話人知道“他不是病人”，於是懷疑聽話人不是他的朋友，但不確定，於是詢問聽者“你不是他的朋友嗎”，聽話者回答“是朋友”，證偽說話人的猜測。例（2）後接謂詞性成分“去新界”。卡露蓮從路邊的風景產生“這條路不是去新界”的猜測，但不敢確定，於是向雷文發問，雷文的回答證實了該猜測。例（3）同樣後接謂詞性成分“住在家裏”。他從來沒見過于憂，於是形成“于憂不是住在家裏”的猜測，向奶奶發問求證，奶奶的回答證實了他的猜測。事實上，肯定式是非問也是求證預期，以“嗎”字是非問為例，其預期就是“嗎”前面的命題。比如：

（4）a. 你是中國人嗎？

b. 你去學校嗎？

以往研究認為肯定式是非問屬於全疑而問，我們認為不準確。肯定式是非問也有一定的猜測成分。比如例（4a），發問人基於某些條件（黑頭發，黃皮膚，黑眼睛，穿著，打扮等），形成“你是中國人”的預期，但是對該預期不肯定，因為同樣條件的也可能是日本人或韓國人，但發問人更傾向於認為“是中國人”。否則，他會問“你是日本人嗎”。同理，例（4b）發問人看到聽話人外出，基於對聽話人的瞭解（比如是學生，當時非週末），形成“你去學校”的預期，但是不確定，進而發問求證。因此，是非問都是求證預期，並且從肯定式是非問轉向否定式經歷了預期的調整。比如說話人在美國看到黑頭髮，黃皮膚，黑眼睛的亞洲面孔，形成“可能是中國人”的預期，但是經過交談發現對方不會說漢語，於是調整原有預期，形成新預期“不是中國人”，雖然對該預期仍不確定，但確信度高於肯定式是非問的預期，因為否定要比肯定需要更多的事物信息，不僅要掌握事物的特徵，還要辨別哪些特徵不屬於該事物的特徵。

無論是肯定式還是否定式是非問前面都可以加上“讓我猜一猜”，表明該問句其實是說話人猜測的內容，也就是預期。比如：

（5）a. 讓我猜一猜，你是中國人嗎？

b. 讓我猜一猜，你不是中國人嗎？

相反，特指問不含顯性預期，所以不能說“讓我猜一猜，你是哪國人？”因此，是非問的本質是對一個不確定的預期的求證，當該預期以肯定命題呈現時為肯定式是非問（如“你去學校嗎？”），當該預期以否定命題呈現時為否定式是非問（如“你不是去學校嗎？”）。

三、預期修正與“不是 X 嗎”的質疑功能

表質疑的“不是 X 嗎”在以往研究中也被歸入反問句（邵敬敏，1996；鄭貴友，2014等）。但我們認為，該句式與典型的反問句在句法語義上存在區別。殷樹林（2006）總結了典

型反問句的三個特點：無疑而問；不需要回答；表示否定。表質疑的“不是 X 嗎”儘管也表否定，但往往是有疑而問，需要回答。比如：

（6）鍾離春：“上次你不是答應了嗎，為什麼又不嫁了呢？”
鍾離秋：“姐，你走後，我又反覆想了想，我不能嫁他……” （CCL）

（7）我說這幾年不是都在講要減輕學生負擔嗎？怎麼還這個樣子？家長說，學校裏這評比那獎勵，都要看學生的考試成績。 （CCL）

（8）我困惑不解地問他：“這幾年你做生意不是賺了不少錢嗎，都用到哪裏去了？”他長歎一聲說：“甭提了！都被大兒子吃白粉吃光了。” （CCL）

以上各例摘自 CCL 語料庫，“不是 X 嗎”的字面意思分別是“你答應了”“這幾年在講要減輕學生負擔”“你做生意賺了不少錢”。與反問句不同的是，說話人在表達上述命題時不再是毫無疑問，而是帶有質疑，質疑現實與預期不符。比如例（6），鍾離春知道鍾離秋之前答應了要嫁人，因此預期鍾離秋會信守諾言嫁給別人。但現實是鍾離秋不答應嫁了。鍾離春對此質疑，希望尋求解釋。例（7）言者預期學生負擔會減輕，但現實是學生負擔依舊很重，與預期不符，言者發出質疑。例（8）言者預期是“（你賺了不少錢，因此）你存下了不少錢”，但現實是聽者沒錢了。因此言者感到“困惑不解”，期望聽者回答解釋。齊滬揚、胡建鋒（2010）注意到“不是 X 嗎”反問句的疑問用法，他指出，表疑問用法時句子中的命題一般是預期信息 , 說話時出現了新信息 , 而且新信息是反預期信息 , 說話人希望瞭解為什麼或怎麼會出現這個反預期信息。鄭貴友（2014）把這類“不是 X 嗎”句的功能總結為表疑。我們認同上述學者的判斷，並認為這是該句式與表反問“不是 X 嗎”的語義區別。句法上，表質疑“不是 X 嗎”一般不傾向與“難道”“豈”“還”等加強反問語氣的副詞共現。“不是”仍然輕讀。“不是 X 嗎”問句後續常跟有其他表追問的句子，這些追問的句子就是說話人質疑的內容，這些內容正是與“不是 X 嗎”中的 X 推導出的預期 Y 相反的非 Y。如例（6）中 X= 答應了，推導出預期 Y=“應該要嫁人”，說話人質疑的內容是非 Y，即“不嫁”。

齊滬揚、胡建鋒（2010）從反預期角度對表質疑的“不是 X 嗎”作過精彩的分析。我們基本認同他們的觀點，但需要補充三點：（1）說話人在發問之前，對於預期“X”有很高的確信度。（2）發問時出現的新信息在確信度上高於原有預期，動搖了原有預期，發問人對此感到不解並發問。（3）聽話人的回答使問話人對原有預期加以修正。第一點可以解釋為何這裏的“不是 X 嗎”仍然屬於反問句，第二點解釋了其質疑功能的來源。第三點則解釋了從質疑到解惑的預期更新過程。比如：

（9）a.（語境：甲前一天沒在辦公室看到乙，聽同事說乙出差了。第二天，甲來上班時看到乙。）
甲：你不是出差了嗎？乙：是啊，昨晚就回來了。
b.（語境：甲看天氣預報說第二天要下雪，到了第二天一粒雪子都沒下。）
甲：天氣預報不是說下雪嗎？怎麼沒下？乙：天氣預報也有不準的時候。

例（9a）甲在看到乙之前，預期他出差了（由於聽同事轉述，該預期確信度很高，表現為無疑而問）。根據常理，出差不會這麼快回來，因此甲預期乙不在辦公室，而事實是乙出現在辦公室，這一新情況與預期相反，且確信度大於原有預期。注意，這裏甲生成了兩個預期，預期 1 是“乙出差了”，預期 2 是“乙不在辦公室”，後者是從前者推導出的隱含預期。現實與隱

含預期相反，從而動搖了預期 1 的確信度，甲希望乙能夠對此加以解釋，因而提出質疑。從乙的回答來看，是肯定預期 1 但否定了預期 2。甲通過乙的反饋可以修正預期 2。其實，乙也可以直接否定預期 1，如回答“誰說我出差了？”。這樣，甲就需要修正預期 1。例（9b）甲聽了天氣預報後，形成了第二天下雪的預期，由於是權威媒體播報的新聞，且長期以來比較準確。甲對此預期的確信度同樣很高。但是現實情況直接與該預期相反，使發問人納悶不解。乙的回答則使甲修正對氣象預報準確性的預期。以上兩例均可轉化為“既然 X，卻怎麼 / 為什麼 Y”，邢福義（2001）指出“既然……，卻為什麼……”是對事實的詰問，具有“強調結果怪異，不合常理”和“反證疑據”的語用價值。“不合常理”就是反預期，“反證疑據”就是我們說的修正預期。

四、預期強化與“不是 X 嗎”的反問功能

我們在 BCC 語料庫中檢索出典型的表反問“不是 X 嗎”如下：

（10）這樣，難道他不是英雄嗎？毋庸爭論的，他是英雄。（BCC）

（11）他不能來，派代表來了，還不是一樣嗎？”（BCC）

（12）對做了錯事（有的很難說是錯事）的學生，學校不去教育，反而採取罰款的辦法，這不是糟踏我們的教育事業嗎？（BCC）

以上例句“不是”一般輕讀，“X”部分相對重讀。楊曉安（2008）通過語音實驗證明，假性問時，“X”部分基頻趨高，時長較長，而“不（是）”基頻下降，時長也相對短縮。句法上，“X”部分可以是名詞（例 10）、形容詞（11）或動詞短語（12），可以與副詞“還”（例 11）“難道”（10）等共現加強反問語氣。“不是”可以插入“也”“還”“就”等副詞，如“他不就 / 也 / 還是英雄嗎”。語義上，反問句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義。郭繼懋（1997）指出，反問句的意義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字面意義，即 Y 為真（即本文反問句的“X”部分）。另一部分為會話隱含意義，即 X 不合乎情理，是錯的。從預期的角度看，說話人認為是真的命題“X”就是說話人的預期，並且說話人對此堅信不疑。但是聽話人或其他人的言行或認知狀態有違言者預期“X”或由“X”推導出的隱含預期非 Y。言者對自己的預期無比確信，並通過反問語氣進一步強化自身預期，對聽者進行反駁，試圖說服對方，尋求認同。比如：

（13）一些部門和單位有的領導同志，對科技人員搞業務，特別是利用業餘時間鑽研科學技術，總是看不慣。不是說人家“不務正業”，就是懷疑人家“動機不純”，有“名利思想”。科技工作難道不是科技人員的正業嗎？（CCL）

（14）彭總情之所至，也來了一個“鯉魚打挺”。一個統率千軍萬馬的大將軍，在地上翻跟頭，不是有失身份的莊嚴嗎？（CCL）

（15）喬妻：仁山，你心中太沒有媽媽了！我日夜的禱告，盼望你能和以美結婚；可是你把她放走！她是多麼有本事，有心路的一個好姑娘啊！

喬仁山：別傷心吧，媽！以美能夠逃走，得到自由，不是一件好事嗎？（CCL）

以上均是表反問的“不是 X 嗎”，說話人的預期就是其字面意思“X”。例（13）言者預期為“科技工作是科技人員的正業”，但是現實中“一些部門和單位有的領導同志”認為科技人

員利用業餘時間鑽研科學技術是“不務正業”。說話人對自身預期（X）無比確信，且相信比其他人的不同預期（非 X）更為合理，因此說話人用反問的形式強調預期命題“科技工作是科技人員的正業”的正確性，以此反駁和糾正那些領導同志的不正確觀點。例（14）彭總（彭德懷）做了一個“鯉魚打挺”的動作，這一行為在說話人看來是不合適的。說話人預期“大將軍在地上翻跟頭有失身份的莊嚴”，並且說話人對此毫無疑問，通過反問的形式強調該預期的正確性，希望彭總認可自己的看法，改變行為。例（15）喬仁山母親盼望“喬仁山和以美結婚”，屬於願望類預期。喬仁山卻認為“放以美走是一件好事”，並且認為自己的預期比母親的更為合理，通過反問強化自己預期的合理性，希望能夠說服母親。

反問“不是 X 嗎”“X”是說話人的預期。如果換一個角度，從聽話人的言行態度對說話人來說，也可以認為是表達反預期，即現實（他人的觀念、行為）與說話人預期相反。因此，表反問與質疑的“不是 X 嗎”都存在反預期，即現實與預期衝突。區別在於，前者的現實弱於預期，不能改變說話人原有預期的確信度，反而強化了原有預期；但後者的現實強於預期，降低了原有預期的確信度，言者需要進一步修正預期。

五、預期激活與“不是 X 嗎”的提醒功能

以下是“不是 X 嗎”表達提醒功能的例子：

（16）八一軍體大隊隊員胡維學：中國人不是有一句古話嗎，忠孝難兩全，我想我在為國家盡忠的時候，老爸他也能理解。（MLC）

（17）（採訪）新人：我們剛到，這就快到了挺好，還是預約比較好。中國人不是長久嗎？今天就 3 個 9，挺難得。（MLC）

（18）（採訪）新人：訂晚上（的酒席）就不太容易訂，天津的風俗不是晚上（辦結婚典禮）嗎，訂在中午，還好訂一些。（MLC）

表提醒的“不是 X 嗎”既不表示否定，也不表示疑問，“不是”和“嗎”不為所在命題提供概念意義，也不具有句法強制性，刪去“不是”和“嗎”不影響所在語句命題的真值。“不是 X 嗎”更多表現為一種程序性意義，以往研究把該意義總結為“提醒”（鄭貴友，2014）或“激活前後景”（胡建鋒，2011）。

“不是 X 嗎”表提醒功能時，說話人的預期是“X”, 且預期聽話人也知道“X”，“X”是聽說雙方的共同預期，說話人確信該預期為真。但是在交際時，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可能未注意到“X”，即聽話人的預期“X”處於潛意識狀態，說話人通過使用“不是 X 嗎”激活聽話人的預期“X”，使之成為聽說雙方聯合注意的中心。比如：

（19）竇文濤：沒錯兒，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前一陣兒就是說有一個列車長被告嘛，就是說有個乘客在車上好像發瘋了嘛，他就把他捆起來。

馬未都：捆死了，捆大發了。

孟廣美：哦，那個啊。（MLC）

例（19）竇文濤說“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引入已經發生的事實，並且說話人預期聽話人也知道這個事實，只是該信息當前未引起聽話人注意，說話人用“不是 X 嗎”加以激活和提

醒，使預期“審判了一個列車長”成為雙方共同注意的中心，成為後句陳述的話題。而從馬未都和孟廣美的回答來看，“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成功地激活了他們的預期。馬未都直接說出了該事件的結果“捆死了乘客”，孟廣美的回答則顯示她想起來那件事。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也注意到這種功能。胡建鋒（2011）指出，反詰問句的作用在於把雙方記憶中相關的已知信息提取出來，構成前景展開所需要的背景，同時在這背景中呈現出前景展開所需要的話題。該功能被劉婭瓊、陶紅印（2011）稱為“提醒”，是當聽者表現出對某種應知信息的無知、忽視或遺忘，說話人為聽者指出並希望對方能激活該信息。“提醒”或“激活背景”的實質是激活共用預期。有的時候，X 對聽話人而言是新信息，但說話人把它當作已知信息用“不是 X 嗎”激活，造成共知的假象，從而拉近與聽話人的距離或增加話語可接受度（詳見胡建鋒，2011）。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激活的是說話人預期，最典型的是打招呼的“不是 X 嗎”，比如：

（20）羅伯特應鈴聲而來。“給費弗爾先生端一杯威士卡蘇打，”我吩咐說。“啊，這不是羅伯特嗎？”費弗爾說。“好久沒見到你了。（BCC）

（21）郭祥把眼一瞇細，笑著說：“這不是劉大順嗎！你回來啦！”他一面說。一面快步搶過來同大順握手。又說：“你這次回國半年還多了吧？”“有八九個月了。”大順笑著說。（BCC）

以上例句常見於久未見面的熟人之間，聽話人的出現激活了說話人對聽話人的記憶，說話人的預期就是“X”，即例句中的“（這是）羅伯特”和“（這是）劉大順”。說話人對此十分確信，不容置疑。聽話人的不期而遇，激活或喚醒了說話人關於聽話人的記憶。反面證據是，如果聽說雙方經常見面，說話人不會用“不是 X 嗎”打招呼。可見，激活的預期可以是聽話人的，也可以是說話人的。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記憶還是已知信息，都與預期密切相關。心理學家 Mullally & Maguire（2014）指出，記憶、想像和預期具有共用的腦機制。大量心理學實驗也表明，想像未來與回憶過去共用相似的行為特徵以及相同的海馬 - 皮層系統（楊玉芳，2020）。

“不是 X 嗎”在激活預期和提醒的同時，起到了引入話題的作用。完權（2021）指出，話題具有互動性，其核心功能是創建新的聯合注意中心，繼而轉為背景注意的中心，並持續保持一段時間。完權（2021）認為，在說話時，會話人不僅會考慮到其自身信息狀態的激活和變化，還會意識到其他會話人也有相應的注意力中心和邊緣的變化，這些都會影響到他們的話語產出。完權所說的創建聯合注意中心就是激活聽說雙方的共同預期，而說話人考慮其他會話人的注意力中心則體現了預期的意向性（即對他人預期的預期）。

六、“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預期強度

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已經證明“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背後的不同預期操作，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變數就是發話人對預期的確信度，或者說是預期的強度。“不是 X 嗎”四種話語功能背後預期的強度由高到低分別是：提醒 = 反問＞質疑＞詢問。

預期強度與問句的信疑程度有密切關係。“不是 X 嗎”句式既是疑問句也是反問句。疑問

和反問的重要區別是疑問程度不同。呂叔湘（1982）曾將疑問語氣按疑問程度由高到低分為三類：詢問＞測度＞反詰。邵敬敏（1996）指出，正反問的疑惑程度居中，即信疑各為 1/2，特指問對所詢問對象完全不知，疑惑程度最強，即信 0 而疑 1，反詰問答案就在問句中，沒有什麼疑惑的因素，即信 1 疑 0，“嗎”字是非問句則為信 1/4 而疑 3/4，“吧”字是非問句為信 3/4 而疑 1/4。其中，“信”就是信念，也就是預期，信的程度可視作預期為真的概率。陳振宇、王夢穎（2021）指出，可以採用主觀概率來定義預期的認知模型。主觀概率指語句中所反映的說話者對某一場景中某一對象的概率的主觀認識或估測。概率論認為，概率本質上是對信心的度量，是我們對某個結果相信程度的一種定量化的表達（劉嘉，2021：195）。可見，概率其實就是對預期的量化表達，當我們說明天降水概率 80% 時，意味著我們預期明天下雨的強度較高。以此觀察問句系統，其實詢問、測度和反詰體現的就是言者對命題為真的不同預期強度。試看以下例句：

（22）a（我拿不準 /* 我相信），他不是中國人嗎？

b（我相信）他應該不是中國人吧？

c（毋庸置疑）他難道不是中國人嗎！

以上例句分別是詢問、測度和反詰，言者預期的強度不同。例（22a）是表達詢問的“不是 X 嗎”，言者預期“他不是中國人，但預期強度比較低，因而提出疑問，向聽話人求證自己的預期。證據是只能添加表示低確信度的短語如“我拿不準 / 我不確定”。相反，不能添加“我相信”“應該”等確信度較高的成分。對於測度問例（22b）而言，該句的預期“他不是中國人”強度較高，可以與“我相信”“應該”等高確信度成分共現。對於表達反問的例（22c），該句預期“他是中國人”強度最高，可以添加“毋庸置疑”等最高強度的語彙表達。前文已分析，表達質疑的“不是 X 嗎”預期強度高於詢問句，低於反問句，表達提醒的“不是 X 嗎”預期強度與反問相近，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不是 X 嗎”四種話語功能的預期強度由高到低是提醒 = 反問（極強）、質疑（強）、詢問（弱）。

綜上，“不是 X 嗎”的多重話語功能是說話人預期內容、預期強度、預期與現實關係等綜合作用下的預期操作的產物。具體如下表所示：

表 1“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的預期特點

“不是 X 嗎”功能	預期特點			
	預期內容	預期強度	預期操作	現實與預期
詢問	不是 X	弱	預期求證	不衝突（預期可能是現實）
質疑	X → Y	強	預期修正	衝突 (現實強於預期)
反問	X	極強	預期強化	衝突 (預期強於現實)
提醒	X	極強	預期激活	不衝突（現實等於預期）

從話語理解的角度出發，對說話人預期強度的理解取決於上下文。以句子“他不是優秀教師嗎”為例，孤立地看這句話，聽話人無法判斷其表達詢問、質疑、反問還是提醒，需要通過前後句子的提示加以判斷。比如：

（23）我可能記錯了，他不是優秀教師嗎？（詢問）

（24）他不是優秀教師嗎？怎麼上課這麼敷衍？（質疑）

（25）他幾十年如一日教書育人，愛生如子。他不是優秀教師嗎？（反問）

（26）他不是優秀教師嗎？你可以選他做導師啊。（提醒）

以上四句因前後句不同，浮現出不同的話語功能。例（23）表達詢問。言者可能之前以為“他是優秀教師”，但出現了新的現實，從而形成新的預期“他不是優秀教師”，該預期強度比較弱，言者不確定，從而形成否定式是非問加以詢問，以期求證該預期。例（24）表達質疑。言者預期為“他是優秀教師”，但現實“上課敷衍”與該預期的隱含預期（優秀教師應該上課認真）衝突，引發言者質疑。後續句是對質疑內容的直接發問。例（25）表達反問。通過前句對他教書育人、愛生如子的描述肯定了他的正面形象，後句“他不是優秀教師嗎”以反問的形式表達言者極強的預期“他是優秀教師”，該預期在言者看來是毋庸置疑的，不因他人的反對意見而改變。例（26）表達提醒。言者通過“他不是優秀教師嗎”激活聽者的關於“他是優秀教師”的預期，並把它作為後續句“選他做導師”的前提和背景。作為前提，該預期的強度極強，才能保證前提的真實性。至少言者主觀認為“他是優秀教師”是真實可信的。

七、結語

本文總結了“不是 X 嗎”問句的表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項話語功能，並從預期的角度對四項話語功能的內在生成機制做了統一說明，即預期求證、預期修正、預期強化和預期激活。“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說話人預期及預期強度的高低密切相關。

問句最能體現聽說雙方的互動，向來是互動語言學的研究熱點。互動語言學認為，互動雙方不同的認識地位會影響相同的語言形式的不同解讀（方梅、謝心陽，2021）。我們深以為然。但是，互動雙方的認識地位具體指什麼？現有研究主要指聽說雙方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狀態。我們認為，聽說雙方的互動實質上是各自預期的互動。事實上，互動語言學理論多處提到預期或預測在言語交際中的作用。如互動語言學的重要術語“投射”，就是指說話人即時產出的話語能夠對其未說出的話語產生一定程度上的預示作用。在說出的語句到達完結位置之前，受話人一方已經可以從話語已產出部分來預測尚未產出的部分，從而預估這一話輪結構可能完結的時間節點（轉引自 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定義所提到的“預示”“預測”“預估”無不是預期。另一方面，“不是 X 嗎”的不同話語功能也是在動態交際中浮現出來的。浮現語法和互動語言學具有相似的理論背景和語言觀。姚雙雲（2011）指出，浮現語法認為語法是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產生的。結構與規則永遠處於演化狀態，它們在話語中浮現出來，並由話語塑造而成形……天賦的語言能力並不能完全決定語言結構的性質，外界的語言刺激、認知心理、文化因素、語用功能等都是決定因素。本文就是從認知心理，即預期的角度解釋“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浮現的一個嘗試。

參考文獻

陳振宇、王夢穎 2021 預期的認知模型及有關類型——兼論與“竟然”“偏偏”有關的一系列現象，《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

方　梅、謝心陽 2021 漢語對話中問句的解讀——以反問句和陳述式問句為例，《漢語學報》第 1 期。

郭繼懋 1997 反問句的語義語用特點，《中國語文》第 2 期。

胡建鋒 2011“不是……嗎？”反詰問句的前後景功能，《當代修辭學》第 3 期。

劉　嘉 2021《概率論通識講義》，北京：新星出版社。

劉婭瓊、陶紅印 2011 漢語談話中否定反問句的事理立場功能及類型，《中國語文》第 2 期。

呂叔湘 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陸方喆、朱　斌 2022 論預期語言學的構建：理論假設、核心概念與研究價值，《關東學刊》第 6 期。

倪　偉 2010《兒童信念–願望推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齊滬揚、胡建鋒 2010 試論“不是……嗎”反問句的疑問用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邵敬敏 1996《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完　權 2021 話題的互動性——以口語對話語料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5 期。

徐盛桓 1999 疑問句探詢功能的遷移，《中國語文》第 1 期。

邢福義 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熊子瑜、林茂燦 2003 語氣詞“ma0”的疑問用法和非疑問用法，《第七屆全國人機語音通訊學術會議（NCMMSC7）會議論文集》

楊曉安 2008 真假疑問句的語音區別特徵——關於“不（是）x 嗎？”型歧義句的語音實驗，《南開語言學刊》第 1 期。

楊玉芳 2020《語言理解——認知過程和神經基礎》，北京：科學出版社。

殷樹林 2006《現代漢語反問句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姚雙雲 2011“浮現語法”與語法的浮現，《中國社會科學報》11 月 17 日。

張發明 1989 試論“不是……嗎”反問句，《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第 4 期。

鄭貴友 2014“不是 x 嗎”句的語義特徵和表達功能，《漢語學報》第 4 期。

Couper-Kuhlen E. & M. Selting.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 Claudi, U. & Hün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llally S. L. & Maguire E. A. 2014. 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 *The Neuroscientist* 20(3), 220-234.

曾君　武漢　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14770397@qq.com

陸方喆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wubeilfz@aliyun.com

朱斌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ccnuzb@126.com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bushi* X *ma*"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Expectation

ZENG Jun LU Fangzhe ZHU Bi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bushi* X *ma*" question, namely inquiry, doubt, rhetorical questioning, and reminder. It analyze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function, and provides a unified account of their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for verification, expectation for revision, expectation for reinforcement, and expectation for activation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inquiry, doubt, rhetorical questioning, and reminder.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bushi* X *m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s and the varying strength of those expectations.

Keywords: expectation; "*bushi* X *ma*"; discourse functions

聲調描寫：數字表達與特徵表達 *

衣　莉

提　要：文章以三處方言為例，闡釋聲調描寫中，數字表達和特徵表達各自具有的優勢及不足之處，論證二者在方言描寫上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數字表達在描寫聲調細節方面更有優勢，而特徵表達在推演聲調的生成規律及演化背後的原理時更勝一籌。結論認為好的聲調描寫應該二者兼而有之。

關鍵詞：特徵表達；數字表達；聲調音系；聲調演化

一、前言

趙元任（Chao, 1930; 趙元任，1980：81—83）發明五度標調制之後，也有很多研究嘗試用特徵來描寫聲調。“調位特徵”這個概念最早是王士元（Wang, 1967, 2010）提出，由“音位特徵”衍化而來。Heyes（2009: 74）曾經解釋引入“特徵”這個概念主要是用來區別“自然類”，對於類型學研究和音系生成非常重要。王士元提出用七對特徵來區別十三種聲調，可以稱得上是最早的聲調生成音系學。利用這組特徵描寫，還可以預測很多聲調種類，不過這種動態的描寫模式並沒有被生成音系學廣泛採納，Clements 等人（2011）稱它沒有跨語言研究的意義。Hyman（1993）曾提出三個調域、三個度的描寫方法，能夠定義九個高度。Yip（2002）提出一套類似的聲調特徵體系，將聲調分出域（register）和次域（sub-register），每個域內部又分出兩高、兩低共四個特徵。Woo（1969, 1972）也曾提出一種特徵表達的理論，指出韻腹中的音段是“聲調承載單位”（tone bearing unit），每個單位只能承載一個聲調特徵，針對漢語普通話的四聲，每個調可以被看作有兩個“聲調承載單位”，每個單位上有一截水平、靜止的調，漢語普通話的四聲用這套體系可被描寫為：HH, LH, LL, HL。這套系統將聲調特徵簡化至一組對立的單位，是生成音系學非常樂見其成的。朱曉農等人（Zhu 等，2019：321—345）後來又提出分域四度制，“分域”是按照聲調的發聲態分出三個域，“四度”是對“五度制”的修訂，他認為調位特徵在語音層面不能充分描寫聲調的高度、拱度、長度和發聲態。而五度制有時又顯得繁瑣，比如單純降調用五度制就能有五十種不同的排列組合方式，這會給類型學研究造成極大的冗餘（Zhu 等，2019：321—345）。朱曉農（2014：193—205）還提出“普適調型庫”的概念，是將一個方言或一類方言經分域四度標調後，再納入一個系統內的辦法，形式

* 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西北方言聲調演化研究”（23YJA740049）的支持，特此感謝！

上可以類比元音或輔音格局圖。

無論是針對單一語言 / 方言的描寫，還是跨語言 / 方言的對比研究，上述每一種表達都嘗試能提出“普適度”更高的描寫方式。筆者認為聲調表達益於將數字表達與特徵表達結合起來，詳細描寫聲調的語音層面益於採用數字表達，分析聲調的生成及演化則用特徵表達更清晰。本文以筆者調查的三處方言為案例來闡釋數字表達在聲調語音描寫層面的優勢（第二節），特徵表達在音系解釋層面的優勢（第三節），以及各自的不足之處，最後得出本文的結論（第四節）。

二、數字表達對聲調的描寫

目前來看，在各種數字表達的方式中，“分域四度制”和“普世調型庫”（Zhu 等，2019：321—345；朱曉農，2014：193—205）已經最大限度地將所有的描寫維度都涵蓋進來。“分域”是以假聲、清聲、和氣聲為基準定義上域、常域和下域三個區域，“四度”與五度制類似，但是對五度進行了精簡，以消除不必要的冗餘度。實踐證明在每個聲域內，用四度已經足夠。值得注意的是，分域四度並不是分出十二個不同的高度來描寫聲調，那樣不僅比 Hyman（1993）的九度還要繁瑣，也超過了人的感知範圍。如圖 1 所示，分域四度總共有六級高度，上、常、下域分別有重合的維度，比五度多了一度，同時還能將發聲態也表達出來，也更接近人耳的感知極限，比如貴州魚糧苗語有六個高度的平調，如果只有五度，最低的氣聲平調只能記作［21］，這個語音描寫是被扭曲的，背離事實（朱曉農等，2012）。

“普世調型庫”嘗試將一個（類）語言 / 方言聲調的拱度、長度、高度都涵蓋到一個矩陣內，矩陣內用數值表達拱度，用不同的字體表達不同的域，比如上域用斜體、下域用黑體、常域為一般字體。長短用下標線。調類的語音表達用花括號 {}，音系表達用直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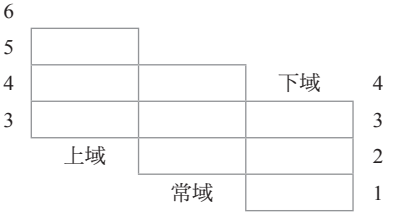

圖 1　分域四度模型（轉引自朱曉農，2024：48—69）

筆者以浙西南吳語的調查為例（衣莉、朱曉農，2023：364—385）來分析“分域四度”對聲調描寫的優勢與劣勢。需要說明的是，調類以古調類命名，分別為陰平（1a）、陽平（1b）、陰上（2a）、陽上（2b）、陰去（3a）、陽去（3b）、陰入（4a）、陽入（4b）（圖表中皆用字母代替）。

浙西南吳語共調查了四十五個方言點，其中保留常域和下域的方言點有十三個，這兩個域基本對應古調類的“陰高陽低”。十三個方言點大部分保留四上四下的格局，也有個別方言點出現調類合併，只有七個調或六個調的情況。但是總體來講，常域和下域的分佈是均勻的。比較典型的案例如圖 2 所示的常山天馬鎮的聲調格局。圖中與坐標橫軸平行的四條橫線分別對應

四度，常域的陰去調值為 {323}，陽去為 {**202**}。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陰陽調在兩個域的對立，它們拱形完全一致，但是聲調的發聲態不同，呈現高低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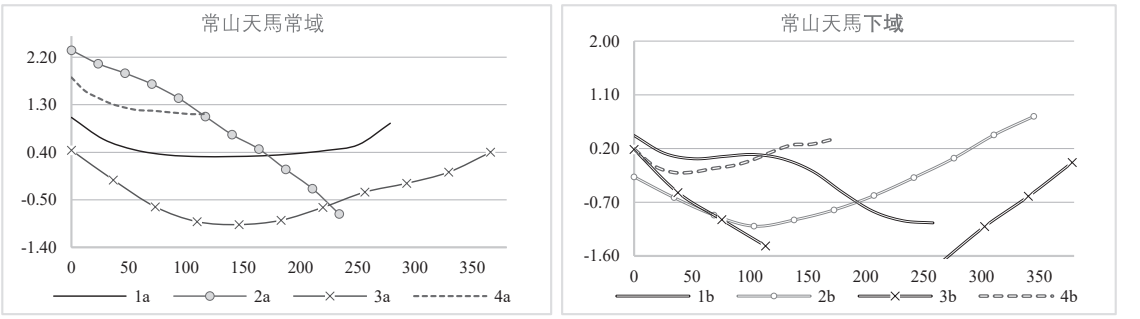

圖 2　常山天馬鎮聲調的兩個域（轉引自衣莉、朱曉農，2023）

另外三十二個方言點出現了氣聲衰減的情況，一部分聲調格局只剩一個調域（如圖 3 上所示武義泉溪），八個調調值分別為：1a={24}，1b={324}，2a={44}，2b={34}，3a={52}，3b={342}，4a={554}，4b={323}，下劃線表示入聲短調。另外還有九個方言點出現了張聲或假聲的情況，呈現上域和常域的對立（如圖 3 下所示）。衢州峽川的陰上和陰去進入了上域，陰上帶有假聲，調值為：2a={*36*}，陰去張聲，調值為：3a={*63*}。其他六個調都在常域，調值分別為 1a={44}，1b={22}，2b={424}，3b={442}，4a={55}，4b={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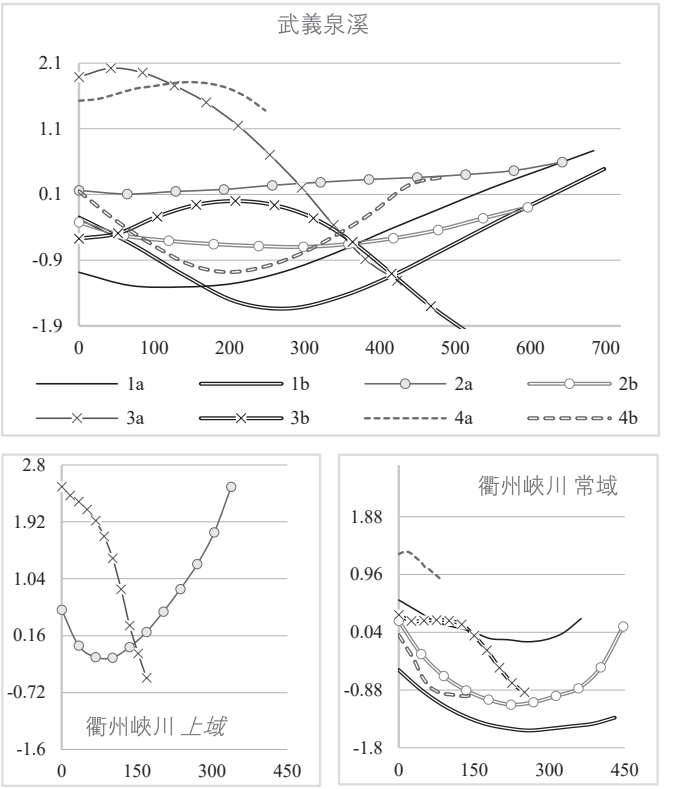

圖 3　武義泉溪的常域聲調格局（上）；衢州峽川的雙域格局（下）（轉引自衣莉、朱曉農，2023）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採用“分域四度”能夠對方言聲調的語音表達進行細緻而準確的描寫。但是問題來了，在嘗試將四十五個方言點的聲調進行“調型”定位時，衣莉、朱曉農

（2023：364—385）並沒有採納數字表達，而是用文字進行了整理，即凹、降、平、升。如果需要表達細節則添加了下標，比如“凹後”表示後凹調。“彎降高”表示高彎降，同時附加字體的改變來表達域差：斜體表示上域、黑體表示下域，常域用一般字體。

之所以用這種表達方式，是因為數字表達無法抽象合併類別，比如常域後凹調可能是{423}{523}，也可能是 {524}，至於它們有沒有語言學意義上的差別，在一個語言或方言內部很容易得出結論，但是在跨語言比較時，是否將其定為一個調型，以及將其定為什麼調值，沒有統一標準。

此外，在討論聲調演化的問題時，“分域四度”也有自己的問題。像浙西南吳語中的方言，在聲調的演化上主要體現在發聲態的變化。這還好處理，無論是氣聲衰減，還是假聲、張聲引發上域，都可以從輔音“氣聲鏈”的變化來解釋（如圖 4 所示，轉引自衣莉、朱曉農，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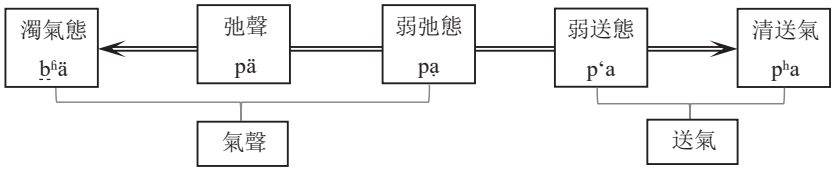

圖 4　清濁音變 II：氣氣鏈（據朱曉農，2018 a：170，圖 43）

但是對於一種拱形變成另一種拱形，比如西北方言的二聲、三聲系統的方言，兩個調類為什麼會合併，以及單字調與雙字調、三字調在轉化生成的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拱形的變化，數字表達就顯得描寫有餘，解釋不足。

Yang & Xu（2019: 417-459）匯總了四十五個不同語言 / 方言中的五十二種聲調演變的案例，最後發現所有的聲調演化大都沿著一條逆時針的路線，如下所示：

low level 11|22 ＞ low falling 32 ＞ mid falling 42 ＞ high falling 52 ＞ high level 55 or rising-falling 453 ＞ mid rising 45|35 ＞ low rising 24|13 ＞ falling-rising 323|214 or low level 11|22 ＞ low falling 32

朱曉農（2018：113—132）在進行聲調的演化研究中提出一個聲調演化圈，類似於元音演化圈，不同的拱形總是處於一個不斷由此及彼的連續狀態中（圖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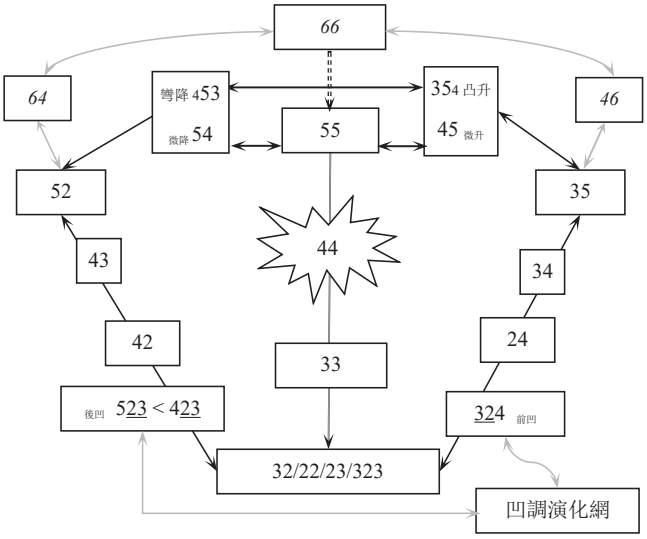

圖 5　聲調演化圈（轉引自朱曉農，2018b：124，圖 11）

無論是逆時針演化線，還是聲調拱形演化圈，都只說明了一個問題：聲調的拱形、高度是朝著某個方向在變化，但是沒有解決為什麼變化的問題，比如高降調［51/52］為什麼會變成高平調［55］。［324］為什麼既會變成［24］，又會變成［32］。總結出來的變化路線是呈現出跨方言的共性（朱曉農，2018：113—132；Yang & Xu, 2019: 417-459; 衣莉，2024），那為什麼跨方言都會出現類似的變化呢？背後的語音機制是什麼，是什麼音系規則在起作用呢？顯然這兩條演化路線並沒有回答這些問題。

三、特徵表達對聲調的音系解釋

接下來筆者以甘肅蘭州和武威的單字調與雙字調、三字調之間的對應變化為例，用特徵表達演示聲調的生成和演化，詮釋特徵表達在分析聲調生成和音系解釋方面的優勢。蘭州方言中，正在進行的一個演化是陰平調從高降變為高平（Yi 等，2024：336—361）。用特徵來描寫蘭州方言的四個調類的調值分別是：陰平（T1a）高平［H］或高降［HM］、陽平高降［HL］、上聲（T2）和去聲（T3）升調［MH］。下面從雙音節字調的角度解釋陰平從高降演化為高平的語音機制和音系規則。

3.1 單字調與雙字調的生成變化

蘭州方言的單字調組合成雙字調後，聲調格局如表 1 所示。該研究在蘭州共調查到二十七位發音人，每位發音人的陰平在進入雙音節字調後，形成的格局如表 2 所示。表 2 中第三列是每個發音人的陰平單字調拱形，第 4—7 列是陰平在雙音節首字時的拱形，第 8—11 列是陰平在雙音節尾字時的拱形（Yi 等，2024：336—361；衣莉，2024）。

表 1　雙字調調值（特徵表達）

	T1a	T1b	T2	T3
T1a	H-HM/H	H-HL	H-MH	H-MH
T1b	HL-HM/H	HL-HL	HL-MH	HL-MH
T2	MH-HM/H	MH-HL	HL-MH	MH-MH
T3	ML-HM/H	ML-HL	ML-MH	MH-MH

表 2　每位發音人的雙字調陰平首字與尾字的調值（轉引自 Yi 等，2024；衣莉，2024）

編號		單字調	雙字調首字				雙字調尾字			
	姓名	1a	1a+1a	1a+1b	1a+T2	1a+T3	1a+1a	1b+1a	T2+1a	T3+1a
1	ZDD	H	H	H	H	H	H	H	HM	H
2	SJ	H	H	H	H	H	H	H	H	H
3	LX	H	H	H	H	H	H	H	H	H
4	GY	H	H	H	H	H	H	H	H	H
5	CSC	H	H	H	H	H	H	H	H	H
6	ZZY	H	H	H	H	H	H	HM	H	H
7	GTP	H	H	H	H	H	H	HM	H	H
8	CHLL	H	H	H	H	H	H	H	H	H
9	YL	H	H	H	H	H	H	H	HM	H

（續表）

編號	姓名	單字調	雙字調首字				雙字調尾字			
		1a	1a+1a	1a+1b	1a+T2	1a+T3	1a+1a	1b+1a	T2+1a	T3+1a
10	CXM	H	H	H	H	H	H	H	H	H
11	CHL	H	H	H	H	H	HM	HM	HM	HM
12	CXH	H	H	H	H	H	HM	HM	HM	HM
13	WXH	HM	H	H	H	H	HM	HM	HM	HM
14	ZZ	HM	H	H	H	H	H	HM	H	H
15	CWM	HM	H	H	H	H	HM	HM	HM	H
16	ZMG	HM	H	H	H	H	HM	HM	HM	HM
17	XXY	HM	H	H	H	H	HM	HM	HM	HM
18	WZC	HM	H	H	H	H	HM	HM	HM	HM
19	SMH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0	SFY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1	CYX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2	CCY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3	PLP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4	XGF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5	HGZ	HM	H	H	H	H	HM	HM	HM	HM
26	QYZ	HM	HM	HM	HM	H	HM	HM	HM	HM
27	CBZ	HM	HM	HM	HM	H	HM	HM	HM	HM

由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居於雙音節首字時，除了兩位發音人外，其他發音人的陰平都是高平 H，居於尾字時分為兩類，單字調陰平是降調的，尾字也幾乎都是高降 HM；單字調陰平是高平的，大部分是高平 H。但整體有高平逐漸擴散的趨勢。

陰平 T1a 單字調與雙字調之間的生成變化可分析為：

（1）HM → H/ [__T (T=T1a, T1b, T2, T3)

這個變化符合 Yip（1989: 149-174）在討論天津方言連調變化時提出的“簡化原則”（Simplification）。所謂簡化原則，是指聲調原本具有兩個特徵，在形成雙音節組合後，其中一個特徵脫落。結合表 2 陰平高平調擴散的情況，可以構擬出蘭州話陰平的演化過程（如表 3 所示）：

表 3　陰平的高平演化構擬

階段	適用規則	單字調	雙字調	
			首字	尾字
階段 1	簡化原則	HM	H	HM
階段 2	綜合–回歸	H	H	HM
階段 3	同化	H	H	H

在第一階段，陰平降調為雙字調首字時，在“簡化原則”作用下，發生了 HM → H 的變化；第二階段，首字的高平回歸到陰平的單字調上；第三階段，單字調的陰平拱形又進而影響到雙字調陰平尾字的拱形。從而完成蘭州話陰平逐漸從高降演化到高平的過程。至於第二個階段中首字的高平回歸到單字調的陰平，主要原因是漢語普通話的影響。研究顯示，調查人當中，是否為高平調與調查人的年齡成負相關，與教育程度成正相關。50 歲以下、教育程度更高的發音人會把單字調陰平讀為高平調（Yi 等，2024：336—361）。這與國家推廣普通話的時間點剛好契合。但是普通話僅僅影響了陰平調的變化，並沒有影響同為降調的陽平，這一點在

結論部分再詳細闡釋。

3.2 單字調與三字調的生成變化

接下來再看一個三字調的案例。甘肅武威方言的單字調只有兩個拱形，陰平、陽平和上聲合併為一個兩折調 {3242}，去聲是一個高降調 {51}。形成三字調後，陰平、陽平和上聲分別出現中平、低平、升調、降調的拱形。具體的三字調格局見表 4：

表 4　武威方言三音節字調格局

調類組合	調值	調類組合	調值	調類組合	調值	調類組合	調值
1a+1a+1a	LM-M-M	T2+1a+1a	LM-L-ML	1b+1a+1a	LM-L-L	T3+1a+1a	HL/H-L-ML
1a+1a+1b	M-M-ML	T2+1a+1b	LM-L-ML	1b+1a+1b	LM-L-ML	T3+1a+1b	HL/H-L-ML
1a+1a+T2	M-M-ML	T2+1a+T2	LM-L-ML	1b+1a+T2	LM-L-ML	T3+1a+T2	HL-L-ML
1a+1a+T3	M-M-HL	T2+1a+T3	LM-L-L	1b+1a+T3	LM-L-L	T3+1a+T3	H-L-ML
1a+1b+1a	M-M-ML	T2+1b+1a	ML-L-ML	1b+1b+1a	LM-LM-L	T3+1b+1a	H-L-ML
1a+1b+1b	M-M-ML	T2+1b+1b	ML-L-ML	1b+1b+1b	LM-LM-ML	T3+1b+1b	H-L-ML
1a+1b+T2	M-M-ML	T2+1b+T2	ML-L-ML	1b+1b+T2	LM-LM-ML	T3+1b+T2	H-L-ML
1a+1b+T3	M-M-HL	T2+1b+T3	ML-L-ML	1b+1b+T3	LM-L-L	T3+1b+T3	H-L-ML
1a+T2+1a	LM-L-ML	T2+T2+1a	LM-L-ML	1b+T2+1a	LM-L-ML	T3+T2+1a	H-L-ML
1a+T2+1b	LM-L-ML	T2+T2+1b	LM-L-ML	1b+T2+1b	LM-L-ML	T3+T2+1b	HL-L-ML
1a+T2+T2	LM-L-ML	T2+T2+T2	LM-L-ML	1b+T2+T2	LM-L-ML	T3+T2+T2	HL-L-L
1a+T2+T3	LM-L-ML	T2+T2+T3	LM-L-ML	1b+T2+T3	LM-L-ML	T3+T2+T3	HL-L-ML
1a+T3+1a	LM-HL-ML	T2+T3+1a	LM-HL-ML	1b+T3+1a	LM-HL-ML	T3+T3+1a	H-L-ML
1a+T3+1b	LM-HL-ML	T2+T3+1b	LM-HL/H-ML	1b+T3+1b	LM-HL-ML	T3+T3+1b	H-L-ML
1a+T3+T2	LM-HL-ML	T2+T3+T2	LM-HL-ML	1b+T3+T2	LM-HL-ML	T3+T3+T2	H-L-ML
1a+T3+T3	LM-HL-HL	T2+T3+T3	LM-HL-L	1b+T3+T3	LM-HL-L	T3+T3+T3	H-H-HL

武威方言中，陰、陽、上合併後形成的兩折調處於凹調的大類中（Zhu & Yi, 2012: 81-106; Zhu 等，2019：321—345），同時也沒有另一個凹調與之形成對立。所以採用特徵表達時，將其調值定為 T1a/T1b/T2=MLM；T3=HL。下面將三字調中調類的變化公式列在下面，其中 T^I 指首字；T^M 指中字，T^F 指尾字，由於篇幅有限，公式中省去了對語境的限定描寫，具體語境參考表 4。

陰平 T1a 的變化有：

（2）MLM → LM/[__T^M+T^F

（3）MLM → M/[__T^M+T^F

（4）MLM → L/T^I__T^F

（5）MLM → ML/T^I +T^M__]

陽平 T1b 的變化：

（6）MLM → LM/[__T^M+T^F

（7）MLM → M/T^I__T^F

（8）MLM → L/T^I__T^F

（9）MLM → ML/T^I+T^M__]

上聲 T2 的變化：

（10）MLM → LM/ [__T^{M}+T^{F}

（11）MLM → ML/[__T^{M}+T^{F}

（12）MLM → L/T^{I}__T^{F}

去聲 T3 的變化：

（13）HL → H/[__T^{M}+T^{F}

（14）HL → L/T^{I}__T^{F}

（15）HL → ML/T^{I} +T^{M}__]

陰、陽、上的凹調［MLM］經歷了幾個變化：MLM → LM；MLM → ML；MLM → M；MLM → L。變成 LM 是脫落了前面的特徵 M，大多數情況是出現在首字。首字陽平都是低升 LM，首字陰平出現了 9 次、首字上聲出現了 12 次 LM。變成 ML 是脫落了最後面的特徵 M，大多數出現在尾字。尾字陽平都是低降 ML，尾字陰平出現了 12 次、尾字上聲 15 次 ML。低平和中平大多處於中字。變化的音系規則仍然可以用 Yip（1989: 149-174）“簡化原則”來解釋。背後的語音機制應該是 Yang & Xu（2019: 417-459）提出的“截斷”機制，即當發音時長不夠一個單音節字調的發音時長時，就會截斷一部分語音特徵。武威方言的去聲有三種變化，高降變高平 HL → H 主要出現在首字和中字時，這個變化與蘭州陰平的變化一致。高降變低平 HL → L 主要出現在中字和尾字，高降變低降 HL → ML 只出現在尾字。後面這二者都屬於高低變化，而且都是從高到低，符合話語結束時的整體韻律特徵。

可以從蘭州和武威的例子看出，共時層面單字調與多字調之間的變化，以及蘭州單字調的歷時演化，拱形的變化都遵循了相同的音系規則。

四、結語

如上文所示，特徵表達用於音系推導會很有意義，它能夠高度抽象概括聲調的本質，但是要讓它完全替代數字表達，卻不一定合適。還是以西南吳語為例（衣莉等，2023），衢州開化城區內方言的聲調格局中有四個凹調：陽上高凹 {434}、陰去後凹 {523}、陽去低凹 {323}、陽平 2/3 例字為前凹 {324}（如圖 6 上所示）。四個調都能夠辨義，凹點的前後與拱形的高低變化都有語言學上的意義，此外它們都在常域，也不存在發聲態的區別。如果用特徵［H］與［L］來表示，四個調都是［HLH］，再加入一個特徵［M］, 可以勉強表示為：{434}=［MLM］、{523}=［HLM］、{323}=［MLM］、{324}=［MLH］。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少一個度，要區分出四個凹調，是很困難的，因為無法確定 {4} 這個度到底是定義為［H］還是［M］。{434} 和 {323} 是兩個拱形平行的凹調，一個高一些，一個低一些。如果將 {434} 定值為［HMH］, 也是一種選擇，但是 {5} 這個度就無法被清晰表達。反觀西北官話中的蘭州話，發音人之間的上聲和去聲有很多語音變體，具體表現為兩折調 {3232}、升降 {35$_2$} 和凹升調 {$_3$25}（如圖 6 下所示），但是調研訪談與聽辨實驗顯示，真正辨義的部分只有其中上升的曲拱，用特徵表達為［MH］或［LM］均可（Yi 等，2024：336—361；衣莉，2024）。根據筆者的調研（衣莉，2024），大多數西北方言的聲調用三個特徵［H］［M］［L］就能夠充分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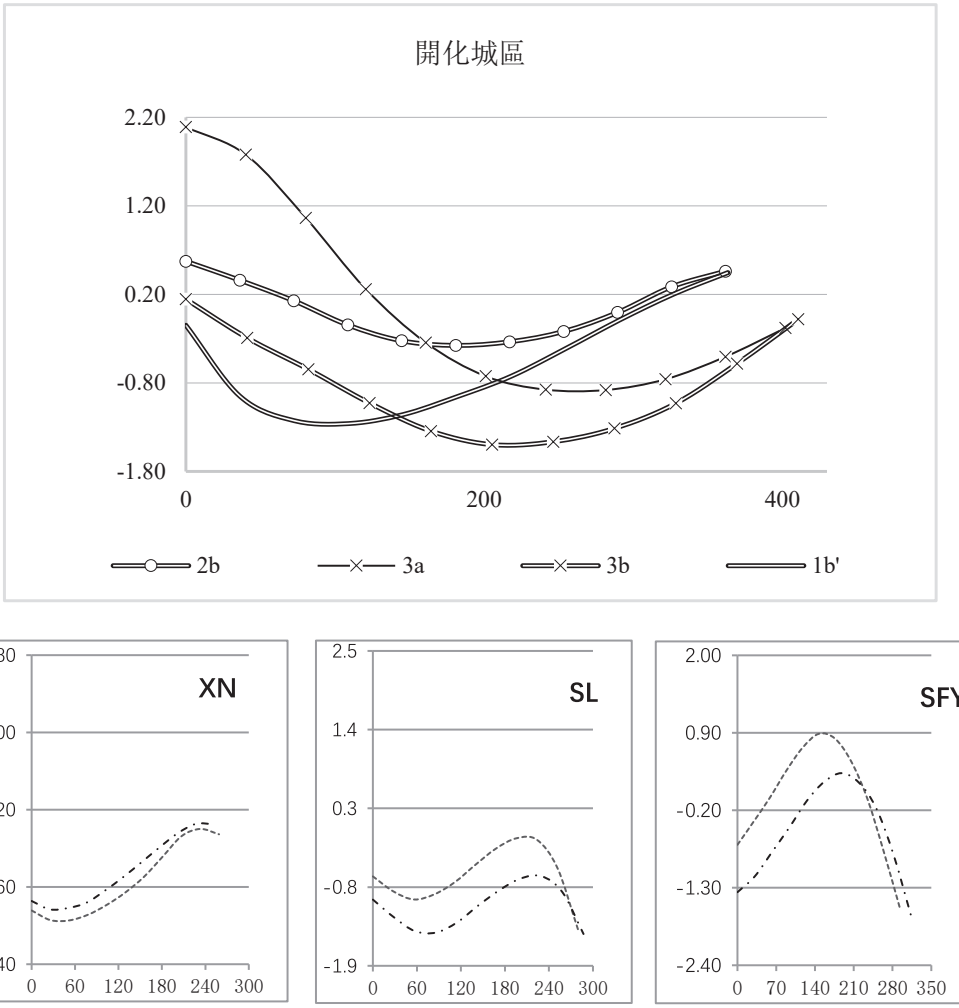

圖 6　浙江開化城區的四個凹調（上）；蘭州三位發音人的上、去調（下）
（轉引自衣莉等，2023；衣莉，2024）

此外，在西北方言中，連字調在交流的過程中權重要更高，單字調之間的區別維度不大，用數字表達反而有時會造成困擾。比如在十四處記錄蘭州方言的文獻中（黃伯榮、趙浚等，1960：71—122；蘭大中文系，1963：81—141；高葆泰，1980：224—231；劉伶，1983：106—121；王毓蘭，1983：13—17；宋法仁，1991：59-62；王森、趙小剛，1997；張燕來，2003；劉俐李，2004：29—33；張安生，2005：77—84；雒鵬，2007：1—4；張文軒、莫超，2009；鄧文靖，2009：66—72；張冠宇，2012：12—18），對陰平的描寫就有七種不同的調值 {53、31、43、21、42、544、44}，即使陽平都被記為高降，陽平的調值也有五種 {51、52、53、31、41}，甚至有將陰平與陽平完全記錄相反的情況。高葆泰（1980：224—231）將其記錄為［31］—［53］，王毓蘭（1983：13—17）將其記錄為［53］—［31］。此處先忽略記音的準確性，蘭州陽平有七種不同調值就體現了上文所提到的數字表達的冗餘性。如果根據特徵描寫，這裏採用了 H、M 和 L 三種特徵來演示，HL=51/52；HM=53/43；ML=31/21，就可以極大降低冗餘度。

最後，筆者再以蘭州話為例，闡釋特徵表達在解釋演化問題的優勢。第三小節（表 3）演

示了蘭州話陰平變化的三個階段，同時闡釋在第二階段，即雙音節首字的陰平調會返回來影響單字調的拱形，筆者提到這是漢語普通話的影響。但為什麼漢語普通話只影響了陰平的降調，而沒有影響陽平的降調呢？從陰平變化的公式看：HM → H，高降脫落了一個特徵［M］，只有一個“簡化”規則。設想陽平要變成普通話的升調拱形，應該經歷兩步：首先 HL → H，其次 H → MH。第一個步驟遵循 Yip 的“簡化原則”；第二個步驟屬於 Yip 提到的“插入原則”（insertion）（Yip, 1989: 149-174）。高降帶有兩個區別特徵［HL］/［HM］，而高平只有一個區別特徵［H］。在習得調類的時候，會首先識別出的區別特徵［H］，如果發音的時長比較短，或者後面有其他調類緊隨其後，調頭的特徵更容易保留下來，而調尾的特徵極有可能被“截斷”（Yang & Xu, 2019: 417-459）。這一步的原理既適用於蘭州話的陰平也適用於陽平。但是陽平是否需要再“插入”一個特徵？“省力原則”和“辨義原則”會發生角力，陰平剛好在“簡化”之後又遇到“接觸”，兩個作用力共同推動了聲調拱形的演化，而陽平不具有這個條件。當陰平脫落了一個特徵後，陽平如果也脫落一個特徵，就會違背辨義原則；至於是否需要再“插入”一個特徵，又與省力原則相違背。同樣的變化，如果用數字表達，很難解釋清楚為什麼 {51} 可以變成 {55}，卻不能變成 {24}。

那麼，如何將數字表達轉換為特徵表達呢？根據筆者的調研，如果數字表達差兩度或兩度以上，就要引入一個［H］的特徵，比如還拿上文提到的浙江開化城區方言的四個凹調為例：{434}=［MLM］、{523}=［HLM］、{323}=［MLM］、{324}=［MLH］。{523} 中的 {5} 是特徵［H］，{324} 中的 {4} 也是［H］，因為它們與最低的 {2} 都差兩度以上。難以區分的 {434} 和 {323} 目前只能用下標來解決，即［MLM］$_{H}$ vs.［MLM］$_{L}$。其他在差一度的情況下，用［H］和［M］形成對立，或者［M］和［L］形成對立都可以。具體的操作步驟可以參考 Chen（2001: 53-57）對聲調表達的闡釋。

綜上，數字表達和特徵表達彼此是不能完全替代對方的。數字表達在描寫聲調細節方面更有優勢，而特徵表達在推演生成規律及演化背後的原理時更勝一籌。筆者認為好的聲調描寫應該二者兼而有之，在描寫聲調的語音表達時，採用數字的方法，而涉及到音系生成和聲調的演化時益採納特徵表達。

參考文獻

鄧文靖 2009 西北地方三聲調方言分佈特點透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高葆泰 1980 蘭州音系略說，《方言》第 3 期。

黃伯榮、趙浚等 1960 蘭州方言概說，《西北師範大學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蘭大中文語言研究小組 1963 蘭州方言，《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劉俐李 2004 永寧音系，《青海師專學報》（教育科學）第 6 期。

劉　伶 1983 新蘭州話簡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

雒　鵬 2007 甘肅漢語方言研究現狀和分區，《甘肅高師學報》第 4 期。

宋法仁 1991 蘭州方言比較談，《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 期。

王　森、趙小剛 1997《蘭州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士元 2010《王士元語音學論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

王毓蘭 1983 蘭州方言與普通話的語音差異，《社會科學》第 4 期。

衣　莉 2024《甘青寧新四省區漢語方言聲調演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衣　莉、朱曉農 2023 演化觀中的聲調類型：西南吳語案例，《語言科學》第 4 期。
張安生 2005 銀川話陽平上聲合併史新探（上），《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
張冠宇 2012 蘭州話單字音聲調格局的統計分析，《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第 3 期。
張文軒、莫　超 2009《蘭州方言詞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燕來 2003《蘭銀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趙元任 1980 一套標調的字母，《方言》第 2 期。
朱曉農 2014 聲調類型大要——對調型的研究，《方言》第 3 期。
朱曉農 2018a《語音答問》，上海：學林出版社。
朱曉農 2018b 演化比較法：如何進行聲調演化的研究？，《語言科學》第 2 期。
朱曉農 2024 聲調的性質和表達，《南方語言學》第 1 期。
朱曉農、石德福、韋名應 2012 魚粱苗語六平調和三域六度標調制，《民族語文》第 4 期。
Chao Y. R.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ître Phonétique* Vol. 45: 24-27.
Chen, M. Y. 2001.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lements G. N., Michaud A. & Patin C. 2011. “Do we need tone feature?”. In Goldsmith, J. A., Elizabeth Hume, Leo Wetzels, De Gruyter Mouton (eds.), *Tones and Features: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Perspective,* 3-2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Hyman, L. 1993. Register tones and tonal geometry. In Harry van der Hulst & Keith Snider (eds.), *The Phonology of Ton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al Registe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eyes, B. 2009. *Introductory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Wang, W.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2): 93-105.
Woo, N. 1969. *Prosody and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MIT; 1972. *Prosody and Phon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Yang, C. and Xu, Y. 2019. Crosslinguistic trends in tone change: A review of tone change stud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Diachronica* 36(3): 417-459.
Yi L., Li H., Li Y. & Mu J. J. 2024. An ongoing tonal pattern change: Lanzho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2): 336-361.
Yip, M. 1989. Contour tones. *Phonology*. Vol. 6.1.
Yip, M. 2002. *To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u, X. N. & Yi L. 2012. Double circumflex and back dipping: Report on two newly confirmed contour types in Chine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1(1): 81-106.
Zhu, X. N., Yi L., Zhang T. & Nguyễn, Đ. H. 2019 Dipping tones in multi-register and four-level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7(2): 321-344.

衣莉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　daisy-yili@163.com

Tonal Description: Numerical or Featural Representation

YI Li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ree dialects to illustrate the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numerical and feature-based representations in tone description. It argues that the two approaches are not mutually substitutable in dialect description: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excels at capturing details in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whereas featural representation proves superior for deducing the generative rules of tone phonology and those governing their evolution. The conclusion maintains that an adequate tone documentation must integrate both perspectives.

Keywords: featural representation;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tone phonology; tonal evolution

隱喻作為人類的本能：19 世紀德國學者隱喻理論書證 *

李葆嘉

提　要：隱喻表達及認知研究源遠流長。本文為 19 世紀德國學者的隱喻理論提供書證。語義學的創立者萊斯格（1825）提出隱喻等是語義變化途徑。波特（1853）研究來自生命及身體活動的隱喻。海澤（1856）提出隱喻是創造語言之想像力的自然表達，討論了聲音隱喻、概念隱喻和概念系統。蓋爾巴（1871）主張語言源於藝術本能，提喻是基於空間意象的一度隱喻，隱喻是基於想像意象的二度隱喻。尼采（1873）認為隱喻是人類的基礎本能，原始隱喻結構預設了人類認知方式，基於隱喻才有概念的再建構。布林克曼（1878）闡述隱喻研究的雙向方法論，嘗試建構天然隱喻系統或隱喻意義網絡。比澤（1893）全面探討兒童、語言、神話、宗教、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詩歌和哲學中的隱喻。當代隱喻認知理論皆見於 19 世紀的德法英美文獻。

關鍵詞：隱喻；語義轉向；概念隱喻；隱喻本能；隱喻哲學

一、引論

“隱喻”（希臘語 μεταφορά，拉丁語 metaphora，法語 métaphore，德語 Metaphor）是個古老的話題。狹義的“隱喻”僅指隱喻，廣義的“隱喻”包括隱喻、提喻、轉喻、人格化等。最初的隱喻分析包含在比喻研究中，最初的比喻研究包含在修辭或言辭技藝（ῥητορική）中。

公元前 467 年，地中海西西里島（Sicily）的錫拉丘茲城邦（Syracuse）發生了一場變革——推翻寡頭統治並確立民主制度，由此引發新的社會需求。當地學者考拉克斯（Corax）立即研究和傳授“言辭技藝”，就人們在議會和法庭上怎樣發言概括出一些知識——為古希臘開啟了言辭分析之門。此後，智者派的代表人物高爾吉亞（Gorgias，約公元前 485—前 380）認為，修辭是話語的技藝；修辭的真正偉大之處在於賦予個人自身的自由以及影響他人的力量。（Plato, 380BC/1892: 367, 371, 372）但蘇格拉底（Socrates，前 470—前 399）、柏拉圖（Plato，前 427—前 347）基於真相認識論的立場，將智者派的修辭視為花言巧語的技巧、

* 基金項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 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課題“俄羅斯語言學史專題研究”（22JJD740022）。

操縱他人的工具，批評言辭技藝關注的並非事實真相。（Plato, 380BC/1892: 373）實際上，他們壓制的恰恰是意義和真相之間的關係。與之不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在《詩學》（前 350）和《修辭學》（前 335）中提出隱喻基於屬種關係的相似性，並把隱喻和哲學反思聯繫起來。“隱喻必須從與原初事物相關但並不明顯的事物中提取——就像在哲學中一樣，即使在相距遙遠的事物之間，敏銳的智慧也會覺察到其相似之處。”（Aristotle, 335 BC/1924: 110）

古羅馬演說家關注的是言辭應用術。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在《雄辯術》（*De Oratore*）（公元前 55）中提出，語言母體缺乏能產和容量狹窄，促使隱喻詞流行；隱喻照亮了語言的特性。（Cicero, 55 BC/1860: 155, 163, 170）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ntinlianus, 35-96）對隱喻具有更深刻的見解。他在《雄辯術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96）中提出，修飾措辭的比喻屬於修辭研究對象，幫助理解意義的比喻屬於語義研究內容，涉及思想和句子結構的比喻與思維方式、語言結構有關。隱喻是出自本能的措辭，正是憑藉隱喻，一切事物才在語言中都找到了合適的名稱。（Quintilian, 1922: viii. 6 section 1-5）昆體良的隱喻論述不但涉及修辭學、語義學、詞彙學，而且涉及思維方式、語言結構和概念命名。顯然，用“隱喻修辭學觀”概括古希臘—羅馬的隱喻研究並不周全。

接下來，語言哲學界或會提及 17—18 世紀經驗主義和浪漫主義隱喻觀。（劉大椿，2009；牛宏寶，2013）而語言學界一下子就從古希臘—羅馬跳到 20 世紀 30 年代的英美，並認為理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的研究體現了隱喻研究從修辭學到語義學的轉折。1936 年，英國文學批評家理查茲在《修辭哲學》中提出隱喻無所不在和隱喻互動理論，隱喻的意義產生於語旨和載體的交互作用。1962 年，美國分析哲學家布萊克（Max Black, 1909-1988）在《模式與隱喻：語言與哲學研究》中完善了互動理論。在《隱喻再論》中指出“隱喻話語的運作，是通過將由次項可預測的（predicable）隱含複合體中的一組‘關聯含義’‘投射到’主項上實現的。”（Black, 1993: 28）1975 年，法國闡釋學家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活的隱喻》中，遵循從詞語到句子再到話語的過程系統理解隱喻的含義。從句子層面上升到話語的語義層面，所研究的不再是隱喻的形式（如修辭學）或其含義（如語義學），而是語言之外的“現實”。1979 年，美國分析哲學家塞爾（John R. Searle, 1923-2025）在《隱喻和思想》中從語用角度提出，隱喻的意義屬話語意義，是說話者的意義與句子或詞的意義出現分離的特殊情況。1980 年，美國語言學家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約翰遜（Mark Johnson）出版《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研究隱喻。隱喻不僅是語言表達方式，而且是認知行為過程，試圖探討日常語言背後的隱喻認知，發掘概念系統的構建規律。這些所謂“新理論”，皆見於 19 世紀之前的文獻。19 世紀不僅是比較語言學的鼎盛階段，而且是語義學的勃發時期。（李葆嘉、劉慧，2014）其隱喻研究受到比較語言學、普通語言學、語言哲學、符號學的影響。隱喻研究的語義學轉折，早在理查茲之前 110 年，萊斯格（Reisig, 1825）已經開啟。關於日常表達、概念系統、思維方式、認知行為的隱喻研究，都可溯源至 19 世紀甚至更早時期。[①]

---

① 本專題“基於原著的西方隱喻理論研究”，包括 5 篇：《認識論和應用術：古希臘—羅馬隱喻理論書證》《經驗主義、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17 世紀—19 世紀初隱喻理論書證》《人類的基礎本能：19 世紀德國學者隱喻理論書證》《建立隱喻博物館：19 世紀法國學者隱喻理論書證》《賴以生存的資本：19 世紀英美學者隱喻理論書證》。

澄清已流行誤說，填補學術史空白，與介紹當代學術有別。當代文獻便於查閱，不必大量引用原文（雖然就準確性而言，轉述不如引用；就概括性而言，引用不如轉述），而早期文獻難知難曉，甚至聞所未聞。如要匡正通行說法，務必提供確鑿書證，因此以呈示原著和略加評點的“書證體”為宜。所謂呈示原著，就是根據其作者思路提煉若干要點（作為小標題）並摘引原著論述（因篇幅所限，刊發時刪除德語引文，僅出李葆嘉中文試譯）；所謂略加評點，就是針對直接引述加以提要指點，並不另外舉例說明（給讀者留下思考空間）。除非略有知識積累，並不進一步展開。19 世紀德國學者的隱喻論述：可謂胸懷錦繡，篇篇哲理箴言；堪稱口吐珠璣，句句名言雋語。即使略加評點，也常常令人難以置喙，以致於難免機械複述。用中國傳統方法（考證—歸納—演繹）研治西方學術思想史，與時下流行的“邏輯性、系統性”（昧於古代原著、慣用轉手文獻）的主觀化構想不同，拙文主張“質樸的、歷史的”客觀化條分縷析。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筆者就是在與讀者一起翻閱古書並揣摩其中的“新理論”。拙文僅為概述和路引，讀者如有興趣，可就某些原著做進一步的專題研究。

二、萊斯格 1825：隱喻研究的語義學轉向

作為“語義學”（Semasiologie）的創立者，德國古典學家萊斯格（Christian Karl Reisig, 1792-1829）師從語言古典學（Sprachphilologie）的鼻祖赫爾曼（Gottfried Hermann, 1772-1848）。萊斯格在哈雷大學擔任古典語言學教授期間，意識到詞源學[②]和句法學強調詞類和形式研究，未能深入而系統地解決語義問題。他在 1825 年完成的《拉丁文語言學講稿》（Pub. 1839）中首創“語義學”這門新學科。（Reisig, 1825/1839: 18）

2.1 提喻、轉喻和隱喻屬於語義學理論

在卷二語義學或意義理論（*Semasiologie order Bedeutungslehre*）中，萊斯格提出：

語言中的觀念發展，其基礎是觀念共同體中的思維聯想。……在人類概念中，某些觀念的聯想極為常見，修辭學已用一些表達手段來描述這些聯想，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聯想即提喻（Synekdoche）、轉喻（Metonymie）和隱喻（Metapher）也屬於意義理論。就以審美為目的的所謂修辭手法而言，它們肯定屬於修辭學的一部分，個人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在一種特定的語言中，**這些修辭手法已經發展為人們特有的語言使用慣例，那麼它們就屬於意義理論**。（Reisig, 1825/1839: 286-287）

萊斯格區分了表達手段的修辭與觀念聯想的語言使用慣例，由此提出提喻、轉喻、隱喻屬於語義學理論。

接下來，萊斯格舉例分析了三種比喻的語義變化現象。第一種是提喻引發的語義變化。

部分的意義來自於整體的觀念，反之亦然，即整體的觀念產生於特定部分的意義。這就是修辭中的提喻（從整體到部分，或從部分到整體）。關鍵在於，要注意某些語言是如何選擇這

② 從 16 世紀到 19 世紀下半葉的文法書中，Etymology（漢譯“詞源學”）通常指構詞分析和詞類研究。如：默里（L. Murray, 1745-1826）的《英語文法》（*The English Grammar*, 1795）分為正字法、詞源學、句法學、詩學四卷；布朗（G. Brown, 1791-1857）的《英語文法的文法》（*The Grammar of English Grammars*, 1851）包括正字法、詞源學、句法學、韻律學四卷。

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來表明整體的。（Reisig, 1825/1839: 287）

第二種是轉喻對語義轉移的作用。

轉喻是觀念轉移的特定類別，即表原因的詞可同時用來表某種結果，或者表結果的詞被設定為表原因的含義。第一種方式，當 lingua（舌頭）意味著 Sprache（語言），因為語言是由舌頭的活動產生的。不僅這些特定的轉移屬於轉喻，其他的意義轉移也屬此類，它們對意義的形成有諸多影響。……至於第二種方式，例如，pallere（蒼白的）常用來表結果而不是原因，即表達的是 Furcht（害怕）。（Reisig, 1825/1839: 288）

第三種是隱喻對觀念變化和語義變化形成的諸多影響。

第三種比喻是隱喻，它為觀念變化提供了基礎，西塞羅將其譯為“轉移”（translatio）。隱喻包括兩種：一種是觀念的概念由外在事物的概念來表達，因此是象徵性描繪；另一種是外在事物甚至沒有與之聯繫的詞，而須從另一對象借用另一個詞來表達它。在此情況下，這個詞反而給出了一個新的意象。如果沒有這種形象化名稱，語言將死氣沉沉且形影不定。**然而有了這些形象化名稱，也就給她帶來了快樂而豐富的生機**。（Reisig, 1839: 288-289）

與前詞語轉用引發語義變化不同，隱喻則涉及觀念的變化。隱喻既可以用外在事物的概念表達觀念的概念，還可以給自身沒有詞的觀念命名。正是由於有了隱喻，語言才充滿生機。

2.2 最常用比喻的民族特性

萊斯格的旨趣在於探討某些特定民族語言的運用情況，即從最常用比喻中發現該民族的某些特性。

我們不可能研究所有的比喻，因為這個過程將無窮無盡，也不符合我們的旨趣。在此，我們僅探討那些能夠解釋清楚某些特定民族語言中運用情況的比喻，**並且往往能在最常用的比喻中發現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性**，即某些最受歡迎的觀念。（Reisig, 1825/1839: 289）

最常用的比喻可以映射其民族精神。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關於語言是人類或民族精神的自然表現（Humboldt, 1836）的觀點與之一致。

萊斯格《拉丁文語言學講稿》中提到本哈迪（August Ferdinand Bernhardi, 1769-1820）的《語法學》：“該書內容非常廣泛，關鍵是要表明感歎詞是語言的最初產物。”（Reisig, 1825/1839: 18）本哈迪在《語法學》卷二《應用語法學》（1803）中闡明了提喻體現的是概念的從屬關係，轉喻體現的是概念的繼承關係，隱喻體現的是概念的等同關係。（Bernhardi, 1803: 89-90）據此不但能夠解釋詩意語言的表達，而且能夠解釋日常語言的構造。[③] 萊斯格將比喻引進語義學，可能受此啟發。在萊斯格創立語義學和導入比喻理論之後，眾多學者闡述比喻在詞語轉用和詞義演變中的機制，從而推動了比較語言學、普通語言學、語言哲學、神話學、符號學等領域的廣義隱喻理論方法研究。

---

③ 作為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本哈迪的隱喻論述詳見《經驗主義、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17 世紀—19 世紀初隱喻理論書證》。本哈迪的《語法學》刊於 1803 年，但其思想屬於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初的浪漫主義。

三、波特 1853：來自生命及其身體活動的隱喻

1853 年，德國比較語言学家波特（August F. Pott, 1802-1887）發表專論《來自生命及其身體活動的隱喻》（全文 27 頁）。

3.1 生命及其身體認知的探索

波特圍繞人格化，討論了語言中的生命隱喻現象。

在北美印第安部落特拉華州的語言中，所有名稱都被分為兩個普通等級：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Pott, 1853:104）

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這些例子甚至超越了平常的生命，雖然仍保持著生與死的差別。依然生長的“活樹籬”（拉丁文 viva sepes Colum）與“木圍欄”（死去的、被砍的）截然不同。還有活的樹木，雖被移走還會結出新果實。（Pott, 1853:105）

隱喻的一個特點是，說話者的內心感受和認知對象之間的相互作用才造成感官印象。

然而，就其一般感覺而言，不同的感覺必定重新相遇，可以說，一部分在觀看者自身之內，一部分在外部感覺與內部感覺之間。此外，語言並不總是保持所觀察主題（感官上將其排斥在外）與對該主題有影響對象之間的區別，而是通過模糊不清的由此及彼、由彼及此路線的兩端（即主動的和被動的）造成感官印象。例如，如果天空看起來是灰色的，那麼它就以這種色彩……呈現給觀看者的眼睛，但觀看者並不僅僅這樣看，不是這樣，他真的出自內心感受在看。（Pott, 1853:110）

事物雖然是外在的，但是人們對其形成的感官印象卻受制於內心感受。一方面將有生命的特性轉移到無生命事物上，一方面將不同的感官印象轉換使用。接下來，波特列舉了隱喻的七種來源：（1）來自失明的；（2）來自失聰的；（3）來自失語的；（4）來自物體的感官特質即味覺的；（5）來自活動障礙的；（6）來自攝取食物和飲料的；（7）來自與動物、植物、礦物特性有關的。（Pott, 1853: 110-117）

擬人化在語言中普遍存在。威爾士的山丘等事物，通常以身體部位的隱喻來命名。

我故意不進一步探討這個無休止的主題，而是就此打住，即這種人格化不僅突然意識到相比的整體，而且經常揭出它們（身體部位、四肢等）的奇特性。例如，“威爾士的山丘通常以身體某個部位的隱喻來命名。”……威爾士語：*ael* 是眉毛；稱山頂為 *ael bryn*（山的眉毛）；把裙子或衣服的鑲邊，也稱為 *ael mantel*（外衣的眉毛）。至於用 *ar ael*（眉毛上面）指“靠近”，是因為眉毛挨著眼睛。（Pott, 1853: 121）

通過隱喻方式命名的詞，可以假定二者在語言中的意象相同。

藉助這種隱喻，即詩意（僅由想像力創造的）來識別事物，雖然本質上並不與之相等，然而在語言中可以假定其意象相同，甚至認為這些創造就是真實的。根據種種考慮，它們只是在不同的表達方式中是相同的。憑藉隱喻方式，絕不會總要同時提供新的語音，致使語言無限擴展，而是**要使大多數身體形象也具有內在的豐富精神**。如果謹慎運用這些形象，那麼一詞多義的混亂程度比人們設想的要小得多。（Pott, 1853:102）

隱喻方式避免了語言的無限擴展，但形成一詞多義：本義和隱喻義。波特論述隱喻賦予身體形象具有內在精神，可謂體驗主義或身體認知研究的早期探索。

3.2 人格化隱喻是“自我的借出”

波特撰寫該專論，受到德國浪漫主義大師保羅（Jean Paul, 1763-1825）的啟迪。開篇即引用其名言：

正如保羅恰當表述的那樣，就心智關係而言，每種語言都是“一本褪色隱喻的詞典”（ein wörterbuch erblasseter metaphern）。換而言之，只有情緒高昂時，比如從詩人過時的概念中，我們才能以敏銳的理性識別出隱喻。（Pott, 1853:101）

此名言見於保羅《美學導論》（1804）第 50 節“形象化才智的雙重作用”。

形象化才智既可以使其身體充滿活力，也可以使其心智具體表現。最初，人類仍然聚集在部落裏，與世界一起繁衍興旺，這種雙重性比喻尚未出現。……就像兒童身上發生的情況那樣，隱喻只是身體和心靈受到約束時才形成的同義語。……隱喻就是口語中較早的詞，只是後來不得不逐漸磨滅而變成實際中的這種表達。……但比喻的心靈和自我的借出依舊合為一體，因為自我和世界仍然融合在一起。因此就心智關係而言，**每種語言都是一本褪色隱喻的詞典**。（Paul, 1804: 184）

所謂“自我的借出”，就是人類將其生命投射到周圍事物上。保羅繼續娓娓道來：

正如人類從世界中將自己分離出來，從隱身其中變為明顯可見。雖然世界尚未具體化，但人類智慧必須使之生機勃勃。他把他的自我借給了宇宙，他把他的生命借給了圍繞他的事物。然而他——因為他的自我僅以充滿活力的身體形式出現——除了肢體、眼睛、手臂、雙足之外，尚無其他或更多的精神可以奉獻給外部世界，但其身體形式卻是充滿活力、充滿情感的。**人格化成為蒙昧人創造的最初詩意形象，而隱喻似乎是縮略的人格化**。（Paul, 1804: 184）

人類的智慧使所處空間和周圍事物充滿生機，最初的詩意形象孕育了語言中的隱喻。原始認知的“萬物有靈論”，與起初語言的“人格化隱喻”平行。雖然隱喻的褪色不可避免，但是詩意的創造卻生生不息。

四、海澤 1856：隱喻是創造語言之想像力的自然表達

學界皆知洪堡特的《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1836），而不知當時有一位學者，以謝林—黑格爾哲學為基礎，在該書出版之前就已確立“語言是人類精神的自然表現”。德國語言哲學家海澤（Karl Wilhelm Ludwig Heyse, 1797-1856）早年師從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和索爾格（Wilhelm Ferdinand Solger, 1780-1819）學習古典學和哲學，又到柏林大學師從伯克（Philipp August Böckh, 1785-1867）學習語文學。畢業後進一步師從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和葆樸（Franz Bopp, 1791-1867）。對將哲學導入古典學或語文學的追求，成為海澤科學活動的驅動。沒有任何學科能像語言學那樣對哲學提出重大挑戰，因此海澤很快轉向語言學，並最終完全投身其中。

翻開海澤的《語言科學體系》（1856），我們想起本哈迪的《語言科學原理》（1805）。《原理》導論包括“語言和語言科學”“語言的歷史觀”，《體系》導論是“語言的本質、必然性和起源”；《原理》分為理論和應用，《體系》包括內部發展和外部發展。二者相映成輝。海澤認

為本哈迪的語言學著作是以真正的哲學精神寫成的。此外，海澤引用了萊斯格的《拉丁文語言學講稿》（Heyse, 1856: 268, 278, 450, 451）。《語言科學體系》是海澤去世後，由其忘年交斯坦塔爾（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整理出版的。距今 170 年前，作者就闡述了當今“前沿話題”——聲音隱喻、概念隱喻、空間隱喻（見卷一第一部分第二章“語言觀念的實現”），提出了建構語言概念系統和語言總體圖景的任務（見卷一第二部分中的“關於語言的多樣性”）。

4.1 以聲音直接感知模仿的聲音隱喻

在 §. 37 中，海澤首先討論了最原始的隱喻方式——聲音隱喻。

被人類固定為觀念的大量感知對象，有些根本沒有觸及人類的聽覺，有些沒有以其特有方式觸及人類的聽覺。在此情況下，這些詞不是對聲音直接感知模仿的運用，而是以相同聲音形成隱喻性符號的運用。這些詞不是對聲音的模仿或實際上的**擬聲詞**（Onomatopöie），而是**聲音隱喻**（Lautmetapher）。（Heyse, 1856: 93-94）

語言符號始源於擬聲。一些通過聽覺的感知對象藉助聲音直接感知的模仿形成了擬聲根詞。不能通過聽覺的感知對象，則借用相同的聲音而形成聲音隱喻符號。可以認為，古老擬聲根詞是原生性聲音隱喻（一度隱喻），借用相同聲音形成的是派生性聲音隱喻（二度隱喻）。

除了聽覺，由於各種感官印象的相關性（Verwandtschaft）或相似性（Gleichartigkeit）即類比性，其他感官的感知也可象徵性地用特徵語音來表示。每一外在感官印象，都以一種奇特方式影響著內在知覺或內在感覺。我們必須把所有感覺視為一個整體並圍繞中心點團結一致。它們並不是孤立地活動和運作，而是如同我們全部精力的系統，形成一個共同合作的鮮活有機統一體。所有感覺的統一反映了我們內心的本質，如同智慧意識是精神統一之所在，因此大腦即所謂感官共同體，成為有機體的感官共同體。就此意義上，所有感官知覺一起流動，所有感覺都像一個宗族的各個分支。因此，沒有什麼能比通過面部表情、感覺等接受的感官印象轉化為聽覺模擬更為自然。因此，某種其他感官的感覺通過音響形象來表達，該音響形象通過聽覺，在內部感知中作為通過其他感覺產生的待指定感知產生相同或相似的印象。**我們也習慣於將相同的詞，應用於不同感官的類似印象**。（Heyse, 1856: 94）

各種感官印象之間具有相關性或相似性，聽覺性模仿直接成為語音符號，通過其他感覺接受的印象轉化為聽覺更自然。這就是聲音隱喻發生的必然性。在人類感官的功能中，語音的表達和接受最為便捷。聲音隱喻是生理官能的必然。

通過這種方式，對自然事物的即時感覺性模仿變成了隱喻性象徵符號的模仿。這種遷移是一種自然的無條件反射轉變，然而心智已從自然狀態中獲得更高程度的解放。作為媒介，**想像力在此取代了感官衝動的模仿，變成了為語言塑造精神**（darstellenden sprachbildenden Geistes）**服務的力量**，具體表現為詞中的想像力。這種情況具有教育效能，它將觀念轉化為感性意象，並通過它們的結合體創造新意象。即使我們堅持把感官知覺作為一種內在感知，也必須考慮想像力的有效性。通過將內在意象轉化為與之類似的音響形象，語音從而變得多產並賦予精神想像物的感官形式。一般而言，人類感覺－精神的力量融合了精神與感覺，並不斷努力通過感官化精神和精神感官化消除兩者的對立。（Heyse, 1856: 94-95）

在聲音隱喻中，對自然事物的感覺模仿變成了隱喻模仿。想像力取代了模仿的感官衝動，意象成了為語言塑造精神服務的力量。人類智力融合了精神與感覺，並通過感官化精神和精神

感官化協調兩者。這就是聲音隱喻發生的認知機制。

在言辭創作中，想像作為無意識的自然活動，毫無顧忌地直接發揮作用。天生具有敏銳感覺的自然人，對每種感官印象都是開放的，牢牢地抓住所感知事物的生動特徵，並立即以相應的聲音形式再現這些，他將其記錄為已經獲得觀念的符號。因此，該詞也以這種方式與想像直接發生聯繫。**這種對聲音的象徵性應用，甚至在已成熟語言的各種詞語中都留下的印記，也比對聲音模擬的詞語要更多**。（Heyse, 1856: 95）

抓住所感知事物的生動特徵以相應聲音形式再現，由此形成已獲觀念的符號，這是指直接擬聲詞。但是能夠直接擬聲的對象有限，於是大量使用聲音隱喻詞，由此促使語言日益進步。

4.2 伴隨語言進步的象徵性聯繫遺忘

接著，海澤揭示了隱喻中的象徵性聯繫如何被逐步遺忘。

在造詞的第一階段，創造富有意義的形象；第二階段，通過想像力產生象徵；第三階段，終於通過心智使象徵成為物體的符號。在此，並沒有製作新的符號，而是通過消除自然語境來記住這個象徵，以此方式使其成為符號。但是第三階段是隨著第三時期語言的完善而進入的，在該時期，智力成為主導性精神力量。從這一角度來看，原始詞的創造或構成就此停止了，而這絕不可能是反思性思維的工作。這種詞的最初產生，必然以該詞與想像物的感官性或象徵性聯繫為前提。**但是一旦這個觀念被該詞固定下來，這種聯繫就會遺忘**（vergessen）**而顯得無關緊要**，因此該詞僅為這個觀念或概念的符號。這種轉變可能不利於詩歌。然而，如果我們認為語言的最根本目的是表達思考精神，那麼這個詞起源所受惠的自然元素逐漸清空就不應視為損失，而是語言進步的必然。（Heyse, 1856: 95-96）

海澤提出造詞的三階段：創造富有意義的形象→通過想像力產生象徵→通過心智使象徵成為符號。此後半個世紀，英國符號學家韋爾比夫人（Victoria Welby, 1837-1912）提出符號與實在的關係：圖像（image，寫實性）→圖形（figure，示意性）→隱喻（詞語性）。（Welby, 1893: 511）與她保持通信的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Charles Peirce, 1839-1914），1903 年將所謂次圖示（hypoicon）劃分為圖像、圖形（diagram）和隱喻。（Peirce, 1932: 222）

詞的最初產生以該詞與想像物的感官性或象徵性聯繫為前提，但是其觀念被該詞固定以後，這種聯繫就會逐步遺忘，從而該詞只是這個觀念的符號。“詞源的遺忘”反映了語言的進步。海澤的這一觀點，成為 19 世紀中後期的熱門話題。斯坦塔爾在《語言結構主要類型的特徵》（1860）中提出，語音和詞語的源頭都可能遺忘，從而使音義關係變得具有隨意性。人類初始表達的起因發自激情或直覺，初始義來自天然反應的擬聲根詞。在語言進化過程中，原始情境中的音義情感聯繫漸漸鬆弛。在表達新的精神內容的變革中，語言變得越來越具有隨意性。（Steinthal, 1860: 82-83）語言發展經歷了擬聲、詞源和隨意組合三階段。在第三階段失去根詞在第二階段仍保存的詞源知識。（Steinthal, 1860: 428）法國布雷阿爾（Michel Bréal, 1832-1915）在《海格力斯和凱克斯：比較神話學研究》（1863）中強調，語言演變及其研究的必要條件，就是基於承認詞源遺忘。達梅斯泰特爾（Arsène Darmesteter, 1846-1888）在《就其意義的詞語生命研究》（1887）中也提及，隱喻和轉喻引發詞語新義的產生，其運行條件就是詞源遺忘。

1875 年，美國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在《語言的生命與成長》中

提出，人類語言傳承下來的每個詞都是具有任意性（arbitrary）和慣例性（conventional）的符號。（Whitney, 1875: 19）此“任意性”是詞源遺忘的另一表述，但他仍然重視詞源研究。瑞士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起初用輝特尼的慣例性解釋符號屬性，後來覺得無論聲音還是意義，在結合成符號前都捉摸不定，因此將語言符號的屬性歸結為“任意性”（arbitraire），但又以“相對任意性”的名義納入慣例性。（Saussure, 1916: 100）詞源遺忘說認為詞語起初是隱喻的或象徵的，只是這種聯繫後來遺忘了，而符號任意性則認為能指和所指的結合不存在自然聯繫，否認語言符號的隱喻性，從而陷入了符號形成的神秘主義。（李葆嘉，2022）

4.3 從感官意義到精神意義的概念隱喻

其次，海澤在 §. 38 中討論了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最常見的隱喻方式——概念隱喻。

詞語發展過程中的另一重要時刻是詞語本身在意義上的隱喻應用——**概念隱喻**（Begriffs-Metapher）。想像力在語言領域，尤其是在其發展進程中，發揮著無處不在的重要作用。它將詞語從最初的感官原始意義（sinnlichen Urbedeutung）引導至更抽象的精神意義（geistigen, abstracteren hinüber）。（Heyse, 1856: 96）

與聲音隱喻不同，概念隱喻是詞語在概念的隱喻，將具體感官意義引導至抽象精神意義。

原始詞的創造是生動的自然視角的操作。它們是感官感知的對象，人類首先將其固定為觀念並以詞語呈現，當時尚無能力提出純粹的精神概念。因此，所有原始詞（根詞）必然具有原初的感官意義。所有精神觀念詞，其原意我們可從詞源上追溯，揭出它們都基於感官意義。立足於人們造詞的精神生活立場，其時還不能完全抽象地把握純粹的精神概念，因此也就產生不了此類詞。但從更高角度來看，當“拋棄胎兒”即廢棄原初感官意義的能力達到完全自由時，表達精神觀念的詞也就超越了最初詞語生產的時代。（Heyse, 1856: 96-97）

此外，非感官觀念並不是立即構思出來的純粹精神，在其顯現的當時而是以感官形式象徵性地視為精神。人們最初據其感性外表或表達方式，或以感官的反像來構思精神。觀念、智力、活動和品質這些表達，首先都是視為感官元素。因此一個民族在其年輕的發展時期，就有了自然符號、神話和體現民族性的詩歌。精神的形成直接體現在感性外表上。這種由想像力主導心智的角度必須以語言表達，其程度甚至高於精神生活的最早表達形式。（Heyse, 1856: 97）

所有原始根詞必然具有原初感官意義，也就意味著所有精神觀念詞，都可從詞源上追溯至感官意義。表達精神觀念、智力、活動和品質的抽象詞，都來自感官意義的具體詞。

4.4 整個語言徹頭徹尾都是比喻的

揭出聲音隱喻和概念隱喻的奧秘之後，海澤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結論：

因此，人類使用的詞語實際上包含了感性觀念，人類有能力用自然隱喻（natürlichen Metapher）表達純粹精神類型的觀念，其時尚未在其完美抽象中認識，而是以感官形象看待這些觀念。**整個語言徹頭徹尾都是比喻的**（Die ganze Sprache ist durch und durch bildlich），我們在意識不到這些感官形象的情況下在大聲說話。（Heyse, 1856: 97）

我們只能重複——整個語言徹頭徹尾都是比喻的。

實際上，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仍然可將一個詞的感官含義區分為實在含義（eigentliche）

和非實在含義（uneigentlichen）即精神含義，並且兩者長期共存。

例如，fassen（從“握住”到“理解”——譯註）、vorstellen（從“放到前面”到“介紹”，再到“想像”——譯註）、Einsicht（從“看到裏面”到“理解”，再到“洞察力”——譯註）、Herz（從“心臟”到“內心”，再到“心情”——譯註）、Kopf（從“頭”到“才智”，再到“思想”——譯註）等。然而在許多詞中，原始感官含義已經磨滅，並從實存語言中完全消失。（Heyse, 1856: 97）

非感官意義概念（unsinnlichen Begriffe）的定名方式有兩種：

（1）非感官意義概念由其表達或顯示自己的感官形式來定名。如：德語 Seele（從“氣息”到“靈魂、精神”——譯註），希臘語 *φνχή*（從“痰、吐痰”到“克制、鎮定”——譯註），erschrecken（從“受驚嚇”到“恐懼”——譯註）, *λόγος*（從“起始”到“原因、推理”——譯註）……。（2）非感官意義概念用感性的類似物（反像）來表達。如：德語 vorstellen（從“把……放在前面、把……領到……面前”到“介紹、表演、使看到、使考慮”，再到“表象、想像”——譯註），begreifen（從“看見”到“理解、認為”——譯註）；希臘語 *κρίνειν*（從“分割”到“分析、評價”——譯註），perpendere（從“垂直線”到“垂直的”）和 franz（從“直的”到“性格直率”——譯註）。（Heyse, 1856: 98）

想像對詞語的形成和運用產生強大影響，不僅表現在從感性層面到精神層面的轉變中，而且表現在感官對象的領域中，使毫無生機的事物充滿活力。這就是無生命事物分為陰性、陽性的基礎。進一步的例子還有，人體或動物身體部位的名稱適用於無生命事物。

如：德語椅子的名稱來自“腿”；山腳的名稱來自“腳”，而山脊的名稱來自“背脊”；鋸子和梳子的名稱來自“牙齒”；容器的名稱來自“喉嚨、肚子”…… 等等。類似的是，以動物及其身體部位來命名植物。如：Fuchsschwanz（狐尾草）來自希臘語的 ἀλοπέκονρος（狐狸的尾巴）、Bockshorn（胡蘆巴）來自希臘語的 αίγόκερας（山羊的角）, Mäuseohr（鼠耳菊）來自希臘語的 μνοσωτίς（老鼠的耳朵）等。（Heyse, 1856: 98-99）

感官活動和感覺印象的意義轉移特別頻繁，從一種感覺到另一種感覺，或到內在知覺和一般的精神印象。

例如，將視覺的失明用於聽覺：……遲鈍的耳朵，盲目的服從、熱情、信仰，拉丁語的 caeca mens（盲人）、cupido（聾子）。【聽覺用於肢體感覺——引註】失聰的反應遲鈍，沒有感覺，如：一條腿聾了（失去知覺）。【味覺用於聽覺印象——引註】如：甜美的音色，甜美的言語；【味覺用於內在印象——引註】如：苦澀的寒冷，苦澀的貧窮；心酸的汗水；痛苦的經歷。【視覺用於內在印象——引註】如：內心感覺的黑暗、模糊、昏暗等。Schmecken（從“品嚐食品”到“玩味、鑒賞”）意味著感受古老而高雅的藝術品，將味覺轉化為審美感受。主觀感覺活動的表達，往往被動轉移到其他感知對象上。如“失明的”（blind），意指看不見的（乘客）、不透明的（玻璃、窗戶），還有盲腸（Blinddarm）意指沒有鼓起的腸子。盲管（blinde Röhre）即只有一頭開口的管子，所以人們不能看透。（Heyse, 1856: 99-100）

作者列舉了五種：視覺用於聽覺印象，聽覺用於肢體感覺，味覺用於聽覺印象，味覺用於內在印象，視覺用於內在印象。此後，蓋爾巴（1871）討論基於身體狀態和活動傳染的隱喻，顯示了感官知覺的交換。（Gerber, 1871/1885: 350）布雷亞阿（1897）討論不同感官溝通的隱喻，或把視覺感受傳遞到聽覺領域，或把觸覺觀念傳遞到味覺領域。人們還把描述人類特性的

形容詞轉移到無生命物體上。（Bréal, 1897: 135-147）這些也就是所謂的“通感”。

海澤提出，隱喻的形成並非出於深思熟慮，而是基於原始觀念的本質。作為創造語言的想像力的自然表達，詩人的隱喻也是如此。

不能認為這些隱喻是可理解的意圖和精心設計的產品，它們是建立在原始概念自身的本質上，作為創造語言之想像力的自然表達。即使如今，真正詩人的隱喻表達也不可以理解為精心構思的產物，而是他對自然天成語言的幻想。（Heyse, 1856: 100）

海澤進一步闡述，隨著語言的發展，人們除了必須放棄語音的象徵意義，還必須放棄非感官概念的最初感官含義。

對於語言的完善而言，在試圖表示非感官概念的詞語中放棄最初的感官含義，其必要性並不亞於放棄語音的象徵意義。唯有如此，它才能變為思考之心智的便捷表現方式。有些語言還沒有完全滲進這種精神層面。在此，大眾意識和語言的視角仍是詩情畫意的觀景台。例如，在阿拉伯語中，詞語從未完全失去最初的感官含義。阿拉伯語顯著的詩意元素和豐富形象就在其中。**如果我們也意識到每個詞的原始含義，就會發現我們的整個語言都是比喻的**（ganze Sprache nicht minder bildlich）。但是，我們通過更成熟的抽象化將自己與這種感官元素分離開來。（Heyse, 1856: 100）

為了完善語言必須忍痛割愛。雖然就每個詞的原始含義而言，整個語言都是比喻的，但是人們已經通過抽象化將這些感官元素逐漸分離出去，也就是“詞源遺忘機制”。

4.5 從具體感知到抽象概念的隱喻路徑

海澤進一步舉例闡述，在概念隱喻中，具體感知詞到抽象概念詞的發展過程。

與空間有關的或外部空間條件，比時間條件先進入人類意識，因此此類形式詞（Formwörter）是最原始的。此處聲音仍是真實的動作示意，指向形成感官感知的實際關係。時間形式詞以及純粹的精神、邏輯（尤其因果）關係的形式詞，都是從地點形式詞通過隱喻化的應用發展而來。因此，也就像物質辭彙領域一樣，語言藉助隱喻以深化和精神化最初的感性概念。參閱：地點、時間和因果的意義，da、daher、dann（本義 = von da“從那裏”，以當時 denn 的形式為證）；weil（“因為”，本義 = während“在……期間”；同時被認為相互證明）。（Heyse, 1856: 102）

作者說明，時間詞以及精神、邏輯關係的詞都是從地點詞通過隱喻發展而來，也就是當今認知語言學所謂的空間隱喻。

由於人們現在對感官對象的感知保持一致，而描述它們的詞，其各種特徵定義已從人們意識中消失，所以這些詞的差異僅留下明顯的聲音形式。另一方面，在通過隱喻發展的非感官觀念和精神概念的詞語中，這種差異是長久的，永遠不會受損。這些術語的詞只能且永遠不會變得完全一致，因為它們不是基於一種匹配的感官實像。（Heyse, 1856: 161）

然而如果一開始，原來的詞根和直接從該詞根孳生的簡單詞已經不完全一致，那麼在進一步成長的語言中，無論在通過隱喻發展的精神概念方面，還是在詞源和句子結構以及最終的外表構思方面，彼此都不得不越來越疏遠。（Heyse, 1856: 165）

描述感官對象的詞，其各種特徵定義逐漸消失。通過隱喻化而來的精神概念詞與其感官觀念的差異卻長期存在，雖然隱喻化的精神概念和最初根詞的特徵在語言發展中越來越疏遠。

與詞形一樣，詞義也必須根據其起源來追溯發展過程。特別是，這種追溯能表明同一詞形中的意義，如何從具體的感官感知，沿著隱喻路徑走進抽象的精神概念。而在派生詞和合成詞中，這個概念又是如何被越來越多地加以界定和限制。（Heyse, 1856: 389）

根據詞源追溯，可以發現同一詞形中的意義，如何從具體的感官感知沿著隱喻的路徑用於抽象的精神概念。

然而，在單詞意義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同時注意不同單詞的同義關係。這些關係，部分與詞源有關，部分也由語言的使用決定，但絕不是偶然的。有教養的語言不能容忍詞語亂用，知道如何憑藉外部環境創造的語言，做到更精當的概念選擇和更細緻的表達。（Heyse, 1856: 390）

無論同源分化，還是用法使然，不同單詞的同義關係都並非偶然。同義詞的存在是為了更精當的概念選擇和更細緻的表達。

4.6 語言概念系統和語言總體圖景

基於以上論述，海澤提出語言研究的目標或任務。

從哲學角度來看，語言比較分析的最高任務是語言特徵分析，根據語言的內在特徵和本質特徵對語言進行分類，從中形成**語言概念系統**（begriffmässiges Sprachen-System）。在這個系統中，作為語言思想實現的特定階段和形式，每種語言都將獲得其特定位置。於是這個系統將提供完整的、忠實的**人類語言總體圖景**（Bild der Menschensprache überhaupt）。因此，如果人類精神在語言中得以表現，那麼語言也將提供人類精神的總體畫面。（Heyse, 1856: 231）

然而，要有完整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極其困難，目前尚無可能，因為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語言以判斷其特殊性。即使在經過充分研究的已知語言中，一個詳盡的特徵“要深入其本質及其與民族精神個性的內在聯繫”，也涉及很大難度。最重要的是，我們首先要充分瞭解該任務的內容和範圍。（Heyse, 1856: 231）

雖然當時的條件還不具備，但是作者已經認識到，語言概念系統的研究任務在於提供語言的總體圖景，已經預見到 20 世紀的語義場和語言世界圖景研究。綜上引述，海澤的隱喻研究相當深入而豐富，當代隱喻研究的若干觀點可與之對照。

五、蓋爾巴 1871：隱喻照亮了語言的灰色之海

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蓋爾巴（Gustav Eduard Gerber, 1820-1901）主張，語言源於人類的藝術本能，知識不僅是人類智力的產物，也是人類感覺的產物，從而使我們能夠通過語言思維塑造精神世界，從而形成我們的世界觀念。他先後出版《語言即藝術》（第一冊，第一版 1871, 第二版 1885）、《語言即藝術》（第二冊，1885）、《語言與知識》（*Die Sprache und das Erkennen*, 1884）、《作為我們世界觀念基礎的自我》（*Das Ich als Grundlage unserer Weltanschauung*, 1893）。在《語言即藝術》第一冊卷一第八章“基於其靈感和改變，詞來自比喻”（Gerber, 1871/1885: 308-363）中，蓋爾巴基於前人研究彰顯隱喻的性質，並進一步舉例闡述其作用。

5.1 對前人認知隱喻觀的闡述

蓋爾巴詳細梳理了前人的比喻及隱喻學說。1846 年，哲學家、音樂學家卡勒特（August Kahlert, 1807-1864）出版《美學體系》（*System der Aesthetik*. Leipzig: Breitkopf u. Härtel）。蓋爾巴引用其中關於“想像是理性的形象化表達”的觀點。

卡勒特（1846: 255）：“正如我們所知，詩意的想像確實是一種意象，但比隱喻和明喻更高級。隱喻與想像力有聯繫，明喻與想像力也有聯繫，想像力受制於其描述概念的約束。想像是觀念的外在形式，想像是理性的形象化表達。”（Gerber, 1871/1885: 89）

蓋爾巴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論證隱喻基於不同領域內的等比關係。

因此，當心智將自我從事物中分離出來並與之聯繫時，原詞本身即這種感性事物被更深層次的領悟意識所抓住，並在其意義的精神化中反映出心靈所接觸相關事物的改變。這種改變基於心靈中接踵而來的類比。意識的過程似乎對應於物質世界的意象，因此人們採用第一個意象來表達第二個意象。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正如我們稍後將要考慮的那樣，堅持將這種類比視為等比關係——不同領域之內的平行關係。（Gerber, 1871/1885: 226）

蓋爾巴還引用了海澤的“概念隱喻”、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 1823-1900）的“根本隱喻”。

毫無疑問，隨著意義的變化——海澤將這座新建築描述為“概念隱喻”（System der Sprachw, p. 96），馬克斯·繆勒則稱之為“根本隱喻”（Vorlese.üb.d.Wiss. d. Spr. II, p. 334）——感性和精神之間的這種反差並沒有進入意識。隨著抽象思維在語音中的逐漸發展，這些語音也逐漸獲得了不同的意義。指向感性事物的語音形象，也適用於非感性事物的語音。（Gerber, 1871/1885: 226）

“根本隱喻”（radikale Metapher）見於馬克斯·繆勒的《語言科學講座》第二系列“第八章·隱喻”，蓋爾巴引用的是德文版（1863）。

1869 年，德國古典語文學家亨利·特里奇·繆勒（Heinrich Dietrich Müller, 1819-1893）刊行《希臘部落的神話》（*Mythologie der griechischen Stämm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 Ruprecht's Verlag）。蓋爾巴引用了其關於不同類型的比喻存在類似之處的觀點。

亨利·特里奇·繆勒（T. II, p. 12）說，將語言的起源與神話的形成進行比較，可以證明隱喻、轉喻、提喻、擬人化和神話符號等不同類型的比喻之間存在類似之處。（Gerber, 1871/1885: 229）

這些“不同類型的比喻”，也就相當於現在通常認為的“廣義隱喻”。

1784 年至 1791 年，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刊行《人類歷史哲學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Leipzig: J. F. Hartknoch）。蓋爾巴闡述了赫爾德關於語言介於“僅為推想”和“純粹感知”之間的觀點。

在人類的精神訴求和我們認識到的純粹感性作品之間，作為藝術的語言處於中間位置。赫爾德正確地說過，語言介於“僅僅推想”（blosser Spekulation）和“純粹感知”（reiner Anschauung）之間，通過語言，“造物主引導我們走上一條可靠的中間道路”。語言包圍了我們的感知界限，因此必須向下確定，因為藝術僅始於自由自在的感知；然後向上確定，因為藝術終止於抽象思維。一方面，只有等到感官意識從黑暗的感覺上升到稍微光明的感覺才能識別事

物，那時語言才能登場。另一方面，當純粹的精神意識與感官意識對峙時，語言才不再湧現。由此形成語言的劃界，一邊是感歎，另一邊是隱喻。（Gerber, 1871/1885: 256）

語言限定了我們的感知。語言內部一分為二：一邊是源於感官意識的感歎表達，另一邊是昇華為精神意識的隱喻表達。在此基礎上，蓋爾巴提出所有的詞從一開始就是比喻。（Gerber, 1871/1885: VIII）

實際中的詞，就是那些已經進入常用語的圖喻（bildlichen）。（Gerber, 1871/1885: 331）

比喻被認為是一種表達藝術，卻忽視了比喻構成詞的本質。我們意義上的比喻，屬於語言即藝術的思考範圍……它們源於有意識的藝術創造。（Gerber, 1871/1885: 332-333）

5.2 隱喻是重新解釋舊詞

《語言即藝術》中還多次提及萊斯格創立語義學。根據蓋爾巴的劃分，第一類比喻是先於隱喻的提喻，第二類比喻是隱喻。

如上所述，我們提及，比喻為語言中的無感官意識事物指定名稱。如果從源頭來說，提喻是將感官世界的意象賦予語言中的詞，那麼隱喻也就是通過這些詞而將意象賦予精神世界。**隱喻並非重新創造詞，而是重新解釋它們**。它以詞語的存在和作用為前提，它不是指稱與空間有關的意象，而是指稱與想像有關的意象。（Gerber, 1871/1885: 341）

蓋爾巴提出，提喻表達的是與感官世界即與空間有關的意象，而隱喻表達的是與精神世界即與想像有關的意象。也就是說，提喻建立在感官感知的基礎上，隱喻是在感官意識不到的領域結網。當隱喻在感官意識不到的事物中引進感官感知的相似物並以此指稱它時，這是冒著直覺或想像的風險。（Gerber, 1871/1885: 355）概而言之，提喻是基於空間意象的一度隱喻，隱喻是基於精神意象的二度隱喻。

5.3 基於感官知覺傳染的隱喻

海澤研究了“通感”造成的隱喻，蓋爾巴稱之為“傳染”（Übertragungen）。

為了說明這些傳染的涉及之廣，我們接著舉些例子，從中可以看到基於通過身體狀態和活動的傳染所形成的隱喻。

如上所述，我們已經談到傳染顯示了感官知覺的轉換。當然感官獲得的印象也會轉移到精神領域，如 candidus weiss（白色的坦率），“白色”意味著“誠實的”“明亮的”“光亮的”，進一步則意味著“顯著的”。而 angustia Enge（狹窄的痛苦），“狹窄”則意味著“恐懼的”“困窘的”。……視覺可轉變為具有洞察力的，……如德語的 sehen（看）、einsehen（明白）、bemerken（注意）。……我們也說：taube Nuss（啞堅果），taube Nessel（啞蕁麻）……而 bittere Armut（苦澀的貧困，即極度貧困）則包含味道。……以及我們所言：sauer sehen（酸酸的看），含義“夢想”。我們還說：Geistesleben（精神生活）、lebendige Hecke（活籬笆）、tote Kohlen（死煤）、tote Strasse（死路）。（Gerber, 1871/1885: 350）

這種“通感”造成的隱喻，廣泛存在於各種語言之中。

5.4 人稱、性別範疇通過隱喻發展而來

波特（1853）曾提及印第安語將所有名稱分為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蓋爾巴討論了名詞的

性別範疇是通過隱喻發展起來。

隱喻在表示人稱、性別範疇方面也很有效。當然，自然的性別差異有此需要，如：Mann（男人）與 Frau（女人）；Stier（公牛）與 Kuh（母牛）；Hengst（公馬）與 Stute（母馬）是通過單詞來區分名稱的。但是，語法上的性別範疇只是通過隱喻發展起來的，它本身就顯得是語言的奢侈。……然而，個體名詞仍然顯示出性別隱喻，在大多語言中太陽是陽性，月亮是陰性。而與船舶有關的名詞，英國人通常會溫柔地小題大作地視為陰性，如：ship（大船）、boat（小船）等。（Gerber, 1871/1885: 352-353）

其實，不僅是性別範疇（擬人化），別的語法範疇也是通過其他隱喻方式發展起來的。

5.5 隱喻照亮了語言的灰色之海

最終，蓋爾巴盛讚隱喻的創造者通過革新發展和塑造了語言。

當然，**掌握語言藝術的天才永垂不朽**。他抓住了當時的火苗，常常在創作的沉思中**用轉瞬即逝的靈光隱喻照亮了語言的灰色之海**（Blitz einer aufleuchtenden Metapher das graue Sprachmeer）。通過如此革新，他進一步發展了語言，只有這些新資訊才被視為藝術品。而在富有教養的語言中進行這種意義轉移的那些人們，大致上都明確意識到此點，因為**他們感受到自己正在塑造語言**。（Gerber, 1871/1885: 359）

隱喻是語言藝術的天才創造。隱喻的光芒照亮了灰暗模糊的語言之海。隱喻發明者感受到自己正在塑造語言。

六、尼采 1873：隱喻本能與概念建構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雖以哲學家蜚聲於世，**但他首先或本質上是一位古典語文學家**。就學緣而言，尼采是萊斯格的再傳弟子。萊斯格在哈雷執教期間培養了幾位傑出的學生。其中一位，利奇爾（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 1806-1876）1826 年從萊比錫投奔於萊斯格門下。1829 年起任教哈雷、布雷斯勞、波恩和萊比錫，培養了 19 世紀下半葉一大批最重要的德國學者。尼采 1864 年到波恩學習神學，受利奇爾影響專攻古典語文學。利奇爾 1865 年 4 月前往萊比錫執教，尼采 10 月轉學萊比錫。1869 年尼采獲免試授予博士學位，利奇爾推薦他到瑞士巴塞爾大學任教。信中寫道：執教 39 年來，我目睹許多優秀青年的成長，但尚未見到像尼采這樣年輕又如此成熟聰穎的青年。可以預期，他將成為德國古典語文學的最傑出人才。1870 年 3 月，尼采被任命為巴塞爾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在就職演講《荷馬與古典語文學》中提出：語文學不是一門單純的科學，而是與藝術緊密交織（比較蓋爾巴的語言源於藝術本能）。所有語言活動都孕育某種哲學世界觀並由之包含，排除個體或彼此分離的細節，得到的就是語言總體即一致性（比較本哈迪的語言整體性）。

1872—1873 年冬學期，尼采講授古希臘—羅馬修辭學。尼采認為，修辭的秘密在於藝術和信念之間的張力。語言本身全為言辭技藝的產物，表達的僅是意見而非知識。在此期間撰寫了《論非信念意義上的真相與謊言》（*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ßermoralischen Sinn*, 1873）。其 *außermoralischen Sinn*（非信念意義），即人們出於傳統信仰或執念所信奉的意義。

1896 年，其妹伊莉莎白（Elisabeth Förster Nietzsche, 1846-1935）刊行該文（本文引用 2018 年版本）。作為尼采唯一的一篇關於語言哲學的文章，第一部分基於對語言的批判思考提出對知識的批判，第二部分討論藝術與科學的關係。該文在 20 世紀被視為語言哲學和美學思想的批判範式，一些學者認為是尼采思想的基石。我們主要從語言學立場或隱喻理論角度審視該文。儘管尼采的行文充滿隱喻和譏刺或所謂哲學思辨，在柏拉圖看來就是“操縱他人的工具”，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則是“隱喻的濫用”，但是我們仍然可從文中剝離出其隱喻理論。該文論述，固然反映尼采在波恩和萊比錫所受古典語文學教育的影響，但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不時可見 19 世紀語言學關於隱喻研究的論點。尼采無疑暗引了前人或時人的若干見解，只是哲學界對此不熟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和斯汀蓋林（Martin Stingelin）的《尼采修辭學講義和〈論非信念意義上的真相與謊言〉與古斯塔夫 · 蓋爾巴〈語言即藝術〉（1871）原文、例證和引文的一致性》（1988）。還可參閱科珀施密特（Josef Kopperschmidt）的《對尼采修辭哲學不純理性批判》（1999），“將蓋爾巴 1871 年的專著與尼采 1872/1873 年的修辭學講義進行比較，很明顯，尼采不僅受惠於蓋爾巴，而且利用了蓋爾巴和他人的論述，以至於其講義可以解讀為‘拼貼’”。（Kopperschmidt,1999: 199）其實，不僅《修辭學講義》（*Nietzsches Rhetorik-Vorlesung*）受到蓋爾巴的影響，而且《論非信念意義上的真相與謊言》即尼采講授修辭學之餘的反思。換而言之，尼采濃縮了此前語言學家的隱喻理論，並從其角度極而言之。總體而言，尼采認為，隱喻在思維和語言中普遍存在，事物與人的關係就是通過隱喻建立起來的。在隱喻的基礎上才有了概念建構。從隱喻中昇華出來的概念形成人類的新世界，同時也就成為限制人類認知的堡壘。

6.1 尼采隱喻觀的宇宙視角

作者彷彿天外來客，該文開篇就將讀者投進浩瀚的宇宙，頃刻使你陷入虛空的失重。

在宇宙某個遙遠的角落，在無數太陽系的閃閃發光中曾有一顆星球，**要小聰明的動物在上面發明了識別**（Erkennen）。這是“地球發展進程”中最狂傲和極荒謬的一分鐘——但僅僅一分鐘。在大自然幾次呼吸後，該星球就要冰凍了，要小聰明的動物只能死去。因此可以編造如此寓言，但卻沒有充分表明人類理智在自然界中顯得極其可憐、甚為黯然和轉瞬即逝，多麼毫無價值和任意武斷。他並非永恒存在，當這些再次結束時，一切都無影無蹤。因為這種智力沒有超出人類生命的其他負載。但它是人類的智力，只有人類的所有者和創造者才會如此憐憫，彷彿看到世間的魚類都在漩渦中墜落一樣。但如我們能與蚊子交流，那麼會聽到它們也帶著這種憐憫在空中遊弋，並感覺自己是世界的飛行中心。實際上，沒有什麼動物應受如此譴責和藐視，**人類不應像軟水管被知識力地小小觸碰就立即膨脹開來**。正如每個負有使命者都想擁有其崇拜者一樣，即使最值得自豪者，比如哲學家也會相信，知道宇宙之眼（Augen des Weltalls）從各個角度像望遠鏡似地直視其行為和思想。（Nietzsche, 1873/2018: 9）

此段開頭語，句句是隱喻。作者採用宇宙之眼，諷刺和悲憫人類理智如何微不足道。地心說中的人類是自大的，而日心說、宇宙中心說中的人類是渺小的。自 17 世紀證明日心說之後，西方一些學者已在論著中採用地球外視角審視人類。而如今宇航員首次從太空看著蔚藍的小球，會立即產生震撼和恐懼。宇宙的無盡黑暗和冷漠，顛覆了人類在地球上的認知。

6.2 兩度隱喻化命名與認識論

基於宇宙視角的隱喻觀，“天外來客”分析人類這種動物如何“耍小聰明”。

我們根據性別範疇對事物分類，稱樹木為陽性，稱草類為陰性——多麼武斷的說法！多麼超出真實的準繩！我們正在談起蛇：這個名稱只指扭動著的蛇，所以它也可能屬於曲折爬行的蠕蟲。多麼武斷的區別，多麼片面的執念，曲行立即會成為事物的特徵！把不同的語言並列在一起可以表明，詞語從不取決於真相，也不依賴於合適的表達——否則就不會有如此眾多的語言。所謂“物體自身”（Ding an sich，僅為純粹無關緊要的事實），語言創造者對此也相當費解，此“自身”說絕不可取。語言創造者描述的僅是事物與人們的聯繫，並用最鮮明的隱喻幫助表達。**神經接受的刺激首先轉變為意象！這是一度隱喻。意象在語音中重塑！這是二度隱喻。**每次都是知識領域的完美跨越，正常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領域。（Nietzsche, 1873/2018: 12-13）

作者認定詞語從不取決於真相。實際上，可能要說的是詞語取決於隱喻，而隱喻反映了不同語言群體對事物不同特徵的特定認知。所謂“物體本身”無關緊要，詞語的形成固然不要求科學的真相（那時的人類無須知道），但確實是當時的合適表達（那時的人類必須這樣）。因此，語言創造者描述的是事物與人們的聯繫，並藉助隱喻表達：從神經接受刺激的意象是一度隱喻，再到意象在語音中的重塑是二度隱喻。正是兩度隱喻化命名，才使人類進入事物識別或傳統知識領域。海澤（從聲音隱喻到概念隱喻）、蓋爾巴（從提喻到隱喻）都有類似論述，尼采只是把這些觀點導入所謂哲學思辨。

人們可以想像一個完全失聰者，他從來沒有聲音和音樂的感覺——就像他緊緊盯著沙子在受振動木板上形成的古巴比倫聲音圖紋，或撫摸振動琴弦尋找聲音的起因。現在他會發誓，如今必須知道人們所說的聲音，因為這些與我們的語言有關。我們相信，只有將事物的本質從樹木、色彩、雪花和花朵這些詞語中拯救出來，我們才能對其本身有所瞭解，而我們一無所有，除了與原初存在完全不相一致的隱喻。就像面對沙子想像聲音一樣，事物本身神秘的未知 X 曾被視為神經刺激（Nervenreiz），然後形成圖像（Bild），最終作為聲音（Laut）。因此，關於語言起源的任何說法和所有資料，包括後來的追求真相者、研究者、哲人的論著和構想都不合邏輯。這些構想如果不是出於“雲杜鵑之地”，那麼至少並非來自語言起源的本質。（Nietzsche, 1873/2018: 13）

尼采認為隱喻與原初存在不一致，並不反映事物本質。這種看法所隱含的是要求語言反映柏拉圖式的即脫離人類日常認知能力的真相。基本官能和生態適應決定日常認知！事物的命名與其特徵有關，人類只能根據人類的認知。至於要認識“樹木、色彩、雪花和花朵”這些事物的本質，那是語言已經發明了數萬年，實驗科學產生以後的進一步探索，並非原初給事物命名的必要條件。尼采批評關於語言起源的構想，都是來自“雲杜鵑之地”（Wolkenkukuksheim）即不切實際的理想化狀態，反過來暴露了尼采對語言起源假說持有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化要求。

6.3 隱喻與語言反映的真假

接下來，尼采抨擊語言反映的所謂真相皆為人們早已遺忘的原初假象。

那麼，何為真相？一支隱喻、轉喻、擬人化組成的流動大軍，簡言之即人類與事物關係

的總和，通過富有詩意和修辭的強化，從古至今流傳、潤色，經過長期使用，顯得牢固而公認，並對民族具有約束力——真相皆為假象，人們早已遺忘的假象；真相皆是磨損的隱喻（Metaphern die abgenutzt），原先的感官知覺早已消失；真相皆為失去圖像的錢幣，如今視為金屬而非貨幣。我們仍然不知追求真相的動力來自哪里——迄今為止，我們只聽說過為了生存而接受社會強加的義務；對於真相也就是使用通常的隱喻，即合乎信念的表達（moralisch ausgedrückt）——根據固定習俗而說謊的義務。在某些情況下，以對所有人都有約束力的方式在表達謊言。（Nietzsche, 1873/2018: 15）

尼采斷言，所謂真相即廣義隱喻組成的人類與事物關係的總和。接著筆鋒一轉，所有真相都是假象、磨損的隱喻、失去圖像的貨幣。作者諷刺，使用通常的隱喻即根據固定習俗在說謊。其實，隱喻就是隱喻，隱喻可能反映真相（或部分真相），隱喻也可能成為故意說謊的工具。刀就是刀，刀的用法取決於使用者的意圖和行為。語言的使用功能就是宣洩（情緒表達）、虛構（臆想、意願，包括謊言）、協調（祈使、禮貌）、描述（現象、原理）和問答（求解、求知）。

當然，現在人們忘記了自己確實如此。因此經過數百年習慣化，他不知不覺地以描述方式在說謊——恰恰正是通過這種無意識，恰恰正是通過這一遺忘，他才有了真實性感覺。不得不把一件事物的感覺描述為紅色的，另一事物的感覺描述為冰冷的，第三件事則被描述為無聲的，由此喚醒一種與真實性有關的信念情感——從無人信任、人人排斥和反對的騙子式謊言中，人類展示了真實性的榮光、可信和有用。他現在將其行為作為理性存在而置於抽象規則下——他不再被意外的印象，不再被感官知覺的情緒激動困擾。他把所有這些印象概括成愈發褪色而更為冷淡的概念，以便將它們與其生活和行動的媒介聯繫起來。**人們將生動的隱喻蒸發成詭異的系統，將圖像溶解成概念，依賴於這種能力區分人類與動物的一切**。（Nietzsche, 1873/ 2018: 15-16）

尼采進一步認為，人們通過無意識的描述式說謊才有了真實性感覺。人們將隱喻蒸發成系統，將圖像溶解成概念，並根據這種能力區分人類與動物。

然而每個感知的隱喻都是獨特的，沒有相等物，因此總能設法逃脫所有準則，但是這些詞項的偉大建築暴露了古羅馬語言骨灰龕的僵化規律，並通過邏輯性散發出數學固有的嚴酷和冷峻。任何被這種冷峻打動的人都難以置信，即使該詞項像立方體一樣骨瘦如柴、棱角分明，像立方體一樣可以移動，也僅僅是隱喻的殘餘。將神經刺激所引起的反映，藝術地轉移為意象幻覺，**即使隱喻並非每個詞項的生母，也仍是這些詞項的祖母**。（Nietzsche, 1873/2018: 16）

即使邏輯性的古羅馬語言，也被尼采貶低為僅是隱喻的殘餘。隱喻不是每個詞項的直接來源，也是其間接來源。歸根結底，隱喻為一切語言之根源。

6.4 隱喻是人類的世界化身

接下來尼采闡述人類自詡萬物之尺度，隱喻也就成了人類的世界化身。

如果我定義了哺乳動物，然後看到駱駝聲稱：看哪，一種哺乳動物，一個真相被揭示了，但其價值有限。我的意思是，該定義是徹頭徹尾的擬人化（durch und durch anthropomorphisch）。除了對人類而言，所含內容毫無“自身實質的真實”（wahr an sich），既實際存在而普遍正當的真實。研究者的這些真相，大體上僅在**尋求人類的世界化身**

（Metamorphose der Welt in den Menschen）。他努力將世界理解為類似於人類自身的事物，充其量也就在為同化感而戰。正如占星家認為恒星是為人類服務的，與之休戚相關。此類研究者也認為整個世界與人類緊密聯繫，與人類原始聲音的極其破損的回聲息息相關，就像人類原始意象的放大意象一樣。其方法是將人視為萬物之尺度，但從誤差出發，認定他直接面對的這些事物是純粹的物體。（Nietzsche, 1873/2018: 17）

尼采轉到知識領域，人類對事物的定義是徹頭徹尾的擬人化（廣義隱喻）。所含內容毫無事物“自身實質的真實”，而只是人類的世界化身。將世界理解為類似於人類的事物，也就在為了實現通過感覺的同化去理解事物。換而言之，隱喻是人類同化事物的工具。

只有遺忘原始隱喻世界（primitiven Metapherwelt），只有從人類想像原始力的激情體液中最初流出的大量意象趨於壯大和僵化，只有通過堅信這顆太陽、這扇窗戶、這張桌子就是真相本身，一言以蔽之，只有通過人類忘記自己是主體，而實際上是藝術創作的主體，他才能生活在某種平靜安寧和一致性中。只要他如果片刻走出這一信念的**牢獄之牆**（Gefängnisswänden），那麼其“自信”將立即無影無蹤。（Nietzsche, 1873/2018: 18）

尼采嘲諷，人類的自信來自於遺忘的原始隱喻世界。只有通過原始意象的壯大和僵化，人類才能堅信語言的表達就是真相。只有忘記了自己是這些藝術創作的主體，人類才能生活在外在和內在的一致性之中。而如果走出這一信念的牢獄之牆，其自信就會立即結束。換而言之，使用某種工具必為此工具所限，隱喻決定了人類認知的局限性。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Wittgenstein, 1921: 247）來自於此。

6.5 隱喻認知與概念建構

就像海澤一樣，尼采也討論了人類在隱喻認知基礎上建構起概念的大廈。

一位喪失了雙手的畫家，想通過歌聲來表達心中的意象。在這種跨領域變換中，甚至神經刺激與所生意象的關係也不必要，這比經驗世界違背事物本質的程度更嚴重。然而，**如果同一意象已經產生數百萬次，並在許多人類族群中流傳下來，並且確實每次都在同一場合出現在所有人類面前，那麼它最終對人類具有了相同意義**，彷彿是唯一必要的意象，就好像原始神經刺激與傳統意象的聯繫存在嚴格的因果關係。一個永遠重複的夢，怎麼就被感知並斷定為現實。即使隱喻穩定而刻板，也不能保證隱喻的必要性和獨佔正當性。（Nietzsche, 1873/2018 : 18-19）

之所以人們認為原始神經刺激與傳統意象的聯繫存在因果性，是因為同一意象已經產生數百萬次並在許多種族中流傳下來，最終對人類具有了相同的意義。尼采將其比喻為一個不斷重複的夢被斷定為現實。

在行星運動和化學反應中，所有使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規律性，都與我們帶給我們事物的特性相一致，以便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隨之而來，始於我們每一感覺的藝術化隱喻構成（Metapherbildung）已經預設了這些方式，即我們的感覺就在這些方式中執行。只有這些原始形態（dieser Urformen）穩定地持久存在，才能解釋過後的概念建構（Begriffe constituirt）如何從隱喻本身重新構成的可能。這是因為這些概念是在隱喻基礎上（Boden der Metaphern）對時空和數量關係的模仿。（Nietzsche, 1873/2018: 20）

尼采意識到，原始隱喻的構成預設了人類的認知方式，人們只能在這些方式中進行認知。

因此，概念建構是從原始隱喻出發的重新構成。尼采在此提到的是時空隱喻和數量隱喻。

6.6 隱喻動力即人類的基礎本能

為什麼在語言和認知中，隱喻的力量如此強大？歸根結底，人類的基礎本能成為隱喻的動力。

這種形成隱喻的動力即**人類的基礎本能**（jener Fundamentaltrieb des Menschen），**須臾也不能離開，否則人類就會消解自己**。實際上，人們並沒有被這種情況所征服，也幾乎不可能被馴服，以至於從其昇華的產品即概念中，一個規則而固化的新世界建成了其堡壘（Zwingburg）。（Nietzsche, 1873/2018: 21）

尼采發揮前人（Heyse, 1856: 97）的觀點，強調形成隱喻的動力出於人類本能，人類離開這種本能也就消解了自己。但是人類不會止步於隱喻，而是要從隱喻中昇華出概念，並形成人類的抽象世界。與之同時，這個新世界也成為人類認知的堡壘。在此，我們可以對比——“隱喻的動力即人類的基礎本能”，是把隱喻視為人類的根本天性；而“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Lakoff & Johnson, 1980），是把隱喻視為人類的生存工具。

尼采繼續描述建設“新世界”的過程。

他尋找一個新的勞作地區和不同的河床，並在神話和一般技藝中尋找寶藏。他不斷地通過設置新的意義轉移、隱喻、轉喻以混淆概念的範疇和單元。他不斷表現出創造覺醒者對所生活世界的渴望。這個新世界色彩斑斕、漫無規則地不相連結、卻富有魅力且永恒存在，如同夢幻的實際世界。（Nietzsche, 1873/2018: 21-22）

面對新的活動和事物，人們不斷地設置新的意義轉移、隱喻、轉喻，從而混淆了概念的範疇和單元。不斷地創造新的世界，製造新的夢幻。

帶著創造的樂趣，他迷戀於隱喻，並移動抽象範圍的界石而變得越發瘋狂。因此，例如，他將溪流描述為將人帶到任何地方的可移動道路。如今，他已經拋棄了被役使狀態的痕跡——否則，他會試圖以憂鬱的活動來表現獨特的貧困。為了生存，他渴望方法和工具，就像為了主子的僕人，拚命想要搶劫和分贓。現在他已成為主人，臉上的寒酸相可能已經徹底消失。無論他現在做什麼，與他以前的行為相比，一切都是扭曲的，因為前者本身就是失真的。……從這些直覺感知中，沒有一條規則的道路會通向幽靈般謀劃的抽象土地。對此而言，這種抽象的詞尚未造出來，當人們看到它們時會沉默不語，或者用純粹禁忌的隱喻和聞所未聞的概念說出來，至少為了創造性地匹配當前直覺感知的強烈印象，不屑摧毀和蔑視舊的概念堡壘。（Nietzsche, 1873/2018: 23）

為了生存和主宰世界，人們必須把大量隱喻用於表達抽象事物。但是，因為原始隱喻就是失真的，所以此後做的同樣扭曲了真相。為了與當前直覺感知的印象匹配，新的抽象詞也就衝出了舊的限制。

尼采對隱喻的解析和真相的揭示，就要收場了，最終把矛頭指向“理性的人”或“尋求真相的人”。

有些時代，理性的人和自我克制的人都存在！他原本只是尋求真誠、真相，免於欺騙和免受蠱惑的侵襲。此刻，在不幸之時，他也會像幸運者那樣展現裝腔作勢的傑作。他沒有流露出抽搐而變形的臉，好像帶著一副維護體面的面具。他沒有發出尖叫，甚至沒有改變嗓音。當一

團烏雲傾瀉在身上時，他就會把自己裹在斗篷裏，在斗篷下慢慢離去。（Nietzsche, 1873/2018: 23-24）

此為結束語。理性的人原本只尋求真誠和真相，免於欺騙和蠱惑。不幸的是，語言的隱喻本質被揭示，理性的人卻只有悄然回避。至於為什麼這樣，其實，尼采已經指出“這種形成隱喻的動力即人類的基礎本能，須臾也不能離開，否則人類就會消解自己”。

《論非信念意義上的真相與謊言》在譏刺隱喻的同時揭示了隱喻的若干特性，當然，作者行文中也充斥著若干隱喻，仍然逃不出人類的本能。認識論的求真，要求超越人類認知能力的真相（就像柏拉圖一樣）；雄辯術的應用，人類只能採用隱喻認知和表達而要避免濫用（就像昆體良一樣）。因此，尼采的困境也就是二者之間的衝突。認知官能決定了認知方式及其結果。基於官能感知，從感歎 / 擬聲（原始聲喻）到衍聲（聲音隱喻），再上升到精神詞語（概念隱喻），人類的語言系統就這樣逐步建立起來。就系統本身而言，隱喻本身無所謂真假。語言表達的真實或虛假，取決於語言的運用即表達內容。至於人們的話語行為中，到處可見含混的說法、虛假的描述、故意的謊言，其實與語言自身的隱喻性質並無直接關係。

當時尼采正在講授古代修辭學，應瞭解古希臘修辭學家、哲學家高爾吉亞的看法。在《論不存在》（*On Non-Existent*）中，高爾吉亞提出三個連貫性論點：1. 沒有存在（真相）；2. 即使有，也不能被人類認知；3. 即使可能認知，也肯定無法向別人傳達或解釋。（McComiskey, 1997: 45-49）這些論點意在駁斥自然學派的“真相標準”（tês alêtheias kritêrion）。依據“有無相成”可以推出：1. 世界有人類能夠感知的存在或相對真相；2. 相對真相能被人類感官及想像力所認知；3. 其認知能通過隱喻化而相對傳達或解釋。所謂世界的存在或真相，即人類隱喻化認知的建構。

七、布林克曼 1878：建立天然隱喻系統和隱喻研究雙向方法論

德國語言學家布林克曼（Friedrich Brinkmann, 1828-?）著有《隱喻：現代語言精神的研究》（1878）、《法英句法的表徵對比》（*Syntax des französischen und englischen in vergleichender Darstellung*, 1884）。前者手稿完成於 1870 年。導論包括四章：研究目的和旨趣，隱喻的本質，隱喻研究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總體目的是從歷史和共時兩方向建立天然隱喻系統。

7.1 隱喻意義網絡與隱喻哲學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隱喻研究的難度。

然而，現在一個詞的所有意義中，絕大多數都不是原始的感性意義或由隱喻構成的意義，如同絕大多數創造意義的理論彷彿都是對隱喻的理性表達。迄今這些隱喻在詞典中專門對待，因此隱喻詞獨具特色，它們經歷過不完全變化狀態。（Brinkmann, 1878: 3）

詞典中收錄的詞語，大部分義項已不是由隱喻構成。詞典中收錄的特色隱喻詞，也經歷過變化狀態。這些都給隱喻研究造成困難。

如果由於對待隱喻缺乏懷有崇高感，人們甚至連單個隱喻也遠未能夠解釋正確，更沒有可能正確理解整個**隱喻意義網絡**（Geflechte seiner metaphorischen Bedeutungen）中的單個隱

喻詞，那麼人們自然就更遠離對隱喻理性表徵的最終果實，即這些自身開放的語言之花，經科學培養而成的最盛開花朵的知識。從而，人們自然也就遠未認識到隱喻作為**人類心靈的啟示**（Offenba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作為人類外部和內部世界的**忠實鏡像**（treuer Spiegel）、作為人類歷史上許多事實的紀念碑的崇高價值，這些都可以用**隱喻哲學**（Philosophie der Metaphern）加以概括。（Brinkmann, 1878: 4）

作者提出了“隱喻意義網絡”（相當於隱喻心智場），以之作為正確解釋隱喻的基礎。作者提出了“隱喻哲學”（相當於認知隱喻哲理），以便探討隱喻在人類心智對世界的鏡像認知以及歷史上隱喻認知事件的一系列重要價值。

7.2 隱喻在句子中的使用特點

在第二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具體研究隱喻在句子中的使用特點。

A. 簡單句中的成分隱喻

如果我們假定隱喻是譬喻的縮略形式，那麼最初出現的最簡隱喻形式就是：1）需要特指的詞通過連繫動詞與意象連接，可以說處於譬喻和隱喻的臨界。2）由連繫動詞連接的隱喻，在語法和邏輯上接近而被稱為述詞。3）隱喻以連繫動詞的句子形式也可作為關係從句出現。這樣的縮略是同位關係。4）關係從句的另一縮略是感歎語和招呼語。5）兩個名詞之間的屬格關係與同位語密切相關。6）屬格的同位語仍屬隱喻形式，可追溯到“X 是 M”格式。7）在其他句法關係中，隱喻名詞能與不同的名詞並置。除了由形容詞表述的定語，隱喻都受到動詞陳述力的影響，從而使其成為主語、直接或間接賓語。（Brinkmann, 1878: 44-48, 50, 55）

B. 作為複合句成分的隱喻

1）更準確地確定或凸顯主句中的隱喻化名詞，最簡方法就是通過關係從句（或用分詞縮略）確定。2）隱喻也可通過狀語性連詞從句來實現。通過包含在主句中的隱喻，可以更細地確定所涉時間、目的、條件和方式。3）比較從句也可採用狀語性連詞從句和關係從句的同樣方式，以補充並完成主句的隱喻，但通常以縮略式出現。（Brinkmann, 1878: 82, 84, 88）

C. 確定單獨隱喻需要幾個主句

隱喻表達首先出現在主句中，然後以與前面的類似方式在後續主句中確定。這些句子也不妨形成由幾個從屬連接組成的單句，因為它們可以彼此獨立並置。（Brinkmann, 1878: 88）

作者的總結是：

然而，通過以上討論的這些思維形式，我們已經到達形象表達所能到的最高點，它們代表了隱喻修辭的成熟之花。而同一種的其他部分，有些則是含苞欲放的蓓蕾，有些仍是未綻放的花冠。最多樣化的花束，可由所有這些語言之花組成。纏繞花束的藝術，就像任何其他藝術一樣，需要天賦和實踐。而且就像在任何其他藝術領域一樣，只有天才方能達到最高的造詣。（Brinkmann, 1878: 93）

隱喻是語言之花，隱喻在句中的使用如同纏繞花束的藝術。布林克曼的這些研究是前人沒有做過的。

7.3 隱喻研究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

在第三章中，作者提出，隱喻對人類思維以及探究精神十分重要，隱喻豐富了我們的

知識。

在我們對隱喻的素材和語音聯繫獲得清晰認識之後，在我們提供了大量隱喻例子之後……我們現在可以繼續回答這些問題——隱喻在語言中的價值是什麼，它們的用途是什麼，它們能為什麼目的服務？（Brinkmann, 1878: 93）

假如不是同時說明隱喻的用途，那麼我們也就無法討論隱喻的本質。但是我們現在的任務，應詳細說明先前只是泛泛而言的內容，從而彰顯與前文所討論隱喻的很不相同的價值。這就是隱喻在語言中的實踐價值，也涉及隱喻在語言中的理論價值。我們不禁要問：語言生活中的隱喻是如何服務並表達思想的需求的？在此：作為人類心智的產物（Erzeugnisse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隱喻對人類的思維及精神的探究有何重要性，它們以何種方式有助於豐富我們的知識？一方面，人類語言創造了思維的隱喻；另一方面，憑藉隱喻可以發現人類的精神探索。（Brinkmann, 1878: 93）

在第四章中，作者提出隱喻的理論價值是，通過觀察歷史上的隱喻能得到許多教益，可以瞭解隱喻本身包含的各種觀念。

我們現在轉向揭示隱喻研究的理論價值。換而言之，正如我們目前要回答的問題：在賦予思維形式方面，隱喻為我們提供了什麼服務，為所有人類提供了什麼服務？現在讓我們提問：通過觀察歷史上的隱喻，我們能得到什麼教益？隱喻本身包含了什麼觀念？這關乎其形式意義，也涉及其實體意義。因此，我們已經觸及要討論的主要話題，所有上述內容只應為我們稍後將要詳細描繪的隱喻系統鋪平道路。（Brinkmann, 1878: 119）

7.4 遵循形成路徑建立天然隱喻系統

在列舉多種語言大量隱喻詞或為“詳細描繪的隱喻系統鋪平道路”之後，布林克曼提出，隱喻研究要以科學而系統的表徵理論為指導。

我們必須牢記，以上是我們觀察隱喻表徵的主要考慮方式（指句子中的隱喻考察——引註）。而除此之外，還有第二種考慮方式，雖然隱喻的數量沒有前者那麼多，但是可以為此研究帶來更切實、更密切、更直接的好處，而以優先方式與前者競爭。這就是隱喻本身間接地從對其精神內容審視中獲得的益處即映射於其上之光，試圖從隱喻中認識語言的精神和詩意。當我們說，我們的隱喻表徵以唯一可稱為科學而系統的表徵理論為指導進行研究時，我們並不認為言過其實，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通往隱喻的完整系統。（Brinkmann, 1878: 11-12）

觀察隱喻表徵的另一考慮方式，就是從隱喻中認識語言的精神和詩意。布林克曼由此提出，根本上僅有兩種隱喻系統。

要將兩個或多個隱喻聯繫起來，只有兩種可能的方式：或基於表達，或通過思考，因此根本上僅有兩種隱喻系統。或者我們組裝基於相同感官概念的隱喻，並根據感官對象的自然語境安排由此發現的各個隱喻群；或者我們要求這些隱喻表達相同的思想，並根據隱喻中表達觀念和概念的程度不等的親緣力加以安排。這兩種方法各有優勢，但必須認為前者更重要，從而通向實際的天然隱喻系統，而後者僅使之擴展。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充分而全面地理解個體隱喻與詞根的感官感知及其他隱喻的密切聯繫。這些隱喻從同一詞根和相關詞根湧現出來，由於某些一致的特徵，往往顯露出其親緣關係。單個隱喻在其多個分支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向整個隱喻植物茁壯成長的最外層、最高分支的轉變，致使這些分支往往與詞根極其不同，只能

通過中間環節來理解。簡而言之，**只有這種方法遵循隱喻形成所經歷的路程，從而建立在其上的系統才值得稱為天然隱喻系統**（natürliche System der Metaphern）。（Brinkmann,1878: 12-13）

一種是基於表達自然形成的隱喻系統，一種是通過思考按照親緣力安排的隱喻系統。只有遵循隱喻自然形成的歷程，才能建立天然隱喻系統。

7.5 隱喻系統研究的雙向方法論

在“導論”最後，作者強調隱喻系統研究的雙向方法論。

如果我們從兩個方向來探索隱喻領域，那麼首先是垂直方向，即由下而上地從感官表達的根源到隱喻的表達，然後是水平方向，即從隱喻到隱喻的橫向聯繫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完成任務。（Brinkmann,1878: 119）

一方面是隱喻形成的歷史追溯，一方面是隱喻之間的橫向聯繫。換成通行的表述，就是“歷史的”和“共時的”研究。這種雙向方法論始於施萊歇爾（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受自然史研究的啟迪，他在《歐洲語言的系統性綜述》中提出“系統”（Systems）研究和“歷史”（Geschichte）研究的區別，二者分別顯示了縱剖面的對象和橫截面的對象。（Schleicher, 1850: 37）施萊歇爾的學生、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博杜恩（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845-1929）引進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靜力學和動力學理論，在《關於語言學和語言的若干原則性看法》（1871）中提出語言的“靜態”（статика）研究和“動態”（динамика）研究。（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1871: I: 65-66）布林克曼的雙向方法論體現了這一學術思潮。

《隱喻：現代語言精神的研究》體量巨大（共 600 頁，其中導論 211 頁，第一卷 370 頁）。第一卷是“語言的動物形象”（Die Thierbilder der Sprache），包括 16 類（狗、馬、驢、騾、貓、牛、山羊、綿羊、豬、小雞和雄雞、鵝、鴨、火雞和孔雀、天鵝、鴿子、蜜蜂），也就是作者遵循隱喻自然形成歷程，建立天然隱喻系統的成果。既分第一卷，應有第二卷。但經網絡檢索，未見第二卷（也許作者並未完成或刊行）。作為德國學者的第一部隱喻研究專著，與前人相比，布林克曼的突出貢獻在於隱喻研究方法論的探索。

八、比澤 1893：隱喻哲學的全面探索

德國語文學家、文學史家比澤（Alfred Biese, 1856-1930），早年在波恩等大學學習古典語文學。1878 年任文法學校教師，1899 年成為紐維德文法學校校長。在此期間，著有《隱喻哲學：基本線索描繪》（1893）。扉頁引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格言：“人永遠不明白他是多麼擬人化”。歌德《格言與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的原文是：

特定總是受制於一般。一般必須永遠屈從於特定。沒有任何人是各種產物的真正主人，都必須這樣認為。大自然開始顯示其表面秘密，人就會感到對藝術（最有價值的說明）無法抗拒的渴望。時間本身就是要素。**人永遠不明白他是多麼擬人化**（Der Mensch begreift niemals, wie anthropomorphisch er ist）。沒有心靈上的差異，（事物）也就沒有差異。在顯花植物中還有那

麼多的隱花植物，以至於幾個世紀都無法揭秘。（Goethe 1960: 503）

除此，比澤還引用了保羅、馬克斯·繆勒、蓋爾巴、尼采、布林克曼等的論述。《隱喻哲學》（全書 231 頁）的正文六章為：兒童想像中的隱喻；語言中的隱喻；神話中的隱喻；宗教中的隱喻；技藝（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詩歌）中的隱喻；哲學（古典哲學、新興哲學）中的隱喻。可謂洋洋大觀，堪稱 19 世紀隱喻研究的集成之作，有興趣的學者可以進一步鑽研。

8.1 隱喻是原創的必要思維形式

作者在“前言”中強調隱喻的普遍價值。

沒有任何構成物體比人類自身活動和所受苦難更容易讓人類理解了，因此原始人尤其會以此來解釋自然界中的每一過程。人類用其肉體與靈魂類比。因此隱喻並非詩意的比喻，而是原創的必要思維形式（ursprüngliche, notwendige Anschauungsform des Denkens）。**我越是認識到源於自然靈感的語言形式對一般自然感覺的重要性，就愈發意識到隱喻的普遍價值。**（Biese,1893: v-vi）

在“引言：何為隱喻？”中，作者進一步闡發了隱喻表面上是修辭手段和詩意比喻，其實是“自然且必然的表達方式”。

然而，無論何人在語言、思想和詩歌中努力追尋隱喻的跡象，他就一定會發現語言中有一些共同點，尤其是在詩歌中被視為人為修飾或藝術性的表達方式。作為修辭和詩意手段，**隱喻其實是一種自然且必然的表達方式**。隱喻方式不僅在語言中，而且在我們整個精神生活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隱喻是內在與外在的融合，即外在的內化以及精神的化身，是我們精神本質的必然表達。無論以何種形式顯現，**隱喻都是我們整個精神存在中心（我們姑且稱為人類中心觀）的自然流露，這種需求就是將自身作為萬物的尺度**。通過唯一充分已知的，即我們自身的內在和外在生活，使得這些外在的陌生事物變得可進入和可理解；另一方面，在語言和藝術、宗教和哲學中，**隱喻塑造我們內心的所有動機，思想和感受**。（Biese,1893: 2-3）

接下來，比澤引用了保羅的觀點。

然而，這朵微小的詩意之花卻足夠宏偉，可以將其芳香洋溢到外部和內部世界，因為“形象化才智既能使身體充滿活力，也可以體現其精神”。保羅對此非常清楚，作為一致性存在，人類只能通過抽象來分離和區別其存在的這兩方面。（Biese, 1893: 11）

比澤意猶未盡：同樣正確，保羅談到人類一旦把自我從世界中分離出來，就不得不將其自我借給世界。人格化是蒙昧人創造的第一個詩意形象，隱喻是人格化的縮略。他們把身體的活力化（Beseelen des Körperlichen）稱為意象比照（如 der Sturm zürnt“風暴在怒吼”），這比精神的具體化（Verkörperung des Geistigen）還要早（如 der Zorn ist ein Sturmwind“憤怒是一陣暴風”）。（Biese, 1893: 12）

8.2 從幼兒思維及其表達的隱喻入手

幼兒思維及其表達的隱喻，是比澤具體研究的起點。德國語言學家湯瑪斯（Robert Thomas, 生卒未詳）在《關於語義演變的可能性》（1894）中述評《隱喻哲學》時指出：

首先，作者證明了幼兒想像中的隱喻，在此，活的物體與死的物體之間沒有區別。語言是隱喻的：（1）語言本身是靈魂的聲音化身，如同物化聲音的精神化；（2）一方面因為感官詞的

意義可轉移為精神詞，另一方面因為無靈魂物體也可生趣盎然，比如對無生命物體也賦予性別。（Thomas, 1894: 733）

比澤在“結語”中寫道：

我們從幼兒的思維和表達方式以及一般語言生活入手。我們揭出隱喻構成了語言的基礎，每個詞最初都是比喻（Tropus）。顯然，古老的和新近的修辭學和詩學的通常解釋，即隱喻是一種言辭手段和詩意點綴，純屬皮毛之見，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比喻縮略理論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這種語言現象在每個兒童早期就已顯而易見，並貫穿於如今和過往持續變化的心照不宣的語言中。我們如何能歸因於更普遍的原則，即與隱喻有關的現象是否也見於我們其他的精神生活。因此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挖掘，以便找到語言表達方式的根源。這種連陌生人也能理解的，以感官覺表徵精神（des Sinnlichen für das Geistige）和以精神表徵感官覺（des Geistigen für das Sinnliche）的根源存在於我們人類自身。（Biese, 1893: 217-218）

在哲學體系中，只有戰勝自身才能識別隱喻的性質。而通過人類心智，許多哲學體系早已形成並戰勝了自身——思和詩將永保隱喻性（das Denken und Dichten wird allezeit metaphorisch bleiben）。這是人之極限和榮耀，這是人類中心觀的體現和造物主賜予人類的禮物。（Biese, 1893: 226）

本文不可能對《隱喻哲學》（共 229 頁）中討論的語言、神話、宗教、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詩歌、古典哲學、新興哲學隱喻逐一介紹（需要另作專題研究）。姑且引出托馬斯《關於語義演變的可能性》中對《隱喻哲學》的總評。

作者以其人類“自然感覺發展觀”而聞名，他承諾在該書中全面考察隱喻的內容，並通過人類生活的精神表達加以驗證。對他而言，隱喻是內在與外在、精神與物質存在的和諧；正如隱喻並非言辭的隨意點綴，而是人類“自然而必要的表達方式”……。因此，對我們而言，根據我們的精神－肉體本性，隱喻是必要的觀察和思維形式。我們不斷地將我們的雙重存在（肉身與精神——引註）轉移到我們自己之外的事物上。但是我們也能將精神事物帶到意識中，並僅以官能感知的意象表達出來。總之，這就是該書的主要思想，它體現了歌德的格言：“人永遠不明白他是多麼地擬人化”。（Thomas, 1894: 733）

8.3 托馬斯對隱喻和轉喻的闡述

受比澤《隱喻哲學》的啟發，托馬斯在《關於語義演變的可能性》中，把語義演變分為兩種：一種是處於同一概念域的語義演變，另一種是轉入另一概念域的語義演變，即轉喻和隱喻引發的語義演變。

最近，比澤在《隱喻哲學》…… 中全面揭示了隱喻形成的根源所在……。隱喻並非言辭的隨意點綴，而是人類思維和言語的必要形式。在我們對精神概念的表達中，此點最為明顯，因為我們只能設想意象中的精神。在許許多多情況下，精神概念中的基本感官意義已經消失，只能對之進行科學探究。（Thomas, 1894: 714）

神話起源於通過人格化理解所有自然力及其過程的強烈慾望。……宗教植根於原居民對自然的靈感啟發和對死者靈魂延續的隱喻信仰。即使宗教的最高層次，也離不開那些對超感官世界的象徵與比喻，雖然這些會變得愈發微妙和深邃。（Thomas, 1894: 733）

隱喻在新詞語的命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人類需要觀照其心智狀態和實際情況

時，他借用官能感知實體的詞，最初不僅隱喻化援引，而且還轉喻化援引。然而，在選擇隱喻化的名稱時，只有處於意識前景區的隱喻才具備激發想像力的優勢。想像力是隱喻化轉移的中介，但也並非固定不變的中介。人們經常指出，羅馬人更喜歡農業和戰爭的意象，而希臘人更熱衷海洋生物和競技的意象。（Thomas, 1896: 197-198）

一般而言，想像力是隱喻化轉移的中介。具體而言，不同的民族生態和活動傾向於不同的意象，由此形成不同的隱喻特色。

九、餘論

學術論著須有文獻綜述。只有對以往研究認真梳理，才能確定自己的研究哪些是對以往的反駁或修正，哪些是基於前人觀點的推闡，哪些才是創見。遺憾的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1980）沒有文獻綜述，使人誤以為此前只有隱喻修辭觀，而隱喻認知觀橫空出世。

17 世紀至 19 世紀初的隱喻研究另述，19 世紀德國學者的隱喻理論已經令人目不暇接。萊斯格（Reisig, 1825/1839）提出提喻、轉喻、隱喻屬於語義學理論，都是詞義變化的途徑。波特（Pott, 1853）探討來自生命及身體活動的隱喻。海澤（Heyse, 1856）強調整個語言徹頭徹尾都是比喻，隱喻是創造語言之想像力的自然表達，論述了聲音隱喻、概念隱喻和語言概念系統。最初的詞是聲音直接感知模仿的擬聲符號；以同樣聲音形成的詞是聲音隱喻；詞在意義上的轉移形成概念隱喻，概念隱喻將該詞從感官意義引導到抽象的精神意義；語言概念系統可以提供人類語言和精神的總體圖景。蓋爾巴（Gerber, 1871/1885）主張語言源於人類的藝術本能，所有詞都是來自比喻。提喻是與空間意象有關的一度隱喻，而隱喻是與想像意象有關的舊詞重釋的二度隱喻。尼采（Nietzsche, 1873/2018）論述了一度隱喻（神經接受的刺激轉變為意象）和二度隱喻（意象在語音中的重塑），形成隱喻的動力即人類的基礎本能，即使富有邏輯性的表達也是隱喻的殘留。原始隱喻結構預設了人類的認知方式，只有基於原始形式才能解釋概念如何從隱喻本身的再建構。布林克曼（Brinkmann, 1878）詳細分析隱喻在句中的使用。不但討論了隱喻的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而且提出了隱喻研究的雙向方法論（一方面是隱喻形成的歷史追溯，一方面是隱喻之間的橫向聯繫），嘗試建構天然隱喻系統或隱喻意義網絡。比澤（Biese, 1893）在“隱喻哲學”的名義下，彰顯隱喻是原創的必要思維形式，全面探討兒童思維和表達、語言、神話、宗教、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詩歌和哲學中的隱喻。由此顯示，19 世紀德國學者的隱喻研究已經從語義變化深入到隱喻本能、聲音隱喻、概念隱喻、概念系統、概念建構、隱喻認知理論以及隱喻研究方法論，並把建構天然隱喻系統或隱喻意義網絡作為主要任務，以“隱喻哲學”為新的理論建樹目標。

隱喻的認知研究並非新課題。通過對 19 世紀德法英美學者隱喻研究的分別追溯，可從總體上概括各自特色。英美學者強調隱喻是語言的初始質地，更為關注褪色和未褪色隱喻、根本隱喻和詩意隱喻，以及隱喻心理或認知的發展階段，顯得詩情畫意。法國學者則基於心智和社會立場，更為關注隱喻在語義變化中的類型和作用，彰顯其語義學內涵。至於德國學者則從語義變化深入到隱喻本能、聲音隱喻和概念隱喻、概念系統和概念建構，從各領域隱喻的考察上升到隱喻哲學，更具哲理和思辨色彩。一言以蔽之，英美學者的名言是“賴以生存的資本”

（Müller, 1888）、法國學者的名言是“建立隱喻博物館”（Bréal, 1897），而德國學者的名言是“隱喻是人類的基礎本能”（Nietzsche, 1873/2018）。

參考文獻

李葆嘉 2022 序：無冥冥之志則無昭昭之明，載李為政著《基於詞義基因的漢語起源弱任意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葆嘉、劉　慧 2014 從萊斯格到布雷亞爾：十九世紀西方語義學史鉤沉，《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劉大椿 2009 隱喻何以成為科學的工具，《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

牛宏寶 2013 英美語言哲學隱喻研究及其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6 期。

Aristotle. 350 BC/1922.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 by S. H. Butcher. London: Macmillan.

Aristotle. 335 BC/1924. Rhetoric. In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XI*. Trans. by W. R. Rober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ernhardi, August Ferdinand. 1803. *Sprachlehre. Zweiter Theil. Angewandte Sprachlehre*. Berlin: Heinrich Frölich.

Bernhardi, August Ferdinand. 1805. *Anfangsgründ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Heinrich Frölich.

Biese, Alfred. 1893. *Die Philosophie des Metaphorischen: In Grundlinien dargestellt*. Hamburg und Leipzig: V. Voss.

Black, Max.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Madri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lack, Max.1993. More about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1871.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и и языке. In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знанию*, T. 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Академни Наук СССР.

Bréal, Michel. 1863. *Hercules et Cacus, études de mythologie comparée. Mélanges de mythologie et de linguistique*. Paris: Hachette.

Bréal, Michel. 1897. *Essai de Sémantique (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 Paris: Hachette.

Brinkmann, Friedrich. 1878. *Die Metaphern: studien über den geist der modernen sprachen*. Bonn: Verlag von Adolph Marcus.

Cicero, Marcus Tullius. 55 BC/1860. *De Oratore*. *Cicero on Oratory and Orators*. Trans. by J. S. Wats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Darmesteter, Arsène. 1887. *La vie des mots étudiée dans Leurs significations* [M]. Paris: Delagrave.

Gerber, Gustav Eduard. 1871/1885. *Die Sprache als Kunst. Zweite auflage*. Berlin: R. Gaertners Verlagsbuchhandlung H. Heyfelder.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960.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In *Kunsttheoretische Schriften und Übersetzungen, Bd. 18*. Berlin: Aufbau-Verlag.

Heyse, Karl W. Ludwig. 1856. *Syste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F. Dümmler.

Humboldt, Wilhelm. 1836.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Berlin: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Kopperschmidt, Josef. 1999. Nietzsche's rhetorical philosophy as critique of impure reason". In B. Babich & R. S. Cohen (eds.), *Nietzsche, Theories of Knowledge, and Critical Theory.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3: 199-207. Dordrecht: Springer.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Comiskey, Bruce. 1997. Gorgias, on non-exist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text in Hermann Diels'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Philosophy & Rhetoric* 30(1): 45-49.

Meijers, Anthonie & Stingelin, Martin. 1988. Konkordanz zu den wörtlichen Abschriften und Übernahmen von Beispielen und Zitaten aus Gustav Gerber: Die Sprache als Kunst (Bromberg 1871) in Nietzsches Rhetorik-Vorlesung und in

"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Nietzsche-Studien* 17: 350-368.

Müller, F. M. 1888. *Biographies of Words and the Home of the Aryas*. London: Longmans Green.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73/2018.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ßermoralischen Sinn*.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Paul, Jean. 1804. *Vorschule der* Ästhetik. Hamburg : Friedrich Perthes.

Peirce, Charles. 1932.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II. Elements of Logic*. C. Hartshorne & P. Weiss (ed.), M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ato. 380 BC/1892. Gorgia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Vol. II*. Trans. by B. Jow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tt, August F. 1853. Metaphern, vom leben und von körperlichen lebensverrichtungen hergenomm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s Deutschen,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2: 101-127.

Quintilian, Marcus Fabius. 1922. *Institutio oratoria Book 8*. Trans. by H. E. Butl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Reisig, Christian Karl. 1825/1839. *Professor K. Reisig's Vorlesungen über die latei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Hrsg. mit A. von F. Haase. Leipzig; Lehnhold.

Richards, Ivor Armstrong.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75. *La métaphore vive*. Paris : Seuil.

Saussure, Ferdinand.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Schleicher, August. 1850. *Die Sprachen Europas in systematischer Übersicht: 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en. Bonn: H. B. König.

Searle, John R. 1979.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thal, Heymann. 1860.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s*. Berlin: F. Dümmler.

Thomas, R. 1894. Ueber die Möglichikeiten des Bedeutungswandels I. *Blätter für das Gymnasial-Schulwesen*. 30: 705-736.

Thomas, R. 1896. Ueber die Möglichikeiten des Bedeutungswandels II. *Blätter für das Gymnasial-Schulwesen*. 32: 193-219.

Welby, Victoria. 1893. "Meaning and Metaphor". *Monist* 3(4): 510-525.

Whitney, William Dwight. 1875.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An Outline of Linguistic Science*. London: Henry S. King.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14: 185-262.

李葆嘉　哈爾濱　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nsdlbj@126.com

Metaphor as a Human Instinct: Documentation of 19th-Century German Scholars' Metaphor Theories

LI Baojia

Abstract: The study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cognition has a long history. This article reviews ancient books to provide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metaphorical theory of 19th-century German scholars. The founder of semantics, Reisig (1825) proposed that metaphor is a pathway for semantic change. Pott (1853) studied metaphors derived from life and physical activity. Heyse (1856) proposed that metaphor is a human instinct and discussed sound metaphor,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conceptual systems. Gerber (1871) advocates that language originates from human artistic instincts, synecdoche is a first degree metaphor based on spatial imagery, and metaphor is a second degree metaphor based on imaginative imagery. Nietzsche (1873) believed that metaphor is the fundamental instinct of human, and the primitiv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presupposes human cognitive patterns, based on which concepts can be reconstructed. Brinkman (1878) elucidated the two-way methodology of metaphor research and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natural metaphor system. Biese (1893)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metaphors in children, language, mythology, religion, architecture, sculpture, painting, music, poetry, and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metaphorical cognitive theories can be found in the relevant works of German, French, British and American scholars in the 19th century.

Keywords: metaphor; semantic turn; conceptual metaphor; metaphorical instinct; philosophy of the metaphorical

境外語言學著作文摘

主題：句法語義、語言接觸、語用與話語分析等

Abtracts of Linguistic Works Published Outside China's Mainland

Theme: Syntax, Semantics, Language Contact, Pragmatics, Discourse Analysis, etc.

［+ 話題］特徵及其句法效應的跨語言研究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TOPIC] as a Syntactic Feature and Its Syntactic Effects

姓名：樊留洋　郵箱：fanliuyang.cl@outlook.com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5。

話題是當代語言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漢語語法學界關心的核心問題。由於漢語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語法結構亦較為靈活，因此對話題的性質界定存在嚴重分歧，延伸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更是引起激烈爭論。文章以普遍語法為理論背景，從句法功能特徵的全新角度切入，對跨語言中話題及其相關結構進行重新分析，系統深入探討［+ 話題］特徵及其驅動的句法效應，以期實現對世界語言中和話題有關語法現象的通盤考慮和統一處理。

通過對跨語言中話題結構的全面考察和現有話題定性觀點的仔細疏理，文章指出，原本屬於語用層面的“話題”進入句法運算系統後，能夠形式化為句法功能特徵“話題”，並在不同語言中驅動“添加話題標記”“話題移位”和“話題重疊”等多種句法效應。一言蔽之，即“話題”本質上是帶有語法效應的語用概念。在此基礎上，文章考察了現有句法功能特徵的類型及其異同，進一步明確［+ 話題］特徵的性質是“句成分功能特徵”，作用範圍是其依附的句法成分，而並非全句。繼而提出句成分功能特徵的處理框架，認為話題和焦點等句成分特徵並非由 CP 層分裂而來，而是如格位一般附著在句法成分上。這不但能夠承襲現有認識的合理之處，也能圓滿解釋跨語言的話題結構對現有話題性質界定觀點帶來的挑戰，具有顯著的理論與實踐優勢。

基於“句成分功能特徵［+ 話題］”的分析框架，文章討論了［+ 話題］特徵的強弱、類型、指派過程和與之相關的語言類型。首先，[+ 話題］特徵存在相對的強弱差異，其強度直接決定了能否在具體語言或結構中誘發相應的句法操作。其次，明確話題在語言學意義下，只有一種，即作為一種非線性語法範疇的“語法話題”，不應區分類型。第三，可以依據語法形式對［+ 話題］特徵是否有所反應及其反應形式，劃分和話題有關的語言類型。

在跨語言視角下，文章指出［+ 話題］特徵能夠驅動三種句法效應。其一，添加話題標記：文章系統考察了話題標記在世界不同語言中的表現，並根據其典型區別建立起相應的句法

拼圖，清晰表現話題標記的句法位置及其功能之間的組合關係，系統概括世界語言中表現各異的話題標記之間的異同。其二，話題移位：話題移位的性質是語音層漂移，而不是句法層明移，並調整了語音層飄移遵循的句法語義條件。其三，話題重疊：提出重疊能夠顯著強化話題強度，其性質是介於句法重疊和語用反覆之間的語用重疊。

按照普遍語法的要求，文章對話題及其相關結構進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運用原則與參數理論，明確了話題的句法性質，系統論證了話題特徵的句法效應，圓滿解釋了相關的話題現象。文章不但深化了對話題及其相關問題的認識，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也踐行了“原則本位”的語法理論和研究方法，驗證了原則與參數理論在語言研究中持續至今的強大生命力和理論穿透力。

語言接觸視野下的陽江粵語體貌範疇研究

A Study on Aspect and Manner Categories in Yangjiang Yue: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姓名：戴瑜殷　郵箱：daiyuyin@ccnu.edu.cn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5。

漢語因缺乏屈折形態，體貌系統呈現高度複雜性，方言內部體貌形式的多樣性與接觸引發的體貌形式疊置更成為研究難點。文章以陽江粵語體貌範疇為研究對象，系統細緻描寫體貌形式的語法功能和分佈規律，並結合歷史層次分析法和語言接觸理論追溯部分體貌形式的來源。

基於體貌分立的理論框架，文章將陽江粵語體貌範疇分為“體”與“貌”兩大範疇：體範疇聚焦事件的時間結構，包括完整體、未完整體和邊緣體；貌範疇則關注動作的主觀量性特徵，分為大量貌與小量貌。在此基礎上，文章系統考察各體貌形式與謂詞類型、情狀類型、涉量賓補、時制類型的互動規律，完整呈現陽江粵語體貌系統的共時面貌，為語言接觸分析奠定基礎。

在語言接觸視角下，文章分兩層解析陽江粵語體貌系統。其一，針對層次疊置的體貌範疇，結合歷史層次分析法離析其內外源層次，梳理疊置層次的相對時間關係，並構擬相關體貌形式的接觸程序。其二，分析無層次疊置，但語法形式仍源於語言接觸的體貌範疇。總的來看，陽江粵語體貌系統中，經歷體、慣常體、動作持續體、起始體、將行體、大量貌、小量貌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其中經歷體、將行體、起始體、動作持續體、小量貌範疇呈現語法形式層次疊置。外源形式的源語既包含強勢方言官話、廣府粵語，亦涵蓋閩語、客家話等區域弱勢方言，呈現多向接觸格局。

通過對陽江粵語體貌範疇接觸個案的系統考察，文章還得出以下四點理論啟示：其一，借貸成分於受語中的語法化程度可超越源語（如陽江粵語起始體標記“浮”），此現象與源語系統的結構制約密切相關。其二，當受語為強勢語而源語為弱勢語時，借貸成分可在受語中得到保存而在源語中消亡，此現象見於陽江粵語貌系統。其三，同譜系方言間表層一致性特徵亦有可能為接觸所致而非譜系特徵承襲，如歷代官話與權威方言對陽江粵語體貌系統持續滲透。其

四，缺位和消歧是語言接觸現象的主要內部成因，如因慣常體範疇形式缺位，陽江粵語選擇借貸廣府粵語“開”的慣常體用法；陽江粵語持續體標記“緊”因兼表動作與狀態持續引發歧解，促使借入外源標記“在”專表動作持續。

綜而觀之，陽江粵語體貌系統的複雜性源於外部語言接觸與內部結構演變的共同作用。文章不僅為漢語方言體貌研究補充了新的方言材料，亦通過接觸個案分析深化對語言接觸理論的認識，為語言生態複雜區域的語法現象研究提供了個案參考。

方位和處所：從語義角色到句法實現

Location and Position: From Semantic Roles to Syntactic Realization

姓名：許筱潼　郵箱：xuxiaotong0327@163.com

原文出處：澳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5。

方所範疇是語言中描述空間位置和關係的重要現象。漢語方所的表達複雜多樣，涉及名詞的空間性、動詞的語義特徵、意象圖式以及方位詞的使用。本研究聚焦漢語方所範疇，從概念結構和句法功能兩個維度展開，探討其語義角色分類、句法實現機制及其認知動因，並通過漢英對比分析，揭示兩種語言在方所表徵上的差異。

文章首先討論了漢語方所範疇的成員類型和句法表現。方所範疇以［+/－容納性］為參項分為處所和方位兩類。處所關注實體的空間區域，與容器圖式契合，常出現在存在構式中；方位則關注實體間的關係，與路徑圖式契合，常出現在運動構式中。

同時關注方所的句法實現過程。研究發現方所的句法實現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首先，名詞的空間性是關鍵因素。強空間性名詞可直接作為方所，而弱空間性名詞需藉助方位詞或其他標記來明確空間屬性。其次，動詞的語義特徵對方所角色的實現有顯著影響。運動動詞通常引介方位，強調方向性；狀態動詞則引介處所，強調靜態空間。此外，意象圖式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例如，“V 進”構式激活容器圖式，使方所被識解為容納空間；“V 過”構式激活路徑圖式，使方所被識解為經過點。最後，方位詞的隱現也對方所的句法實現起重要作用。方位詞的出現與否取決於方所的空間維度是否需要進一步明確，如“V 到”類構式中方位詞常被省略，而“V 進”類構式中方位詞則凸顯空間維度。

基於以上對漢語方所範疇的研究，本文進一步關注漢英中的方所易位現象。通過漢英對比分析，揭示了兩種語言的方所表徵系統的顯著差異。具體而言，漢語採用動詞表徵運動、介詞表徵方向、方位詞表徵維度的三分體系，而英語採用二分體系。這種差異反映了漢英認知定勢的差異導致兩種語言對方所的凸顯程度的區別。

本文釐清了方所、方位、處所三者間的差異，在此基礎上系統論述了方位詞“裏”“上”在漢語空間表徵中的作用。通過與英語空間表徵系統的對比，揭示了漢英空間表徵系統三分和二分的區別，並且指出漢語空間表徵系統三分的認知動因是漢語“背襯優先”的認知定勢。

中國文化語境下負面情感管理的語用學研究

The Pragmatics of Managing Negative Emotions in a Chinese Context

姓名：雷容　郵箱：leirong@gdufs.edu.cn

原文出處：Routledge Press, 2025.

近年來，情感已成為國際語用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本研究從人際語用學視角對中國心理治療互動中的負面情感及其管理進行分析。人際語用學這一情感管理新興研究視角的擇取基於以下理據：一是和諧管理理論中人際和諧感知與人際情感之間的關聯；二是人際和諧感知受語用原則制約：人們依據原則所規定的社交權利與義務評判關係是否和諧。

具體而言，本研究考察心理治療師如何管理來訪者在講述其與關係親近的第三方（如父母、子女、配偶等）之間的社交關係時所產生的負面情感；這些負面情感被視為來訪者對與不在場第三方之間不和諧關係的回應。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感情”（*ganqing*）是制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等人際交往的語用原則。本研究考察以下問題：（1）當來訪者講述他們與第三方因感情原則違反而感知到的不和諧關係時，他們表現出哪些類型的負面情感？（2）心理治療師如何管理這些負面情感？

通過對自然發生的語料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當來訪者講述他們與第三方因感情原則違反感知到的不和諧關係時，表現出憤怒 / 憤怒與悲傷、內疚與憤怒（及悲傷）；（2）心理治療師主要採用了以人際關係為導向的負面情感管理方式，具體包括：替不在場第三方辯解，以改變來訪者對人際關係不和諧的評價，進而管理對方的負面情感；與參與者共同指責不在場第三方；通過明示或隱含否定等方式，替來訪者澄清與正名，進而管理其負面情感。

本研究對語用學理論的貢獻之一，在於提出“基於代理的人際關係管理”模式。在心理治療會話中，不在場第三方觸發的人際失諧引發來訪者負面情感，治療師以“修復關係”為目標實施情感管理，實質是對來訪者與第三方之間的不和諧關係進行管理。治療師根據語境需要，既替缺席的第三方發聲，也替來訪者代言，形成交際中的“代理”行為。該模式突破了以往僅關注當面交際雙方的研究框架，揭示了特定機構語境下由第三方介入、通過“代理”實現人際關係管理的新路徑。

本研究基於“感情”這一語用原則審視人際和諧，從而將以往聚焦“平等權”“交往權”等西方語用原則的研究框架，拓展至更具本土化屬性的語用維度。研究提出的“基於代理的人際關係管理”及其情感管理策略，亦兼具學術價值與現實啟示，可為心理健康實踐與和諧社會建構提供可行路徑。

推薦人：李思佳　18535475005@163.com

“我跟你說”：互動元話語在中國直播電商中的運用

“I’m telling you”: The Use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Chinese Live Streaming Commerce

姓名：劉倩、程偉　郵箱：jnucheng@126.com

原文出處：*Journal of Pragmatics* 237: 14-29 (2025).

直播電商（live streaming commerce, LSC）依託主播即時展示商品與彈幕互動，構建了高度互動與沉浸式的消費場景，而主播的話語在建立信任、拉近距離和引導消費決策中起到關鍵作用。本研究基於 Hyland（2005）提出的互動元話語（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分析框架，聚焦立場表達（stance）與介入（engagement）兩類互動性資源，以阿里巴巴淘寶直播平台 60 個直播銷售片段為語料，探討了電商主播如何藉助元話語資源促進與觀眾之間的準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即雙方雖無直接互動，但觀眾仍能與主播形成單向聯結。研究發現，互動元話語在 LSC 話語中廣泛存在且功能顯著。在立場表達方面，主播高頻使用自稱語（self-mentions，如“我”）與加強詞（boosters，如“真的”）以強化其專業形象並提升信息可信度。在介入資源方面，主播對於觀眾指稱（audience reference，如“你”）、提問（questions，如“剛搶到沒有？”）及指示語（directives，如“趕緊去搶！”）的廣泛運用則促進了主播和評論者之間的相互認知與感知同質性。這些話語策略共同構建了一種表面互惠的線上購物互動話語，從而促成觀眾對主播的想像性社會聯結。本研究將元話語研究從學術書面語拓展至媒介化的商務口語中，揭示了互動元話語在促進主播與觀眾的 PSI 中的策略性運用，為 LSC 從業者的語言實踐與培訓提供了參考。

推薦人：陳靜垚　chenjingyaoserendipity@hotmail.com

從“心”與“面子”的視角理解中國關係實踐的情感維度

Understanding Affective Aspects of Chinese Relation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eart” and “Face”

姓名：冉永平、范琳琳　郵箱：ranyongping@hotmail.com

原文出處：*The Sociopragmatics of Emotion* 149-170 (2025).

當前人際語用學研究對人際情感及關係實踐中的情感動態關注仍顯不足，尤其缺乏基於漢語真實語料的實證探討。儘管“面子”理論常被用以解釋社會交往行為，其在情感層面的闡釋力存在局限，且難以作為跨語言概念的詞彙載體。現有研究多依賴自我報告或問卷數據，缺乏對真實互動場景的深入分析。

本文突破以“面子”為主導的傳統理論框架，引入“心”（情）這一概念，強調對他人情感福祉的主動關懷。研究基於中國醫療紀錄片中的多模態互動語料，聚焦“催繳醫療費用”這一敏感場景，運用互動社會語言學方法，系統分析醫生為緩解“情感威脅行為”（heart-

threatening act）所採取的策略。研究識別出六類主要策略：喚起人情（提及過往幫助）、引導對方主動提出繳費、直接否認“情感威脅”、強調共同目標（如患者康復）、提供情感強化（承諾積極救治）與認可對方的“道德面子”。這些策略體現了“心”（情）與“面子”在互動中的交織作用，如通過維護面子間接實現情感撫慰。

在理論層面，本文拓展了語用學對情感維度的理解，驗證了“心”（情）作為文化特定概念的分析價值，推動了人際關係研究的本土化發展；在方法上，藉助真實互動語料直觀呈現“心”（情）的實踐形態，為理解現實人際互動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

推薦人：張茜、詹全旺　13272554928@163.com

重要性標記在“三分鐘學術演講”中的跨學科研究

Words that Matter: A Cross-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Importance Markers in 3MT Presentations

姓名：王倩、劉焰華、胡光偉　郵箱：guangwei.hu@polyu.edu.hk

原文出處：*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80: 91-108 (2025).

本文聚焦於學術話語中的“重要性標記”，探討其在“三分鐘學術演講”這一跨學科、高風險的學術體裁中的使用情況。該研究基於框架語義學，對涵蓋硬科學與軟科學的 120 篇獲獎演講語料進行了系統分析，並提出“重要性框架”，指出其包含“因素”（Factor）、“解釋”（Explanation）、“程度”（Degree）、“行動”（Undertaking）與“利益相關方”（Stakeholder）五個核心框架元素。該研究對跨學科學術交際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研究者提出的“重要性框架”為學術演講修辭實踐的分析提供了系統的分析工具，不僅有助於解釋“三分鐘學術演講”中的語言現象，也為會議報告、學術研討與論文答辯等其他學術體裁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其次，通過對硬科學與軟科學演講的對比分析，研究揭示了認識論傳統與受眾期待對修辭選擇的深刻影響，從而深化了對跨學科修辭差異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該研究在教學實踐中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不僅為研究生學術交流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借鑒，也為課程設計及面向公眾的學術傳播提供了實證支援與策略啟示。總體而言，該研究在理論層面拓展了學術話語分析的視野，在實踐層面回應了學術培訓與跨學科交流的現實需求，具有突出的學術價值與廣闊的應用前景。

推薦人：王一凡　wangyifan1026@outlook.com

大語言模型輔助標注在語料庫語言學與話語分析中的潛力評估：以道歉為例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LLM-assisted Annotation for Corpus-based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Apology

姓名：Danni Yu, 李璐暘 , 蘇杭 & Matteo Fuoli　郵箱：liluyang@bfsu.edu.cn

原文出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9: 4, 534-561 (2024).

在語料庫語言學研究中，一個核心挑戰在於如何提高語料庫標注的效率。人工標注雖能更準確、全面地捕捉離散的語用現象（pragma-discursive phenomena），但在可擴展性與實際操作性方面明顯不足，同時還需要專門訓練。本研究聚焦於道歉言語行為（apology speech acts）功能成分的標注，探討了大語言模型，如 GPT-3.5 與 GPT-4，在語用語料標注自動化中的潛力。實驗採用局部語法（local grammar）的標注框架，並對 Su & Wei（2018）提出的編碼本（codebook）進行了修訂。在此基礎上，設計了包含範例的提示語，要求 GPT-3.5 與 GPT-4 模型根據對應提示語進行標注。研究結果顯示，在實例層面的語用標注中，GPT-4 的表現優於 GPT-3.5。與人工標注者相比，GPT-4 的準確率達到 92.7%，僅略低於人工標注者的 95.4%。總體而言，研究結果表明，大語言模型在言語行為的局部語法標注中具有較大潛力，同時在應對不同標籤類型之間的變異方面，仍然有人工監督的必要性。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哪些標注類別較依賴人工校對。此類人機結合的混合模式將顯著減輕語言學研究者的負擔，使其能夠從繁重的人工編碼工作轉向更高層次的分析任務。

推薦人：Mariah Al Giptiah Binte Yusoff　mariah6030@gmail.com

Jakin Tan　jkintan90@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隸屬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 1966 年，前身是“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1978 年，易名為“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0 年，承蒙吳多泰先生慷慨捐資支持學術研究工作，因此命名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本中心的研究務求做到新知與舊學並重，理論及實踐結合，致力於為中國語文研究作出貢獻。

本中心有多個首創的紀錄。

歷史最悠久：本中心成立於 1966 年，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的首個研究中心，為本校歷史最悠久的研究中心。

首批 **CSSCI** 期刊：本中心編輯和出版的《中國語文研究》與《中國語文通訊》為漢語語言學領域的重要發表平台。自 2023 年以來，兩份期刊都獲選為 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是首批進入 CSSCI 來源期刊的香港期刊，《中國語文研究》更是首本進入 CSSCI 來源期刊的英文期刊。

發起博學論壇：本中心在 2015 年與中山大學共同發起“方言語法博學論壇”，2017 年復旦大學加入，並由三校輪流主辦活動。作為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論壇推動了跨地區研究，加強了學術交流和對話。“博學”二字把三校聯繫起來：香港中文大學校訓“博文約禮”的“博文”來自《論語》“君子博學於文”；《中庸》“博學之”組成中山大學的校訓；而復旦大學的校訓則出自《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博學”也象徵當代語法學的一個方向，著重類型研究，提倡比較分析。論壇以此為目標，匯聚學者，共同探索方言語法特點。

首個海上絲路活動：本中心在 2017 年舉辦的“海上絲綢之路組曲”活動，是首個以“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名義舉辦的語言學活動。2024 年主辦的“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聚焦“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語言學研究。2017 年的“一路”活動，加上 2024 年的“一帶”研討會，完整呈現“一帶一路”沿線的語言學研究情況，也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響應。

首個粵港澳大灣區聯盟：本中心在 2019 年籌辦首屆大灣區中文論壇，是區內高校相關學系代表的首次聚會，旨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校之間的合作交流，推動區內高校的研究，為區

內中文和語言學教研探索新的未來。此外，本中心積極推動成立和支撐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分別在 2020、2021、2022 年三年協辦“中國語言學嶺南書院”，並在 2024 年以聯盟名義舉辦首屆大灣區漢語語法論壇。

香港基地的創立：本中心在 2024 年與復旦大學合作，在香港設立首個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的伙伴基地，致力於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並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此外，本中心在 2025 年設立教育部語言文化國際傳播聯合研究院的首個境外研究基地，作為基地的支撐單位，助力增強語言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2025 年與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簽訂協議，共建人文學科術語研究基地，重點推動術語研究和方法構建的工作，這是該委員會首個在境外設立的研究基地。

展望未來，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將繼續肩負重要使命，兼顧中國語文的基礎和應用研究，致力推動比較研究，並重視轉化基礎研究的成果，探索應用研究、交叉學科研究等多個領域的創新發展，提供一個充滿活力的平台，為中國語言學研究的發展貢獻力量。

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2024 年）

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復旦大學）香港夥伴基地成立典禮（2024 年）

稿約

《澳門語言學刊》是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主辦、澳門語言學會協辦的專業學術刊物，刊物始創於 1995 年。國際標準刊號為 ISSN 0874-629X，屬半年刊，規格 185mm×260mm，於每年 5 月 15 日及 11 月 15 日出版發行。現任主編徐杰，執行主編袁毓林，副主編胡波。

本刊旨在為學界讀者提供最前沿的學術信息與科研成果。辦刊原則是堅持學術性，拓展思想性；追求原創性，側重信息性；尊重獨立性，鼓勵思辨性。目標是成為海內外語言學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的發表平台與信息交流樞紐。

本刊內容除常規學術論文外，還設立了“語言學爭鳴”和“境外語言學著作文摘”兩個特色專欄。前者的用稿原則是鼓勵開拓創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者擇優遴選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和國家發表或出版語言學著作、博士論文以及期刊和文集論文的摘要發表，促進境內外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傳播與交流。

本刊用稿範圍包括與漢語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句法學、語義學、語用學、修辭學、語音學、音韻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等領域以中文撰寫的論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宜。論文須有題目、提要、關鍵詞的中英文對譯。所有稿件，文責自負。文稿最後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電子信箱、手機號碼等聯絡方式。凡投給本刊的文稿，格式體例請參照本刊網頁上載的“格式樣本”（網址 https:// linguistics.fah.um.edu.mo）。

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投稿請寄 linguistics@um.edu.mo，勿寄私人，以免延誤。如對格式仍有疑問，可參照《中國語文》的格式處理。投稿者如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本刊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發佈、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對其文章進行發佈、刪改、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文章一經發表，編輯部即寄贈當期樣刊 1 冊，以申謝忱。優質稿件，稿酬從厚。

本刊電子文本可從本刊網站（網址 https:// linguistics.fah.um.edu.mo）下載。